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苹



(1958年创刊)

2021年第1期 总第 434 期 出版日期: 1月20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的哲学底蕴探析 李凤亮 杨 辉 1 哲学 重思"主客二分" ——基于主客体关系 胡敏中 7 边界与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生态演绎的反思 路 强 16 爱因斯坦的科研境界与冯友兰的人生境界 陈晓平 24 ——兼评动画片《哪吒》 "绝学"蠡测:杜国庠的因明研究 郭 桥 孔漫春 30 政 法 社会学 ・政府监管研究・ 市场所, 还是食药所 ——基层食药监管体制改革选择的行政逻辑 刘 鹏 钟光耀 39 从一元监管到社会共治: 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趋向 徐国冲 50 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及其变动 王亚柯 夏会珍 57 人民获得感:美好生活期待与国民经济绩效间的机理阐释 文 宏 林 彬 66 ——主客观数据的时序比较分析 经济学 管理学 ・"十四五"区域与城市发展・ 主持人: 张可云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尺度探讨 张可云 何大梽 74 "十四五"期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研究 孙久文 林丽群 傅 娟 83 "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策略 李文静 90 推进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管理动力系统理论的视角 郝全洪 97 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权力需求结构的扎根研究 李朋波 黄艳艳 罗文豪 104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哲学 gzphil@126.com

经济 gzecon@126.com

政法 gzpols@126.com 历史 gzhist@126.com 文学 gzliter@126.com

(月 平4)

历史学 抗战到底的"底"与最后胜利 刘家和先生学术研究的实践、特点及品格	桑 兵 111 刘林海 134
文 学 语言学 由"中"而来:中国形式美的起源、定型和内容 "西方"如何作为方法	张 法 144
——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维度与方法论立场	段吉方 157
秦"书同文"告令颁布具体时间考 王贵元	上 李洁琼 165
《周礼》鸟兽尊彝形制再议	任家贤 173

封三、封底:岭南人文图说

——孟鸿光生平及其印作书迹略论(上)

邝以明

英文摘要 177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1, 2021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Outlook
Rethinking "the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Hu Minzhong (7)
Boundary and Interpretation: Re-examination of Ecological Ded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Lu Qiang (16)
Einstein's Spher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Feng You Lan's Spheres of Living
On Du Guoxiang's Study of Hetuvidya Guo Qiao and Kong Manchun (30) Market or FDA Office?
——The Administrative Logic of Food and Drug Regulatory Regime Reform Choice in Township-level ——Liu Peng and Zhong Guangyao (39)
From Unitary Supervision to Social Co-governance: Development Trend of Food Safety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in China
Changes of Gender Pension Gap Urban Employees in China Wang Yake and Xia Huizhen (57)
The Sense of People's Gains: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Good Life Expect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Based o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ata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Scal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
Research o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Dynamic System Theory ——Hao Quanhong (97)
Hao Quanhong (97)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Front-line Employee's Power Demand in Service Context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Different Anticipation of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Zhong" (中) Produces the Beauty of Form in China and Its Origin, Forming and Contents
How to Use "the West" as a Method
——On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and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of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
The Restudy of the Shape about Zun Yi in Zhou Li English Main Abstracts Wang Guiyuan and Li Jieqiong (165) Ren Jiaxian (173) (17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 的哲学底蕴探析 *

李凤亮 杨 辉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论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安全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从意识形态安全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精髓;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应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继承理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基础;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力量延伸。深入研究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的哲学底蕴,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文化安全 哲学底蕴 [中图分类号] D621;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01-06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新闻自由"和"网络自由"之名,大肆输出意识形态,传播西方价值观念,诋毁中国制度、中国形象。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更是如此,国外某些媒体和政客对我国抗疫工作恶意炒作,致使我国抗疫故事不但不能得到真实呈现,反而被误解,严重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2014 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鱼 虽然在中央层面"文化安全"被多次提及,但这是把文化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文化安全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洞察国家文化安全的新特点、新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擘画了新时代我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蓝图与整体布局,拓展了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领域,这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论述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关键所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究"(18ZD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凤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讲席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杨辉,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深圳,518055)。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年, 第201页。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① 他在 2018 年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② 这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来客观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蕴含的深刻含义,对推进我国文化建设、构建国家文化安全堤坝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意识形态安全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精髓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③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④这些论断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代表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具有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能力。一方面,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通过排除思想干扰、传播主流价值、批判敌对思想等形式在国内上层阶级中掌握话语权,进而实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目标;另一方面,将特定的意识形态渗透注人"文化软实力"中,实现意识形态的无形传播,以"文化软实力"增加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⑤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先要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夯实社会民众核心价值认同的思想文化基础,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⑥深刻分析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必须将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作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精髓,体现了党对于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和其本质认知上升到了新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表现,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具有思想导向和引领作用,能够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凝心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⑦"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其深层体现就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

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内在统一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⑨ 这一论述表明为了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塑造大国强国形象,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和功能,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在推进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⑤ 杨雨林:《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内涵与引申》,《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第 33-34 页。

⑦谢环驰:《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人民日报》 2018年3月6日第4版。

⑧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版。

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63 页。

化软实力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以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以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为目标的具体行动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三个维度来对其阐述。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从文化事业体制改革入手,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提出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强调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文化新业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的精髓,体现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它不仅对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精神文明创建、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具有引领作用,而且对深入推进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意义。

二、以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保证国家文化安全

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矛盾,必须坚持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论述牢牢把握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将其贯穿于整个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理论叙事之中。恩格斯在谈到事物普遍联系时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这一论述强调了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具有普遍联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传统安全,还包括非传统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文化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另外,人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故而,我们不能静止、孤立、片面地看待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并视其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保障,给予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明确的定位,表明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所有安全息息相关,彼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够使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样,只有在保证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马克思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哲学矛盾运动的观点方 法,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指出了维护文化安全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在战略布局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意识 形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指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如他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 指出:"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在具体措施上,近些年来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一直面临着国内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自觉性的衰减与退化,以 及国外文化渗透两个方面的挑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而文化产业自身所兼具的经济属性、 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能够通过文化产品的形态输入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文化产业 的良性发展已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支撑与国家综合国力中文化力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市场体系以及文化经济政策,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推动我国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在之后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指出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将网 络安全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网络安全法治建设、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系统部署,推进我国 网络强国建设。同时, 他在历史文化、新闻舆论、学校教育、核心价值观等具体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指明了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① 这些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用矛盾分析法,以战略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及问题意识来谋划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论述坚持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根本方法,深刻揭示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丰富了我国文化安全理论研究的内容,为深入研究马克思文化安全思想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

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 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提出了"人民主体论",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 富的创造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党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刻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 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②在文艺事业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强调要反映好人民心声,认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尽管有千千万万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 靠的办法是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③ 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主,文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更好 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④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更是强调了人的安全的重要性, 认为人的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些观点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⑤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当代世界的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这一重 大判断是综合人民需要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的根本性变化所得出的,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这一发展思想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所在,能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力量,具体表现为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安全事业的坚定捍卫者。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首先,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文化发展的唯一源泉,为文化内容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其次,人民群众为文化内容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再次,人民群众是文化创新的主体,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检验能够进一步推动文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② 这一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思想的补充,表明了只有融入群众生活的文化才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人民群众作为文化的创造者,能从内容创造、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人民群众也是文化安全事业的坚定捍卫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 "人民安全是

① 周逢梅、邵小文:《习近平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③ 庞兴雷:《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3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⑦ 庞兴雷:《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⑧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国家安全的宗旨"。^① 这些深刻表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另外,文化自信作为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能为我国构筑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而文化自信只有扎根于勤劳智慧的人民群众之中,才能释放力量。 总的来说,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的鲜明表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的核心内容,能够为真正实现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力量。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继承理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②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任何新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和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③条件和环境下进行的。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文化的创造不能脱离历史一脉相承的连贯性,文化的繁荣发展更是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是因为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④所以我们不能割裂和历史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的继承,这是因为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④所以我们不能割裂和历史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来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马克思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中指出,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决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先进的文化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这表明了各民族的传统思想、观念和文化是鲜活的历史与实践,含有精华与糟粕;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引领各民族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石,更是各民族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标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是中华民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之源,更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甚至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要来源。他曾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他高度强调了文化发展与传承不能忘本,要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力量。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时他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②另外,他也明确阐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与创新路径,要求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的方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富有思想深度、历史厚度、实践力度,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强烈的自豪感,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基础。

五、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力量延伸

①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第1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第 3-4 页。

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党建》2014年第3期。

⑦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对内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文化 力量,而且对外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交流互鉴,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马克思曾说过:"每 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 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①认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 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 文学"。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论,上述观点表 明没有绝对纯粹的民族文化,世界历史在打破各个国家和民族交流屏障的同时增强了民族间的相互依赖 性,推动了各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实现了跨文化的普遍交往,文化的世界性日益显现,而文化的交流互 鉴正是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延续的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尊重世界 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习近平总书记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 发,明确强调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互学互鉴,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 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③ 这就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阐明了推动文 明进步的动力源泉,也为解决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如近些年来我国与法国、俄 罗斯、意大利等国开展的文化年活动,正是国家间加强文化交流的体现,也是文化深入合作的见证。在 阐述文明交流互鉴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时,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以"民心相通"来实现不同文 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包容互鉴,强调"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 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④ 这一论述为我们实现文明交 流互鉴提供了方法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文明观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实践的思考,是对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有助于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增强各民族间的相互 依赖,加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和世界文明的共同繁荣。当前,随着 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被世界所熟知。在吸引世界目光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威胁论""中国 崩溃论"等不和谐的声音,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安全。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 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密切,关系更深入,范围更广泛。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了塑造良好的国 家形象, 扭转国际舆论的被动局面, 我国应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 阐发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延伸我国的文化安全力量。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从马克思主义能动反映论的向度强调文化安全的重要性,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精髓;从辩证法的深度指明国家文化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方法;从群众史观的高度强调我国文化安全的维护需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从文化继承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指出我们要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各个维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深刻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强大功效,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论述的哲学底蕴。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做好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立起更加和谐有利的文化环境。

责任编辑:王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③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④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3 日第 2 版。

哲学

重思"主客二分"

——基于主客体关系*

胡敏中

[摘要]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把传统西方哲学的认知方法和思维模式概括为"主客二分",并加以超越,甚至否定、批判和消解。这一学术动向也影响到我国,有学者在否定和批判"主客二分"的同时,隐喻式地否定、批判主客体及其关系,把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等同于"主客二分",认为这种思维模式也一样有片面、静止、僵化和二元对立的特征。其实,主客体关系是多面相的,从而能被建构多维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自然为人立法、人与自然互为立法、人为自然立法、更高形态的人与自然互为立法就展现了主客体力量对比变化的人类历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和成果都是对人和世界关系的追寻,所以,人和世界、主体与客体是人类历史和哲学的永恒主题。

[关键词]主客二分 主客体关系 主客关系的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B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07-09

近 20 年来,"主客二分"已成为我国哲学尤其是生态伦理学以及环境科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 只不过大多学者对其是持否定和批判的观点,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人地矛盾是由"主客二分"的哲 学理念占主导造成的,要化解生态危机,消除人地矛盾冲突,首先要破除"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观念。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甚至把"主客二分"等同于主客体关系,并借题发挥,在超越、破除、否定和批判"主 客二分"的哲学观念时,一同超越、破除、否定和批判了主客体的哲学观念,认为主客体及其关系同"主 客二分"一样,是一种先验、静止、僵化、对立的二元论观念,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念。

一、"主客二分"的出场

我们知道,西方传统主流哲学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不管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唯名论和唯实论,还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不管站在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很大程度都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和传承,主客关系不仅成为先在固定的传统哲学研究框架,而且成为哲学研究的固定范式,也成为西方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模式。西方人敢于对神秘事物的探险,敢于对自然的征服,追求极限活动和刺激等无不同这种思维方式有关。西方传统哲学的精髓是在主客体分立甚至对立中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强调天人相分,个体独立于整体,分析是其主要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人的自我改变'的实践思想与当代中国心灵文化建设研究"(AHSKY2016D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敏中,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客座教授(四川 内江,641100),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暨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编审、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的思维方法。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强调个体从属于整体,综合是其主要的思维 方法形成鲜明对照。

19世纪 30 年代伊始,西方传统哲学进入和转向现代,这种转向不仅仅是时代的跨越,而且更是哲学主题、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的转向。有学者概括出现代西方哲学的五大转向:反形而上学的转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的转向、实践的转向和反主体主义的转向。①现代西方哲学不再从主客体关系的预设中寻找哲学问题,而是直接把哲学问题独立地呈现出来,即或把经验事实、存在、意志、直觉,或把语言、符号、实践等直接当作哲学研究的问题和对象。转向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其哲学派别、哲学问题、哲学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哲学结论等各不相同,但在告别传统哲学的主客体关系模式,抛弃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上却是相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更多在综合和统一上研究相关的哲学问题。

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自觉不自觉地告别和超越了主客二分思维模式,那么,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则直接解构和消解了主客二分思维模式: "用'延异'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从纵向思维转向横向思维;用差异对抗理性的总体化;注重个体性和自我关切,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用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取代表象论和基础主义认识论;用不确定性和小型叙事取代元话语和宏大叙事;用'精神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用微观政治学取代宏观政治学。"^②后现代主义哲学否定和消解本质、确定、中心、终极目标、逻各斯和一元的东西,追求不确定、无中心、漂移、边缘、过程、非逻辑和多元的东西,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对其特征的恰当概括。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只是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思维范式,而且竭力否定和批判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的一系列传统哲学问题。可见,在超越、否定和批判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上,后现代主义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走得更远、更深。

中国当代哲学语境下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诟病、否定和批判,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自我意识的建构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因此,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否定和批判的研究路径和范式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学者。另外,当代中国特有的学术背景也助推了对"主客二分"的否定和批判。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哲学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而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就是在典型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构建起来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是条块分割的,缺乏内在的关联。存在与思维、认识与实践等范畴也都是在"主客二分"中被阐述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哲学在不断打破、改革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僵化、教条式的哲学体系。经过多年的探索,新哲学体系已基本建立。中国哲学体系的这一选择和构建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否定和批判了僵化、教条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哲学观念。

再者,受生态危机影响甚至威胁的当代,不少学者反思自启蒙理性以来,科技理性和资本逻辑的过度张扬所造成的自然生态不适应人类性甚至是逆人类性和反人类性,以及所造成的人类欲望的无所忌讳和无限膨胀,并在此基础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危机和冲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在人类与生态关系上各执一端的片面立场等,这些也影响和助长了学者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反思,并试图超越、否定甚至批判"主客二分"。

从"主客二分"即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学术出场和现实出场来看,"主客二分"有四种不同的表现。第一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二分",即把主客体看作没有多大联系的对立关系,笛卡尔和康德就持这种"主客二分"观念。第二是僵化的"主客二分",即把主客体看作机械、静止、僵化、先验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的是这一主客二分观点。第三是被动的"主客二分",看不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

① 杨寿堪:《冲突与选择: 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目录第1-4页。

②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21页。

费尔巴哈持的就是这种"主客二分"观念。第四是在主客体关系上片面、孤立地各执一端,即或把主体看作处于支配客体的中心地位,或把客体看作处于支配主体的中心地位,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是其具体表现。

我们当然要摒弃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为"主客二分"没有把握主客体全面、深刻和辩证的关系。仅从字面看,"主客二分"只是对主客体做区分和差异化的表述,并不等同于主客体之间的先验、抽象、静止、僵化、对立和二元的关系。当然它有沦为这种关系的风险,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先例,因此,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主客二分"这一用词,更要避免采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

"主客二分"只是主客体关系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还是用主客体关系,不用"主客二分"称谓为好。既然这样,有人借超越、否定主客二分思维模式,进而超越、否定主客体及其关系则犯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

其实,主客体及其关系不只是思想意识和思维模式问题,更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思想意识和思维模式只不过是对客观现实的构建而已。因此,在对待主客关系和"主客二分"问题上,我们要相应地区分客观现实和思维模式的主客关系与"主客二分"。先验、僵化、二元对立的"主客二分"只存在思想观念中,不存在于客观现实中。

二、主客体力量对比变化的人类历程

可以说,自人类产生至今,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从总体和终极意义上说,都是在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中所获得的。主客体关系是人和世界关系的哲学表达,而人和世界关系则是主客体关系的宏大叙事,因此,人和世界的关系、主客体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最大问题,也是哲学的最高、最大问题。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但主要是指自然,在人类社会早期尤其是这样。

自然相对人类来说具有恒定性,就是说自然不仅先于人类而存在,而且自然的力量和变化也是相对恒定的,我们常用地质年代来表述自然的演化。而人类的进化则是非常快速的,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中,两者进化的速率是不对等的,两者力量的对比也是在不断变动的,这就是主客体之间力量对比和变动的关系。以此观之,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为人立法、人与自然互为立法、人为自然立法、更高形态的人与自然互为立法四大历史发展阶段或四大历史时代。"人为自然立法"是康德提出的哲学命题,此命题的意思是人用知性范畴去统合自然界,自然界才有了自因。康德提出此命题的目的就在于确立人在认识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了认识论乃至哲学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本文借用康德的这一命题来说明主客体之间力量的对比关系,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然为人立法,主体占支配地位就是人为自然立法。这里的"法"是指规则、规律,即"尺度",也指人的力量,不完全等同于康德的知性。

自然为人立法。这个时代也就是人类的前文明时期,即野蛮时期和原始时期,在人类漫长的原始社会,没有产生国家,也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客体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原始先民只能使用最简陋、最粗糙的石器工具,无法从自然中获得更多食物,更不能生产、加工食物,不可能抵御强大自然力量的威胁,其食物来源只能靠大自然的施舍、恩赐,因此,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状态处于最低水平。原始先民只能被动地服从自然的支配和摆布,屈从自然的强大力量,原始先民同自然的力量是极其不对等的,一方极其弱小,另一方则极其强大,其主客体关系完全是自然占绝对统治、支配的地位。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就是原始社会的根本法则。可以说,原始社会是自然为人立法的时代,就是原始先民被自然支配,任自然摆布,臣服于自然而维持生存和繁衍。

自然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自然为人立法只能是自然自发地迫使原始先民依照自然规律和法则而生产和繁衍。原始先民的思维不发达,没有产生自我意识,不能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是主客不分的,从而只能自发、本能地依自然而生产、生活和繁衍。原始先民不能区分自我和对象、主体和客体,但

原始先民也是有意识的,这种意识是主客不分的笼统、综合、模糊的原始意识。但原始意识又是自发、本能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以及拟人化的和互渗的。这就是说,原始先民总是把自身的特性和作用自发、本能地投射到自然物中,把自然物当作具有与自身一样特性和作用的东西,万物有灵论,原始图腾、巫术、艺术和神话等都证明了这一点。^①

原始先民的主客未分的我向、拟人和互渗的笼统意识又是一种集体意识或表象,而个体意识不发达。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对原始先民的集体表象做了深刻的论述。^②

那么原始先民的意识为什么是主客不分的、笼统模糊的,又是我向、拟人和互渗的集体表象呢?这又要归结为原始先民抽象思维不发达,力量渺小,为了生产、生活和繁衍,只有通过我向、拟人和互渗意识,借助自然力量来弥补和增强自身力量。同时,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加之个体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强大威胁,原始先民只有联合起来组成氏族和部落,"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③

客观现实上,原始社会的主客体关系典型地表现为自然为人立法的不对称、不对等的关系,自然力量远远大于、强于原始先民的力量。但原始意识又是主客不分,受我向、拟人和互渗律支配的集体意识和表象,主客体关系的客观现实和原始集体意识表征是矛盾和模糊地交织在一起的。

人与自然互为立法。原始社会的后晚期和奴隶社会的早期,出现了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人类的意识和思维也随之有了发展,尤其是抽象思维有了发展,促使了早期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有了自我意识,便能区别主体和客体,告别了原始先民受互渗律支配的模糊笼统的集体意识。抽象思维、自我意识随同语言文字的出现,都标志着人类已走出了愚昧和野蛮的洪荒,步入了文明大道。

在历史悠久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阶级关系不同,但生产方式和 社会特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农耕社会和农业文明是其本质特征,而农耕社会的本质就是适应自然、 利用自然,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运行都是依自然变化的节律而进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 其真实写照,从而人、社会和自然处于"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中,超稳态的中国社会是其典型代表。

农业生产是农耕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生产工具有木制和铁制农具。木制农具直接取材于山林,铁制农具经过开采提炼而成。由于受技术和生产规模的制约,其矿藏的开采远没有超过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存在资源的枯竭。另外,农业生产的动力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风、水等自然力。农耕社会的生产是适应自然、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生产,人的力量同原始社会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和增强,可以把人的目的和意志通过利用自然、适应自然而实现。这可称为人为自然立法,但这种人为自然立法不是强加给自然和野蛮征服自然实现的,而是通过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进行的。况且,在农耕社会,人的欲求是节制型的,不是贪婪型的,节制型的欲求就决定了其生产目的不是盲目的扩张和膨胀,而是同环境承载能力和社会发展状态相适应的。

在农耕社会,人为自然立法体现了人的积极性、能动型和创造性,人的主体性是同自然客体相适应和相协调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从自然客体方面看,只有自然同时为人立法,人才能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自然和人互为立法,人和自然的关系才是和谐的,不会发生对立和冲突。

农耕社会是人和自然互为立法的时代,是天人合一和一致的社会。但农耕社会并不是最理想的 社会,因为在农耕社会中虽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资源和物质财富短缺,人

① 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86页。

②[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1页。

类还将会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迈进。

人为自然立法。18 世纪中后期,瓦特发明蒸汽机,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农耕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生产的自动化,自动化生产同手工劳动相比,生产效率是成倍增长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⑤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动化,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是由人的技术力量和社会力量所推动的,这些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工业社会的到来,真正开启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时代。人为自然立法就是人通过劳动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而且不断改造自然,创造自然,使自然按照人的目的和需要发生变化,自然成为人的有机的身体。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⑥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⑥

工业社会同农耕社会相比,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原来不为人知或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大洋、深海、极地、低轨道天空等,都成为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在实践和认识范围内的自然界不仅是对象性存在的自然,而且是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感性的表现,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并且这无机的身体越来越强壮,也越来越庞大。这也说明人为自然立法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

随着自动化机器向智能机器的推进,工业社会也相应进入后工业社会,智能化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当今的互联网、多媒体、自媒体、流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是其具体表现。如果说工业社会的自动化机器主要应用于生产领域,还没有直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智能化社会不只是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而且也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智能化。智能化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拟化和数字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实践和认识关系可以通过数字虚拟来进行建构。这样操作更便捷,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智能化时代人为自然立法的方式和特征不同于自动化时代。自动化时代人为自然立法主要是通过人的现实的力量为自然立法;而智能化时代人为自然立法主要是通过数字化虚拟地为自然立法,不仅使现实的自然虚拟化和数字化,而且可以创造一个比现实自然更逼真、更富有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更理想化的数字自然和虚拟自然。

自动化时代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这无机的身体主要是人的肌体和感知觉的 扩展和附加;智能化时代的自然更是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这无机的身体则主要是人的智能的扩展、 附加、放大和加重、加厚,甚至是比人的有机身体更"有机"的无机身体。

所以,智能化时代与自动化时代相比,人为自然立法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在宽度、厚度和精度上都进了一大步。

人为自然立法是人类本质力量增强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甚至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创造自然的重要体现,这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但如果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的贪欲,为了资本的无限增殖,盲目地、不加节制地、不顾自然界承受能力为自然立法,任意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那么,人为自然立法的正面效应就走向了反面。

工业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家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阶级对立社会。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榨取,对自然的掠夺,是其发家致富的唯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

手段。从而,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产生和激化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也激化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①并且是野蛮式地支配、占有和征服自然,从而破坏了自然自身的生态修复和再生功能。资本家对自然的胜利式的破坏,也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技术和生产能力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并开具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良方,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已经过去 100 多年。100 多年来,人为自然的过度立法有过之而无所不及。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在彰显它的优势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劣势,生态危机就是其中之一。植被破坏、能源枯竭、空气污浊、水体污染、土地沙化、臭氧穿洞、垃圾成山、病毒流行等,不仅成为自然生态危机问题,而且更是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已变成自然界成为人的有毒有害的无机的身体。因此,全世界各种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政府机构和学术团体不仅都在大声疾呼,要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绿色发展理念。但由于经济利益和资本利润的诱惑和驱动,以及世界各国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许多人宁可选择经济增长而把环境治理放在次要地位,从而导致全球环境治理举步维艰。

人为自然立法和以人类为中心,彰显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②人是目的,这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过度地人为自然立法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说,当今自然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恰当和过度的人为自然立法造成的,是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后果。

要真正根治环境问题,或许要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到那时,人为自然立法才是真正实现了人的内在尺度和自然界的 外在尺度的和谐、美好统一。

更高形态的人与自然互为立法。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代,科学技术极度先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异常丰富,人民的生活非常幸福和美好。那时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对立、矛盾和冲突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与此同时,只有消除私有制,祛除对剩余价值和经济指标的单一的、无止境的追求,真正按美的规律创建人类生活,才能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更高形态上的和谐。马克思指出,与动物不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③只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才能"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感性的美的特性"。 ④这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唯一征途。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⑤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即"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⑥

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真正矛盾解决,并实现有机统一,自然才真正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也成为自然的有机形态。自然与人的相互统一、相互过渡和相互存在,实质上也是人与自然互为立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1页。

② 高连福:《关于主客二分模式的思考》,《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8页。

④ 马尔库塞:《自然与革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8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125页。

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新水准、新形态,看似向农耕社会的复归,但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更好阶段和更高形态的复归。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从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断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是由被动到主动,由被支配、被统治到支配、统治自然的过程。在人与自然的历史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有和谐一致,也有矛盾冲突,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相互交织的。

主客体关系不只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由于人与社会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与社会的本质力量是同向发展提高的。人与社会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这些矛盾不是由人与社会谁为谁立法造成的,主要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及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论述主客体关系时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

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要解决的最终问题,因此,要否定主客体及其关系是不可能的。主客体之间有相统一和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和冲突的一面,正是主客体之间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主客二分"与主客体关系

主客体关系被人的思想观念所把握和建构,就产生了主客体观,并会积淀为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范式。思想观念的主客体关系有的可能只看到主客体相一致和统一的一面;有的可能只看到主客体相矛盾和冲突的一面;有的甚至孤立地看待主客体,把主客体当作二元对立、僵化、静止和先验的关系,目前否定、反对和批判"主客二分"的学者就是针对这一情况的,当然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借否定、批判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进而否定、批判客观现实的主客体及其关系则是走偏了方向。

我们知道,客观现实的主客体关系是全面而深刻的,对立、僵化、静止和先验的主客体关系只是部分人的认知方式和思想模式,以及由这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所主导的行为方式。我们一定要把客观现实的主客体全面、深刻的关系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区分开来。

我们不敢全然断定传统西方哲学就是一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哲学。应该说,传统 西方哲学主要是在主客关系中探讨哲学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在主客体关系中建造着不同的哲学主题。 这期间确实有哲学家将主客体看作僵化、静止和先验的二元对立关系,但也有不少哲学家把主客体看 作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转向是研究主题、思维模式的转向,即不再在设定的主客体关系框架中研究哲学问题,而直接对问题进行哲学研究。这的确在哲学体系和话语叙事上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但其哲学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主客体关系,其哲学体系仍内嵌着主客体元素。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通过烦忙和烦神在时间和空间中敞开自身,就是此在同工具和他人发生关系时而产生的烦忙和烦神,这实质上也是主客体关系的展开,只不过不是固定、僵化的"主客二分",而是生成和敞开的主客体关系。

后现代主义哲学公开否定、批判和解构传统哲学的本体、本质、基础、逻辑等确定的东西,追求边缘、不确定、多元、过程和生成的东西。即使这样,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也不可能完全消解和抛弃主客体及其关系,哲学的边缘、漂移、过程和生成都是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间进行的,这些都隐匿着主客体及其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上的确超越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对立模式。它们也是这样直接宣告的,但要真正判断它们的哲学性质不能只看它们宣称什么,更要看它们的哲学本身是什么。不管什么流派的哲学,不管是坚守"主客二分",还是超越"主客二分",也不管是承认主客体及其关系,还是否定主客体及其关系,不管是主张"天人合一",还是主张"天人相分",实质上都自觉不自觉地提问和回答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即主客体及其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实现了哲学的五大转向,而实践的转向就是马克思完成的,或者说是从马克思哲学开始完成的。批判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两大任务,也是其两大特征。马克思哲学批判传统西方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基于社会实践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并在批判中阐发了其实践观。马克思的实践观超越了传统的静止、僵化、二元对立的主客二分,^① 在批判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明其实践观,马克思的实践观是能动的、创造性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实践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哲学家们不应只是解释世界,根本的在于改变世界即实践,而改变世界是客观的、对象性的、动能的、感性的人的活动。

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机械被动的主客体观和传统的主客二分,但并没有超越主客体关系本身,相反,马克思是在唯物史观的主客体关系中阐述其实践观的,马克思用事物、现实、感性、世界来指称客体,用哲学家包括费尔巴哈和唯心主义者来指称主体,实践就是人能动地改变世界的活动。

四、主客体关系的多面相

不管从内容还是从方式看,主客体关系都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主体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主客体关系。主体有物质和精神两大根本需要,而精神需要又包括思想的、道德的、艺术的和信仰的需要等,主体的各种需要都同客体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②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之间的思想的、艺术的、宗教的和道德的关系,主要是以主客体关系的内容及与内容相适应的形式而划分的几副面相。我国哲学界把主客体关系归结为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也主要是以主体的活动方式来划分主客体的不同面相的。

我们还可以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来确定主客体关系的不同面相。

"主客二分"是传统哲学所持的僵化、静止、先验和二元对立的主客体观,是一种僵化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辩证地看待主客体就会产生辩证的主客体观。辩证的主客体观既能看到主客体的区别和差异,也能看到主客体的一致和统一;既能看到主客体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又能看到主客体之间静态的相对稳定和继承。辩证的主客体观应该是比较准确、全面地揭示了主客体关系的真实面相。

"主客二分"观念把主客体的区分绝对化和先验化,从而不能准确、全面揭示出主客体的真实关系, 是一种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主客体观。

我们承认,主客体是相互区别的,一般说来,主体是人,而客体是物。传统哲学所说的天人相分就是把主客体看作两个不同的东西,主客体各自的内部结构、特征、运行规则和作用等都是有差异的,可见主客体是有分的。但主客体更有合,在社会历史领域,主客体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传统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都是客体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也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也就是对象和非对象的相互生成和转化。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看到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生成和统一,并以此否定和批判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这是正确的。

但如果只看到或者过分夸大主客体的相互生成和合一,而看不到主客体的相对静止和稳定,就像

① 鲁克俭:《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一种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主客二分"观念一样,也是片面的。

如果我们从现实社会的一个截面和节点来看待主客体,主客体的确是相互创造和生成的,很难看出它们的相对稳定和静止。但如果从社会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主客体,它们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既是现时的又是先在的,既是生成的又是继承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① 恩格斯也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② 就是说,人类创造历史都是在前人留下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后人所创造的成果又将留给下代人,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果说,创新是动态生成的,那么,继承就是静态传承的。从历史主客体关系说,历史的长河就是主客体关系的动态和静态的不断更替的历史。

总之,主客体是有差异和区别的,但不是僵化的二元对立。主客体是动态的相互生成和创生的,但这是在继承了前人留下的成果基础上的生成,其又具有静止、先在的一面,是动与静、当前和先在的统一。

和谐、合一是主客体的总体和本质的关系,但也包含着矛盾和冲突。在当今,主客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于主体,因为当今社会是人为自然立法的时代,人类的力量能支配、统治甚至征服自然,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当今的全球化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就是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的结果,表面看这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实则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表现。人与自然要合作、和谐、共赢,我们既要发展,又要保护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从偶然和少数现象看,人与自然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来自自然界本身,如自然灾害和病毒传染,这些同人类对自然保护不力有关,但主要还是自然本身力量作用的结果。人类对自然灾害要加以预测、预报,把自然灾害的破坏和社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对病毒传染,我们既要救治患者,又要探索病毒的病原和病理,研究对付和消灭病毒的有效药物,要攻克和征服病毒。从这一意义上说,"征服自然"在局部的范围内还是可以使用的。③即使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人类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仍有许多是未知的,有许多奥秘需要人类去探索和解答,从探索未知来理解"征服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征服"含有野蛮和强制之意,但也有战胜、攻克之义,如果从后者理解"征服"又未尝不可。

当代,随着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人和机器的合作不断加强,将来甚至有可能把智能芯片或微型智能机器植入人脑和肢体,使人的能力不断增强,可能会出现人机合体的"超人"和"人肉机器"。即使那一天真会到来,只要有主体的存在,无论是生物自然人还是人机合体的人,都将存在着主客体的各种复杂关系。

"主客二分"只是对主客体关系做僵化、二元对立的理解,是一种教条、僵化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现实的主客体关系面相是多样的,主客体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更有合作,本质上是和谐和共赢的关系。主客体之间既互惠互利,也存在矛盾和冲突。我们要尽力化解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主客体的进一步合作、互惠、互利、和谐和共赢,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责任编辑:罗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7-338页。

③ 胡敏中:《为"征服自然"辩》,《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3期。

边界与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生态演绎的反思

路 强

[摘 要]在当代的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学研究中,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引入这一语境的成果屡见不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两种思想无论是产生背景,还是问题指向,均有着很大的历史差异。这些成果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不同理论之间相互阐释的过程,因此,需要特定的方法论为原则,才能避免产生阐释的误区。具体而言,需要回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原点,确立相应的诠释边界,同时,找到其中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性意义,进行合乎诠释原则的理论转化与延伸,才能合法而有效地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而不能随意将一些看似相仿的概念与理论进行生硬的捏合与比附,以至于产生违背学术常识的理论曲解。

[**关键词**] 边界意识 合法性阐释 中国传统哲学 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16-08

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嫁接与捆绑,似乎已成为目前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研究中的一个惯常思路。特别是很多西方学者,发现现代西方的那种工具理性与科学主义的思路已然不能有效地应对环境问题时,纷纷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这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一问题领域似乎获得了很强的理论自信。但是,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常常会发现,在很多论述中,几乎是不加分析地将一些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类似的概念与判断进行勾连,以此来建构一种中国哲学的生态演绎。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给人们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误解,而且也淹没了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效的生态环境启示。按照最新的阐释理论来看,"(阐释的)变异和延伸只能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文本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必须立足于文本。文本规定了开放的限度,决定了阐释的界限及其合法性"。^①因而,就需要以一种阐释的有效性和阐释的边界作为基点,来重新审视这些已经产生的理论,发现并纠正其中可能产生的思想误导,进而提供真正能够从中挖掘出生态环境思想启示的中国传统哲学元素。

一、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演绎中的阐释问题与质疑

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自 20 世纪中后期兴起以来,至今仍然是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内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形态被提出,乃至被世界范围所认可的时候,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更是被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涉猎;于是,出自中国本土的各种传统文化思想,纷纷成为其相关的思想元素与理论基点。随着国外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力度加大,一些国外学者也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作为其建构理论的思想资源,这无疑也大大增加了国内学者的文化信心。于是乎,

作者简介 路强,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610066)。

① 张江:《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将各种传统思想纳入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学之中的研究路径层出不穷。近年来,无论是以学派为对象,产生的诸如儒家生态哲学思想、道家环境伦理启示等,还是针对具体的中国思想家的生态环境思想研究,都以不同形式的成果样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还远不会有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至少在其哲学的内在逻辑中,无论是哪一学派还是哪一位思想家,都不可能直接产生对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那么,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之间架起桥梁,就必须找到其内在的以及可以进行沟通的根据。

无论是生态哲学还是环境伦理学,其产生的背景一方面是生态学的产生,另一方面则是在人类的 实践活动中, 生态环境的变化已然显现为对整个人类生存产生影响的问题。因而, 可以说, 对生态环 境进行的整体性反思不会早于19世纪。如果笼而统之地将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均 称为生态思想的话,那么,所有产生于19世纪之前的思想,在其原本意义上是不会产生所谓的生态 思想的。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生态哲学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 恩·怀特(Lynn White)发表了《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第一次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 度探讨了西方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受怀特的启发,西方学者此后从精神和价值观层面对西方环 境危机的根源,以及克服环境危机的精神道路进行了深入且广泛的讨论"。①这也就说明了这种与生态 环境相关的哲学伦理学思想,不会在这一时间节点前产生。基于这样的学术史证据,无论是在生态 学产生之前,还是在怀特提出这一观点之前,所出现的思想成果直接冠以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这样的 名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与理论逻辑的。虽然,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思想中析出某些思想的元素或思考 的途径,来照应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但这种照应往往是某种启示性的和间接性的。因而,如果要让 这些思想资源能够获得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启示或合法性的支持,就必须从思想资源本身与当代 生态环境人文反思的现实成果两方面出发,寻找出二者从概念的内涵到理论内蕴的共通性;进而发现 那些原本不是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中,是否能够抽象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关怀和人文思想, 从而能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某些方面予以回答与诠释。落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笔者认为, 要从中析出对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启示性观点或论述,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回到概念的原初意义去进行比较,即要对生态环境思想中的种种基本概念与传统思想中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确定,确保在论证过程中逻辑的一致性。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古代哲学中某些概念的多义性,从而保证在概念互释过程中的合法性。在中国哲学中,诸如自然、天地、气、理,这样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乃至同一思想家的不同语境中,都会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对这些概念进行生态化的演绎不仅要在考证的意义上看到其"所指"与"能指",而且还要分析其内涵与所指称的对象在思想演化与历史变迁中可能产生的变化,从而保证依据这些概念形成的判断和论证对于相关的生态问题具有足够的理论效能。

其次,在立足概念进行理论延伸的过程中,要明确不同理论的指向,即要分析出作者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这一表达和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哪些方面能够形成对应。在这里则尤其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达,中国的很多古代思想家,都善于使用比喻的方式来阐释理论,因而,就需要透过其字面意义发掘出其思想的真正指向。这样一方面会避免附会式的误读,另一方面则可能真正发现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价值的思想元素。诸如,《论语》中提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里其实是为了表达孔子的仁人本心,而并不意味着儒学诞生之初就有动物保护的意识。然而,如果沿着儒家的仁爱之心去思索的话,倒是可以将这种"不忍人之心"外扩为一种关爱万物的道德情感。

其三、着力寻找到中国古代哲学中可以下沉为普遍意义的思想系统、使之能够切近当代生态哲学

① 杨通进:《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或环境伦理学的逻辑体系。简言之,就是要从相关的思想元素中找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之整理为一套能够对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效论证的系统性思想,从而克服那种可能存在的单向度的生硬比附。如果希望能够从中国古代自然观中获得某种生态性的启示,就要系统梳理古代思想中那些真正能够指向其所处社会之外的物质环境的观点或者观念,而不是把一些仅仅是以自然物作为比喻或借喻材料的说法,直接诠释为某种生态哲学。诸如儒家的"生生"概念与"赞天地之化育",就包含了某种对于自然万物的态度,从而可以将其进行生态演绎。而如果将老子的"无为"直接解释为尽量不去以人的实践干涉自然环境的生态思想,则显然是缺乏过渡性论证的武断结论。

其四,在努力发现那些具有生态环境内蕴的思想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思想启示可能具有的理论边界。换句话说,就是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对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启示性的价值的。例如,在《老子》中,提到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44章》)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19章》),这些观点在当时更多是在个体修养和社会治理角度发生意义的,它们可以反映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指向极简主义而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并在价值观上贬低物质欲望而高扬精神诉求,等等。这类思想无疑可以对于当今的某些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启示,但由于历史的落差,这些启示不可能被完全阐释为现代意义上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学观点。即我们其实无法从中判断,老子会对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样的问题有直接的说明或理论阐发。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对自然还远远达不到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人类与自然环境打交道的模式是一种低水平的,匍匐于自然脚下的和谐。这也就意味着不能随意将一种只具有局部性意义的理论扩展为一个体系化的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思想。不加任何限制地说道家思想本质上是生态哲学,或直接说孔子、老子在最初的致思过程中,就会有环境伦理这样的思想产生,这类表达至少是不严谨的。

基于上述理由,当我们以生态环境为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就需要重新考虑已有的理 论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并且能够真正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所提供的有 效的价值元素。

二、概念原点与理论的延伸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首重概念,因而,无论将其思想做何种方向的延伸,首先要明确概念的含义与指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很多概念具有多义性,而对其意义的准确判断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思想的本义与相关的历史背景。那么,当这些概念被运思为某种生态思想的时候,就需要将思想的阐释立足于概念的原点。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哲学中"自然""天"这两个被广泛应用于当代生态思想的概念中得到证明。

"自然"这一概念多见于道家思想当中,在其产生的原初语境中,自然更多地具有一种动词的含义,即一种存在的本源状态,因而才有了"道法自然"一说。因此,"自然"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自然环境,甚至它不具有一个明确的客体指向,而是一种本体性质的表达。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考证,《老子》中的自然,指的是"自己如此""自成"的含义。这里的动词意义要远大于其名词意义。因此,就有学者指出:"《老子》书中提出'自然'一辞,在各方面加以运用,从来没有把它看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是运用自然一语,说明莫知其然而然的不加人为任其自然的状态,进为《老子》全书中心思想'无为'一语的写状而已"。①以此为代表,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自然"主要意味着一种动态规则,一种最为原始也最为本源的状态,它是潜在的,不断生成着的;同时也是超越的,是人类的理性认识不可完全囊括的。这样的自然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它"兼顾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各种现实及潜在因素,是对优化的事物状态或趋势的一种界定,单纯从自然或人事方面理解都是偏颇的"。②显然,在这种概念下,是产生不了诸如今天的所谓保护自然、关爱自然的

①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2页。

②谢阳举:《论道家亲自然传统的环境哲学价值》,《晋阳学刊》2015年第1期。

理念的,当然也不存在对自然的破坏,因为,从本源角度来说,人类不可能对这样的"自然"有所影响。因此,也就不能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老子的思想中主张人类行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要同自然和谐相处就能够"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第55章》)。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这一概念,与当代环境伦理学或生态哲学中所提到的"自然"概念是存在着裂隙的,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具有的内涵是不同的,也就不能直接从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的自然概念与理论内涵中,直接导出某种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理论或论证。

同样,如果说"自然"这一概念多被学者用来沟通道家哲学思想与当代生态环境思想;那么,"天" 这一概念则被多用于沟通儒家哲学思想与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究其理论渊源,不外乎儒家有"敬天 法祖""天人合一"等诸多论证天人关系的思想。可以说,儒家对"天"这一超越性存在有着与生俱 来的敬畏,而且因为这种敬畏使得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思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产生那种主客 二分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而是形成了一种"和合"理念,即"是一个差分性、殊异性,而又融突性、 融合性的范畴"。^①在这样一种逻辑下,"天"这个概念在儒家思想中,也确实包含了外在自然环境这 一含义,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之天。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先秦荀子所提出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 为桀亡"(《荀子·天论》)。因而,这里很容易形成一个似乎颇有根据的逻辑,就是在儒家思想里天然 地包含了今天的那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理念。但是,这将两种相隔千年的理论直接类比并得出某 些结论的做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且不说,在儒家思想中对于"天"的内涵有着多个层次的认识,除了 刚才所提到的具有自然属性的"天"之外,还有难以认知的"神秘之天",如孔子所提出的"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以及作为道德源头的"德性之天", 如孟子引《诗经》中的 那句"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如果较为全面地分析儒家的 代表性文本,可以发现,儒家所真正敬畏的更多是具有能够对应人间道德规范的"德性之天"。儒 家对于"天"的理解中内在这一个从西周"以德论天"到后世"以天论德"的过程。一方面,儒者很 大程度上对《尚书》中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进行了相应的诠释和扩充;另一方面,则认为"天" 是道德的形而上基础,即"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因此,儒家之所以要敬畏天地,是 因为其将天地道德化了,他们认为天,或者说天地,是道德性的,是某种伦理秩序的源头与根据。这 一点,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中就有了明显的体现。而经由宋明理学的"天理"之说,这种"德 性之天"的定位已然成为儒家思想中的主流。由于儒家并没有自然哲学的意识,因而其本体论的建构 主要是一种道德本体论,即它是从人的道德维度去理解天地万物的,人们对"天"的敬畏也就体现为 对道德的敬畏,而并不是在今天意义上所说的对自然规律、自然存在的敬畏。

以上两例说明,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当代生态环境思想之间,尽管有些概念看似很相近,或者具有一定的意义同约性,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更为明显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思想之间的裂隙不可逾越,关键是要找到联系二者之间的有效逻辑桥梁。换句话说,就是要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概念出发,发现其能够真正对应生态环境思想的内涵,从而实现传统理论的生态化延伸。

回到前面提到的两个概念——"自然"与"天",在人们对其进行生态化演绎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这些概念在具体的理论背景下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及其能够与生态思想形成对应的思想指向。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与诸如"'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意蕴""'道法自然'的生态解读"等类似的表达,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明晰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核心概念是如何与相应的生态概念相沟通的。以"天人合一"为例,从学界的共识来看,一般认为对这一命题较为系统的论述出现在张载的《西铭》之中,其理论的背景是:以其"气论"为基础,认为万物的本源为太虚状态的"气",因而天地万物,包括人,有着相同的根源;而由之引发的结论,则是认为天理与人性在道

① 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德层面上具有可沟通性,即人的道德来源于"天",人是道德本体的一个集中体现。由此看来,在这 一命题中,对于"天"的理论设定是存在本体与道德依据的,而并不是所谓的"自然之天"。尽管很 多学者将天人合一作为某种精神旨趣追溯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至于庄子的"万物齐一",但是, 无论从哪种定位中,"天人合一"这样一个命题中的"天"都无法和今天生态思想意义上的大自然或 者生态环境整体完全对应。正如张岱年先生对这一命题的分析,"所谓天人合一,乃谓天人本来合一。 关于天人本来合一,有二说: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所谓天人相通,其意义可分为两层:第一层 意义,是认为天与人不是相对待之二物,而乃一息息相通之整体,其间实无判隔;第二层意义,是人 为天是人伦道德之本原,人伦道德原出于天。……天人相类之意义,亦可析为两方面。一、天人形体 相类,此实附会之谈。二、天人性质相类,此义与天人相通论之天道人性为一之说相似,实际上亦是 将人伦道德说为天道"。[□] 由是观之,通过这一命题直接推导出诸如"人对自然的尊重"或者"人与自 然应该相互和谐发展互相促进"这类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和武断的。如果要沟通"天人合一"这一 命题与当代的生态思想,只能在本体论意义上来寻找其中的契合性,发现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具有那 种本原意义上的统一性,二者在本体论层面是"无判隔"的,从而可以将其作为对抗各种"中心主义" 的依据。同时,还要注重这一概念在思想史上的多元化演绎。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标志性概念,天 人合一在思想史中被很多思想家进行了特定维度的诠释或延伸,那么也就使得这一较为抽象的理念获 得更为具体化的内涵,而在这些指向性更为细化的内涵中则更便于将之与当代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学 的一些具体观点相比较或进行联系。诸如,在王阳明那里,这一观念很大程度上就被诠释为"万物一 体同仁"的理念,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②这一观点则 显然包含了人与人类社会之外万物的某种联系。正像有学者指出,王阳明的"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超 出人类而涵盖天地万物",并且"与万物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同感'(empathy)概念……具有同感的 人自然会积极地帮助他人摆脱苦痛"。③由此来进一步展开对"主客二分"的自然价值论的有效批判, 这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拒斥,则有着非常强烈的环境伦理意蕴。那么,沿着这一思路再进行理论的延 伸,才能具体说明其对于某些生态环境思想,如环境美德、生态本体论等,所具有的支撑意义。只 有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过渡中,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思想延伸至当代生态环境思想的理论效能。

三、普遍意义与内蕴启示的显现

如果说,从概念获取有效的思想资源,进而进行理论的生态化演绎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寻找 生态价值的最初阶段的话,那么,如何从一整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析出系统性的生态思想,则是更 多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沿着上一个问题的思路,在我们将某些原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较为合理地延伸 至生态环境问题之后,是否可以将这些思想要素相互贯穿起来,形成属于中国自身的、独特的生态哲 学思想或环境伦理思想。特别是当西方的种种思想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显得捉襟见肘的时候,西方学 者似乎也开始向东方思想探出了触角。这不能不说给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以及信 心。在这个意义上,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时候,就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其中的内在逻辑。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目标,当我们去思考诸如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解读或生态价值的时候,就不能将一些相近的话语拼凑在一起,而应该"从某个文本或者语句进入一个思想之后,再深入到文本的内在思想结构上去,看作者当时在考虑什么问题"。^④ 这些问题与今天的生态问题有何种相关性,能不能作为解释乃至解决某类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依据。换句话说,要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中找寻到其对于生态思想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里的普遍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就是在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③ 黄勇:《儒家环境美德伦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④ 路强:《从〈中国哲学史〉看中国哲学——陈静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15年第6期。

其思想的内部有没有蕴含着人们对于自身与外在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其二,就是沿着某些思想的发展,能否昭示出与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形成对应的特定理念。

从第一个方面而言,首要的是从整体上理解古代思想的含义,清晰地把握古人所要表达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以及他要解决的问题指向哪里。以先秦老庄的一些理论为例,无论是"道法自然",还是"万物齐一",其思想指向都是在本体论领域的,即他们要探究的是超越社会历史的终极性存在。这种存在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雅斯贝尔斯的"大全",海德格尔的"存在"。在这个层次上,无论是说人类归属于自然,还是人类与万物平等,都是基于一个原生意义上的、绝对自由的人。其存在被容纳于自然的大化流行中,这里的自然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或者说那个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展开意义的自然,而是一种处于遮蔽状态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力量。古人探究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寻找到人类超越自身,进入绝对自由状态的途径。因而,古人提到的自然、天地、万物,是与人圆融在一起的,而不是分立而论的。通过这种对存在本真的探究,其目的大多为人类寻求超越性的生存目标与本体性的存在依据,而并不是确立某种所谓的生态平等或自然的内在价值。因而,从中无法得出"人类尊重大自然"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理念。因为,这里的自然已经是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展开的自然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化自然"。

但是,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可以沿着这一思路找寻其普遍意义,即人的存在根基并不是来源于人自身,特别不是来源于在社会历史中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人类同其外在的世界在根源上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作为社会性的存在还是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其对于自然万物的依赖性远大于异质性。同时,人虽然可以在认识论领域乃至价值论领域将自然对象化,对其进行认识与分析,但是在这个自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作为存在本体的自然,作为推动万事万物第一动力的自然。在这个自然面前人们其实是无法用尊重、保护、和谐这些典型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概念的,其第一要义只能是敬畏,并在这种敬畏的基础上,进行审慎的反思。通过对这种普遍意义的揭示,可以提供给现代人类某些更为恰适的自然观,用以反思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或者至少也可以用以对抗各种中心主义、独断理性主义等已经陷入生态困境的观念。

从第二个方面而言,则是将特定的思想进行某种合理的延伸,从其推论中发现是否具有特定的生态哲学价值,或者说能够回答某些生态环境问题的价值。在此,要对现代的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细化分析,从中找到其与古代思想的某种视域交叉。例如,在宋明理学中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理欲之辩",其中得到的一个共识性结论就是"物欲"对于人性而言是危险的,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是在精神层面同"天理"沟通,并且要尽可能地限制欲望的膨胀。而在当今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领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人们的生活价值序列进行反思。很多学者也认为,必须转变那种以物质消耗为核心的价值系统,消费主义与经济主义是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此,不难发现,在对于"物欲"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可以同现代生态思想进行沟通的。有学者明确指出,"儒家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而不像现代文化的理念劝诱人们以赚钱和占有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①虽然这些儒家思想的创造者并不旨在解决生态问题,或者也没有从环境影响的思路上去看待人们的"物欲",但是,至少可以说,沿着这种"存天理,去人欲"的价值观去进行实践的话,在生态上是相对安全的。

诸如此类的思想延展,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引入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对人们现实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有直接的关注。这种关注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会提出各种实践生活方式的理念,这些理念中也就包含了人类面对外在自然环境的实践方式与价值判断。这无疑也就触及了当代

① 卢风:《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8页。

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所面对的问题,因此,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例如,一些思想流派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是否对于生态是安全的,另一些思想流派所代表的生活价值观是否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有益,尽管这些特定的思想都不是针对生态环境问题而进行建构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以及《孟子·梁惠王上》提到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些并不能说明孔子、孟子这些儒家思想代表在当时就有生态平衡或动物保护的意识,而只是儒家对于"仁"这一至高道德概念的实践表现。但是,这无疑反映了特定的价值观,至少,在"仁爱"这样一种价值的指引下,人类会少很多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开发。这才可以说是这种古代哲学思想对于当代生态环境的真正意义。

基于以上论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必须是从其下沉的普遍意义的揭示中,才能阐释出具有当代生态价值的观念,这些观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些启示性的意蕴上。如果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时间节点设置在19世纪中晚期以前的话,其所产生的观念一定不是直接针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之所以一些观念能在这一领域发生作用,是因为其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实践方式,乃至于精神生活的建构具有永恒性的意义。人们在不断反思自身问题的时候,能够从中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启示,进一步又将这些启示投入现实的具体问题上来,形成所谓的传统思想的现实关照。因而,在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进行生态演绎的过程中,要极力避免的就是不经逻辑推演的附会与不顾古代哲学思想自身发展脉络的随意诠释。诸如,将孟子中"以羊易牛"的事件解释为某种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保护主义,或者将庄子提出的"万物与我为一"直接解释为某种生态保护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显然都是荒谬的。

四、边界意识与合法性阐释

基于上述分析,当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生态化演绎的时候,一方面需要随时对理论的运用及论证的逻辑进行审查与反思,以防止在论述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则要真正找到二者之间能够同构的思想元素,特别是要辨析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那些超越时代,而且能够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形成启示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价值或立场,以之来作为沟通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生态哲学的理论支点。简言之,要寻找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哲学价值或环境伦理启示,并将其诠释为某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时,就必须对这些思想本身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并在符合基本阐释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思想发掘与演绎。

在此,需要阐释学(hemeneutics)的基本观点来确立这一思想演绎过程的原则。诠释学本身要求在诠释的过程中要保持一种客观和理性精神,既要看到思想本身的发展,也要尊重思想与思想之间视域融合的条件。用诠释学自身的理论要求来表达,就是"自我一理解不是一种自由漂浮的意识,不是一种被当下情境填满了的忽隐忽现的半透明的东西,它是一种已经处于历史和传统中的理解,惟有通过扩大它的视域来理解所遭遇的事物,它才能理解过去"。①这也就是说,诠释要具有一种公共性和共识性,对于一种古代思想的诠释需要在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作用上,才能变得有效。也正是基于此,近年来张江教授主张将诠释学中"诠释"的意义重新翻译为"公共阐释",并指出"对阐释而言,文本的客观性自在,为书写者意图之载体,面对文本,承认和考证其本义是首要。不可将己心强制于文本,以私意取代文本之义",同时"对话,协商,相互理解,当是阐或诠之基本态度。对本义之发挥或借本义而重建,不可无拘无束,当有根据,且应明示如此扩张或歪曲,是阐者之意。如此方为正当,乃合阐释之伦理要求"。②以这些基本的阐释原则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生态演绎时,首先把握的是边界意识,即所谓的"有边界约束",看到"文本阐释意义为确当阈域内的有限多元"。③这要求在运思过程中要对所使用的思想元素有着较为透彻的理解,对原本思想体系的逻辑也要有较为明晰的把握。

①[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9页。

② 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③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思考者必须首先进行文本与历史的回归,即准确把握原始文本的内涵及其内蕴思想的指向,从而确定这些思想在产生之时是在哪个领域发生作用的。就像在前面提到的,当需要借用古代的某种"天人关系"来启示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至少先要搞清楚在这一特定理论中的"天"究竟是自然之天、道德之天,还是神性之天。不同的内涵也就确定了理论的边界。例如,在宋明理学中表达出的天人相应相通的思想中,大多数是将"天"道德化了,这些理论也就往往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而,在理学家那里,"天人合一"可以被更为准确地表达为"天人合德"。因而,不加分析地将"天人合一"阐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越界,乃至有臆造的成分。同时,在将一种哲学思想进行推论式的演绎时,这种对于理论的边界意识则表现为发现理论过渡的逻辑必然性。在儒家很多经典中,都提到了圣贤对外物的关爱,如从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到张载的"兼爱万物"。这里的思想逻辑,在于通过这种外在的伦理规范或实践规范,来体现儒家的"仁爱"本体,乃至实现"仁爱"这一终极道德目标。这与"动物保护主义"或者"生命权利论"既无逻辑的必然性,也无直接的相关性。如果要进行逻辑演绎,应该是儒家确立了"仁爱"这一终极道德本体,因而"仁爱"是人性的本质,人要实现人性就必然要去实践"仁爱",而怀着一颗"仁爱"之心进行生产生活实践,其过程一定会对生态环境有较少的危害。

进言之,通过边界意识的确立不仅可以审视已有的各种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的不同生态解读, 因为"有限的多元"意味着这些思想或理论产生的可能性范围,并且昭示着在这一维度的思想建构中 需要在一定的公共性视域内形成共识。这不仅要求当人们希望通过某些中国传统的哲学反思和价值观 念来启发对今天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时,必须立足于文本的历史内涵与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样的边界之 内; 而且, 如果要在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发掘其蕴含的生态价值, 最终需要形成的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 性和确定性的共识, 并且能够为特定的共同体所理解并接受。那么,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的, 就是仅凭借主观的理论想象来进行诠释,即不能只是在肤浅地理解一些概念之后依稀想到另一些概念, 更不应该把字面上相似的表达断言为必然的联系。因为,用以保证阐释合法性的"视域融合",意 味着"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吻合关系。解释参与了人类精神的讨论,而这种人类精神又唯有在前后相继 之中才能思考事物的统一性。正因为一切解释都必须具有某个开端并力求摆脱掉解释引起的片面性, 所以解释就具有一切有限一历史存在的辩证结构"。①换言之,就是要确定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生态哲 学和环境伦理的可沟通性、找到二者之间相通的内涵与话语指向、以摆脱片面且具有主观随意性的 诠释,从而达到共同体的共识。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说,通过中国传统的种种哲学思想,可以获得对 今天生态环境问题的启示,并且形成与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态思想之间的对话。而立足于这样的 思想立场,中国古代那些哲学思想才能够展示出对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真正价值,特别是其中的一 些精神旨趣要比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更具优势。例如,其整体论的价值立场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环境伦 理中各种"中心论"的思维方式的弊端。因此,也可以说,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原则进行审查和自 我反思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才能够导出适应于当代的、中国式的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

责任编辑:罗苹

①[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11页。

爱因斯坦的科研境界与冯友兰的人生境界

——兼评动画片《哪吒》*

陈晓平

[摘 要]爱因斯坦把科学家的研究动机或境界分为三种,即追求物质利益、追求好奇心和创造欲的满足、出于宇宙感情。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参照冯友兰的人生境界理论,我们可以增加一种科研境界,即以促进社会利益为动机的责任境界。科研的责任境界和宇宙境界分别对应于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追求物质利益和好奇心、创造欲之满足的科研境界对应于人生的功利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亦即"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动画片《哪吒》所说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命"是指社会成见,哪吒所反抗的是某些社会成见而不是宇宙规律。

[关键词]科研境界 人生境界 天人合一 道德成功

[中图分类号] N02;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24-06

爱因斯坦是著名的犹太裔科学家,冯友兰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家,而哪吒却是神话动漫影片中的一个人物。现把后者与前二者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是讨论他们的人生观,或许显得唐突。不过,笔者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那就是 2019 年 7 月上映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 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这意味着,除了艺术形式之外,其人物观念和主题思想得到中国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共鸣,这一现象是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的。如果我们从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的视野来反观这一文化现象,那便有可能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爱因斯坦关于科研境界的理论

爱因斯坦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中谈道:"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庙堂里的三种人,一种是出于好奇心和创造欲的满足,另一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还有一种人则是他最为赞赏的类型,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所属的类型。对于第三种科学家,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系统哲学思想史"(19ZDA03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计算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19BZX03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境主义反怀疑论方案批判研究"(18BZX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智能社会与人的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①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00页。

因斯坦描述道:"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有趣的是,这种人在外表上也有一些共同性,即"他们的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不过,"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许多人那样彼此相似。"^①

这使我们想起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如果把此话套用在爱因斯坦所说的那三种科学家,我们可以说:前两种科学家是相似的,后一种科学家则各有各的不同。后一种科学家之间的不同首先在于科学研究的动机上。爱因斯坦承认:"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用笼统的一句话来回答。"^②其实,爱因斯坦也只是描述了这类科学家的精神状态,并未给出其精神的具体内容或目标。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试图给那种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做一个大致的描述,也可说是一幅大致的自画像。他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爱因斯坦进而解释:"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于是他们就试图用他们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③逃避世俗和寻求真理是第三种科学家之科研动机的两个方面。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追求真理就是发现宇宙的普遍规律。然而,"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依靠直觉来发现宇宙规律,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只能用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的"先定的和谐"加以解释。^④莱布尼茨认为,一切"单子"之间,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存在一种预先被永远确定了的和谐。不难看出,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是黑格尔"思有同一"的先声,也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之说是异曲同工的。无怪乎,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稿是《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先定的和谐"是先于人类意志的和谐。爱因斯坦所信仰的宗教与一般宗教有所不同。他的上帝不是人格化的,而是宇宙和谐所表现出的"理性",他称之为"宇宙宗教感情"。这种宇宙感情成为了爱因斯坦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爱因斯坦谈道:"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⑤"宗教情感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⑥

在爱因斯坦的宇宙感情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对于"奇迹"存在的认可。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类世界的可理解性(如果允许我这样的讲的话)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永恒的神秘。"他解释道:"先验地,我们好像可以很自然地认为世界完全是紊乱的,人的思维完全无法掌握。我们也可以(而且确实应该)设想世界是服从一定规律的,但这些规律只是思维的安排能力所造成的,就像

①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3、101页。

②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1页。

③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1页。

④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1、102页。

⑤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3页。

⑥ 爱因斯坦:《科学的宗教精神》,《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83页。

语言中字母的排列顺序那样的规律。但是,像牛顿引力理论所创造的规律性则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规律性。即使这个理论中的公理是人造的,但是理论的完全成功暗示了客观世界的高度规律性。这是人们不可能先验地预先设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奇迹',而且它随着我们的认识的不断发展而加强。"^①从理论上讲,世界完全可以是杂乱无章、混沌无序的,可是科学的成功似乎表明世界是有序的,而且可以被人为创造的理论所解释,这在爱因斯坦看来就是一个奇迹。人为创造的理论与客观世界的规律如此符合,这从逻辑的角度是无法设想的,只能用"先定的和谐"(或"思有同一"甚或"天人合一")来解释。对于人类来说,先定的和谐就是一个永恒的谜。因此,人类不应该太自信,而应对这种"先定的和谐"保持几分敬畏和感恩,并为不辜负这种"先定的和谐"而努力去发现它和遵循它。这就是爱因斯坦心中最深层的科研动机。

对于爱因斯坦而言,由于相信宇宙会有奇迹,一方面,人们应该努力捕捉那些奇迹;另一方面,捕捉奇迹未必能够成功,甚或一败涂地。有鉴于此,一个人只管尽到自己的努力,而把成败交给"上帝"(宇宙)来决定;借用中国的一句格言,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个人一旦持有这种态度,便可如爱因斯坦所说"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而找到"感情生活的支点",并"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那便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二、冯友兰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

如果说,爱因斯坦关于科研动机的说法只是从科学家的角度出发,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关于"成功"和"人生境界"的理论则是对所有人而言的,因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可以说,追求成功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行为动机,尽管人们对"成功"的理解有所不同。

冯友兰把成功分为三种:道德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和学问的成功,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功的因素也有三个,即努力、天资和机会,简称为力、才、命。这三个因素对于任何成功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对于不同种类的成功,这三个因素的配合比例是有所不同的。"大致说来,学问方面'才'占成分多,事业方面'命'占成分多,而道德方面则是'力'占成分多。"^②

关于学问的成功即立言,冯友兰举例说:"有些人致力于作诗,并作到十分的努力,然而他作出诗来,尽管合乎平仄,可是不是诗,那么,他就是没有诗的天资,但也许他在其他方面可以成功的。"^③可见,天资对于作诗是最重要的,当然要想成为一个好诗人,努力和机遇也是不可少的。

事业的成功即立功与做学问不同,干事业不是一人之能力所能完成的,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并且对手还得比自己差。这些条件能否得到满足,主要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机遇。冯友兰举例说:"项羽能力大,偏偏遇到的对手刘邦比他还高明,所以他只好失败。我们看看《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时不利兮',他毫无办法。有些庸才,偏偏成功,史册上很多,不胜枚举。"^④

关于道德的成功即立德,冯友兰指出:"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的多。只要努力,不需要天才,不需要机会,只靠努力便能在道德方面成为完人。这是什么道理呢?也就是为圣为贤需如何?很简单,只有'尽伦'。"冯友兰进而解释道:"所谓'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从前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现在不限定'五伦'。……名词虽旧,但意思并不旧。如果以新的话来讲,就是每个人应站在他的岗位上,做他应做的事。"⑤道德上的成功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无关的,一个普通人可以

① 爱因斯坦:《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奇迹"》,《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33页。

② 冯友兰:《人生成功之因素》,《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1页。

③ 冯友兰:《人生成功之因素》,《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572页。

④ 冯友兰:《人生成功之因素》,《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572页。

⑤ 冯友兰:《人生成功之因素》,《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573页。

成为道德上的成功者,而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可以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失败者。不仅如此,道德的成功与 所做事情的成败也是关系不大的;一个人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到努力就是立德,即使失败了也无损 其道德上的成功。例如,历史上的忠臣文天祥和史可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不影响他们在道德 方面的成功,以致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冯友兰宣称:"这种超越天才 与机会的性质,我们称它为'自由'……'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不能说'人 皆可以为李杜'或'人皆可以为刘邦、唐太宗'。"^①

由于机遇或天资方面的限制,一个人未必能够取得事业上或学问上的成功,但是这些限制却不能 从根本上妨碍他成为道德上的成功者。因此,道德成功的钥匙就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那把钥 匙就是努力。如果一个人不仅追求学问的成功或者事业的成功,他还追求道德的成功并付诸行动,那 么他的人生境界便得以升华;借用康德的术语,他便从必然王国跃迁到自由王国,当然,这种自由 是"自律的自由",而不是放任的自由。

前面谈到爱因斯坦对三种科学家的划分,这三种科学家代表三种精神境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 互相排斥的,而是后者包含前者并且超越前者。科研的较低境界是追求功利,即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一 种科学家;这并不是不道德的,因为人总要生活,科研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问题在于,一个科学家 仅以功利为科研的目的是远远不够的,虽然不是不道德,但也谈不上是高尚的。科研的较高境界是追 求好奇心和创造欲的满足,这也可说是追求个人利益,但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利益。精神利益和物 质利益并不冲突,可以同时追求。这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二种科学家,其境界比第一种科学家要高, 因为精神利益比物质利益具有更高的品质。在爱因斯坦看来,科研的最高境界是以宇宙情感为动力的, 即对宇宙和谐和宇宙规律保持敬畏和崇敬。这种境界是对前两个境界的超越,而不是否定。

按照冯友兰的人生境界理论,我们还可补充一种科研境界,即责任境界。一个具有责任境界的科学家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其境界高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前两种境界,但却低于后一种出于宇宙感情的境界。宇宙感情也是一种责任意识,如果说责任境界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怀有责任感,那么宇宙感情则是对整个宇宙怀有责任感,其责任感的底蕴更加深厚,层次也更高。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它们的品质依次递进。^② 据此,我们可以把以上所说的四种科研境界做如下归类。首先,所有科研境界都超越了受本能支配的自然境界。其次,出于功利目的的科研境界和出于好奇心和创造欲的科研境界均属冯友兰所说的功利境界,因为无论追求物质利益还是追求精神利益都是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不过,功利境界内部还可细分为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后者高于前者。第三,出于社会责任的科研境界和出于宇宙感情的科研境界分别属于冯友兰所说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道德境界的人是心怀社会的,天地境界的人是心怀宇宙的,因而后者的心地更为宽广。天地境界的人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此观念相当于爱因斯坦所相信的"先定的和谐"。冯友兰指出,这是一种心理的变化,而不是物理的变化;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而不是物质的变化。此种境界的人并不一定做出什么不同凡响、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却能对世界和人生具有相当深刻的"觉解",可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

由于这种人思想深刻,所以难免表现出爱因斯坦所说的"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孤独是一种超脱,用冯友兰的话说,这是道家特有的"风流"和"洒脱"。当然,不管孤独也好,洒脱也好,必须对社会尽到责任,即"尽伦",成为道德上的成功者;因为天地境界是对道德境界的超越,而不是排斥。冯友兰这样描述中国人特有的"国风":"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

① 冯友兰:《人生成功之因素》,《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574页。

② 参阅冯友兰:《新原人》,《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① 冯友兰所说的"国风"是儒墨道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使人进入道德境界,而且使人进入天地境界。

三、评动画片《哪吒》

动画片《哪吒》剧情梗概如下:天地灵气孕育出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元始天尊将混元珠提炼成灵珠和魔丸。灵珠将投胎为人,助人向善;而魔丸则将会生出魔王,祸害人间。元始天尊启动了天劫咒语,三年后天雷降临,摧毁魔丸。太乙真人受元始天尊之命将灵珠托生于陈塘关李靖家的儿子哪吒身上。然而阴差阳错,灵珠和魔丸竟然被掉包。本应是灵珠英雄的哪吒却成了混世魔王。但是,表面上调皮捣蛋、桀骜不驯的哪吒在内心深处却有着善良本性,并有试图改变人们对他误解的强烈愿望和冲动。面对民众的鄙视和天雷的降临,哪吒将何去何从?对此,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

从理论上讲,"我命由我不由天"违反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命观。冯友兰指出:"儒家所讲的命,乃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②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③ 既然哪吒的命可由他一人说了算,并且其环境可以由他创造或改变,可见,此命非彼命也。

动画片《哪吒》是对中国民间神话的改编,而"我命由我不由天"带有无神论的色彩。用神话来宣传无神论,这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在笔者看来,动画片《哪吒》所说的"命"是指社会成见,即冯友兰所说的"环境"。《哪吒》所折射出的感人精神实际上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成见的反叛。这一心声通过《哪吒》的呐喊而释放出来,那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另一方面,不信命的态度符合儿童不成熟的自我中心主义,从孩子口中说出一些无知加狂妄的话,那是符合儿童天性的,尽管荒谬但却显得可爱。"初生牛犊不畏虎"是个性自由的彰显或张扬,加上对某些现实状况的合理反抗,构成了动画片《哪吒》深层的审美价值。这种深层审美价值或许算得上康德所说的"壮美",加上影片"优美"的表层审美价值,即对图像和声音的优质处理,便产生动人心弦、沁人肺腑的震撼力。除此之外,《哪吒》那种既反映儿童心理又涉及人生哲理,因而既活泼又严肃的主题思想,使其中的表现方式恰到好处、别具一格,产生出既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意味深长、耐人咀嚼的艺术效果。如哪吒嘴里念叨的那首"儿歌":"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一口七八个,肚皮要撑破,茅房去拉屎,想起忘带纸。"这哪里是儿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如果由一位小学生以语文作业的方式交给老师,老师可能会给他个"不及格"。可是,当这首"儿歌"出自一个被禁闭在家里却满怀委屈怨恨和百无聊赖的孩童之口,则有其特别的寓意和幽默。

动画片《哪吒》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贯穿一种精神,即对社会成见或社会习俗的反叛。它的那句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针对社会成见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人力不可改变的天命。其实际的意思是:我的善恶是由我自己而不由社会成见或社会权威决定的。在这里,天命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自然之道(道法自然),大致相当于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规律,在这种意义上,《哪吒》的口号是正确的和积极的。正如冯友兰所说,道德成功的钥匙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只要努力,谁都可以成为道德的成功者,即"人皆可以为尧舜"。

《哪吒》影片中还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即:"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这句话是反面人物申公豹对其徒弟敖丙(即由调包之龙珠投胎东海龙王而生)说的,他把人心中的成见看成人力不可改变的宇宙规律。对此,哪吒喊出"去你个鸟命",以及"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并且最终博得敖丙的认同,两人成为朋友,共同践行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理。

①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30-331页。

② 冯友兰:《人生成功之因素》,《三松堂全集》第11 卷,第570页。

③ 冯友兰:《论命运》,《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465页。

对于被宇宙力量控制的天命,哪吒实际上并不反抗也无法反抗。当他得知在自己三岁生日那天, 元始天尊将派天雷来取走他的性命,他无奈地叹息道:"我自己的命自己扛,不连累别人",而后被天 雷击毁。这既表明天命不可违抗并且哪吒是认天命的,又表明哪吒不认的只是社会成见之"命",并 用自己的善良之举反驳之。哪吒的善良不仅表现在不愿牵累父母的孝心上,还表现在他为保护陈塘关 的百姓而奋不顾身地迎战申公豹和敖丙。就在将要刺杀敖丙的最后一刻,哪吒念及朋友情分而放敖丙 一马。敖丙也念及朋友情分最终与哪吒站在一起,共同抗争那个"鸟命",以致同归于尽。

影片的最后情节是,哪吒和敖丙携手面对死神天雷的到来,不过,天雷只销毁了他们的身体,而未能销毁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最终得到陈塘关百姓的爱戴和尊敬,这可说是"善有善报"吧。哪吒的身亡表明天命最终是不可违背的,而他的灵魂不死则表明社会成见之"鸟命"是可以改变的。从灵魂不死的角度看,哪吒的抗争最终取得成功,但这只是道德的成功,这便是"不成功,便成仁",即立德之不朽。动画片《哪吒》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此。

《哪吒》片尾的台词是:"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知道,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这意味着"命"这个东西是很难捉摸的,就连哪吒也没弄清楚。不过,对于命是什么,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给出较为清晰的回答。

作为被宇宙力量控制的天命是不可改变的,但作为被社会成见影响的命是可以改变的。后者之所以可以改变,那是因为道德成功即立德的自由权利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一个人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德行向不公正的社会成见进行抗衡,并且这种抗衡本身就是立德。正是在此意义上,哪吒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伸张了人所具有的道德成功的自由权利,又不否认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

在苍茫的宇宙或自然面前,一个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渺小,否则他就是不自量力、狂妄自大。因此,一个人应当对宇宙或自然抱以敬畏和崇敬。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德性,德性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尽伦",即努力尽到自己的社会职责。只要一个人尽到努力就是道德的成功即立德,而无论其努力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成功权利,人们由此可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在立功和立言上我们应当认命,但在立德上我们不必也不应认命。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即使受到不公的待遇也在所不惜,这就是立德的自由所在。孟子有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心就是人的善良本性,即"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里所说的知天、事天就是"天人合一",亦即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据此,如果人的善良本性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那么他可以接近甚至达到天人合一或天地境界。

爱因斯坦把宇宙感情看作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冯友兰把天地境界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哪吒那句"自己的命自己扛",把承认被宇宙力量控制的天命和承担责任结合起来。当我们把三者的人生观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时候,让人不禁想起哲学家康德那段至理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①宇宙感情或天人合一不同于一般宗教对人格化上帝的崇拜。这种境界中的人具有爱因斯坦式的孤独或中国道家式的超脱,同时具有对世界甚至宇宙的强烈责任感。对于这种精神境界,普通人通过努力也可达到,因为精神境界主要是立德而非立言或立功方面的。

责任编辑:罗苹

①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绝学"蠡测:杜国庠的因明研究*

郭 桥 孔漫春

[摘 要]关于因明的研究构成了杜国庠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然而多年来学界对此鲜有论及。侯外庐比较早地认识到杜国庠因明研究的价值,可是,这一认识相对于他在《杜国庠文集序》中对杜国庠学术研究的整体评价而言晚了20年。不了解杜国庠的因明研究,就难以准确地把握他关于先秦诸子,尤其是墨家思想的研究。杜国庠关于因明的研究主要涉及因明术语的现代诠释、因明的体系构成及其特点、新因明喻体形成的历史基础以及关于因明传播的回顾与反思。侯外庐称杜国庠的因明研究为"绝学",本文的研究可谓侯外庐这一评价的一个注脚。

[关键词]杜国庠 因明通俗化 因明理论 因明传播

[中图分类号] B81-09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30-09

杜国庠(1889—1961),曾用笔名"林伯修""林柏""吴念慈""杜守素""杜惑""吴啸仙"^①等,广东澄海人。学界称其为"朴素谨严的革命学者",认为他"研究中卓著劳绩、具有自己独到见解";^②而且他还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者之一"。^③他于1907—1919年在日本留学,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和郭沫若一道,听过日本佛学大师桂馨谷在东京本乡讲《大乘起信论》《金刚经》。^④这一时期,"杜国庠因研究佛学而获知'因明'(印度逻辑)的大意,这对他后来治理墨经很有帮助。"^⑤在回国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杜国庠对作为佛教逻辑的"因明"进行了专门研究,视因明为"值得我们腾出些时间来研究"的学问。^⑥在其生前自编的学术著作《便桥集》,以及其逝世后出版的两部文集,即《杜国庠文集》,还有作为"当代广东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之一的《杜国庠选集》中,均收录有杜国庠有关因明研究的论著。^②遗憾的是,杜国庠关于因明的研究成果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在《杜国庠文集》中所载的两篇序文、

^{*}本文系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2019CXT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桥,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孔漫春,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 开封,475004)。

① 参见杜国庠:《便桥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0年, 第237页; 於湘:《"墨者杜老"——访问杜守素先生》, 《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5期。

② 王匡:《写在〈杜国庠文集〉后面》,杜国庠文集编辑小组编:《杜国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1-592页。

③ 李锦全:《历史的轨迹 时代的召唤——杜国庠〈中国思想史论集〉序》,《学术研究》1998年第1期。

④ 参见郭沫若:《序〈杜国庠文集〉》,杜国庠文集编辑小组编:《杜国庠文集》,序文第 2 页; 熊泽初、黄学盛:《杜 国庠传略》,《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237页。

⑤ 熊泽初、黄学盛:《杜国庠传略》,《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 第237页。

⑥ 杜守素:《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5期。

⑦在《便桥集》中, 收录有《"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在《杜国庠文集》中, 收录有《关于"因明"》《"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在《杜国庠选集》中, 收录有《关于"因明"》《"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一篇编后记^①中,以及"简述社会科学家生平事迹、学术道路、成就影响"的《杜国庠选集》之前言^②中,均未提及杜国庠的因明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就杜国庠的因明研究予以初步探讨。

一、汉传因明基本术语的现代诠释

《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是汉传因明的两部经典。杜国庠在研究因明的过程中,立 足于近现代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对这两部典籍中出现的一些基本术语,进行了现代诠释。 这种工作,对于推动因明知识的广泛传播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兹举三例如下。

- 1. "同品""异品"。这是陈那新因明体系中的两个基本术语,杜国庠对这两个术语给出了以下两个解释。(1)"什么叫做'同品'、'异品'?如立'声是无常'宗,在这命题中,'声'是主辞,'无常'是宾词(述语),即用以判定主辞而欲证明其为如是的。凡事物具有这'无常'的属性者,称为'同品';而不具有'无常'的属性的事物,称为异品。" ^③ 杜国庠在这里通过举例的方法解释何谓"同品""异品"。(2)"'品'是品类。所谓'同品',是指具有宗的'后陈'(即'谓辞'或'表辞')所表现的属性的事物而言。……没有这样属性者,就是'异品'。" ^④ 在这里,杜国庠借助于"后陈"的现代解释,从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角度说明"同品""异品"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构成逻辑上的矛盾关系,"同品"是肯定概念,"异品"是否定概念。
- 2. "自悟" "悟他"。"启发他人使明白道理,叫做'悟他',自己奋发学习而明白道理,叫做'自悟'。" ^⑤ 或者说,"说服他人",叫做"悟他";自己"追求真理",叫做"自悟"。 ^⑥ "自悟"和"悟他"是新因明"八门二益"体系中所谓的"二益"。杜国庠的这一解释,指出了"二益"的目标指向以及实现途径。
- 3. "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能立',是说立论者建立一个论旨,它没有谬误,能站得住。'能破',是说能揭露论敌的谬误而推翻他的论旨。"关于"似能立"和"似能破",杜国庠的解释是:"建立论旨,因含有谬误而立不了,叫做似能立;驳斥他人论旨,没能把它谬误揭穿,或它原无谬误等而破不了,叫做似能破。"^②这里,杜国庠指出了似能破的两种可能情形:其一,在对方立论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谬误,但是,驳斥者没能指出谬误之所在;其二,对方的立论原本正确,不存在任何谬误,驳斥者是徒劳,根本不可能把对方驳倒。

关于为何要"立"(包括"能立"和"似能立")和"破"(包括"能破"和"似能破"),杜国庠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为什么要'立'要'破'呢?都由于要'悟他'——即是使别人悟到真理兴起正确的行为,纠正错误的行动。"[®]关于"似能立""似能破"的产生原因,杜国庠也进行了分析,即因为"运用逻辑没有到家,分析事物不能透彻,以致议论中含有缺点,不能达到'立'和'破'的目的罢了。"[®]

二、因明的体系构成及特点

(一) 因明的体系构成

因明作为古代印度的"五明"之一,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关于这一点,杜国庠有明确的认识,

① 郭沫若作《序〈杜国庠文集〉》, 侯外庐作《杜国庠文集序》, 以及王匡撰《写在〈杜国庠文集〉后面》。

② 杨越、蒋祖缘:《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概论》,杜国庠:《杜国庠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说明"第1页。

③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④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杜国庠:《便桥集》,第184页。

⑤ 杜国庠:《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哲学研究》1959年第10期。

⑥ 杜守素:《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5期。

⑦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杜国庠:《便桥集》,第182页。

⑧ 吴念慈编:《论辩文作法讲话》,上海:南强书局,1934年,第31页。

⑨ 杜国庠:《怎样写论辩文》,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35-36页。

他指出:"'因明'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体系",^①至于该"独特的体系"的具体构成,他以《因明入正理论》为基本依据进行了分析。

在《因明入正理论》的开头,商羯罗主以"颂"的方式对因明的理论结构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说明:"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②关于《因明入正理论》之开首颂,现代因明研究者进行了不同的断句。断句一:"能立与能破 及似唯悟他 现量与比量 及似唯自悟"。^③断句二:"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④断句三:"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⑤不难看出,上列三种断句虽然存在是否使用标点符号,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不同之差异,但就整体而言,它们均维系了五言一句的初颂用字格式。这一做法,固然能较好地体现颂文的诗体格律特色,但是在义理的理解方便方面,却不及杜国庠的断句:"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⑥后者的断句,完全是根据语义的相对完整性进行的。当然,与杜国庠类似的做法也并非无迹可循。唐代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世称"《庄严疏》")有关于《因明入正理论》首颂的如下解释:"及似二字该上立破""及似二字该上现比",大意是"要读作'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⑥当然,不难看出,杜国庠的断句和文轨之间也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异的。

基于对《因明入正理论》首颂的特殊断句,杜国庠对其中的"似能立""似能破"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及似'的'似'字,即指似能立和似能破而言。在逻辑上,虽有'真''似'的不同;但就目的上说,四者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欲使'他'人'悟'得真理;所以说'及似,唯悟他'。"[®]换言之,在杜国庠看来,能立、能破与似能立、似能破,前后两组情形虽然存在逻辑上的"真""似"不同,即能成立和不能成立之差异,但究其本旨而言却是一致的,均在于实现"悟他",即说服他人。进而,有关能立和能破、似能立和似能破的理论,也就构成了新因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称为"立破论"。

除了"立破论",《因明人正理论》之首颂还表明有关知识论的内容也是新因明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杜国庠这样指出:"在悟他之前,立论者都须'自'已'悟'得真理,于是达到'自悟'的知识就很重要",^⑤这也就是《因明人正理论》首颂的后半截所提到的四种知识——现量、比量、似现量、似比量。(1)"现量",这是指通过五官的感觉所得来的知识;(2)"比量",这是指由推理所得来的知识;(3)"似现量",这是指错误的现量;(4)"似比量",这是指错误的比量。"知识虽有正确与谬误之分,但就获得它的目的说,都是为'自悟'",^⑥所以,《因明人正理论》初颂的后半截提出"及似、唯自悟"。有关"现量""比量""似现量""似比量"的内容,构成了新因明理论体系中知识论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量论"。

总之,杜国庠依据《因明入正理论》初颂的内容,指出新因明理论的两大构成部分是"立破论"和"知识论"。这两大部分,在新因明中的位置关系是"把立破论放在知识论之前"。之所以如此,在杜国庠看来主要是出于"佛教弘教的立场",^⑩即传播佛教教义,驳斥异端观点。关于这一点,他后来有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即"颂把'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二句摆在前面,显示这一逻辑与墨家

① 杜守素:《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5期。

②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杜国庠:《便桥集》, 第181页。

③ 吕澂著、张春波整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

④ 沈剑英:《因明学研究》(修订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2页。

⑤ 谈锡永主编、李润生导读:《传统文化典籍导读·〈因明入正理论〉导读》, 北京: 中国书店, 2007年, 第279页。

⑥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杜国庠:《便桥集》,第181页。

⑦ 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5页。

⑧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⑨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⑩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①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逻辑不同,是着重于论争的。" ^① 唐代因明学者文轨也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解释,他指出:"此论宗明立破。故先他后自。" ^② 意思是,《因明入正理论》的宗旨在于阐明"立破"之则,"立破"的目的均在于悟他,所以在初颂的表述中先言悟他,后及自悟。可以看出,杜国庠和文轨的解释大体相同,只是在语言表述上存在着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差异。

需要指出,(1)尽管在《因明入正理论》初颂中,有关"八门二益"中"八门"的表述顺序是:能立、 能破、似能立、似能破——"悟他"四门,现量、比量、似现量、似比量——"自悟"四门,但是在 初颂之后的实际阐述过程中,商羯罗主则打破了这一顺序。《因明人正理论》在初颂之后的实际阐述 顺序是:能立、似能立;现量、比量、似现量、似比量;能破、似能破。实际阐述的顺序和初颂中理 论概括的顺序呈现出明显的差别,这一反差现象为《因明人正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 话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的出现表明了什么?(2)《因明入正理论》初颂中关于"八 门二益"的排列顺序,体现了商羯罗主对于"悟他"之门即"立破学"的重视,他关于"自悟"之门 即"知识论"(量论)的阐述是从属于"立破学"的。这一理论倾向,延续了陈那《因明正理门论》中 所呈现出来的理论特点。《因明正理门论》在开首即指出:"为欲简持能立、能破义中真实,故造斯论。" 也就是说,"为了简别和持取能立与能破中的真实道理而作此论,表明本论重在立破。"③《因明正理 门论》中关于"八门二益"的实际阐述顺序是:能立、似能立("为开悟他说此能立及似能立。" ④); 现量、似现量;比量、似比量("为自开悟唯有现量与比量。"^⑤);能破、似能破。(3)《因明正理门 论》和《因明入正理论》是陈那的早期新因明著作,其中所呈现出来的对因明两种成分即"立破学" 和知识论的轻重对比,到了陈那的后期因明著作《集量论》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集量论》共分6品, 第1品是"现量品", 阐述陈那关于认识论的主张, 指出量只有两种——现量和比量。第2品是"自 义比量品", ^⑥ 阐述三支作法中的"宗""因"二支。第 3 品是"他义比量品"。^⑦ 在该部分,"首先概括 说明:在自义比量的基础上,为使他人能够理解立论者所推知的道理,而说出具足三相的因,叫作他 义比量,即把在思维中所进行的推理,用语言表达出来。" 8 然后,进一步辨析"宗""因"二支。第 4 品是"观喻似喻品", 阐述三支作法中的"喻"支。第 5 品是"观遣他品", [®] 阐述因明概念论的内 容。第6品是"观反断品", @ 阐述似能破的内容。不难看出,在《集量论》中,有关"自悟"的量论 (包括"现量"和"自义比量")被置于首位,有关"悟他"的"他义比量""喻似喻""反断(似能破)" 则居于次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杜国庠关于新因明理论体系的两大构成部分之关系的断定是有条 件的,他明确指出自己的判断是以"可作为新因明的代表作"的《因明入正理论》为前提的,即"由 上举《因明入正理论》(可作为新因明的代表作)看来,新因明虽由佛教弘教的立场,把立破论放在知 识论之前,同时不免有其限界,但它的知识论却颇平实"。 ② 这一点,体现了杜国庠在学术研究中所秉 持的谨慎断言态度。

(二) 关于因明的特点

在杜国庠看来, 因明具有以下特点。

①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② [唐] 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卷 1, 支那内学院 1934 年刻本。

③ 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页。

④ 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 第212页。

⑤ 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 第213页。

⑥ 吕澂译为"为自比量品",参见吕澂:《集量论释略抄》,《内学》1928年第4辑。

⑦ 吕澂译为"为他比量品",参见吕澂:《集量论释略抄》,《内学》1928年第4辑。

⑧ 陈那造、法尊译编:《集量论略解》,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编辑说明"第4页。

⑨ 吕澂译为"观遮诠品",参见吕澂:《集量论释略抄》,《内学》1928年第4辑。

⑩ 吕澂译为"观过类品",参见吕澂:《集量论释略抄》,《内学》1928年第4辑。

①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1. 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因明"作为印度的"五明"之一,杜国庠认为,它"约略和现今的逻辑相同",同时他也明 确地指出:"因明这种逻辑有许多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①这一观点,可 以获得以下证据的支持。其一,对《因明入正理论》开首颂的分析。《因明入正理论》的开首颂是"能 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这四句颂,前两句说明"显正破邪"的轨 则,后两句说明"求真了悟的途径",那么"前后连贯起来,成为一种有机的逻辑体系。由于建筑于 求真理的基础之上,故它能不坠于没有内容的形式,不脱离认识论的立场。"②其二,新因明的喻支包 括喻体和喻依,"且由喻依导出'喻体'",以及因明所谓的"宗过"中包括"现量相违"。③"现量相违" 的意思是, 所立的宗不符合世间五官所感觉到的知识。其三, 熊十力关于"比量三术"的解释。熊十 力的具体解释如下:"实则三相之义,盖可诠之为比量三术:初相陈因,但云设臆,次乃汇同,第三 简异。(简者简别。)三术者备,证义圆成。篝灯兀坐,闻有声来,声浪奔腾,知是无常。此岂漫然, 良由比度,而此比度,略由三术。初臆无常,因所作故,即以此因,遍在声上。设声有非所作者,此 因便非,必须更作他臆,今无不遍,此臆或然。次乃汇同,历观声外余处,有无所作,亦是无常。又 次简异,复验声外余处,有无其常,亦是所作。乃果于瓶于空,同有异无,(于瓶等见是所作与无常, 名同品定有。于空等见是其常而非所作,名异品遍无。)合证所作,无常必随,声所作故,应是无常。 即前设臆,至此决定。" ④可以看出,熊十力把因三相视为检验一个立宗是否成立的三个有机环节:"设 臆"("遍是宗法性"), "汇同"("同品定有性"), "简异"("异品遍无性")。杜国庠在此基础上认为, 可把因三相看做"比量(推理)三术",熊十力所做的说明可以作为因明"顾到实际"的证据。^⑤

2. 介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中间的一种特殊的逻辑。

杜国库反对仅仅因为三支作法和三段论之间存在相同之处,便把因明"附会成了形式逻辑",认为这种做法"抹杀因明的特殊性",属于"毫无是处的皮相之见"。至于应该如何从西方逻辑的角度看因明,杜国庠结合新因明的喻支进行了分析。在陈那新因明中,虽然保留了喻支,但新因明的喻支和古因明不同,新因明的喻支包括喻体和喻依,而古因明的喻支仅仅包括喻依。就新因明的喻支来看,"如果置重于喻体,便多带有演绎的色彩;如其侧重于喻依,则归纳的色彩加强起来。而新因明的喻,从其由古因明演展出来的过程(尤其是删'结'改'喻'的过程)看来,从因的三相的确立和说明等看来,可以说喻体部分是由喻依概括出来的。"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杜国庠提出:"说因明是介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中间的一种特殊的逻辑,毫不过分;近时研究因明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见解。"^⑥

关于"因明是介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中间的一种特殊的逻辑",杜国庠还给出了另外的解释。他指出,因明不像演绎逻辑,单在论式中的概念和命题等上面做功夫,它除了检查宗之前陈是否遍有"因"所指的属性,"就说这是建立'声有所作性'这个命题,恰和演绎逻辑底小前提相等",而且"就宗底同品及其异品所包含的事物去检查是否'同品定有'及'异品遍无'。这就使因明类似于归纳逻辑了。"^②可见,这里是在结合因三相进行分析,即就因三相的整体可以证成宗之成立而言,因明具有演绎逻辑的性质;就第二相和第三相的各自证成而言,因明又具有归纳逻辑的性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关于因明,杜国庠指出:"公平地说,它是介在于演绎和归纳两种逻辑中间的一种逻辑"。[®]

"介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中间的一种特殊的逻辑",这是杜国庠关于陈那新因明所给出的一种性

①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杜国庠:《便桥集》, 第181页。

②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杜国庠:《便桥集》,第181页。

③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④ 熊十力:《唯识学概论•因明大疏删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⑤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⑥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⑦ 吴念慈编:《论辩文作法讲话》, 第 206 页。

⑧ 吴念慈编:《论辩文作法讲话》, 第 206-207 页。

质断定。在此基础上,他又从因明发展史的角度对因明做出了相应的分析。他指出:"三段论法是演 绎逻辑, 而因明则大体说来是介平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之间, 从其历史的发展说, 是朝着归纳逻辑走 的。" "从其历史的发展说,是朝着归纳逻辑走的",这一判断遭到了石村的批评。石村指出:"认为 因明'从其历史的发展说,是朝着归纳逻辑走的',这种论断也未必是正确的。"个中缘由,石村这 样指出:"古因明发展成为新因明,它所表述的推理由简单类比进展到以演绎为主的推理,而在演绎 过程中又附着有归纳的因素。重于当下的'悟他',使得因明不能撇开可以亲知亲证的事实方面(喻 依),这就构成了因明三支作法中的归纳因素。……在陈那的因明理论中,宗支所表达的认识,离开 了喻支中两个等值的表述普遍性联系的正反命题(同喻体和异喻体),就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第七世纪 时法称的因明学说中、索性砍去喻依、并把喻体提到论式的最前面、废去了喻支的名称、在这里偏重 演绎的倾向就更明显了。"^②杜国庠和石村的看法孰是孰非?我们认为,二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相同, 进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存在差异。杜国庠主要立足于如下事实:古因明五支作法中的"合"支所体现的 是类比推理, 陈那三支作法中喻支的特殊构成则体现了归纳推理——喻支由喻体和喻依构成; 由喻依 到喻体,体现了归纳的过程。石村则不同,其观点主要立足于如下事实:古因明中存在着喻依,宗的 得出是类比的结果; 陈那新因明中宗支的得出, 离不开喻体的直接支持; 法称因明中, 喻依不再存在, 宗支的得出完全是演绎推理的结果。应该说,杜国庠和石村两人的看法,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抓住了因 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石村对杜国庠的批评忽视了对方所下断定的语境。

三、新因明喻体形成的历史基础

无论是古因明抑或陈那新因明,均包括"喻"支,只是古因明的喻支仅仅涉及具体的事物,宗是借助于喻支和宗的前陈进行类比而得出的,陈那新因明的喻支则不然。陈那新因明的喻支包括两部分:喻体和喻依。其中,喻依可谓是对古因明喻支的直接继承,而喻体属于新增部分,它揭示了因法和宗后陈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普遍联系。

在谈到古因明和新因明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往往看到的是陈那因明中喻体和古因明喻支之间的区别,而杜国庠则不然。

下引案例是三支作法的一个经典例子。

宗:声是无常,

因, 所作性故,

喻:若是所作,便见无常,譬如瓶等(若是其常,见非所作,犹如空等)。③

在上举例子中,杜国庠指出:"'譬如瓶等',本为古因明所有,谓之喻依;另把'若是所作,便见无常',加于其上,称为喻体。这种改作,似乎不无受到古因明被删去的'结'——如'瓶有所作性,瓶是无常;声有所作性,声亦无常'——的暗示。"⑤这里,杜国庠用"暗示"一词来表达古因明的喻支和新因明的喻体之间的关系,透漏了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遗憾的是,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杜国庠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不过,关于古因明的"合",他有这样的解释:"古因明的'结',⑥是从瓶和声都有所作性的共通点,由'瓶是无常'而类推到'声亦无常'的。"⑥假设进一步追问:为何从瓶和声都有所作性,进而由"瓶是无常"而可以类推到"声亦无常"?所作性和无常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在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过程中,所作性和无常之间的必然联系就会被发现,进而得到明确的表述,形成

①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② 陈望道:《因明学概略》、石村:《因明述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 第 220、220-221页。

③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④ 原文的"结"应为"合"。

⑤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 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⑥ 原文的"结"应为"合"。

⑦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新因明中所谓的喻体。当然,这仅仅是本文对杜国庠所谓"暗示"的一种解释,是对古因明的喻何以能够引申出新因明的"喻体"的一种推测。

关于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中喻体的形成基础,现代的因明研究者多立足于三支作法中喻体和喻依的关系来进行分析,认为喻体是对喻依所提供的具体事实进行归纳的结果,杜国庠则独辟蹊径,他从古因明和陈那新因明相互联系的角度,从因明发展的视角切入问题的考察。这种研究方法,体现了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融为一炉的致思风格。

四、汉传因明传播的回顾与反思

汉传因明的传播也是杜国庠因明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一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 汉传因明的传播史

杜国庠称因明为"移植进来的逻辑"。^①关于因明的"移植"及其传播情况,他有如下一段概述。 "因明入正理论"是唐朝玄奘法师由印度携归。于贞观二十一年秋八月六日于弘福寺承诏译 出。因为辞约理丰,未易理解,他的高足窥基遂为疏解,名"因明入正理论疏"(俗称"大疏"), 一时疏解,无可俦匹。自唐迄明,它的流传情况如何,未有稽考,就其在中国失传复由日本取回 的事实看来,恐怕流传也是不太广的。^②

基于上述材料,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杜国庠关于汉传因明在中国的移植和传播情况的 论述,主要是对陈那所开创的新因明进行分析。汉传因明的内容包括古因明和新因明。古因明在中 国的传播伴随着佛教的流传,标志性事件是公元5-6世纪,先后有三部古因明的著作被翻译成汉文, 即《方便心论》(公元 472 年译出)、《回诤论》(公元 541 年译出)、《如实论》(公元 550 年译出)。玄 **奘在汉传因明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把陈那所开创的新因明传入中国,对因明义理进行宣讲,进** 而培养了第一批研究因明的中国学人,催生了第一批由中国学人完成的因明著述。由于玄奘的翻译和 讲解,汉传因明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指出,"汉传因明主要继承和发扬了印度新因 明系统中陈那早期因明思想,以《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为经典", ③ 杜国庠关于"印度 的逻辑——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只谈到了玄奘于公元 647 年翻译的《因明人正理论》,没有涉及他 于公元 649 年翻译出的另外一部新因明经典,即《因明正理门论》。(2)由于玄奘及其弟子、再传弟 子的卓越工作,唐代成为汉传因明史上因明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玄奘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撰注的因 明注疏有 20 多种, 例如: 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 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 净眼的《因明 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 慧沼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因 明入正理论疏义纂要》《因明入正理论疏义断》,智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 《因明入正理论疏略记》,等等。其中,窥基之注疏影响最大,世称"大疏",诚如杜国庠所言:"一时 疏解,无可俦匹"。(3)"大疏"在中土失而复得的事实表明,宋代至近代,汉传因明在中国的传播进 入衰弱阶段。关于"大疏"在中土失传的时间,杜国庠援引松岩的重刻"大疏"跋指出:"盖在元 季兵燹"。"大疏"之所以能够失而复得,有赖于光绪二十一年春杨仁山居士"由东瀛取回",后校雠 锓板。^④

(二) 汉传因明的传播效应

关于汉传因明的传播效应,杜国庠分别从和明代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进行对比,以及因明自身对中国学术影响的角度予以说明。其中,关于和《名理探》的对比,他这样指出:作为从外国"移植进来的逻辑",因明和《名理探》"虽都由外国传来,但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前者实在比后者大得多。"个中原因在于,陈那因明传入中国的时候,"佛教大体已经中国化了,故易为国人所接受。"《名

① 杜守素:《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5期。

②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③ 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

④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理探》的翻译则不然,"当时西方思想对于国人尚属生疏",《名理探》又非全本翻译,"故未为世人所重视,甚至多连这书名都不知道的"。^① 从因明自身对中国学术影响的角度而言,杜国庠一方面肯定了有唐一代属于汉传因明发展的高峰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就整体而言,因明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不大,^② 流传不广,^③ "禅宗盛行之后,因明终归衰歇,连因明的书籍也一时绝迹了。" ^④ 当然,这里所谓"因明的书籍",系指窥基的《因明人正理论疏》。^⑤

总之,关于汉传因明的传播效应,杜国庠一方面认为要比《名理探》"大得多",另一方面又认为传播范围有限,影响"不大"。后者引起了杜国庠的关注,认为是"值得吸取的教训"。⑥他进一步分析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1)因明的汉译本用语存在缺陷。这主要指"文词难懂""用文言表达异俗事例",^⑤进而使得"译文不通俗""不像中国语文的惯例"。^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杜国庠在研究、阐释因明的过程中,着力于用语的通俗易懂。本文前述"汉传因明基本术语的现代诠释"之内容,可谓是其"因明知识通俗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2)禅宗的影响。在《"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一文中,杜国庠发现了禅宗和因明的不相容关系,即"禅宗盛行之后,因明终归衰歇"。此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因明在中国之所以不振,除了译文简约,堆满佛教成语之外,似与中国佛家宗派的消长有着很大的关系。"^⑤就此,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此中消息,耐人深思"。^⑥当然,基于"他对佛学思想有专门研究",^⑥杜国庠给出了自己"深思"的结果:"禅宗自六祖慧能以后,宗风广播南北,而禅宗重在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本来就不重视因明这样的逻辑的。"

五、结束语

因明研究是杜国庠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的探索及取得的成就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1. 侯外庐的新认识与杜国庠的因明"绝学"。在完成于1962年的《杜国庠文集序》中,侯外庐曾有如下自述:"我读了广州'杜国庠文集编辑小组'同志们编辑的《杜国庠文集》,倍觉他的精粹的遗篇逸章是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的典范,教育意义很大。"^⑤《杜国庠文集》辑录的文章共分五部分,其中,第五部分是关于逻辑和因明的。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当时尚未引起侯外庐的关注。时移境迁,20年后,侯外庐撰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章《深沉的怀念——纪念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国庠的学术研究时他明确地提出:"二十年前,我写《杜国庠文集序》曾对此有过论述。在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想再作一些补充。" ⑥这些"补充",包括对原《杜国庠文集》中第五部分内容的评价。他这样指出:"第五部分讨论逻辑学与因明学问题,是杜国庠同志的'绝学'之一。"这里,杜国庠关于逻辑和因明的研究被侯外庐视为"绝学"。针对这一"绝学",他给予了高度评价:"杜国庠同志的学术造诣是多方面的,逻辑学、因明学,达到很高的成就。" ⑥这一评价,体现了20年后侯外庐对杜国庠学术研究的重新认识。本文

① 杜守素:《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5期。

② 杜国庠:《学习逻辑最好在大辩论中学习》, 杜国庠:《便桥集》, 第 205 页。

③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④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杜国庠:《便桥集》,第185页。

⑤ 杜国庠:《学习逻辑最好在大辩论中学习》, 杜国庠:《便桥集》, 第205页。

⑥杜国庠:《学习逻辑最好在大辩论中学习》,杜国庠:《便桥集》,第205页。

⑦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⑧ 杜国庠:《学习逻辑最好在大辩论中学习》,杜国庠:《便桥集》,第 205 页。

⑨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⑩ 杜国庠:《"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 杜国庠:《便桥集》, 第185页。

① 侯外庐:《深沉的怀念——纪念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

① 杜国庠:《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 Z1 期。

③ 侯外庐:《杜国庠文集序》,杜国庠文集编辑小组编:《杜国庠文集》,序文第7页。

④ 侯外庐:《深沉的怀念——纪念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

⑤ 侯外庐:《深沉的怀念——纪念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究》1981 年第1期。

的研究可谓侯外庐上述评价的一个注脚。当然,杜国庠关于因明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论及, 比如,有关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也为其所关注。2. 因明何以"值得我们腾出些时 间来研究"?在《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一文中,杜国庠提出了"'因明'值得我们腾出些 时间来研究"的观点。①这是基于近代时期因明复兴的时代背景,杜国庠关于因明所给出的一个价值 判断。他为何会做出如此断定呢?根据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因明已经成为中国文 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杜国庠指出,因明自唐玄奘传播到中国之后,"迄今一千三百有余年,虽没有普 遍流行,但确已构成中国佛学的一部分,为释家所乐道。"鉴于此,他得出结论:"凡是谈到中国的思 想史和中国逻辑史的,对于这份遗产,都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②(2)学习和研究因明,有助于 训练论辩思维。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关于因明对于论辩文写作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方面的论述。 他指出:"因明关于论辩的种种说话,可以作写论辩文时的参考"。例如,"七因明""五问四记答", 有关"宗过"的知识,"立量破"优于"显过破"的主张,"六因"理论。他说,"这些都是对于做 论辩文的人有帮助的。"③这里,杜国庠所谓的"因明"包括古因明和陈那新因明。(3)因明是认识 和把握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有益参考。 在这一方面, 杜国庠借鉴因明对于墨家逻辑思想所进行的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就是有力的佐证。当然、借鉴包括因明在内的外国逻辑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时 候,杜国庠明确地指出:"只可借镜,不能用它替代"。④事实上,杜国庠不仅仅主张因明"值得我们 腾出些时间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对因明也做出了切实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或以专论的形式 出现,例如《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因明"没有脱离认识论的立场》;或以散论的方式存在于其他相 关论著之中,例如《论辩文作法讲话》《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这些研究成果,既涉及因明的 基本理论,也涉及因明作为工具性学科的应用价值,例如,因明对于论辩文写作以及研究中国古代逻 辑、尤其是墨家逻辑的参考价值。应该说、因明的研究和运用构成了杜国庠学术研究历程的一条鲜明 脉络,不了解他对因明的研究,我们对这样一位"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的"革命学者"治学风格和 特点的把握就难免失之偏颇。例如,有学者曾撰文指出,杜国庠"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诸子思想", 列举的论据是: "在《庄子》章里, 他把宋钘的言论和庄子的言论作了比较; 在《荀子》章里, 他把 荀子的礼与孔子的礼作了比较;在《韩非子》章里,他把荀子的'势'、慎到的'势'与韩非子的'势' 作了比较;在《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里,他把公孙龙的思想与墨辩的思想作了比较。"^⑤不难看 出,这里对于杜国庠运用比较法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之理解,至少在论据的选择上囿于诸子之间的比较。 实际情况是,杜国庠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时候,除了把诸子进行比较,还把诸子,主 要是墨家的思想和因明进行比较。翻检杜国庠有关墨家研究的文章,可以发现因明是其阐释研究的重 要凭借,理解因明知识几乎成为准确理解杜国庠墨家思想研究的必要前提。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杜守素:《为什么逻辑离不开认识论?》,《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5期。

② 杜守素:《关于印度的逻辑:因明》,《文讯》1948年第4期。

③ 吴念慈编:《论辩文作法讲话》, 第 207、208-209 页。

④ 杜国庠:《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哲学研究》1959年第10期。

⑤ 杨越、蒋祖缘:《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概论》,《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 第23页。

政 法 社会学

・政府监管研究・

市场所,还是食药所

——基层食药监管体制改革选择的行政逻辑*

刘 鹏 钟光耀

[摘 要]以我国 2013 年以来的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进程为研究领域,基于对中部 J 省两个县的双案例分析,有助于研究在信息模糊条件下,面临食品药品统一监管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两种选择时,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选择的行政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机构改革选择时具有行政服从、同级诱导及自身理性自定的综合特征,而三种逻辑中占主导的是基层政府对于自身行政工作绩效、风险与编制约束的理性判断;地方政府会倾向于运用"选择性的行政修辞"和"策略性的绩效论证"来为自身的机构设置方案进行行政辩护,以实现三种逻辑的形式统一。最后,本文基于学理分析,为今后的基层机构改革,以及大市场综合监管形势下,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市场监管综合体制 基层机构改革 行政修辞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39-11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中国的基层国家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中,县级及其以下的政府机构设置模式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问题,^① 由此往往可以折射出国家建设和行政改革在基层落实的政治逻辑。在单一制的中国行政体系下,以往的研究大都认为基层行政机构设置的主要因素是上级政府部门的决策方案和压力,^② 或受到其他同级政府部门政策示范的诱导,^③ 而基层政府对自身的利益考量并非最为重要的因素,其一般只有被动落实的可能。^④ 同时,这些研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假设,即中央或其他上级政府对于机构设置的方案选择已经十分明确。然而,从现有的政治制度分析,地方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应当属于本级政府的事权,理论上是无需参照上级政府意见而自行决定的。在历次机构改革的探索期,均为地方政府的创新探索留有余地。那么,如果上级政府并未对基层行政机构设置方案做出统一规定的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18ZDA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光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①徐勇:《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强村、精乡、简县》,《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② 柯学民、刘小魏:《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视角》,《理论月刊》2014年第11期。

③ 卓越、陈诚:《梯度理论在政府创新扩散中的应用研究——以行政服务中心及其标准化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 杨光斌:《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新论——理论、现实与政策》,《学海》2007年第1期。

确指示,甚至不同的上级政府部门在方案选择上出现一定的冲突或矛盾,基层政府会如何做出选择呢? 什么因素能够解释基层政府的选择逻辑呢?

中国自 2013 年至 2018 年持续进行的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系改革,给回答以上的理论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建立一个统一、权威、高效的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既是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自 1998 年以来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一直努力的战略方向。自 21 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有向美国式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学习打造中国的 FDA 改革设想,但这个过程显得比较步履蹒跚。^① 每当发生比较重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之后,多头分散的监管体制总是被媒体和社会公众所诟病。2013 年 3 月,国务院合并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原来分散在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能及相应的监管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统一划转到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随后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对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目标与时间要求,建立单列的食药局成为主要的政策导向。这对于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央政策的影响下,2014 年底,全国范围内,95%的地级市、80% 左右的县设置了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局。

然而,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等待和观望之后,一些省份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放弃此前新采用的食药局模式,这些省份调整或者重新改变了市县层面食药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决定采用合并工商、质监等部门组建大市场监管局的市场局模式。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 2014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一些省在编制控制、基层延伸和监管压力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在县乃至市一级选择了综合监管的市场局模式。到 2016 年 5 月,全国设置独立的食药监管机构的县市已经减少到 40%。^② 而到 2017 年底,全国 70% 左右的县(市、区)和 20% 左右的地市都推行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③

因此,本文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2013 年以来,我国基层食药监管体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过程? 这种发展和流变过程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 在面临食品药品监管统一专业要求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两种具有一定冲突的改革要求时,基层政府在设计自身监管体制时是如何考虑的? 如何平衡食药安全监管工作的专业性与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 信息模糊 (信息不对称) 下的政府行为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以往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均建立在一个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即中央或其他上级政府对于机构设置的方案选择已经十分明确。然而,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对于下级的政令并非总是清晰明确的。在实际的行政结构中,中国有五级政府,每一级政府均是下一级政府的委托主体,也同样是上一级政府的代理人。这样长而密集的委托一代理链条必然会带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决策者优先考虑的是政策的灵活性,这来自政治上的变幻莫测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④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政策充斥着多重的解读,因此中国的政治行动者往往必须掌握解读上级不完整不清晰信息的技巧。^⑤越基层的政府面临着越严

① 刘璐、叶祖光等:《美国 FDA 的食品监管机构和管理措施简介》,《中国药事》2004 年第 4 期。

② 毕井泉:《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座谈会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药监管信息查询平台: http://www.cfdacx.com/news_show.aspx?id=9749,2016年6月21日。

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 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9年第2期。

④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mbracing Uncertainty: Guerrilla Policy Style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p.1-22.

⑤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77.

重的信息模糊问题。

实证研究发现,基层官员确实面对着大量模糊和宽泛的指导方针,^①以及来自不同层级部门相互冲突的指令。^②而有研究则认为,这种模糊的语句所造成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有意为之,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政策的灵活实施,鼓励地方开展政策创新,允许地方在多任务目标中进行工作选择,使得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避免承担政策失误的责任,这样有助于增强中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和弹性(Resilience),适合中国的国家治理。^③

此外,不明确的政策吸引了不同立场的支持者,并增加了其参与政策执行的机会。面对着中国这一超大型国家所带来的跨地区多样性,以及在单一制政体下的多层级政府需要允许对政策命令的多样化解释,因此,基层政府在施策中必须要应对政策一致性和实施灵活性之间的矛盾。^④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偏好相对模糊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进行政策创新和不同机构改革方案选择时究竟会遵循什么样的行动逻辑?已有研究尚未对此做出很好的回答。

(二) 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模式选择的行政逻辑

如前文所述,在本文所研究的新一轮机构改革前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系改革的浪潮中,各基层政府所选取的机构设置模式不尽相同,形成了单列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综合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并存的局面。那么,是何因素影响了各基层政府的改革选择?不同的行政决策背后所遵循的逻辑有何差别?

已有研究认为,作为典型的单一制国家,我国的中央一地方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来自中央授予,上级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单边垄断",^⑤ 地位较高的政府会要求地位较低的政府遵循其改革选择。^⑥ 因此,就我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而言,影响地方政府政策选择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便是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虽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有所下降,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单一制的国家性质,^⑦ 中央政府在政治层面上依旧掌握着主动权。因此,已有研究认为我国目前的央地关系呈现的是"财政分权、政治集权"^⑥ 的特征,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实际控制通过财政拨款和人事任免等方式逐步加强,^⑥ 辅以"压力型体制"^⑥ 层层加压,下层政府对于上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只有被动落实的可能。因此,影响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便是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

除了需考虑对于上级政府的行政服从外,同级政府的示范诱导也是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或机构改革之时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多个同级的下级政府同时接受上级政府的考核,由此导致同级政府间出现激烈的竞争,下级层面的地方政府领导会有较大的动力以更好的表现来争夺任期、晋升机会等奖励。^⑩已有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发现,处于不确定环境中时,组织会有很大动机去

① Linda C.Li, "Working for the Peasants?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n the Chinese Rural Tax Reform", *The China Journal*, vol.57, 2007.

② Graeme K. Smith, "The Hollow State: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3, no.1, 2010.

③ Jing V. Zhan and Shuang Qin, "The Art of Political Ambiguity: Top-Down Intergovernmental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2, no.2, 2017.

⁴ Xueguang Zhou,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llu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36, no.1, 2010.

⑤ 柯学民、刘小魏:《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视角》,《理论月刊》2014 年第 11 期。

⁶ Brett Sheehan, "Book Reviews: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38, no.2, 2000.

② Yasheng Hua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 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World Development*, vol.24,no,4,1996.

⑧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⑨ 吴从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模式变迁的政治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⑩ 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①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模仿其认为成功的类似组织的实践,^①以帮助其降低风险和成本,提升其竞争力。^②相邻的各地方政府有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特征,面临大体相同的政策问题,被互相视为"政策学习的良好对象",^③地方政府会"不断观察"周边政府的政策实践,以此作为本级政府决策的参考,以简化决策制定过程。^④也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同级间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剧基层政府的政策模仿,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地方政府对于同级政府的行为会非常敏感;^⑤周边政府改革实践越成功,基层政府则会越不甘落后,积极模仿周边政策实践。^⑥本文所研究的基层政府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即处于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上级政府对于政策创新的要求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同级政府间的模仿、学习和竞争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本研究中基层政府的选择逻辑。为便于比较,本文将同一层级政府间的模仿、竞争和学习统一概括为同级压力。

在央地关系视阈下,以上研究认为,在我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下,面对上级政府的财政及人事控制,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对上级政策的被动落实执行,同时还会受到同级政府压力的一定影响。在这种对上负责且高度竞争的体制中,地方政府自身的很多利益诉求往往很容易被忽视。虽有部分研究指出基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对上级政府的决策持暧昧态度,但也表示这并不是决定基层政府政策选择的最重要因素。^②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会发现在上级压力和同级诱导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同一省区内,不同基层政府的机构改革模式却并不同;同一基层政府在不同时期,机构设置也存在差别,影响基层政府决策的因素并非单一的。那么导致这些差别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究竞遵循怎样的行政逻辑,是当前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已有研究中所关注的上级行政服从压力、同级政府诱导压力及基层政府自身理性等三方面因素,探讨基层政府机构改革选择背后所遵循的行政逻辑。

三、2013年以来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源流与分析

2013 年来,我国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一直存在着"食品药品统一权威监管"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两种源自中央政府,却又差异巨大的改革顶层设计,在监管思路上表现出综合监管和专业监管并存的特点。而同一时段,部分省级政府对于基层监管机构设置也缺乏相对明确的指引,基层政府所面临的信息条件较为模糊,各地所选取的机构设置模式各具特色、五花八门。在本轮机构改革以前,单就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机构名称而言,各地就存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不同称谓;同一省内甚至同一地级市内,各县区的监管机构设置也不尽相同。

此前全国各省的食品药品监管模式虽然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但总体上来说,都是由两大模式衍生出来的,即单列模式和综合模式。所谓单列模式,就是指从省到乡镇,每一级政府都设立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专门负责食品药品监管事宜的监管模式;所谓综合模式,就是从省到乡镇,中间某几级政府不设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而是将其监管职能与其他相关部门进行部分合并,由新合并的综合部门来负责食品药品监管事宜的监管模式。前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即为单列模式,该

① Pamela R. Haunschild and Anne S. Miner, "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Ouarterly*, vol.42, 1997.

②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2, 1983.

③ Patricia K. Freeman, "Inters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State Legislators Regarding Energy Policy Innovation", *Publius*, vol.15, no.4, 1985.

④ Jack L. Walker,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3, no.3, 1969.

⑤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48, no.1, 1995.

⑤ Frances S. Berry and William D. Berry,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2, 1990.

⑦ 马斌:《央地关系一体化下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时段较多采用单列模式的省区主要包括北京、山东、河南、湖北、广西、甘肃等;前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均为综合模式,主要出现在浙江、江苏、辽宁、安徽、贵州、宁夏、天津等省市。而梳理我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变革源流可以发现,以上的单列模式和综合模式,分别源自 201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 2014 年后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具体而言,倾向于专业监管的单列模式源自 2013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2013 年 3 月,为克服原有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所存在的重复监管与监管盲点并存的缺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食品药品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随后,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 号文〕,对省、市、县三级食品药品监管职能和机构整合提出了目标与具体要求。 全中央政策的影响下,到 2013 年 9 月底,先后有 17 个省出台了省级食品药品机构的三定方案,而其他的省份仍然持观望态度。但是,随着督导力度的增加,至 2014 年 5 月,全国省级层面的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到 2014 年底,全国已有 95%的地级市、80%左右的县选取了单列模式设置了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金在改革初期,单列模式为我国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主导模式。

然而,在单列模式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另一种倾向于综合监管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也同步发展起来。2013年12月,浙江省在监管职能和机构整合方面更进一步,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市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意见》,提出在县级整合原食药监与工商部门职责,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划入原质监部门的食药监管职责。^④自2014年下半年起,安徽、福建等多个省份在市县层面启动了类似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

以上"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重要源流是 2014 年来中央所推动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2014年 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出台,要求在市场监管领域整合执法资源,探索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机制,探索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同时提出"加快县级政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探索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而到 2014年 11 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继续肯定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并将综合执法范畴由城管、文化等扩展到食药监管、工商质监等更为广泛的监管领域。在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要求和指导下,单列模式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面积减少,综合模式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在全国大范围铺开。到 2016年 5 月,全国独立设置食品药品监管的县市已经锐减到 40%;⑤而到 2017年底,全国有 70% 左右的县(市、区)和 20% 左右的地市都推行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⑥

在 2018 年 3 月的最新一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后,这种市场监管综合设置的模式最终在中央层面也开花结果,即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等的职责整合,成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市

① 马凯:《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2_1/2013 -07/18/content 1776445.htm, 2013 年 3 月 11 日。

②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wgk/2013-04/18/content_2381534.htm,2013 年 4 月 18 日。

③ 毕井泉:《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座谈会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食药监管信息查询平台: http://www.cfdacx.com/news_show.aspx?id=9749, 2016 年 6 月 21 日。

④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市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zj.gov.cn/art/2014/2/19/art_32431_137184.html, 2012 年 12 月 11 日。

⑤ 毕井泉:《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座谈会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食药监管信息查询平台: http://www.cfdacx.com/news show.aspx?id=9749, 2016 年 6 月 21 日。

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 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9 年第 2 期。

场监督管理总局。^①到 2018 年 11 月底,全国 31 个省级市场监管局(厅)已全部挂牌成立。^②两年来,机构改革已由中央、省级层面向市、县、乡镇等基层全面延伸。虽然这一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归为一统,但中间这一存在多种机构组合形式的过渡阶段却仍然值得研究,特别是为研究央地关系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案例。

在 2013 年至 2018 年 6 年间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中,中央层面先后提出了"加强食品药品统一权威监管"与"加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两种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改革要求。而彼时,中央和各省级政府并未对这两种改革方向做出相对明确的取舍指引,为基层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但这也导致了基层政府所面临的信息条件相对模糊。在此条件下,我国不同省区的基层政府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案,甚至同一省区内各基层政府的选择也存在差别。在彼时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浪潮中,究竟是何因素决定了各基层政府不同的行政抉择?在上述信息模糊条件下,基层政府的改革选择究竟遵循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本文接下来将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对此进行探讨。

四、服从、跟风还是自定: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过研究设计的思考,考虑到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都不够具有代表性,我们决定选择中部地区省份作为调研地点,并决定就两种不同监管模式各选择一个县开展深入调研。经过对中部各县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梳理,本文最终确定J省的Z县(综合模式)和H县(单列模式)作为深度调研的案例,两个县均属于中等经济发展区域,在该省和全国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县。两县来自同一省区,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大体相同,更加利于我们做出深入的分析,也利于我们排除其他相关因素的干扰,得出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研究结论。

(一) 案例陈述: 两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Z县是中部 J省 S市下辖的一个普通县,该县 2015 年的经济总量在 J省 109 个县级单位中排名第 38 名,属于中等偏上的县。该县自 2015 年 8 月开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整合原食安办、工商局、食药监局职能和人员,成立了 Z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就是惯常意义上所说的"二合一"(工商+食药监)综合监管模式,内设 14 个机构,同时下辖 1 个直属机构——反不正当竞争分局,5 个派出机构——城区分局、B分局、C分局、D分局、E分局,6 个所属事业单位——Z县市场监督综合执法大队、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牌子)、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维修行业管理办公室。

另一案例为J省的H县,该县是J省C市下辖的一个普通县级市(为便于比较,文中用H县指代),该县 2015年的经济总量在J省排名第 28 位,与 Z县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改革之前,H县已于 2009年建立了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及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而至 2015年4月,在其所属的C市首次提出开展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之后,该县就整合原工商局、质检局和商务局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能,在C市率先成立了新的食品药品监管局。新组建的H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设 9个科室,下辖 2个直属机构——酒类监管站和食品安全监察队,9个派出机构,包括副科级分局 1个,股级所 8个。

由以上案例陈述可知, Z县和H县来自同一个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同, 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时间也基本相同(均为2015年), 但两地在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中却选择了两条明显不同的改革路径。Z县选择了市场监管局这一综合模式, 在县级以下设置市场监管所; H县则选择了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单列模式, 在县级以下设置食品药品监管所。就两地改革时所面临的形势而言, 两地所面临的来自上级政府的信息条件应当是基本相似的, 那么究竟是何因素导致了两县走向了不同的改革方向? 结合上文的文献分析, 本文选取影响基层政府改革选择的"行政服从""同级诱导""自身

① 新华社:《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第1版。

②中国计量:《2018年度全国省级市场监管系统机构改革落幕》,《中国计量》2019年第1期。

理性"等三方面因素,对两县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进行进一步的动力学分析。

(二) Z 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Z 县和 H 县在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之时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部分和接下来一部分将结合调研资料还原 Z 县和 H 县机构改革时的各方面情况,探讨两县不同模式选择背后的行政逻辑。具体而言,Z 县之所以最终选择市场监管局这一综合模式主要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行政服从。根据已有研究,基层政府行政机构设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上级政府部门的决策方案和压力。而考察 Z 县上级政府的政策文件可见,在 J 省发布《J 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后, Z 县所在的 S 市于 2013 年 7 月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市、县两级政府原则上按照中央与省级食品药品监管改革模式重新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原来食安办、食药监、工商和质监等的食药安全监管职能进行整合,对原多部门分段监管模式进行统一监管改革。而在上级政府的改革实践方面,S 市参照 J 省食品药品监管改革模式,于 2013 年 9 月组建了 S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全市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等各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由此可见,在 Z 县改革之前,其上级政府从政策文件至改革实践均将设立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一单列模式作为改革的选择模式加以确立和暗示。因此,从行政服从角度而言, Z 县或许应当更加倾向于选择单列模式。

二是同级诱导。鉴于同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对于各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示范和诱导作用,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案例县的同级政府压力。Z县所属的J省S市下辖8个区、11个县、2个县级市。而在Z县进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之前,S市已有X区(2014年9月)和C区(2015年7月)两个县区启动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C区综合执法改革在减少监管环节、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先后得到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肯定,在该市发挥了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此后,包括Z县在内共5个区县同步启动了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改革。而至2018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前,J省109个县中仅有12个县实行单列模式,其余97个县均实行了综合模式,其中72个县实行二合一模式,25个县实行三合一模式。由此可见,单从同级跟风角度而言,Z县机构改革将倾向于选择综合模式。

三是理性自定。由以上两个角度的观察可知,行政服从和同级诱导两方面因素分别将 Z 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模式,那么是何因素最终导致 Z 县选择了市场监督综合执法这一综合模式?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 Z 县改革之时的现实情况: 随着食药安全地方负总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的提出,食品药品安全成为基层政府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 Z 县和全国大多数县一样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存在较大压力,一般而言,单列模式的统一权威监管在保障食药安全方面更有优势。然而,该县所面临的编制约束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选择单列模式: 改革之时, Z 县公务员编制已严重超标,在不增编的条件下,要大幅增加该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编制几乎不可能,也不可能按 S 市的要求在基层配置 3—5 名食品药品监管的专职人员,单列模式一时难以推进。而彼时适逢国务院提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而这一新的改革方案则可在不大幅增加编制的情况下实现食药监管基层全覆盖,这为该县的改革困境提供了新的出路。而至 2015 年 8 月 Z 县进行食品药品监管体制调整时,周边乃至全国很多市县都已成功实践了这一新兴的改革模式,此时采用综合模式的风险较小。此外,Z 县食药企业较少,监管压力相对较轻,选择综合模式风险并不大。该县对于本县理性判断的逻辑为前文的上级行政服从和同级压力所造成的进退维谷的困境提供了出路。最终,Z 县在考虑前述各方面因素基础上,基于对本地监管绩效、编制约束、风险现状等因素的理性判断而放弃了单列模式,转而采用综合模式设置了市场监管局。

(三) H 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与 Z 县相比, H 县改革时所面临的情况则存在一定的不同。

一是行政服从。2015年4月, H县所在的C市出台《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指出市(州)、

县(市、区)政府原则上参照省级食药局的模式组建本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随后,C市于2015年6月开始在市级层面整合食品安全监管和药品管理职能,组建了单列的C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要求各县(市、区)应于当年7月前完成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任务。虽然此时综合执法改革已在C市同步展开,但C市在市级层面将改革主要控制在城市管理领域,成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而未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能整合进综合执法中。因此,在H县改革之时,就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和改革实践而言,其上级各层政府均将维持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这一单列模式作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示范方案,这一点与Z县存在一定的一致性。

二是同级诱导。H县所在的C市下辖2个区、10个县和4个县级市。至2015年H县进行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之时,国务院推行的综合执法改革在县级层面大规模展开,虽然H县所在的J省和C市均未明确要求将食品药品监管整合进综合执法,但C市大部分区县均在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开展了综合执法改革。至2015年7月,C市下辖16个县级政府中共有10个县(市、区)按照市场监管大部制思路整合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中Q县等6县(市)实行"二合一"模式,X区等4个区(县)实行"三合一"模式。因而,就同级政府的诱导压力而言,H县所在地级市的大部分县区均选择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综合模式,而正如上文所言,综合模式在全省范围内都占据绝对优势比重,这对H县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强大的同级诱导压力。

三是理性自定。由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在行政服从压力和同级诱导压力方面,H县与Z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那么为何H县会选择和Z县迥异的"食药局"模式呢?对该县改革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境的考察或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调研发现,虽然编制约束压力在H县同样存在,但是在改革之初该县就编制问题就已做出了统一部署。改革之前,C市出台《县(市、区)控编减编方案》,要求各县(市、区)在严控编制总数的基础上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统一划转,在这一方案的指引下,H县果断采取了从其他部门划转富余编制和编制向基层下斜的方式来充实基层监管力量,使食品药品基层监管得到了保障。而在食药安全风险方面,对比其他县市,H县食药企业相对较多,食药产业产值比重相对较大,特色小吃"驴肉火烧"全国闻名,食品安全系统性风险整体较高。此外,该县此前也曾因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而被问责,食品药品安全成为该县领导历年来高度关心的事项,该县具有建立统一集中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强烈意愿。在综合考虑编制现状及食药安全风险等因素后,H县最终放弃了周边地区所普遍采用的"市场所"综合模式,维持并强化了"食药所"的单列模式。

五、服从、跟风还是自定:两县食药监管体制选择的行政逻辑

由以上的案例分析可知,行政服从、同级诱导和自身的理性自定等三方面因素均影响着 Z 县和 H 县的机构改革选择,两县的机构改革选择具有行政服从、同级跟风以及自身理性判断的综合特征(具体见表 1)。

	行政服从	同级诱导	理性自定	最终选择
Z县	倾向单列	倾向综合	倾向综合	综合模式
H县	倾向单列	倾向综合	倾向单列	单列模式

表 1 两县机构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作为来自同一个省份、改革时间基本相同的两个县,就行政服从和同级诱导这两方面逻辑而言, Z 县和 H 县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与本文之前的假设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就行政服从而言,两县的 上级政府改革时均选取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一单列模式,成为下级政府参照的示范模式;同时两 县上级政府也都曾制定了政策性文件推动组建单列的食品药品监管局(C 市更是对各县区改革时间进 度做出了明确要求,就此而言 H 县所面临的上级压力相对更大)。而从同级诱导来看,至 2015 年两县 机构改革之时,基于大部制逻辑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两县的同级政府中均已大面积铺开,实行并维 持单列模式的上级压力因综合执法改革要求的稀释而有一定的减弱,来自同级政府成立"市场局"的 诱导加强。因此,单从同级诱导而言,两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应更倾向于综合模式。行政服从和同级 诱导这两方面逻辑将改革选择指向了不同的路径。

进一步的案例分析显示,在面对服从和诱导跟风这两方面相互冲突的行政逻辑之时,两县对于本县实际的理性考量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食品药品安全地方负总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的提出,食品药品安全成为各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本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绩效的关切度均较高,这一点上两县具有一致性。但访谈发现,两县在编制约束和食药安全风险现状方面却存在较大的差别。Z县因严重的编制约束压力而较难实现基层食药监管的覆盖,同时该县食药安全风险相对较小,从理性判断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为该县的理想选择。而且县食药产业比值较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必须通过统一权威的监管保障食药安全;而该县在编制上的统筹安排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列所面临的编制压力。

在上述两县改革之时,单列模式和综合模式在两县周边各地均得到了大量探索,而两县的上级政府也未对改革进一步做出清晰指引或要求,这为两县的自由裁量提供了制度空间,也为两县各自的理性判断提供了良好条件。机构设置作为各级政府的事权,即使上级政府对于改革有一定的指引,但也并非强制性的。最终,两县对于自身行政工作绩效、风险与编制约束的理性判断超越了对于上级服从和同级压力的考虑,基于自身的理性自定选择了相应的改革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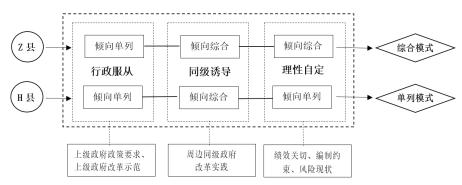


图 1 两县机构改革模式选择的行政逻辑

如图 1 所示,在两县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之始,两县既需要面对来自上级政府专业监管的改革要求,也需面对周边同级政府不同改革选择的示范压力;而此时,上级政府对于选择何种模式实际上缺乏明确的具体指引,基层政府所面临的信息条件相对模糊。在这样一种模糊信息条件下,基层政府在选择行政机构设置模式时实际上遵循着上级服从、同级跟风和自身理性等多重行政逻辑。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些行政逻辑中占主导的乃是基层政府自身的理性自定:基层政府做出选择最为重要的动力是其对于自身行政工作绩效、风险现状与编制约束的理性判断,而服从和跟风这两种逻辑都是从属于这一主导逻辑而发挥作用的。

六、研究发现及解释:如何运用行政修辞达致有限理性

由上文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在行政机构改革之时均会基于自身理性判断而最终选择适合自身的改革方案,但是无论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表明,来自上级政府的服从压力和来自同级政府的诱导压力都是地方政府所无法回避的现实,地方政府必须对自身的行为选择做出合理性论证,以回应公众关切。

在笔者走访 Z 县时,当问及为何会选择综合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如何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专业性与统一权威时,该县工作人员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自我辩护。一方面,对于该县的改革选择,该县工作人员主要强调该县的改革"是按照中央简政放权和综合执法改革的要求来进行,是符合上级政府政策要求和改革趋势的";而对于我们所关注的监管专业性问题,被访谈者则选择忽视而不回答。另一方面,被访者倾向于选择性运用综合执法改革的效果来论证其合理性。该县被访谈者主

要表示采取综合模式后,工商、质检中食药监管人员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监管力量",基层监管资源大大增加,基层的5个分局已覆盖该县全部的16个乡镇,并表示这是在现有编制约束下"单列模式所无法实现的"。在监管效果方面,被访谈者表示机构合并后抽检的"频次大大上升",机构合并将机构间的沟通转换为部门间的交流,"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企业和消费者的满意度也得到明显提升"。

与 Z 县相比,在解释为何会选择单列模式及单列模式如何回应上级政府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要求时,H 县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进行解释。对于为何未采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该县表示综合执法的前提应当是"职能相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相对而言专业性要求较高,担心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纳入综合监管后可能会降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专业性,因而该县放弃了综合模式;同时也强调该县的改革在政策方面符合中央建设统一权威监管机构的要求,有其政策合法性。对于改革后监管绩效,一方面,被访谈者表示保持食品药品监管的独立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重视程度,单列模式上下同构也有利于保持上下级监管部门对接通畅;另一方面,被访者通过列举改革前后的监管数据指出,机构改革后 H 县的食品药品监管频率得到有效提升,违法案件的查处率也大大提高,食品药品安全形势大为好转,因而认为改革后的监管效能得到了提升。

综观 Z 县和 H 县两地的自我辩护,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两地论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论证策略却有明显的相似性。具体而言,两县的共同策略可以概括为"片面的行政修辞"和"选择性的绩效论证"。在行政修辞方面,在面对食品药品专业权威监管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两个来自上级政府相互冲突的改革要求时,两县均倾向于选择性地对上级政府文件要求进行单向度解释: Z 县倾向于表明该县综合模式符合中央简政放权和综合执法改革的要求和趋势,利于加强基层监管力量;H 县则倾向于强调单列模式遵循中央加强食品药品统一权威监管的要求,利于加强监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绩效论证方面,两县机构改革后食品药品安全现状的确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 Z 县主要倾向于从"基层监管力量加强""监管抽查频次增加"等能反映综合监管优势的角度进行论证,H 县则从"基层监管专业性提升""监管协调更加通畅"等角度进行分析,也意在表明单列模式提升了该县食品药品监管的绩效。

两县的行政辩护虽然有明显的策略性,但也有其合理性。在本文研究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中,两县基于自身的理性判断综合上级行政压力和同级诱导压力,做出了符合本地实际的改革选择。但是上级服从、同级跟风和自身理性自定等逻辑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地方政府通过片面的行政修辞和选择性的绩效论证说明自身的选择符合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也符合改革趋势,以此回应上级压力和同级诱导,使这三方面逻辑实现形式上的统一。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我国中部同一省内两个县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基层政府机构改革选择的行政逻辑。研究得出,在我国推动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中,基层政府的改革选择具有行政服从、同级诱导及自身理性判断的多重逻辑;而在这三种行政逻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乃是地方政府对于自身行政工作绩效、风险现状与编制约束的理性判断,地方政府在综合上级服从压力和同级诱导压力的基础上,最终会基于自身的理性判断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改革选择。同时,本文也发现,案例中的信息模糊条件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是较常出现的情况,这为基层政府的行政决策预留了一定的制度空间,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可以充分推动地方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政策指引,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政府改革和决策混乱状态的出现。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发布,为多年来的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争论提供了来自中央层面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依旧为基层改革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2018年11月,全国各省级市场监管局全部挂牌,标志着机构改革由中央、省级层面向市、县、

乡镇等基层全面延伸。2019年7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指出机构改革"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必须科学把握基层政府在机构改革和监管执行中的行政逻辑。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四方面建议。

第一,中央政府在机构改革方案制定时应当就地方政府的"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做出明确区分。针对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规定动作",又允许其有"自选动作",允许地方在规定限额内因地制宜地设置组织机构和配置相关职能。对于此后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层面应当对"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做出明确区分,使地方政府明白哪些改革措施是中央政府要求必须完成的,哪些改革措施和机构设置是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而自由选择的,只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又确保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

第二,就省级层面而言,在追求本省区改革选择一致性的同时,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建议各省级政府在今后的机构改革中,应根据本省的经济社会特点和工作需要对于本省区内的机构改革做出统一的改革方案设计,理顺部门职责关系,避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推进本省区机构设置的整体化、系统化。在此基础上,也应加强政策和改革意图的宣贯,通过政策文件、联席会议等沟通机制,将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设计的意图有效、准确地传达给各基层政府,避免各基层政府在信息模糊条件下进行摸索,规避基层政府进行选择性的绩效论证。

第三,应当充分考量地方实情,赋予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领域更多的自主权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的自主权,突出不同层级职责特点,允许地方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规定限额内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①因此无论是在机构改革中,还是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应充分考量地方实情,在监管权责下放的同时赋予地方充分的自主权,鼓励地方政府用好监管权力,依据本地实际创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方式。

第四,在大市场综合监管的新形势下,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需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中央政府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需要发布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市场监管所的建设指导标准,特别是针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资源投入和配备需要有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另一方面涉及基层监管所的监管资源投入和设置方式,原则上都应当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和做法,支持和鼓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情况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方面开展探索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的真正落实。

责任编辑:王冰

①《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第1版。

从一元监管到社会共治: 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趋向*

徐国冲

[摘 要]以2003—2017年中央层级联合发布的55份食品安全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有助于梳理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概况与演变历程。研究发现,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中政府机构合作、政府—非政府机构合作以及非政府机构间合作等合作形式均有所涉及,但政府机构间合作最受青睐,表明政府一元监管仍然占据主导。从演变历程看,政府机构间合作有所弱化的同时,政府—非政府机构合作稳步强化,表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正逐步得到重视。这一变化源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棘手、政府有意识地放权以及社会的成长。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共治,还要重视能力建设与信任构筑,以持续提升主体能力和有效协调主体合作。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合作监管 社会共治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50-07

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升监管效能是政府职责之所在,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但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追根溯源,其症结之一是合作监管不足。我国曾长期实行分段监管体制,监管权限高度分散,导致监管碎片化。由此观之,监管绩效不仅取决于单个部门的表现,还与部门合作能力密切相关。即便在2018年三局合一机构改革后,许多监管事项仍有赖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属部门间合作;从地方经验来看,各部门之间的整合目前更多属于"物理整合"而非"化学整合"。不仅如此,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鲜明的跨界性。这不仅表现在知识边界、管辖权边界上,更体现在利益相关者复杂多样上。监管机构的政治利益、监管对象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公众的社会利益相互交织,存在较大张力。需要推动多元主体携手并进参与合作,在此过程中构建互信,并藉此统合利益诉求,进而改进监管效能。因此,强化合作监管被视为化解监管困局的重要策略。

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成为学界研究重点。大量学者着力阐述了推进合作监管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从整体性政府视角中汲取养分。具体到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有学者认为应从组织结构、责任与激励机制、伙伴关系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入手,改进部门合作。^① 虽然网络结构是整体性政府治理协调的组织基础,与存续已久的科层组织存在较大张力;但其提出的诸如组织结构等改革建议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对培育跨部门合作仍不失借鉴意义。还有学者从关系合约视角审视合作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和实现程度研究"(18JZD04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国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① 颜海娜:《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分析》、《学术研究》 2010 年第 5 期。

管推进路径,认为监管主体间交易具有部门追求自主权、收益的不确定性及治理成效的外部性特征;构建部门合作机制也应从上述方面入手。^①还有少量学者从量化角度探讨了影响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因素。既有研究已就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存在重规范轻实证的不足,从量化角度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发展脉络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级联合颁布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以联合发文单位的属性为切入点,透视新世纪以来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演变路径,希冀以此推进相关研究。本文试图回答: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在参与主体的构成上呈现何种特点?其演变与发展遵循何种逻辑?

一、研究设计与发现:从一元监管到社会共治

本文选用中央层面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政策文本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 作为客观的、可获取的、可追溯的文字记录, ② 经过长时间积累的大量政策文本为研究者把握较长时 期中相关政策思想转变、制度演进提供了研究窗口。第二,政策文本的结构化、半结构化特征与统 计学、计量学等研究方法结合,文本资料得以转化为数据资料,进行更为科学、准确的分析。第三, 较之于联合发文,联合执法、部级联席会议等合作形式的相关资料相对难以获取,而长时间的记录 则更为鲜见。本文选取的政策文本均源自"北大法宝"数据库。以"食品安全"为关键词,在"中央 法规司法解释"数据集中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628份文件。为确保选取的政策文本符合研究主题, 确立如下筛选原则。第一,相关性原则,即政策文本必须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内容,且必须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发文主体。第二,规范性原则,即选取的文本必须是正式文件。因此,便函等非正 式文件被剔除。共计剔除 573 份文本。最终共获得 55 份样本,起止时间为 2003—2017 年。③ 这一时 段恰好处于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逐渐受到重视的时期。2003年,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被赋予综合协调的职责。不过,受行政级别所限、该机构无力节制其他部门、协调职能长期虚置。 2010年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等高级官员领衔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议事协调,并于2011 年将卫生部的综合协调职能划归帐下,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获得实质性突破。本文以2011年为界, 将政策文本按2003-2010年、2011-2017年的分段合并,进行分段考察。需要指出的是,有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党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发文单位。本文将所有发文单位划分为两类:政 府机构(广义上)与非政府机构,前三种发文单位属于政府机构,后三种属于非政府机构。根据合作 主体性质,本文将合作监管分为政府部门间合作、政府—非政府机构合作、非政府机构间合作。

表 1 展现了 2003—2017 年内不同类型合作监管的平均占比。就一般概况而言,各类合作监管形式均有所涉及,但使用频率差异巨大:政府机构间合作最受青睐,平均占比高达 99.21%,远远高于其他合作监管类型;政府一非政府机构合作次之,平均占比为 3.25%;非政府机构间合作应用最少,占比仅为 1.02%。就历史演变而言,政府机构间合作占比虽然始终保持高位,但有所下降;政府一非政府机构合作、非政府机构间合作占比呈上升趋势。

合作类型时段	政府机构间合作	政府 - 非政府机构合作	非政府机构间合作
2003—2010 年	100.00%	0	0
2011—2017 年	98.41%	6.49%	2.04%
平均占比	99.21%	3.25%	1.02%

表 1 2003—2017 年各类合作监管平均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上述数据表明:第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仍以政府一元监管为主。原因在于,受路径依赖制约,

① 聂勇浩、颜海娜:《关系合约视角的部门间合作: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② 黄芩、任弢等:《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2期。

③ 由于资料收集时点限制,收集的是2017年9月21日(含)之前出台的政策文本。

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全能主义思想仍然影响颇深,食品安全监管被视为政府的独占领域,轻视了其他主体的作用。更为现实的考量是,相较于同质性主体合作,异质性主体间合作具有更大的难度。困难主要源自协调多重制度逻辑。所谓制度逻辑是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①行动者大多受知识、资源概况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形成特定心理认知模型,以此作为其认知范式和行为脚本。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对公共管理的认识论范式、行事逻辑存在差异,^②且这一差异强于相同领域的行动者间的差异。以价值认知为例,政府更加强调程序合法性。不同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张力越大,合作越是困难。不仅如此,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合作监管曾长期受到忽视,而这也阻碍了监管绩效的改进。鉴于同质性主体合作难度相对较低,优先强化政府部门间合作既是经过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其成功经验也能为日后打造社会共治奠定基础。第二,政府一非政府机构合作的强化,表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正逐步得到重视。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监管绩效,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转化为棘手问题,推动社会共治、发挥其他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显得尤为必要。在此背景下,社会共治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原则被写入新《食品安全法》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共治并非仅仅出于改善监管绩效的工具性目的,而是顺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将企业、社会组织、公众视作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治理伙伴,鼓励各方群策群力,打造良好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二、走向社会共治的内在逻辑

(一) 问题特性: 社会共治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化,成为典型的棘手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高度复杂性,这不仅体现为知识匮乏招致的技术复杂性,还体现为众多利益相关者协调困难引发 的社会复杂性。利益相关者不仅来自不同的政策部门,典型的有食品安全、卫生、农业、渔业、进出 口贸易等部门,还涉及不同领域的行动者:政府(法定监管机构)、企业、社会(行业组织、公众)。上 述利益相关者往往具有不同心智模型、行为脚本、行动逻辑,引发协调困难。二是不确定性,由于食 品安全问题与其他问题相互交织,牵涉多种因素,因此,难以确定其因果关系。有时,某种问题的解 决方案甚至会招致新的问题。三是利益相关者观点各异。以追求目标为例,政府寻求保障安全与促进 发展,企业追求的是获取稳定收益,消费者则期望获得物美价廉的食品。③上述目标之间存在着内 在张力,导致针对特定食品安全问题,各方可能采用不同甚至是相抵触的解决方案。观点差异往往是 根深蒂固的,即便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撑也难以形成获得各方普遍接纳的方案。食品安全问题的棘手 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行动者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传统一元监管并非治本之策,难以持续有效提升食 品安全绩效。相互依赖性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共同利益基础。毕竟,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会损害 政府政绩合法性,还会损及相关食品行业声誉、危害公众健康。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这一点。二是行动者置身于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主要体现为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各 方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资源之间的交换与互补。以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为例,监管部门通过抽样检查 获取部分风险信息,企业、行业协会则凭借其对本行业的深度参与掌握一定的风险信息,社会公众则 经由消费行为获知相关风险信息。较为准确地勾勒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离不开各方信息数据的分享。

作为自上而下的监管策略,政府一元监管虽然减少了决策复杂性,然而,这也意味着将其他相关 主体的技能、资源、观点与意见排除在外,不利于更为全面认识问题症结、争取利益相关者支持、有

① 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 John Bryson, Alessandro Sancino, John Benington and Eva Sørensen, "Towards a Multi-Actor Theory of Public Value Co-Crea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vol.19, no.5, 2017.

③ B. Peters Guy and Jon Pierre, "Food Policy as a Wicked Problem: Contending with Multiple Demands and Actors", World Food Policy, vol.7, 2014.

效执行监管政策。相形之下,社会共治策略虽然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但作为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混合型策略,它有助于整合知识、资源、技能与观点,搁置争端发挥协同效应,形成集强制型监管(如威慑、惩罚)与非强制型监管(如学习、劝说)于一体的混合监管工具箱,进而更为灵活有效地处置食品安全问题。这种灵活性恰恰是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棘手问题所必需的。而且,作为多边合作策略,第三方的存在有助于降低政企合谋导致的监管俘获风险。从长远看,其成效将优于单边决策,后者可能因失误导致决策反复,进而引发监管成本激增。

(二) 政府放权: 社会共治的可能性

宏观治理策略的转型、改进监管绩效的压力以及政策学习,促使政府有意识放权,发挥社会主体活力。事实上,监管策略的选择深受宏观的国家治理模式影响。由此观之,我国食品安全走向社会共治,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密不可分。在计划经济体制瓦解前,我国实行的是管控型治理模式。此时,国家治理实质上是政府一元治理,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统摄一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元化的,社会是作为国家的社会而存在。这决定了当时的食品安全监管策略——政府一元监管。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管控型治理模式有所松动。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治理改革不断深化,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等举措推陈出新,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推动国家治理逐步迈向多元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而这也为食品安全监管走向社会共治创造了契机。

改进监管绩效的压力促使政府寻找替代性监管策略。21世纪以来,安徽阜阳毒奶粉、三聚氰胺 等震惊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极大关注,促使食品安全逐渐成为政府高层关注的重点议题。这集 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管部门行政级别的提升。起初,食品安全监管仅作为卫生管理的具体事项 由卫生部负责,并未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随着该问题逐步得到重视,2003年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然而,该部门权限较小制约了其开展工作。2008年机构改革则将其划归卫生部管理,影 响其独立性。2013年其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此后又陆续将相关监管权限划入其旗下,充分展现了中央 高层的支持。2018年进一步展开三局合一改革,将食品安全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整合。二是问责制度 的强化。自提出以"最严肃的问责"保障食品安全后,我国陆续出台《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 (2016年)、《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2019年)等法规, 完善了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 形成了以跟踪督办、履职检查、评议考核结果为抓手的问责考评制度。政府高层的重视使监管部门改 善监管绩效压力不断强化,而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则使其逐渐认识到政府一元监管不足以应对这 一压力。一元监管策略之下,监管主体青睐使用命令控制手段,而这一手段实质上隐含着对抗性色彩, 即将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置于对立面。相比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前,食品技术并不复杂,食品 企业数量少,同质性强,多为体制内企业,追求利润动机不强烈。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属于温和的驯 服问题,清晰界定问题、寻找可行解决之策并非难事,命令控制手段也可以较好地满足监管需要。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食品安全问题逐渐转化为棘手问题,难以准确界定问题及对策,对抗性监管 手段显得不合时宜,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携手应对。

政策学习使政府高层意识到社会共治是可行的替代性监管策略,有意识支持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认识逐渐从浅层次的工具性理念深化为政策核心信念。早年,"社会共治"被视作应对一元监管治理绩效难孚众意的权宜之计,尚停留于工具性理念层面。通过国际交流等政策学习契机,政府高层意识到企业自我监管有助于提升监管绩效。引入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等更具灵活性的监管方式即为例证。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对行业组织的重视促使我国进一步挖掘社会力量的潜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素有动员社会力量之传统——爱国卫生运动曾于不同历史时期多次开展,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成效。西方经验则为激发存量制度潜力注入了新活力,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地位获得认可: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强调发挥社会组织行业自律、科普宣教

的功能; 新《食品安全法》则对其寄予更大的期望,将社会组织功能进一步扩展至帮扶企业、信息报送、风险交流、标准制定等领域。同时还对其发挥行业自律提出了更深层的要求:建立行业规范和奖惩机制,并纳入食品安全五年规划重点建设内容。许多行业组织也纷纷回应,试图推动行业自律功能由虚人实。随着政府对社会力量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强调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占据一席之地,对社会力量的重视从工具性理念提升为政策关键信念——社会力量是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参与监管并非只是改善绩效的一时之策,而是打造现代监管型国家的应有之义。这一信念被凝练为社会共治,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原则。

(三) 社会成长: 社会共治的可行性

社会成长主要反映为社会组织监管能力的提升,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做出相对专业的判断。以此为支撑,社会力量方可分担部分监管责任,为政府放松管控、释放监管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一般而言,监管能力由分析能力、管理能力与政治能力组成。^①分析能力关乎监管主体高效地生成并调查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管理能力关乎监管主体有效利用资源应对监管问题的能力;政治能力则关乎监管主体获得必要支持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前文中有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地位得到认可的论述,已经反映了社会组织政治能力的强化,因而此处不再赘述。

在分析能力上,社会组织分析能力的强化集中展现为知识生产、运用能力强化。以中国食品保健协会为代表的大型社会组织不仅拥有许多知名企业会员,还有许多知名专家参与其中。正因如此,它们不仅积累了海量的行业动态一手资料,还不乏专业技术理论支撑,助力其敏锐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社会组织基于获取的数据信息,形成政策建议或专题报告,发挥科普宣传、建言献策、提供技术服务、架起政府与行业企业沟通渠道、促进国际交流等多样化功能。以中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为例,该协会于2016年成立。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深入参加了诸如保健食品法规调研,并获得重视,有关司长听取了相关建议;还曾组织"2016北京国际医学工程转化高峰论坛"等会议。

在管理能力上,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强化集中表现为内部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与完善,包括组织运转的制度化程度、人员构成以及责任制度等。在组织运行上,早期社会组织的运作随意性较大,既有组织以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也有遵循章程运作的,还有受上级指令控制的,甚至少数组织运作直接由领导人拍板。^②随着发展,社会组织的运作依据逐步统一、规范和制度化,绝大多数食品类社会组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了运作章程,就其愿景使命、会员资格、治理架构、理事会选任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在人员构成上,专业技能人员与专职人员比重不断增加。在责任制度上,社会组织逐步探索制定针对成员违规行为的奖惩措施。新《食品安全法》将行业协会纳为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将行业自律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举措之一。得益于此,业内开始摸索从严格行业规范、建立声誉机制等入手,倒逼企业自律。例如,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通过发起"国家优质乳工程",利用声誉机制推动企业主动采用国家领先标准与技术。

三、实现社会共治的发展路径

(一)能力建设:持续提升主体能力

对于政府监管机构而言,能力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人员、设备、经费是展开监管工作的基本条件,必须以此作为监管力量建设着力点。在人员方面,既要增加专职监管人员数量,又要扩大具有专业素养的监管人员比例,还要健全监管人员定期培训制度,打造高素质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在设备方面,既要推进执法装备标准化,又要推进设备现代化、信息化。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设备因其快速、智能的优势,能提升工作效率,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监管人员不足的缺陷。

① Michael Howlett and M. Ramesh, "Achilles' Heels of Governance: Critical Capacity Deficits and Their Role in Governance Failures: The Achilles Heel of Governance", *Regulation & Governance*, vol.10, no.4, 2016.

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行政管理》2005 年第 5 期。

以食品安全监管与大数据结合为例,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与分析均主要以大型计算机、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因素为依托, ^① 绝非单纯增加监管人员数量所能实现; 不仅如此, 大数据技术还能揭 示许多传统数据分析手段难以发现的行为规律,其改进监管绩效的前景也非增加人力所能比拟。在经 费方面,应根据政府层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经费投入重点。欠发达地区以及基层监管部门由于经费 有限,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帕累托改进,应以改善监管人员工资待遇为重点。基层监管面临最突出的 矛盾是"人少事多"。更为严峻的是还存在较为普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不利于思想稳定,导致人 员流失,损害了监管效率。^②对于发达地区、非基层监管部门,经费投入则应向智能化、科学化监管 倾斜。科研投入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与人才支撑,而且周期长、牵涉面广、不确定性强,基层与欠发 达地区往往难以承受这一负担。第二,政府一元监管模式之下,备受青睐的命令控制手段已经不足以 应对当前的监管挑战,必须推进监管方式多元化。虽然在产业内企业大多同质,且监管机构明悉达成 监管目标的最佳制度设计的情境下,命令控制手段有其优势,但随着食品产业发展,监管对象的复 杂性、异质性特征愈发凸显之时,该手段极易导致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此外,由于命令控制手段排 除了其他行动者的参与,滋生了政企合谋的土壤。因此,必须转变过度依赖命令控制手段的局面,推 进监管方式多元化, 回应愈发复杂的监管情境。基于施耐德等人的分析, 常用的监管方式可划分为 命令控制手段、激励型手段、能力手段、学习手段以及象征劝诱手段, ③增加后四种监管手段的 使用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努力的方向。第三、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社会复杂性、常常需要多个部门的 通力合作,必须强化部门间合作。经过多年探索,我国逐渐形成了跨部门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机构、 部门间联席会议、部门联合工作组、联合发文、联合执法等多样化的组织间合作机制。为更好地发挥 上述机制的潜力,应总结各项措施的适用情境及其优劣势,并形成书面报告,据此指导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选择适宜的协调机制。不仅如此,还应就组织间合作机制的激活、运转、评估、终止等制定详细 的规则, 使之进一步制度化、完备化。

在提升企业能力方面,由于我国食品企业实力差异巨大,既有诸如蒙牛、伊利等跻身食品饮料百强的大型食品企业,又有许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等"三小"经营单位,因而需要分类施策。对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能力建设的重点是精益求精,力争成为行业国际标杆。为此,应鼓励其加大食品科研投入、强化产学研合作,积极拥抱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增强企业的分析能力与内部管理能力。对于"三小"经营单位,能力建设的重点是规范提升,力争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为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取缔经营条件恶劣且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经营单位;另一方面,要帮扶主动整改的经营单位,并引导建设集中加工销售市场,鼓励其联合发展。对于中小企业,能力建设的重点是更进一步,力争壮大企业综合实力。较之于大型企业,虽然其缺乏规模经济优势、技术水平较低,但具有地方性知识优势。尽管大型企业建立了许多地方分部,但其经营策略主要是考虑全国市场。因此,在扶持中小企业展开集约化经营的同时,应立足于其地方性知识,打造地方性特色品牌。

在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方面,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推动社会组织多元化发展。根据食品安全治理的多重需要,应培育维权类、技术服务类、行业自律类等类型社会组织。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赋权于社会组织。《食品安全法》中虽然赋予了社会组织在帮扶企业、信息报送、风险交流、标准制定等方面一席之地,但具体规定语焉不详、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应出台更为细致的配套规定。以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标准审查为例,必须说明参与资格、参与流程、参与形式等细节。第三,改进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引入现代化社团管理制度,成立理事会、监事会、代表大会,

① Mariusz Maciejewski, "To Do More, Better, Faster and More Cheaply: Using Big Data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vol.83, no.1, 2017.

② 王庆邦:《食品监管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11期。

³ Anne Schneider and Helen Ingram,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2, no.2, 1990.

在明确划分各组成部门权责的基础上,构建分权制衡的基本架构;完善财务监督管理制度,防止获取不当收入、滥用组织运营管理费用、进行非法或不符合本组织定位的投资,保证组织公益性;合理设置组织人员构成,保证专业技术人员、专职管理人员占据一定比例,保障组织正常运转。

(二) 信任构筑: 有效协调主体合作

信任是促成相互依赖行动者维持良好合作的关键。究其本质,信任是个体对他人的看法,它意味着对独立行动者之行为有预测,^① 隐含着对合作伙伴的积极期望——相信合作伙伴有意愿和能力协助实现所寻求的合作优势。同时,还表明行动者愿意承担合作过程的潜在风险,即合作伙伴可能会采取损及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合作伙伴采取了机会主义做法,不仅会侵蚀信任,还会滋生猜疑、背叛等负面因素,而后者又会进一步削弱信任。如果合作伙伴遵循积极期望行事,将会促进信任强化。信任具有自我强化的特质。而包容性协商则有助于实现信任的正向强化。包容性协商不仅吸纳了与食品安全治理相关的各类行动者参与,还促使任何一方均不谋求以自己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防止了社会共治蜕化为强势方的支配;通过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应对食品安全困境。在协商过程中行动者认识到,行动者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可以形成对问题和解决方案更为深刻的理解,推动一开始似乎是不可调和的观点整合,由此形成彼此理解,并为达成共同认识创造了基础。以下策略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协商:一是明确协商参与者范围,厘定哪些领域(sector)、哪些层级的行动者应被囊括其中,成员的模糊性将导致协商困难;二是就社会共治目标展开协商,及早揭示不可调和的分歧,突出协商难点;三是重视权力管理,由于资源控制能力、正式权威等因素影响,社会共治参与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权力差异。为减少因权力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保证协商过程公开、透明。

综上所述,从总体概况上看,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中,政府机构间合作、政府一非政府机构合作以及非政府机构间合作等合作形式均有所涉及,但政府机构间合作最受青睐,表明政府一元监管仍然占据主导;从演变历程看,政府机构间合作有所弱化的同时,政府一非政府机构合作稳步强化,表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正逐步得到重视。这一变化源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棘手、国家有意识地放权以及社会的成长。同时,为了更好地拥抱社会共治,还应重视能力建设与信任构筑。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选用联合发文以观察合作监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数据只能反映主体间合作与否,但未能反映具体合作事项。事实上,不同合作事项也反映了合作的深入程度:例如浅层次的合作多局限于信息交流、分享等活动;随着合作深入,将逐步转向成员交流、资源共享等更高层次的活动。不仅如此,许多非政府机构虽然参与了合作监管,但不具有发布政策文本的法定权力,难以从联合发文的数据中捕捉这类情况,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深入。

责任编辑:王冰

① Chris Huxham and Siv E. Vangen, Taylor and Francis, *Managing to Collabora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Advan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39.

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及其变动*

王亚柯 夏会珍

[摘 要]通过利用 2013 和 2018 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 (CHIPS) 数据,可以研究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及其变动。研究发现,2013—2018 年间,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有所扩大,女性养老金收入占男性的比重由 88% 下降为 80%。其中,劳动力市场特征可解释的部分比重下降,不可解释部分所占的比重上升,从 2013 年的 50.6% 上升为 2018 年的 60.6%,意味着市场歧视的作用越来越大。相比较而言,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较大,且在此期间的增长幅度更大,超过三分之二的比重来自不可解释部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的性别差距较小,超过三分之一的比例来自不可解释部分。这一结果表明,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企业单位的工资报酬制度更多受到私有化、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使得女性在养老金收入方面受到更多的性别歧视,且歧视程度在此期间有所扩大。基于此,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应在提高老年女性收入方面有所改善,以减少老年贫困。

[关键词]养老金性别差距 城镇职工 分解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4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57-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加剧。根据联合国预测,2030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会达到 25.3%,2050 年则进一步达到 36.5%,远高于世界 60 岁以上人口的同期预测占比 16.5% 和 21.5%。^① 在老年人口中,与男性相比,女性所占比重更高。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占比 51%,80 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占 58%,90 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占比则高达 67%。与此同时,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0 岁,女性干部为 55 岁,女性工人为 50 岁。根据 OECD 数据,我国男性和女性退休后的余寿分别为 12.6 岁和 19.0 岁,相差高达 6.4 岁。^② 与男性相比,女性退休后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故女性面临更大的长寿风险,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也更大。研究发现,在我国贫困人口中,75 岁以上贫困老年女性占 19.2%,男性占 15.5%。^③ 一个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旨在于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防止老年贫困。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异问题研究值得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收入和财产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再分配效应研究"(16AJY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亚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会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9)。

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15*, New York, UN, 2015.

② OECD 统计数据库: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54758, 2010 年。

³ Rui Zhao and Yaohui Zhao, "The Gender Pension Gap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vol.24, no.2, 2018.

通常而言,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性别差距的衍生。^① 因此,学界通常认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主要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任职年限较长、受教育程度较高、工资水平高的员工,养老金收入水平也会较高。^② 有学者发现就业的单位部门也会对此有较大影响,公共部门女性的养老金收入与男性差距较小,而私营部门的差距较大。^③ 此外,已婚对女性养老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已婚女性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庭照顾等责任,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直接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多地从事非正规部门和兼职工作,而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险覆盖和较低的福利水平。^⑤ 有学者对美国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女性养老金仅占男性的 55%,且工资收入和任职期限的解释力度分别达到了 54% 和 16%。 ⑥ 近年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单身女性养老金占男性的比值从 63% 下降为 52%,而已婚女性养老金占男性的比值则从 22% 降为 21%,工资水平和工作年限的解释力度均为 50% 左右。 ^②

在国内,学界对养老金收入性别差异的分析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大多认为,我国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源于劳动力市场特征等因素的差异。[®] 部分文献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也是导致养老金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 仅有少量文献对养老金收入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有学者利用 2013 年 CHARLS 数据的研究发现,女性养老金占男性的比值为 82.5%,工作年限、工资水平和工作单位的解释力度较大,分别为 19.3%、13% 和 11%。[®] 有学者根据 2015 年 CHARLS 数据的分析认为,男性养老金收入约是女性的 1.9 倍,养老金制度和退休前工资是导致性别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其解释力度分别达到 53% 和 19%。[®] 可以看出,已有文献对我国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及其原因的分析还非常有限,仅仅分析了单个年份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无法反映性别差距在不同时点之间的变化。

在我国基本养老体系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大。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即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同。直至 2015 年 1 月中央政府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改革,实现养老金制度并轨。然而,现有老人大多是在双轨制下退休,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决定机制不同,故其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也有所不同。本文采用 2013 年和 2018 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数据(CHIPs)进行分析,两个年份分别位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前后,反映了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最新变化。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的规模有多大?在 2013—2018 年间有什么变化?引起性别差距及其变动的因素有哪些?歧视是否发挥了作用?同时,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

① María Jesús Vara,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Spanish Public Pension System", Feminist Economics, vol.19, no.4, 2013.

② James E. Pesando and Morley Gunderson et al., "Pension Benefits and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4, no.3, 1991.

³ Carole Bonnet and Dominique Meurs et al., "Gender Inequalities in Pensions: Different Components Similar Levels of Disper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16, no.4, 2018.

④ Scott T. Yabiku, "Family History and Pens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riage, Divorce, Children, and Private Pension Coverage",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vol.14, no.3, 2000.

⑤ Deborah Kasente, "Gender, and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53, no.3, 2000.

⁶ Jay Ginn and Sara Arber, "Pension Penalties: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7, no.1, 1993.

[©] William E. Even and David A. Macpherson, "When Will the Gender Gap in Retirement Income Narrow?",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71, no.1, 2004.

⑧潘锦棠:《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中的性别利益——兼评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⑨ 王海东、李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女性养老金水平研究——兼析养老金性别差异》,《社会保障研究》2013 年第1期。

[®] Rui Zhao and Yaohui Zhao, "The Gender Pension Gap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vol.24, no.2, 2018.

① 詹鹏:《我国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性别差距有什么不同?影响因素有哪些差异?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2013—2018年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及其变动进行分解分析;二是探讨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

二、数据和统计性描述

(一) 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数据源自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于 2013 年和 2018 年的城镇住户调查。CHIP 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常规住户调查大样本库。该数据涵盖了家庭和个人就业、退休以及收入等方面的详细信息,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本文主要使用 2013 年和 2018 年的城镇住户调查。2013年和 2018 年 CHIP 城镇数据分别有 17516、36259个样本,包含了北京、山东、辽宁、江苏、广东、陕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等 14个省市。根据 CHIP 数据,在 2013—2018 年间,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略有增长,从 57.8% 上升到 59.3%。在两个年份,女性的覆盖率分别为 26.4% 和 27.3%,都低于男性约 5 个百分点。女性退休人员的覆盖率低于男性约 1 个百分点。

(二) 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异,故选取已退休人员,并剔除无养老金、养老金收入缺失等样本,2013年和2018年数据最终分别获得2255和2674个有效样本。本文利用两次调查数据描述了男性和女性职工在不同分组下的平均养老金差距,结果见表1。在2013年和2018年,女性的月养老金均值都低于男性,且差距在此期间有扩大的趋势。2013年男性月养老金的均值为2586元,女性为2286元,女性月养老金占男性的比值为88.4%。到了2018年,男性月养老金均值增长为3965元,女性则为3157元,女性占男性的比值下降为79.6%。但同时,不同类型的部门存在较大差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性别养老金差距较小,且下降幅度不大;相比而言,企业单位的性别养老金差距更大,且下降幅度也更大。2013年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养老金收入占男性的比值为93.5%,这一比值在2018年略下降为91.6%。企业单位的女性养老金与男性的比值从2013年的88.3%降为2018年的78.0%。

按照不同分组来看,2013—2018年间各个分组的性别平均养老金比率都有所下降。在各年龄组中,女性养老金均值都低于男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养老金的性别差距大体上趋向增大。在2013—

		2013 年		2018 年			
	男性 养老金均值	女性 养老金均值	女/男(%)	男性 养老金均值	女性 养老金均值	女/男(%)	
总体	2586	2286	88.4%	3965	3157	79.6%	
机关事业单位	3336	3119	93.5%	5017	4594	91.6%	
企业单位	2254	1991	88.3%	3539	2762	78.0%	
60 岁以下	2231	2232	100%	3432	2969	86.5%	
60—64 岁	2484	2185	88.0%	3852	3142	81.6%	
65—69 岁	2634	2284	86.7%	3990	3273	82.0%	
70—74 岁	2608	2390	91.6%	3899	3275	84.0%	
75—79 岁	2992	2453	82.0%	4234	2961	70.0%	
79 岁以上	2908	2762	95.0%	4540	3599	79.3%	
党员	2877	2751	95.6%	4535	4064	89.6%	
非党员	2394	2178	91.0%	3510	2930	83.5%	
小学及以下	2156	1895	87.9%	3391	2394	70.6%	
初中	2293	1971	86.0%	3608	2789	77.3%	
高职/大专	2877	2679	93.1%	4141	3511	84.8%	
本科及以上	3795	3874	102%	5527	4988	90.2%	
样本量	1114	1141	2255	1286	1388	2674	

表 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2018年间,各个年龄段的性别养老金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60岁以下、75—79岁和79岁以上3个年龄组下降幅度最大,均超过10%。值得注意的是,在党员身份的分组中,2013年和2018年非党员的性别养老金比率分别为91%和84%,皆低于党员的96%和90%。而且,与党员相比,非党员的性别差距在5年间的下降幅度更大。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组来看,与高学历相比,低学历的性别养老金比率更低,即低学历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更大,而且,低学历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在此期间的下降幅度也更大。其中,2013年小学及以下组、初中组的性别养老金比例为87%左右,2018年则分别下降为70.6%和77.3%。高职、大专分组的性别养老金比率在2013年为93.1%,2018年下降为84.8%,本科及以上学历则从2013年的102%下降为2018年的90.2%。

三、分解分析方法

研究性别收入差距的经典方法是由 Oaxaca 和 Blinder 提出来的 Oaxaca-Blinder 分解法。^① 它是将 男女平均收入的差距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由个体特征差异或解释变量均值不同所引起的,通常被称为 可解释部分,二是由收入方程估计系数不同导致的,后一部分通常被称为不可解释部分或歧视部分。 Oaxaca-Blinder 分解法主要基于线性回归模型,假设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方程如下。

$$lnw_m = x_m \beta_m + \mu_m \tag{1}$$

$$lnw_f = x_f \beta_f + \mu_f \tag{2}$$

式中, x_m 和 x_f 分别为男性和女性的个体特征, β_m 和 β_f 为男性和女性个体特征的估计系数。设定 \overline{w}_m 和 \overline{w}_f 代表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均值,则男女收入函数的均值差异可以表示如下。

$$ln\overline{w}_m - ln\overline{w}_f = \overline{x}_m \beta_m - \overline{x}_f \beta_f \tag{3}$$

根据不同的基准组,上式可转化为以下两种形式。

$$ln\overline{W}_m - ln\overline{W}_f = \overline{x}_m \beta_m - \overline{x}_f \beta_f = (\overline{x}_m - \overline{x}_f)\beta_f + \overline{x}_m (\beta_m - \beta_f)$$
(4)

$$= (\overline{x}_m - \overline{x}_f)\beta_m + \overline{x}_f(\beta_m - \beta_f) \tag{5}$$

现令 $\Delta \overline{x} = \overline{x}_m - \overline{x}_f$, $\Delta \beta = \beta_m - \beta_f$, 故 (4) 式和 (5) 式可转化如下。

$$ln\overline{w}_m - ln\overline{w}_f = \Delta \overline{x}\beta_f + \overline{x}_m \Delta \beta \tag{6}$$

$$= \Delta \overline{x} \beta_m + \overline{x}_f \Delta \beta \tag{7}$$

式中, $\Delta \overline{x} \beta_f$ 或 $\Delta \overline{x} \beta_m$ 是由两个性别分组间的个体特征所引起的收入差异,通常被称为可解释的部分, $\overline{x}_m \Delta \beta$ 或 $\overline{x}_f \Delta \beta$ 是由两个性别分组收入方程的系数差异引起的收入差异,通常被称为不可解释部分或歧视的部分。要注意的是,Oaxaca-Blinder 分解存在基准组的选题问题,即以不同性别组的工资结构作为歧视不存在情况下的工资结构。其中(6)式是以女性作为基准组,(7)式是以男性作为基准组。不同的基准组选择会导致分解结果的不一致。

Neumark 对这一方法进行改进,以男女性混合的全体样本的收入方程作为参照,通过加权的方法构造了无歧视收入结构。Neumark 的全样本收入方程的无歧视结构如下。

$$\hat{\beta} = (X'\Delta X)^{-1}(X'\Delta\Omega) = (X'X)^{-1}X'Y$$
(8)

其中,Y表示收入对数,X表示男性和女性全部样本可观测个体特征矩阵。 Δ =diag(m_i + f_i , m_2 + f_2 ,……, m_i + f_i), m_i 和 f_i 分别表示第 i 类受教育水平或工作单位类型或行业或职业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 Ω = ($lnw_{m_i}m_i$ + $lnw_{f_i}f_i$)/(m_i + f_i) 表示各类个体特征的无歧视结构下养老金收入组成的向量。那么,男性和女性养老金收入均值的差异可分解如下。

$$ln\overline{w}_m - ln\overline{w}_f = (\overline{x}_m - \overline{x}_f)\widehat{\beta} + [\overline{x}_m(\beta_m - \widehat{\beta}) + \overline{x}_f(\widehat{\beta} - \beta_f)]$$
(9)

式中, $(\overline{x}_m - \overline{x}_f)\hat{\beta}$ 为男性和女性个体特征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 $[\overline{x}_m(\beta_m - \hat{\beta}) + \overline{x}_f(\hat{\beta} - \beta_f)]$ 为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 $\hat{\beta}$ 是男性和女性收入结构的加权平均。

① Ronald Oaxaca,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14, no.3, 1973.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职工养老金性别差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分解。首先我们设定 ΔY_t 为 t 时期收入均值对数的性别差异,则 $\Delta Y_t = ln\overline{w}_{mt} - ln\overline{w}_{ft}$; $\Delta \overline{x}_t$ 表示 t 时期特征变量均值的性别差异, $\Delta \overline{x}_t = \Delta \overline{x}_{mt} - \Delta \overline{x}_{ft}$; $\Delta \beta_t$ 表示 t 时期两性特征变量估计系数与加权平均系数的差异, $\Delta \beta_t = \beta_{mt} - \hat{\beta}_t$ 或 $\Delta \beta_t = \beta_{ft} - \hat{\beta}_t$ 。那么,养老金的性别差距从 0 期到 1 期的变化可以分解为如下。

$$\begin{split} \Delta Y_{1} - \Delta Y_{0} &= \{ (\overline{x}_{m1} - \overline{x}_{f1}) \hat{\beta}_{1} + [\overline{x}_{m1} (\beta_{m1} - \hat{\beta}_{1}) + \overline{x}_{f1} (\hat{\beta}_{1} - \beta_{f1})] \} \\ &- \{ (\overline{x}_{m0} - \overline{x}_{f0}) \hat{\beta}_{0} + [\overline{x}_{m0} (\beta_{m0} - \hat{\beta}_{0}) + \overline{x}_{f0} (\hat{\beta}_{0} - \beta_{f0})] \} \\ &= \{ (\overline{x}_{m1} - \overline{x}_{f1}) \hat{\beta}_{1} - (\overline{x}_{m0} - \overline{x}_{f0}) \hat{\beta}_{1} \} + \{ (\overline{x}_{m0} - \overline{x}_{f0}) \hat{\beta}_{1} - (\overline{x}_{m0} - \overline{x}_{f0}) \hat{\beta}_{0} \} \\ &+ \{ \overline{x}_{m1} (\beta_{m1} - \hat{\beta}_{1}) + \overline{x}_{f1} (\hat{\beta}_{1} - \beta_{f1}) - \overline{x}_{m0} (\beta_{m0} - \hat{\beta}_{0}) + \overline{x}_{f0} (\hat{\beta}_{0} - \beta_{f0}) \} \\ &= (\Delta \overline{x}_{1} - \Delta \overline{x}_{0}) \hat{\beta}_{1} + \{ \Delta \overline{x}_{0} (\hat{\beta}_{1} - \hat{\beta}_{0}) + \overline{x}_{m1} \Delta \beta_{m1} - \overline{x}_{f1} \Delta \beta_{f1} - \overline{x}_{m0} \Delta \beta_{m0} - \overline{x}_{f0} \Delta \beta_{f0} \} \end{split}$$
(10)

可以看出,上式将两期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变化分解为右式的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两个时期两性特征差异的变化带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变化,该部分被认为是可解释部分差异带来的变化;第二部分表示两个时期两性特征变量估计系数差异带来的性别差距变化部分,被认为是禀赋回报率差异或不可解释部分差异带来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利用 Neumark 分解方法对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进行研究,主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我们利用两个年份调查数据,估计了男女职工混合样本的总体、不同部门的养老金收入函数。第二步,根据回归的系数估计值和解释变量的平均值,本文利用 Neumark 分解方法对 2013 年和 2018 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四、养老金性别差异的估计和分解

(一) 养老金水平的性别差距

首先,本文利用 2013 年和 2018 年调查数据对城镇职工混合样本的养老金收入函数进行估计。被解释变量是个人月养老金的对数,解释变量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基准组,由其估计系数可以看出养老金的性别差距。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退休前单位类型、退休前所在行业、职业,以及省份等。表 2 列出了总体样本、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样本分别回归的结果。总体上,2013-2018 年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且绝对值逐渐增大,这意味着城镇职工的性别养老金差距在此期间是拉大的。从机关事业单位来看,男女职工的养老金差距不大,在 5 年间略有上升,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相比较而言,企业男女职工的养老金差距更大,且在此期间有所扩大,统计上也都非常显著。在总体样本的回归中,相对于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收入更高,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在表 2 中可以看出,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收入与其年龄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年龄对养老金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我国养老金待遇增长机制的作用。在 2013 年的估计结果中,相对于省略变量即 60 岁以下,60 岁以上职工的养老金随着年龄而不断增加,79 岁以上达到峰值。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也随着年龄平稳增长,企业职工养老金在 70 岁以上才出现随年龄增长的趋势。到了 2018 年,全体职工和不同类型部门职工的养老金随着年龄增长的趋势更加显著。党员身份对养老金收入的影响在此期间在统计上变得更加显著。同时,学历也会对职工的养老金收入产生积极的作用。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高职和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的养老金收入更高,且在统计上较为显著。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高学历对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此外,不同行业以及不同职业和地区等变量对职工的养老金收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不同时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分解结果

基于表 2 估计的养老金收入函数,本文根据 Neumark 分解方法将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异分解为两大部分。一是个体禀赋差异带来的差距。根据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计发办法,职工的养老金水平主要取决于工资收入和缴费年限等因素,基于此,养老金的这一差距主要源于个体禀赋带来的工资水平

表 2 城镇职工养老金收入函数的回归结果

- P-	2013 年				2018年	
变量	总体	企业	机关事业	总体	企业	机关事业
女性	-0.064***	-0.079***	-0.028	-0.123***	-0.150***	-0.077
	(0.0193)	(0.0227)	(0.0371)	(0.0176)	(0.0203)	(0.0349)
机关事业单位	0.289***			0.322***		
	(0.0259)			(0.0241)		
60-64 岁	0.016	0.019	0.015	0.106***	0.103***	0.101*
	(0.0254)	(0.0286)	(0.0564)	(0.0254)	(0.0283)	(0.0571)
65-69 岁	0.0300	-0.003	0.116**	0.145***	0.144***	0.119**
	(0.0290)	(0.0341)	(0.0575)	(0.0279)	(0.0315)	(0.0600)
70-74 岁	0.089***	0.086**	0.107*	0.120***	0.109***	0.155**
	(0.0323)	(0.0378)	(0.0641)	(0.0319)	(0.0370)	(0.0641)
75-79 岁	0.125***	0.133***	0.140**	0.098***	0.072	0.191***
	(0.0372)	(0.0453)	(0.0686)	(0.0369)	(0.0440)	(0.0705)
79 岁以上	0.201***	0.259***	0.103	0.243***	0.248***	0.230***
	(0.0424)	(0.0526)	(0.0756)	(0.0380)	(0.0447)	(0.0729)
党员	0.027	-0.001	0.063	0.121***	0.127***	0.087**
	(0.0224)	(0.0278)	(0.0384)	(0.0202)	(0.0244)	(0.0355)
初中	0.068***	0.091***	-0.043	0.132***	0.137***	-0.031
	(0.0257)	(0.0280)	(0.0667)	(0.0270)	(0.0293)	(0.0745)
高职/大专	0.187***	0.195***	0.138**	0.192***	0.178***	0.088
	(0.0282)	(0.0322)	(0.0619)	(0.0283)	(0.0315)	(0.0723)
本科及以上	0.401***	0.345***	0.403***	0.300***	0.238***	0.223***
	(0.0466)	(0.0721)	(0.0753)	(0.0440)	(0.0625)	(0.0815)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7.439***	7.419***	7.672***	7.613***	7.622***	7.693***
	(0.0543)	(0.0652)	(0.1470)	(0.0651)	(0.0753)	(0.157)
R ²	0.296	0.192	0.229	0.328	0.241	0.235
调整 R ²	0.286	0.177	0.191	0.320	0.229	0.198
F值	30.13	12.55	6.01	40.24	20.21	6.31
观测值	2255	1615	640	2674	2004	670

注:(1)男性、企业、非党员、小学及其以下、一类行业、工人、甘肃分别为参照组;

和缴费年限差异。二是禀赋回报率差异带来的差距,这部分差距是源于劳动力市场上女性获得工资报酬时遭到歧视的部分,具体结果见表 3。表 3 结果显示,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总性别差距(男女职工平均养老金的对数之差 100)从 2013 年的 10.71 增加为 2018 年的 22.42,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扩大幅度为 11.71。其中,禀赋回报率带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呈现增大的趋势,从 2013 年的 5.42 上升为 2018 年的 13.59,而且,它占总性别差距的比重也从 50.6% 上升为 60.6%。这意味着歧视产生的作用逐渐增强。同时,从个体禀赋差异来看,它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解释作用逐渐减弱,可解释部分占性别总差距的比重不断下降,从 2013 年的 49.4% 下降至 2018 年的 39.4%。这表明男性和女性职工之间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特征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表 3 还列出了各个分解成分及其变化。在不可解释部分中,常数项的估计值反映了具有参照组特征 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即 60 岁以下、学历低、企业单位、行业和职业收入低等。表 3 结果显示,常数项 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在 2013—2018 年间有所增长,从 14.31 上升为 34.8。常数项的估计值反映的

^{(2)***}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是具有参照组特征的职工的养老金水平,本文的参照组是具有年纪轻、学历低、行业收入低、职业差等特征的个体,这一结果意味着具有参照组特征的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在此期间的扩大幅度显著,即处于劳动力市场低端的女性职工受到更多的性别歧视。在可解释的部分中,年龄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解释力度最大,但在此期间有所下降,从 2013 年的 21.3% 下降为 2018 年的 8.3%。同时,受教育程度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解释力度也大幅下降,从 14.9% 下降为 4.4%。相反的是,党员身份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作用增大,解释力度由 2013 年的 2.2% 上升为 2018 年的 15.1%。此外,单位类型、行业、职业和省份等就业特征差异对养老金性别差距也有一定作用。其中,就业单位类型差别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最大,但在此期间有所下降,从 2013 年的 12% 下降为 2018 年的 9.5%。其他特征变量对性别差距的解释表3 城镇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分解结果

变量	20	13 年	201	8年
文里	差距	贡献(%)	差距	贡献 (%)
总差异:	10.71	100%	22.42	100%
不可解释部分:	5.42	50.61%	13.59	60.62%
其中:常数项	14.31	133.61%	34.8	155.22%
可解释部分:	5.29	49.39%	8.83	39.38%
年龄	2.28	21.29%	1.87	8.34%
党员	0.24	2.24%	3.38	15.08%
受教育程度	1.59	14.85%	0.98	4.37%
单位类型	1.29	12.04%	2.12	9.46%
行业	0.24	2.24%	0.46	2.05%
职业	0.13	1.21%	0.08	0.36%
地区	-0.49	-4.58%	-0.08	-0.36%

作用较小,且在此期间略有下降。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职工养老金决定机制有所不同,我们分别对其养老金的性别差距进行了分解,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在 2013 年和 2018 年,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都大于机关事业单位。同时,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有较大程度的拉大,总差异从 10.2 上升到了 23.2;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在此期间略有扩大,从 5.3 增长为 7.6。但同时,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企业职工禀赋回报率差异带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有所扩大,由 2013 年的 6.9 上升为 2018 年的 17.0,对差距的贡献率由 68% 增长为 73.6%。但对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禀赋回报率差异带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变化不大,其解释力度略有所下降,所占比重从 2013 年的 37.9% 下降为 2018 年的 35.1%。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企业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中的歧视部分更大,且歧视程度在此期间有所增大。这主要是因为,与机关事业单位相比,企业单位的工资报酬制度更多受到私有化、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使得女性在养老金收入方面受到更多的性别歧视。

从表 4 中的分解成分来看,对企业而言,常数项对养老金差距的贡献大幅度增加,从 12.2 上升到 34.9,这意味着年纪较轻、学历低、职业和行业收入低等具有参照组特征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在此期 间拉大的幅度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企业职工个体特征差异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在 2013—2018 年 间有所下降,从 32.0% 下降为 26.4%。2013 年年龄因素对性别差距的贡献最大,高达 20.6%,但至 2018 年,贡献下降为 6.7%。党员身份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在此期间有所上升,从 2013 年的 0.7% 增大为 2018 年 13.3%。受教育程度对性别差距的贡献大幅下降,从 2013 年的 9.9% 下降为 2018 年的 2.5%。行业、职业和地区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度变化不大。这意味着男女企业职工之间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特征的差异有所减小。相比较而言,机关事业单位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常数项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减弱,从 30.6 下降为 24.0,这意味着具有参照组特征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有所缩小,即处在劳动力市场低端的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工作人员遭受的性别歧视在减弱。个体特征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解释

力有所增大,从 2013 年的 62.1% 上升为 2018 年的 64.9%。2013 年年龄的解释力度最大,所占比重为 46.3%,2018 年则下降为 30.1%。党员的解释力度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 2013 年的 12% 增大为 51.4%。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度在此期间大幅下降,从 2013 年的 29.6% 下降为 2018 年的 5.8%。行业、职业和 地区对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解释力度变化不大。这一结果源于机关事业单位男女工作人员之间的人力资本

	企业单位				机关事业单位			
变量	2013 年		2018年		2013 年		2018年	
	差距	贡献	差距	贡献	差距	贡献	差距	贡献
总差异:	10.18	100%	23.15	100%	5.33	100%	7.63	100%
不可解释部分:	6.93	68.07%	17.03	73.56%	2.02	37.90%	2.68	35.12%
其中:常数项	12.22	120.04%	34.90	150.76%	30.62	574.48%	23.99	314.42%
可解释部分:	3.26	32.02%	6.11	26.39%	3.31	62.10%	4.95	64.88%
年龄	2.10	20.63%	1.56	6.74%	2.47	46.34%	2.30	30.14%
党员	0.07	0.69%	3.08	13.30%	0.64	12.01%	3.92	51.38%
受教育程度	1.01	9.92%	0.57	2.46%	1.58	29.64%	0.44	5.77%
行业	0.27	2.65%	0.42	1.81%	-0.78	-14.63%	-1.20	-15.73%
职业	0.14	1.38%	0.16	0.69%	0.18	3.38%	-0.29	3.80%
地区	-0.34	-3.34%	0.32	1.38%	-0.77	-14.45%	-0.22	-2.88%

表 4 不同部门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分解结果

和就业特征的差异略有增大。

(三) 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动态分解结果

上文分析了城镇职工在两个不同年份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及其影响因素,本部分我们将考察城镇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在 2013—2018 年间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按照上文公式(10),本文将全体职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变化程度分别进行了分解,并将其分解为各个解释变量的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 5。表 5显示,在 2013—2018 年间,我国城镇总体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有所增长,增长的幅度为 0.1177。从总体职工的分解结果来看,党员身份等个人特征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对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的扩大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部门性质、职业等就业特征的影响作用较小。同时,估计方程中常数项部分的作用是最大的,它带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变化是总差距变化的 1.75 倍。这表明低端劳动力市场上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的扩大幅度远远超过了总差距的扩大幅度。

同时,表5还分别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变化幅度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8年期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也都有所扩大,扩大的幅度分别为0.1261和0.0231,但企业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的扩大幅度远超过机关事业单位。与此同时,拉大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原因有较大不同。首先,年龄和行业变量是影响养老金性别差

变量	总体		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		
文里	差距	贡献(%)	差距	贡献 (%)	差距	贡献(%)	
年龄	-0.0508	-43.16	-0.0592	-46.95	0.0210	90.91	
党员	0.0324	27.53	0.0118	9.36	0.1070	463.20	
受教育程度	-0.0540	-45.88	-0.0082	-6.50	-0.1223	-529.44	
部门性质	0.0016	1.36	-	-	-	-	
行业	-0.0023	-1.95	-0.0500	-39.65	0.1458	631.17	
职业	0.0005	0.42	0.0067	5.31	-0.0211	-91.34	
省份	-0.0146	-12.40	-0.0018	-1.43	-0.0410	-177.49	
常数项	0.2049	174.09	0.2268	179.86	-0.0663	-287.08	
总计	0.1177	100	0.1261	100	0.0231	100	

表 5 2013—2018 年间城镇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变化的分解结果

距的重要因素,但其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具体而言,年龄和行业变量对缩小企业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扩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性别差距产生了非常强的作用,贡献率分别达到 90.9% 和 631.2%。其次,党员身份产生了拉大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影响,但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作用大小不同。党员身份对企业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变化幅度的贡献率仅为 9.4%,但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性别差距的贡献率高达 463.2%。最后,常数项对养老金性别差距仍有较大影响,但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作用有较大差异,贡献率分别为 179.9% 和 -287.1%。对企业而言,在此期间,年纪较轻、学历低、职业和行业收入低等低端劳动就业群体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有大幅度扩大的趋势,而机关事业单位低端就业群体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反而有较大程度地缩小。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 CHIP 的城镇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收入性别差异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3—2018 年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逐渐扩大,女性养老金收入占男性的比重由 88%下降为 80%。其中,不可解释部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 2013 年的 50.6% 上升为 2018 年的 60.6%,这意味着市场歧视对养老金差距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要注意的是,处于劳动力市场低端的女性职工遭受更多的性别歧视,与男性的养老金差距大幅增长。第二,企业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有扩大趋势,且扩大幅度较为明显。女性养老金收入占男性比值从 2013 年的 88%下降为 2018 年的 78%,差距值从 10.18 上升为 23.15,扩大幅度为 12.97,明显大于总差距的扩大幅度。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来自不可解释部分,市场歧视的贡献从 2013 年的 68% 上升为 2018 年的 73.6%。这表明企业女性职工遭受的市场歧视更为严重,且歧视程度在此期间有所扩大。第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性别差距有小幅度的扩大。2013—2018 年间,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养老金收入占男性比值从 94%下降为 92%,性别差距值从 5.33 扩大为 7.63,均低于企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比例来自于不可解释部分,但这一比重在此期间有所下降。相应地,可解释部分占比有上升趋势,意味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性别差距主要源于个体特征差异的增大。

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作为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性别歧视的衍生,女性的养老金收入也会受到市场 歧视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女性面临更大的长寿风险,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老年贫困。基于此,我国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应在保障老年女性收入方面有所改善,以防止老年贫困,例如设定男女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 建立遗属或夫妻关联性养老金制度等。

责任编辑:王冰

人民获得感:美好生活期待与国民经济绩效间的机理阐释

——主客观数据的时序比较分析*

文宏林彬

[摘 要]人民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是民众美好生活期待和国家发展绩效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人民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作用机理模型,运用 21 世纪以来四波 CSGS 社会调查和国家统计数据进行时序上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揭示人民获得感与发展绩效之间的不匹配、不同步的现实困境。结果表明:国家宏观经济向好发展、个人收入增加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能有效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但两者间存在相互预测效应、时间滞后效应、复合累积效应、间断均衡效应、路径依赖效应等多重作用机理。为此,提升人民获得感的关键在于回应美好生活期待,同时引导民众预期,理性看待获得感与发展绩效间的差异。

[**关键词**]人民获得感 民众期待 经济绩效 时序比较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66-08

一、问题的提出

人民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在物质和精神上有切实收益的主观感受,也是民众美好生活期待在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中的满足程度(文中简称"民众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人民获得感,人民获得感既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指明了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多获得感就必须将其落实在改革成效之中。^①揭示人民获得感与发展绩效之间不匹配、不同步的现实困境,成为亟待回应的理论问题。人民获得感是一个政治哲学构念,包括民众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平公正和个人收益等主客观要素,蕴含着民众现实收益基础之上的个人心理感受。相关学者已经关注此领域,相继探讨了人民获得感的内涵界定、维度划分和实践指向,阐释人民获得感指标体系的时代价值,强调人民获得感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新标准,指明其蕴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维度,认为将人民获得感作为主观评价维度纳入国家治理的评价体系,可以使国家治理成效在客观指标基础上的评价标准更为切实有效。^②这些研究表明人民获得感是反映国家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其构成要素中的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差别和联系。然而,相关研究关注到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联,却忽视了两者间的作用机理,即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8JZD042)及广州市社科智库课题"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广州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研究"(2020GZZK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文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彬,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41)。

①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② 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期。

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之间相互比较的差异和联系。因此,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学者倾向于支持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但其外在表现如何相关,即对国家发展绩效如何促使获得感提高的机理尚且缺乏研究;二是以往研究多是采用截面数据探讨相关性及因果关联,尚不足以全面观测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且囿于国家宏观发展和政策执行的成效通常需长时间观测和考察,^①单纯使用截面数据,会存在研究问题与研究数据匹配性不足的问题;三是现有研究多是从政治学、哲学角度来阐释其内涵与维度,其共性之处是都指明人民获得感包含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两种层次,但并未同时结合主客观数据展开分析。面对现实中民众客观收益显著却仍不满意的情形,^②或者客观收益较少而主观感受却很强烈的现实矛盾,^③亟需展开分析和解释。回应民众美好生活期待需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但两者间并非简单的相关或者因果关系,其中表现出的不匹配、不同步的现象需结合主客观数据来进一步分析和解释。

认清问题背后的作用机理和变化规律,能够在更深层次理解和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进而能够为提升人民获得感提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人民获得感中民众美好生活期待与国家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和逻辑关系。笔者选用主观评价数据与发展绩效指标进行匹配,明晰成果收益转化为个人感受的过程和逻辑,从而在更深层次上理解获得感。本文将通过构建人民获得感评价体系,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间的作用机理模型,运用21世纪以来的四次中国城乡社会治理(CSGS)数据观测我国民众感受的变化,收集相应年份国民经济发展绩效数据,实证性地呈现美好生活期待与经济发展绩效在时序上的联系,并对其作用机理给出学理性解释。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 人民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

人民获得感是民众多层次、多方面实实在在的感受,包括物质获得和精神感受两个层面,主要可归纳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等。获得感作为对民众心理感受的抽象概括,不仅能衡量个体满意程度,同时指明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④ 获得感的激发过程,是民众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期待得到回应的主观感受。^⑤ 具体而言,经济获得感在国家层面,涉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是国家整体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的提升,在民众期待上有所回应而产生的感受。在民众个体层面,主要是基于民众与以往和预期相比、与他人之间相比形成的个人感受,包括个人经济获得感和分配公平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包含政治参与获得感和正风反腐获得感等,是民众行使法律赋予权利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监督政府公权力以及对自己国民身份的自信和认可。民生获得感包含教育获得感、养老获得感、医疗获得感和就业获得感,是指民众在享有政府提供的教育、养老、医疗和就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中的满足程度。但个人感知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仅与个体自身的客观收益相关,而且与以往的纵向对比和他人的横向对比密切关联,使得单一数据往往缺乏客观性。^⑥

就经济发展方面而言,现有文献多集中于解释民众经济获得感的客观影响因素,以及试图探讨民众美好生活期待与国民经济指标的关系。例如经济获得感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是由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共同组成的,具体而言: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增长)是衡量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国家各方面的长期发展具有重

① 施茜、裴雷等:《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实证评测——以江浙信息化政策实践为例》,《图书与情报》2016年第6期。

② 何李:《城市政府环保行为与公众感知存在差异的原因——以资源型城市为例》、《城市问题》2017年第3期。

③ 李兰芬、王蓓蕾:《人民获得感不断增强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5日第6版。

④ 钟婧:《用百姓的"获得感"提升改革的"含金量"》,《人民论坛》2017年第25期。

⑤ 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⑥ Daniel Treisman,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0, no.10, 2007.

要作用。^①个人经济方面的收入变化情况,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和相应获得感息息相关,能够较好反映个人经济获得感。^②分配公平主要指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贫富差距,通常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来加以反映。^③结合国民经济主观感受评价指标,笔者认为国民经济获得感主观层面来源于宏观经济发展、个人经济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客观收益来源于GDP增速、个人收入增长率、城乡收入差距等。

(二) 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间的作用机理

个体感受与客观收益之间通常不是简单线性相关,而是兼具多重特性的复杂关系。已有许多研究已 证实经济绩效等宏观数据与个体感知数据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④ 且会表现出多重特征, 比如本文研究的 人民获得感,不仅包含个人经验感受,还应结合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可综合考察两者之间的内 在关联。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常出现在宏观经济管理、管理心理学等研究领域,如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 从实施到落实再到产生成效,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被称为"宏观经济管理滞后效 应"。^⑤ 宏观经济管理侧重于探讨宏观调控和政策效果的相关联系和延迟效果,即宏观变量作用效果,通 常表现为具有相关关系和存在滞后效应。从管理心理学视角看,客观事物与个体感受之间存在感知上的 差异,并且感知差异会进而调节个人判断。 ⑥ 比如有学者认为客观风险危害程度会引发民众主观风险认 知的变化, ^② 而公众的主观清廉感知则受到腐败曝光案件数量影响, ^⑧ 需要外在变量达到一定总量和程 度才会引发个体感知的变化,这就说明对民众个人感受的影响需客观指标处于较高水平、较长时间发挥 作用才能形成显著效果,即"量变引发质变"的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并且宏观绩效指标与微 观个体感知之间并不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 如经济绩效与个人腐败感知之间的变化存在拐点,其原 因可能在于,制度因素或政治因素会使政策过程在较长时间遵循稳定与突变的变迁(Dramatic Shifts), 这种稳定与剧烈变化的现象可以"间断均衡现象"(Punctuated Equilibrium Phenomenon)来形象概括。® 相关性的变化是指现实结果与个体感知之间存在交互机制,会通过人的意识以能动的方式解读现实,但 个人认知受个人信息量和观念的影响,个人认知固化形成观念(Concept)和印象,^⑩ 观念和印象会影 响社会判断,[©] 即个人感受存在"认知路径依赖"(Cognitive Path Dependence)。这些现象和解释性理论, 都为我们探究微观个体感知与宏观指标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参考,并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人民获得感与经济 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为了回应民众美好生活的期待,民众美好生活期 待的实现程度又是检验发展成效的标准。因此,本文着重探究人民获得感的外在表现,也即"美好生活

①丁元竹:《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国家治理》2016年第2期。

② 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 2 期。

③ 邵雅利:《共享发展增强人民获得感》,《人民论坛》2018年第3期。

④ 邓雪琳、孙宗锋:《经济绩效、政府规模与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全国 77 个地级市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 2018 年第 2 期。

⑤ 高明:《滞后效应与需求管理模式的重新设计》,《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⑥ 沈伊默、周婉茹等:《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2017年第8期。

⑦朱正威、石佳:《重大工程项目中风险感知差异形成机理研究——基于 SNA 的个案分析》,《中国行政管理》 2013 年第 11 期。

⑧ 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 G 省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Montinola Gabriella and Jackman Robert, "Sources of Corruption: A Cross-Country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 no.1, 2002.

⑩ 李文钊:《间断—均衡理论: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稳定与变迁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① Jean Vergne and Durand Rodolphe,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and Empirics of Path Dependence: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estability Issue,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47, no.4, 2010.

① Mishina Yuri, Block Emily and Mannor Michael, "The Path Dependence of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How Social Judgment Influences Assessments of Capability and Charact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3, no.5, 2012.

期待与国家发展成效"的外在差异和内在联系,提出了两者间相互预测效应、时间滞后效应、复合累积效应、间断均衡效应、路径依赖效应的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主观数据方面,本文选用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提供的全国性代表数据(CSGS)。该数据分别于2002年、2009年、2012年和2016年采集完成,由清华大学等高校牵头完成,笔者曾参与全国样本的数据抽样及区域数据采集工作。调研团队为解决以往全国抽样数据采集过程中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匹配带来的覆盖偏差,结合了人口分布、经纬度、地理定位以及区域抽样等数据,在传统分层多阶段基础上与 GPS/GIS 辅助的区域抽样等方式相结合,按照分层、多阶段以及规模成比例(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PPS)等程序进行操作。四次调研分别获取3780份、5098份、3347份与4068份有效问卷,共16293个有效截面数据,涵盖全国28个省市区,具有较高代表性。其中2019年对外申请公开(2016年完成收集)的4068份有效问卷中,城市问卷1632份,农村问卷2657份;东部问卷1850份,中部问卷1433份,西部问卷786份。客观数据方面,笔者从国家统计年鉴中获取了相应年份对应指标的数据,这些指标包括宏观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居民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详见表1。

(二) 变量选择

本文旨在探讨民众美好生活期待与国家经济绩效的关系。在主观变量方面,笔者选择"您觉得我们国家目前整体经济状况怎么样?"来测量宏观经济获得感,选择"您家目前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来测量个人经济获得感,选择"您觉得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状况如何?"来测量分配公平获得感。客观变量方面,笔者选用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宏观数据,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增速)来表示;对于个人经济收入变化的宏观数据,采用居民收入增长率来表示;对于分配公平的宏观数据,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来反映。

国民经济客观绩效	2002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5 年
宏观经济增长 (%)	8.40%	8.90%	9.00%	6.40%
居民收入同比增长 (%)	10.32%	8.70%	15.02%	8.90%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	7702.80	17174.65	19109.44	31194.83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2475.60	5153.17	5919.01	11421.71
城乡收入差距比值(%)	211.15%	233.28%	222.85%	173.12%

表 1 国民经济客观绩效数据

(三)分析方法

本文侧重于定性的描述与比较,并结合使用量化的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GRA)方法予以检验。在测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关性方面,国内外学者还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其研究领域和测量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侧重于对滞后性的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回归模型、得出回归方程来计算出滞后期;定性分析主要适用于分析宏观投入,或者因选取指标数据量太少,侧重于对图表数据的描述和比较。^①由于定性方法更为简便和更具操作性,对数据量要求较低,可以深入分析主客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可辅助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法(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GRA)进行检验,^②相应的运用范围更

注: 因统计口径不一, 2002年、2009年使用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2011年、2015年使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① 张同斌、高铁梅:《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与关联效应的国际比较——基于美、英、日、中、印、巴六国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

② 刘璐、郭兵:《地方政府 R&D 投入与经济增长滞后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来自上海 1999—2010 年的经验数

为广泛。为此,笔者分阶段进行多次测量,并侧重于借助图表直观展现、描述和分析。而量化的灰色关联分析则侧重于根据曲线变化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序列之间的关联是否紧密,关联度(Relational Grade)越接近1,证明曲线之间相关性越强。与回归分析相比,本文采用的方法对样本量和数据分布要求较低,并能直观反映两者间的作用效果。

另外,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将反映系统效果的行为特征数据视为参考数列,影响系统效果的因素数据视为比较数列,本文确定民众主观感知数据作为参考数列,客观指标数据作为比较数列。(2)对参数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均一化处理,即选取各数列数据区间内某一数作为参考值,进而方便比较。(3)计算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 ξ (X_i),先计算比较数列 X_i 曲线上的同一时间点数据与参考数列 X_0 曲线上对应数据的差值绝对值,记为 Δ oi (k),再找出 Δ oi (k) 中的最大值 Δ max 和最小值 Δ min,即可求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同一时间的关联系数 ξ (X_i),计算公式如下:

$$ξ(Xi) = \frac{\Delta \min + \rho \Delta \max}{\Delta oi(k) + \rho \Delta \max}$$
 $r_i = \frac{1}{N} \sum_{K=i}^{N} ξ(K),$ 其中 ρ 为分辨系数,通常取 0.5。(4) 最终关联度 ri 取各

数列关联系数的均值。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国民经济主观层面分析

人民经济获得感是指民众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主观感受,来源于民众对宏观经济、个人经济、分配公平三方面测量指标的实现程度。从时序上看,在 2002 年至 2011 年期间"国民经济期待"满足情况几乎处于平稳状态,但党的十八大以来至 2015 年期间,其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具体来说,国民经济获得感在四次测量中总体满足程度(测量指标均值)分别为 19.77%、17.73%、17.70%、35.30%,其中宏观经济获得感程度为 10.90%、4.40%、8.00%、62.40%,个人经济获得感程度为 28.80%、20.90%、20.00%、23.90%,分配公平获得感程度为 19.60%、27.90%、25.10%、19.60%。由此可见,国民经济获得感能够综合反映出民众的主观感受,及在四次受访中的民众美好生活期待满足程度的变化特征和变化趋势。

(二) 美好生活期待与国民经济绩效的匹配分析

民众期待满足程度与发展绩效之间是兼具多重特性的复杂关系,可从主客观数据匹配的外在差异透视其内在逻辑。使用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间的作用机理模型,可从相互预测效应、时间滞后效应、复合累积效应、间断均衡效应、路径依赖效应等角度对其加以分析和解释。第一,从时序上看,民众期待与经济发展绩效间存在一定的相互预测(Mutual Prediction)关系,表现为相关性和变化状态趋同。当然,笔者已经假定获得感包含民众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两个要素,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结合图 1、图 2 和图 3 可以直观地看到,国民经济各项发展指标都呈现出先较大幅度增长,而后平稳发展,再逐渐回落的"倒 U"变化。而民众感受会受实际获得影响,随之表现为快速上升,二者变化趋势趋同。第二,基于客观获得的民众感受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可以从呈现节点和滞后期进行描述。以图 2 为例,个人收入增长率在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处在上升状态,但民众的主观感受并不强烈,未能较好感知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人客观收入的变化。而作用于民众感受产生的效果直至 2011 年之后才得以显现,并且与居民收入变化趋势非常相似,可看出作用效果的呈现时间点会有明显延迟,即存在滞后期。第三,国民经济绩效需形成复合累积效应才会提升民众获得感,表现为时间和程度的复合效应。图 1 和图 2 显示在 2002 年、2009 年和 2011 年三次统计中,国家 GDP 增速维持在 8.8% 左右,居民收入增速维持在 11.3% 左右,在全球已处于较高发展水平,而 2011 年民众获得感程度相较上次测量增长近一倍。经济发展成果显著,需维持一段时间的较快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程度复合作用下激发民

据》,《科技和产业》2012年第10期。

众主观感知和认同程度,而后集聚爆发,这表明获 得感程度需在累积效应下才能快速增加。第四,民 众基于客观获得的主观感受存在一定的间断均衡现 象,表现为民众获得感与发展绩效两者间平衡和突 变共存。图 1 和图 3 显示两组对比数据在 2002 年 至 2011 年期间都表现为平稳发展状态,获得感与 发展绩效呈现均衡现象。但都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 出现剧烈变化,这种间断均衡的出现可能与制度因 素、政治因素有关。第五,基于客观获得的民众主 观感受存在一定的认知路径依赖, 表现为主观感受 受过去一段时间发展绩效影响。个人认知和观念的 形成与过去一段时间获取的信息密切相关,如图 2 居民收入增长率在 2002 年至 2009 年期间有明显回 落,由此人们倾向于形成个人收入并没有达到预期 的主观判断。而民众个人会因其认知和观念造成的 路径依赖,难以及时接受新信息的动态变化,如居 民收入增长率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出现显著增长, 但民众个人会因其认知和观念,做出与客观事实不 相吻合的判断。由此,我们发现将国民经济民众感 受与发展绩效的数据匹配后, 出现了两者间的多重 差异,结合已有分析框架,实现了其内在逻辑的学 理分析和探讨。

(三) 灰色关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予以检验。以四次测量的民众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作为灰色关联分析的参考指标,以宏观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对比分析指标,计算它们在不同滞后状态下的灰色相对关联度。由表2可知,从2002到2015年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绩效指标对民众感受的带动作用明显,不同对比分析指标与国民经济主观感受的关联度均接近0.8,说明曲线之间



图 1 国民经济主观感受和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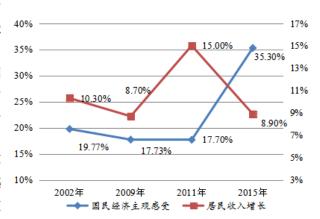


图 2 国民经济主观感受和收入增长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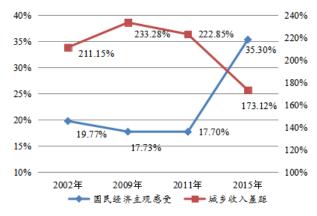


图 3 国民经济主观感受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

变化趋势非常接近。因此,总体来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民众个人收入持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对增进国民经济获得感起到了显著积极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人民获得感与客观收益之间存在相互预测关系和滞后效应。

(四) 消解现实困境的路径探讨

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入顾客满意理念,使传统政府绩效衡量指标转向以人为本的政府满意度,逐渐形成从个体态度和行为分析公共管理现象的新视角。^①在"政府行为—公众体验"双向互动模型下,民众

① Grimmelikhuijsen Stephan, et al.,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bining Insights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sycholog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77, no.1, 2017.

表 2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数据名称	国民经济主观感受	宏观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
2002 年	19.77%	8.40%	10.32%	211.15%
2009 年	17.73%	8.90%	8.70%	233.28%
2011年	17.70%	9.00%	15.02%	222.85%
2015年	35.30%	6.40%	8.90%	173.12%
均一化处理	17.7	8.4	11.00%	200.00%
差值绝对值 Δoi(k)		0.173129	0.307858	0.0611992
		0.057829	0.210786	0.1647051
		0.071429	0.365455	0.11425
		1.232446	1.185259	1.1287503
关联系数 ξ (Xi)		0.8922	1	0.853931
		1	0.8580322	1
		0.838565	0.921826	0.980223
		0.451893	0.369479	0.364615
关联度 r _i		0.799692	0.795664	0.7873343

会基于政府服务供给和决策行为,形成感知上的体验和满意度。^①公众感受结果可以有不同指标衡量,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民众良好的体验是获得感形成的重要来源,具体包括客观获得、主观感知和民众期望。而现实中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也可从管理心理学视角对其加以解释。宏观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产生的效果要落实至微观个体,普遍会存在延迟,甚至无直接影响的结果。^②面对人民获得感主观层面与客观层面的时滞效应,如何规范和引导各主体的责任与意识,保障人民获得感的实现,是未来改革的"着力点"。从政府主体来看,政府一方面需要切实回应民众期待,实现政民之间的互动、沟通,努力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增强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不能忽视公众参与,^③了解并吸纳民众诉求,努力实现政府管理精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才能有效改善民众感受。

从公众客体来看,要实现以预期管理引导社会心态。一是要理性看待政府绩效的主客观评价差异,由于民众感受具有滞后效应,同一时期民众的获得感指数并不能非常精准地反映该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现实中,主客观指标存在反差,民众基于感性认识容易产生对政府绩效的不合理判断。民众没能直接感受到国家整体宏观发展成果,可能是由于两者间复杂的作用关系,导致绩效效果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作用于微观个体。二是要合理设定个人预期,^④民众基于客观收益做出对未来的预期,同样的绩效产出会由于民众的不同目标期待而产生不同满意度。^⑤引导民众做好个人预期管理,可将其视为客观获得与民众感受之间的调节变量, ^⑥通过关注、引导公众对未来经济形势

① 张书维、李纾:《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1期。

② Alfred Tat and Wonhyuk Cho,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Police Performance: A Large-Scale Survey Stu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77, no.2, 2017.

③ 范柏乃、金洁:《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④ Anders Filtenborg, Gaardboe Frederik and Sigsgaard Jesper, "Experimental Replication: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vol.19, no.9, 2017.

⑤ Jacobsen Rebecca, Snyder Jeffrey and Saultz Andrew, "Understanding Satisfaction with Schools: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25, no.3, 2014.

⑥ Poister Theodore and Thomas John, "The Effect of Expectations and Expectancy Confirmation/Disconfirmation on Motorists' Satisfaction with State Highway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21, no.4, 2011.

的合理期待,^①影响公众预期的形成。值得强调的是,当前国家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绩效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回落逐渐趋于稳定,政府需要依据发展绩效的变化趋势,动态影响民众的目标预期; 民众自身设定合理的目标期望,才能有效避免失落感,从而保持较高水平的获得感。

五、结论与展望

获得感的形成包含客观获得、主观感知和民众期望等层面,而客观收益与民众感受之间的不同步、不匹配,一直是困扰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难题。探究清楚民众美好生活期待与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能够更加准确把握人民获得感的本质内涵和特征,进而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改善人民获得感。笔者在已有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人民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作用机理模型,收集了 2002 年、2009 年、2011 年和 2015 年国民经济发展绩效与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数据,在纵向时间序列上,呈现了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的变化趋势、相关特征和外在差异,并辅助以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量化检验。本文发现:(1)人民获得感中的民众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线性相关,而是具多重特性的复杂关系;(2)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相互预测效应,在 2002 年到 2015 年间,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提高、城乡差距缩小三项对比分析指标与国民经济主观感受的关联度均接近 0.8,说明曲线之间变化趋势非常接近;(3)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潜后效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效需要经过较长滞后期才能明显作用于微观个体;(4)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复合累积效应,经济发展成果显著,需维持一段时间的较快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程度复合作用下才能激发民众感知和认同程度;(5)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的断均衡效应,表现为两者平稳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共存;(6)国民经济主观感受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路径依赖效应,表现为民众感受会受过去认知和观念的影响,造成与客观事实不相吻合的判断。

国民经济发展对人民获得感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更快、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有其现实意义。但为避免现实困境的出现,一方面,民众应客观衡量自身收益,同时面对国家发展步入"新常态",应设置自身合理预期,谨防不合理期待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同时还需努力实现精准治理,提供更为精细化的民生服务,让民众有切实收益。另外,本文使用的数据、观测时间或测量次数存在一定不足,今后可延长追踪时间、增加测量次数,以期能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满足程度与发展绩效间的内在联系,增强研究解释力。

责任编辑:王冰

① 杨宜勇:《预期理论的拓展与创新——从心理预期引导到经济预期干预再到社会预期管理》,《社会科学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经济学 管理学

・"十四五"区域与城市发展・

主持人: 张可云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尺度探讨

张可云 何大梽

[摘 要]区域协调主要包括确定空间尺度和制定协调手段两方面内容。对于前者而言,我国虽然已经围绕四大板块制定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但仍未形成实现区域协调具体目标的适宜尺度,以"单纯促进板块之间的协调作为中国区域协调着力点"的事实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这种基于单一尺度的区域协调,是我国区域分化态势依旧严峻的原因之一。为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区域协调发展尺度类型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构建一个以"板块间协调构筑蓝图性指引,问题区域协调把控政策方向,城乡协调保障精准施策,城市群协调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多尺度综合框架。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 空间尺度 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74-09

区域协调发展是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必须追求的目标。区域协调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空间尺度,二是协调手段。后者通常是指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包括旨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区域政策和规划等。前者则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所谓空间尺度,是指政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有目的地划分出的具体空间对象,其有范围大小之分,而且单一标准的空间尺度不能满足区域治理的要求。空间的划分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其通常取决于划分的目的以及空间的属性和特征,如美国 BEA 经济地区(Economic Areas,EA)划分以及欧盟的标准地区统计单元目录(Nomenclature of Territorial Units for Statistics,NUTS)的划分标准就不尽一致。^①区域协调必须兼顾这两方面的内容,而就实际操作难度而言,决策层不难制定出较好的协调手段,但要确定适宜的空间尺度并非易事。

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大部分已有研究都是讨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协调,如杨敏(2005)从可持续发展、发展能力、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六方面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国家宏观调控绩效、大力推进和深化区域合作的建议。^②事实上,东、中、西部的均衡发展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的蓝图性谋划。关于中国区域协调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基于"三大地带"或"四大板块"的大尺度区域

作者简介 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何大梽,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① 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166-172页。

② 杨敏:《区域差距与区域协调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框架,并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而形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体内容。在这一 过程中,有很多学者研究了如何在既定的大尺度空间划分下实现协调发展,而少有学者去研究适宜协调 发展的空间尺度。在早期关于"空间"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问题区域(主要指落后区域、 膨胀区域和萧条区域) 的角度出发, 政府通过有目的的调控, 有重点、分阶段地协调区域关系并促进各 种类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① 由于在每个板块中都能找到这三类问题区域,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是 对四大板块划分的突破。陈栋生(2005)在全面论述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将空间尺度正式划分为 三大类: 首先是区域政策覆盖区,泛指四大板块;其次是政策点击区,主要是指一些问题突出的单独 区域,如资源型城市、生态保护区等;最后是经济合作区,主要是指通过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来实现各 主体互利共赢的空间区域,具体包括都市圈、跨地带的大区域和多省接壤地区等。②这种划分为区域政 策工具的使用提供了更多参考,进而提高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尺度多样性。随着"都市圈""城市 群""经济带"等新的空间表现形式的出现,一些学者重新思考了中国区域协调的空间格局。例如,覃 成林(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和治理机制构 成的有机整体,主张在空间组织机制中构建多极网络的空间组织体系;^③ 张可云(2018)将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定义为"两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三核"(落后区域、膨胀区域与萧条区 域)与"四从"(新型城镇化战略、陆海统筹战略、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从内容主体、 空间识别和战略实施三方面概括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总之,空间尺度的选择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在其具体实施时还需要深入地讨论与完善。

在研究现实问题时,西方经济地理学者十分重视空间尺度。新经济地理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提出,⑤它虽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的缺陷,但受"解释统一"(explanatory unification)这个一般方法论标准的制约,却将空间尺度问题置之不理。因此,自新经济地理学诞生之日起,便有不少西方国家经济地理学者对其提出了尖锐批评。例如,马丁·博迪(Martin Boddy)指出,新经济地理学因其模型构建需要而无法处理好空间尺度问题;⑥罗恩·马丁(Ron Martin)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既不那么新,也不是经济地理学,只能称之为地理经济学而不能叫新经济地理学。⑥乔舒亚·奥尔森(Joshua Olsen)更具体地指出,克鲁格曼及其他地理经济学家利用相同的模型解释大都市区层次、区域层次与国际层次的集聚,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弄清楚哪些机制对哪些空间尺度更重要。⑧西方学者的这场争论有益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清楚空间尺度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分化问题日渐凸显,为了防止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态势的扩大,中央适时提出了若干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政策和规划。然而,到目前为止,区域分化的态势依然明显(见图1)。从宏观层面讲,无论是三大地带的划分还是四大板块的划分,都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构筑了清晰框架。但在区域战略具体实施时,板块的空间尺度依然过大,并导致了板块带动板块的协调方式收效不佳。这也说明,无论制定出多么好的协调手段,若没有制度落地和精准施策的适宜尺度作为支撑,则依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不能仅仅建立在单

① 胡乃武、张可云:《统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第1期。

② 陈栋生:《论区域协调发展》,《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③ 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④ 张可云:《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与区域协调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⑤ 学术界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是克鲁格曼于 1991 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参见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 no.3, 1991, pp.483-499.

⁶ Boddy M., "Geographical Economics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 A Critique", *Urban Studies*, vol.36, no.5-6, 1999, pp.811-842.

② Martin R., "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3, no.1,1999, pp.65-91.

⁽⁸⁾ Olsen J., "On the Units of Geographical Economics", Geoforum, vol.33, no.2, 2002, pp.153-164.

个标准的尺度基础上,而应是多维尺度的协同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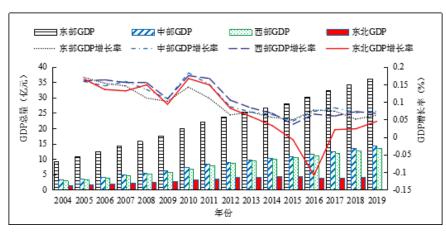


图 1 四大板块 GDP 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中国现有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尺度类型

(一) 大而泛的空间尺度类型

所谓大而泛的空间尺度,是指在中国全域层面根据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进行的大范围空间划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该类空间尺度划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 2003 年之前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二是 2003 年之后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板块(亦称四大战略区域)的划分。这两种划分都是基于经济水平、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中国全域空间的分类识别,其相同点是都旨在解决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不协调关系,不同点在于前者的划分标准是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的结合,如将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沿海省份也纳入东部沿海地区;后者的划分基本上只考虑了经济因素,如将东北地区单独划分出来,同时剔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省份。目前,基于四大板块构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凝聚了各界的共识,板块之间的协调成为了实现区域协调的重点。毫无疑问,四大板块的划分具有极强的蓝图性指引作用,勾勒出了各板块所存在的主要区域问题,我国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针对性战略措施。同时,四大板块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配套"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雄安新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的空间联动作用,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以板块协调带动全域协调"的主流框架。

然而,基于上述框架的区域协调发展并未产生明显效果,不仅板块之间的分化依然较大,而且南北的分化也日渐凸显。事实上,不管是板块的划分还是针对性战略和各种联动机制的提出都是无可厚非的,空间分化依旧显著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区域协调战略并未得到区域政策和规划的有效支撑,大尺度空间的联动或协调战略的制定往往只是方向性把控,其最终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依靠具体的政策和规划;二是四大板块内部也存在着明显发展差异,使得单一政策或规划无法在板块尺度上施行,需要分析板块内部子单元的发展特征并进一步细分。因此,在现有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框架下,如何使区域政策和规划精准落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四大板块的划分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但它不适用于具体协调目标的实现,其泛 化且异质的空间无法给区域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提供具体抓手。因此,有必要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根据不 同类型的区域病特征对空间进行划分,即识别问题区域。

(二) 问题区域空间尺度类型

问题区域的识别以区域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任何区域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都会

经历从年青到成熟再到老年的演变过程,^① 在不同阶段也会面临着不同的区域问题和不完全一样的要素流动样式,不同区域在空间发展格局中所处的竞争地位也不同。将区域生命周期理论与区域病理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划分出四类新常态区域,即现代化前区域、年青区域、成熟区域与老年区域。其中,只有年青区域不存在突出的问题,^② 其他三类区域都存在典型的区域病。具体而言,这三类区域病可以被概括为"穷""堵"和"老"(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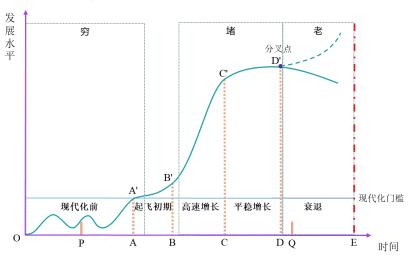


图 2 区域生命周期示意图

"穷"是指现代化前区域的区域病,这类区域的发展水平较低。就区域内部而言,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缺乏支撑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产业,人均收入低下,基础设施不健全;就区域间而言,要素净流出严重。在四大板块中,这类区域主要存在于广大西部地区中,但在其他板块中也能找到此类区域,如东部的河北环京津贫困带、海南五指山地区,中部的罗霄山区、太行山地区与鄂豫皖地区,东北的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等。

"堵"是指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成熟区域的区域病,这类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且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处于主宰地位。从区域内部来看,人口与经济活动的过度集中已经导致了生产生活成本上升、拥堵、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集聚不经济问题,同时还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趋于老化、环境趋于恶化等迈向萧条泥潭的种种特征。从区域间来看,这类区域对于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的掌控力,是要素和各类资本的主要输出地。在四大板块中,东部地区整体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中部(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西部(成渝地区等)和东北的较发达地区(辽沈、哈长地区等)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老"是指优势丧尽的老年区域的区域病,这类区域的经济结构严重衰退,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具体而言,其在区域内部表现为支柱产业落伍且竞争力下滑,结构老化且转换乏力,失业率较高且生活 水平逐步下降;区域间表现为大量的企业和人口外流。在四大板块中,老年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 但在东部(淄博、邢台、韶关、徐州等)、中部(岳阳、襄阳、开封、马鞍山、景德镇、大同等)和西部(包 头、石嘴山、克拉玛依、攀枝花、自贡、遵义、天水等)地区同样存在这类区域。^③

根据上述三类区域病,我们可以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划定出特点更加鲜明、问题更加明确、尺度相

① Thompson J. H.,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Manufacturing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vol.42, no.4, 1966, pp.356-365.

② 年青区域是发展活力十足的要素净流入区域(如21世纪前的深圳与即将建设的雄安新区),不存在突出的区域病, 大范围区域环境变迁或中央决策重视使得这类区域的区位优势或政策优势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③ 详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3年3月18日发布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该规划划定的老工业基地包括95个地级老工业城市和25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市辖区。

对较小的问题区域。由于主要病症与成因大同小异,患有同类区域病的不同区域适宜实施区域政策。然而,这仅仅是明确了对各类区域进行政策干预和规划指导的界线,一些细节性指导问题依然有待明确。例如,对于不同穷困地区而言,由于穷困程度存在差异,虽然政策大方向一致,但其需要的干预力度是不一样的。为此,在问题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空间的划分。

(三) 细分的空间尺度类型

1. 城乡尺度类型。"城乡关系"是中国最基本的空间关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具体而言,"城乡"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城镇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前,中央政府根据当时的现实条件制定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的发展路线,使得城镇化进程并未得到有效推进。截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率仅仅为17.24%,① 较1949年仅提高了6.6%,而同期的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7.7%。中国的区域不平等,在大空间尺度上表现为四大板块之间的发展分化,在小空间尺度上则反映为板块内部各类问题区域中以城、乡为基本单元的分化,具体包括"城城分化""乡乡分化"和"城乡分化"。这是由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决定的。其中,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举措。因此,在问题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空间细化为城市和乡村。一方面,二元尺度的空间划分使得协调的对象更加清晰和具体,容易被分辨和识别。虽然行政区划调整会使得部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在空间范围上产生变化,但这种人为的调整能够通过协商来对特定地区的区域政策进行事前调整,可以降低事后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城乡的划分将有效地解决精准施策的问题。问题区域尺度决定了区域政策的大方向,但无法解决由其内部差异引起的在干预力度上的异质性问题,这一问题往往反映在以城和乡为基础的差异上。

2. 城市群尺度类型。城市群是由一组行政级别不同、资源禀赋各异、人口规模不一、经济水平分化 且地理邻近的城市组成的空间尺度, 其内部至少有一个超大型城市或者多个大型城市作为辐射带动群内 其他子城市的核心,这些城市彼此之间构成了1小时通勤圈的空间范围,即都市圈②形态。相对于周边 区域而言,城市群具有较高的一体化特征和经济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为城 市群在全国布局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中国城市群的出现时间比这个概念的提出时间更早。20世纪80 年代初到90年代末,随着东部沿海城市的快速崛起,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初具城市群规模,随后在珠 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也形成了两大城市群。③然而,当时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刚开始进行,经 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较低的城镇化率并不满足提出"城市群"这一概念所需的客观条件。在这段时间里, 中央政府通过允许农民工进城来促进劳动力向优势地区集聚,实现了城市数量增加(主要是中、小城市) 和城镇化率提升。中小城市从1978年的153座增加到1998年的583座,数量和人口各增加了2.8倍和2.6 倍。④至此,在前两个阶段城镇化进程的积累下,中国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第三阶段城镇化。2006 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 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 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⑤"城市群"一词首次出现在"五年规划" 的纲要中,正式表明中国的空间格局逐渐进入了城市群时代。城市群几乎遍布全国,逐渐在各个区域形 成了带动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增长极、为扩大内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二、新发展格局对区域协调发展空间尺度的要求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下同。

②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都市圈被定义为"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③ 方创琳:《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城镇化与城市群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展望》,《经济地理》2018 年第 9 期。

④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⑤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国际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经济下行压力激增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阻力。为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在 2020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是面对发展环境突变的一次战略调整,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预示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种战略调整无疑会促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也表明新时代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将迎来进一步的嬗变。新发展格局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来抵御外部的冲击,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协调发展将更加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作用,这对不同空间尺度间的协调提出了新要求。

(一) 以板块间协调带动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

四大板块间的协调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性指引。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必须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①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指引下,在"区域""省域""市域"和"县域"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地区强化分工、联系与合作,促进要素在国内区域间充分流动,打破区域间原料大战与市场封锁或分割,畅通不同尺度空间单元间的大循环。使国内不同地域单元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国内区域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为此,需要完善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区域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二) 以问题区域间协调释放内需潜力

"穷""堵""老"三类问题区域是发展不充分在空间上的表现,而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问题区域与发达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区域发展问题的核心在于聚焦"穷""堵""老"。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聚焦于这三类区域,一方面可以明确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着力点,另一方面还可挖掘出巨大的消费与投资潜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增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重视这三类区域的作用。从战略区域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潜力最大,是中国最大的回旋余地。2020年上半年,在中西部地区18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南、湖北、陕西、山西与内蒙古等5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负;在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6个是正增长,其中13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数据表明,在面对重大冲击时,中西部地区抵御冲击的能力要强于其他地区。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潜力较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该重点布局于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聚焦"穷""堵""老",是从总体上解决国家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抓手。

(三) 以细分尺度间协调形成巩固内需的增长极体系

一方面,要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通过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来进一步释放农业农村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经济核心区域已经形成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带动作用,培育覆盖全国的增长极体系。由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地区是中国目前的经济重心,这四大城市群和菱形的几何中心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扩大内需与自主创新的领头羊。这些核心城市群与都市圈不仅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内需,而且负有带动整个国家发展的重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的实施,将优化已有增长极并催生新的增长极。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空间尺度框架的构想

"十四五"规划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顺应新的时代要求,中国应当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本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框架下,配套"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轴带引领作用,结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要求,实现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根据前文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推进需要战略层面、政策方向把控层面和政策实施层面的多维支撑。这表明,单纯在一个空间尺度上讨论区域协调发展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为此,"十四五"规划有必要构建旨在扩大内需、促进区域协调的空间尺度框架,明确不同尺度的空间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 以板块间协调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性指引

四大板块的划分不仅勾勒出了中国整体发展"东强西弱"的基本特征,还奠定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基调。根据该基本特征,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东、中、西联动的大政方针,如鼓励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有序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积极引导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与重构等。"十四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四大板块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蓝图性指引作用,在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推动四大板块发展。

- 1. 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自 1999 年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整体发展水平 的较大飞跃,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以及创新水平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作 为中国面积最大且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板块,西部地区的发展仍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对外经济联系 水平还有待提高。西部地区虽然受益于政策倾斜和自身要素成本优势,承接了部分产业,但与中、东部 地区的产业关联水平仍较低,整体上仍未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西部地区,由于部分区域生态环境恶 劣且生态修复能力脆弱,一些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进入难度加大,提高了形成"东中西产业 高度关联、经济良性循环"格局的难度。此外,西部沿边地区与俄罗斯、蒙古、中亚地区、南亚和东南 亚等地区在边境经济合作、跨境产业布局、跨境旅游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但其目前整体的开放水平较 低。第二,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分化日趋显著,主要表现为西南和西北的分化。西南地区依托长江黄金水 道和成渝城市群等多重有利因素,拉大了与西北地区在发展条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推动 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需要在三方面着力。一是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布局。以绿色发展为前提,积极承 接中、东部地区相关产业,主动布局新兴产业,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业态;二是推进西部沿边地 区开放发展。主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加强西部与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如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体化建设等;三是推动西南西北协调发展。主要推动成渝双城经济 圈建设,配套关中平原、宁夏沿黄、兰西等多个城市群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 发展的增长极体系。
- 2. 推动东北振兴新突破。东北老工业基地萧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其内部产业结构老化造成创新与增长乏力;二是外部新兴产业冲击,如新兴资源城市的崛起会使以资源产业为主的传统老工业基地在市场中丧失竞争力。因此,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必须从内外部着手。一方面,加快老工业基地内部老化产业结构的转型或重组。对于老化时间不长且萧条不严重的地区可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来实现经济复苏,而对于优势丧尽且极度萧条的地区则需要通过产业重组来恢复活力;另一方面,对外扩大开放。发挥东北毗邻东北亚的地理优势,主动承接或引进日本、韩国的先进产业,将外部的竞争转换为合作,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进而摆脱萧条泥潭。
- 3. 加快中部地区的崛起。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对于国家区域战略实施具有联东带西的作用。目前,中部地区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存在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和内部恶性竞争等现象,产业布局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其次,开放力度不够,招商引资局限于东部地区;最后,中部地区各省的发展没有形成有效的聚合力,如安徽依附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江西和湖南依附于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因此,加快中部地区的崛起,一方面要优化产业布局,拓宽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理范围,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形成中部六省之间

一体化发展机制。

4. 加速东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行区域,部分区域已经初步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如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然而,东部大城市的过度集聚问题依然未解决,存在明显的以拥堵、污染和高房价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病。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产业调整造成的经济利益短期损失,部分地区有意降低产业转移效率,使得产能疏解过程缓慢。因此,加速东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要对发达地区的非核心功能进行有效疏解,带动人口和各类要素的流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为缓解大城市病提供经验);另一方面要提高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的效率,尽快转移与现阶段发展不相匹配的产业。此外,东部地区还要利用沿海优势进一步全方位开放,以引领全球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为目标,强化国际交流和规则对接,提高国际影响力。

(二) 以问题区域协调把控区域政策方向

问题区域的划分建立在标准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可以将其分为"穷""堵""老"三种类型,具有相同特征的问题区域往往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且问题表现形式类似。因此,每一种类型的区域都有着明确的政策导向,在不考虑问题区域内部异质性的情况下,可以确定适应不同区域病的基本政策方向。首先是"穷"区域的政策方向。扶持"穷"者的政策应落脚于促使其加快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或服务业社会,最终步入现代化轨道。其次是"堵"区域的政策方向。扶持"堵"者的政策重点在于促使其通过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吐故纳新,永葆经济发展活力。最后是"老"区域的政策方向。扶持"老"者的政策应倾向于帮助其通过产业转型或重构,重振昔日雄风,最终目标是恢复往日活力和地位。21世纪初就有学者呼吁明确问题区域划分,^①但时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将其提到决策议事日程。"十四五"规划纲要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区域划分方案,以明确未来区域政策的空间尺度。

(三) 以城乡协调明确精准施策着力点

城乡的划分突出了问题区域内部的异质性,在确定区域政策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施策力度、施策范围以及施策效率的问题,奠定了区域精准施策的基础。首先是施策力度的确定。在同一个问题区域内部,城乡的划分反映了"患病"轻重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城城""乡乡"和"城乡"之间的差异。这无疑明确了区域政策的空间识别,可以根据空间的不同类型、问题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相应的施策力度。其次是施策范围的确定。通常而言,城和乡的空间范围都是固定的。即使部分城、乡的空间范围会随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但政府也能相对容易地确定调整后的具体范围。因此,城乡的划分使我们能够确定具体的施策范围,让政策工具精准落地。最后是施策效率的评估。效率评估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其中,事前评估主要说明区域政策的合理性,事中评估主要是监督规划与政策的落实过程,事后评价是对区域政策的效应和效率的全面评估。毫无疑问,城乡的划分让上述三个阶段都能找到具体抓手。

(四) 以城市群协调促进国内大循环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的核心要义就是扩大内需,即充分依托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城市群作为核心空间尺度,其经济体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目前,城市群的发展在中国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均衡态势,沿海地区的城市群已经迈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还不具备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由此可见,城市群发展潜力巨大,它将成为扩大内需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主要着力点,"十四五"期间有必要确定城市群发展的规章制度、布局和协调路径。

1. 建立并完善城市群发展的规章制度。"城市群"作为国内需求潜力最大的空间尺度,其在管

① 张可云:《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1年, 第517-518页。

理体系、构成城市数量等方面的具体问题都需要一套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来解决。第一,要明确城市群管理基本制度。城市群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其往往涉及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如何管理和谁来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要严格规范城市"入群"条件。"城市群"是一种高级别的空间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并不是每座城市都可以"组群"。在确定入群城市的时候,需要遵循市场的一般规律,结合城市的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多种指标,坚决避免某些并不具备相关条件的城市为了获取更多"政策红利"而盲目人群的行为。

2. 推动和形成城市群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城市群为主要增长极的空间格局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鉴于中国国土辽阔且异质情况明显的事实,我们十分有必要在全域层面培育多个适宜各地发展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并不一定需要形成很大范围的集聚,但一定要科学地分散至全部国土空间。从空间范围角度来看,城市群就是一个良好的协调区域发展的空间单元。一方面,任何区域的城市群都是由当地相对发达的城市所构成,在集聚程度、要素流动效率、研发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另一方面,城市群的辐射范围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即以中心城市为源头向外围腹地逐层扩散,这相较于以往板块之间的联动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事实上,中央在"十三五"期间就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的发展方向,但是在规划中的城市群基本上分布在中部、东部、西南和东北地区,而西南的西藏和广大西北地区城市群数量还相对较少。在"十四五"时期,城市群的发展和布局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基本形成"多级引领,全域扩散"的空间格局。

3. 构建城市群发展的协调路径。首先是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主要指都市圈与其腹地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意味着要将城市群发展成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分工明确以及市场、交通、治理等全方位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让城市群成为带动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区域增长极。其次是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发展。分散在全国且发育良好的城市群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连接,形成东西交错、南北通达的城市群轴带,带动轴带经济发展。最后,由城市群轴带在空间形成的网状结构带动全国高质量协调发展。概括而言,这三个步骤可以概括为"点一轴一网"高质量协调发展路径。目前,中国还处在第一步的阶段,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十四五"期间,应大力推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力争走好既能扩大内需又能支撑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一步。

四、结论

"区域协调"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在何种空间尺度下进行协调",其二是"如何协调"。中国虽然已经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制定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但对于协调尺度的要求还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这也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区域发展分化现象依旧突出的原因之一。为此,本文较全面地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尺度要求。首先,归纳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尺度的类型,由大到小分别为板块尺度类型、问题区域尺度类型和以城乡或城市群为主的细分尺度类型;其次,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探讨了上述不同尺度的作用;最后,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空间尺度的构建进行展望,按照由大到小的空间尺度提出了以"板块间协调构筑蓝图性指引,问题区域协调把控政策方向,城乡协调保障精准施策,城市群协调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多尺度综合框架。

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进而实现全国的一体化发展。支撑该目标的尺度基础不能仅仅是单一的空间尺度,我们需要在总结归纳出一般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空间进行合理分解,完善对问题区域和标准区域的划分,形成多维尺度协同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本文在此方面只进行了初步的方向性探讨,具体空间尺度划分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张超

①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十四五"期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研究*

孙久文 林丽群 傅 娟

[摘 要]"十四五"期间,我国反贫困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点是巩固"精准扶贫"取得的成果,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发生率下降、贫困 县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等。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过渡期,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探索和建 立与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反贫困战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有利于低收入人群 收入增长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社会各界更多的人参与对低收入人口的扶持与帮助等。借鉴国际标准,本 文测算得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合理的农村相对贫困线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且由 于城市贫困问题尚不急迫,加上财政压力较大,农村的贫困人口问题仍是我国扶贫政策的重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需要重点从基本公共服务、产业与就业、绿色发展、国家扶持与社会参与等四个方面着手,并 且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措施可能需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常规性帮扶措施。

[关键词] 脱贫攻坚 脱贫成果 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线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1) 01-0083-0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反贫困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文拟从我国反贫困长期战略的角度,分析"十四五"期间的反贫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十四五"时期反贫困的形势与目标任务

一般认为,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是一个必然趋势。我国从 2013 年启动的旨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精准扶贫"战略,到 2020 年底完美收官。2020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将是我国反贫困战略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过渡期。按照中央的部署,过渡期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一)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虽然都是针对贫困问题的概念,但二者在内涵上和标准上有着较大区别。

在大部分研究中,对绝对贫困的测度多使用收入与消费等货币尺度。绝对贫困是指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维持其居住和温饱等最低生存需求。2008年,世界银行根据 15 个最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标准,确定每天 1.25 美元的标准为极端贫困标准,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贫困标准的中位数,确定每天 2 美元的标准为高贫困标准。2015年,世界银行又将每天 1.25 美元的标准提高到每天 1.9 美元。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减贫战略研究"(20JJA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林丽群,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傅娟,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45)。

衡量相对贫困则不使用收入与消费等货币尺度。相对贫困是指某个人在食品、住房等需求满足,以及健康、娱乐和社会活动等方面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都少于社会正常群体,与其他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的平均生活水准有差距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些人群所拥有的生活和生产的资源少于社会其他的群体,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也就是说,这部分人的收入已经能够达到解决温饱的要求,但如果更多地考虑社会需求和人力资本的教育需要,他们就还是贫困人口。如果加上公共环境卫生和文化设施等社会福利内容,他们的获得感就更差一些。多数欧盟和 OECD 国家都使用相对贫困线,常用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50% 或 60%。

我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起步于农村减贫。1978年中国就开始实施"以工代赈"的扶贫战略,使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普遍贫困的状况得以改善,经济发展对脱贫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在农村普遍的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之后,1994年国家制定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扶贫进入了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的攻坚阶段,同年国家划定了 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简称贫困县)。2000年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两不愁、三保障"^①扶贫标准;2010年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 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 10年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扶贫思路,"精准扶贫"成为新的扶贫战略;2015年 10月 16日,习近平在 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②和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

(二) 当前反贫困的形势与面临的挑战

从演化过程来看,"十四五"时期的重点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5年之后,反贫困的重点将转到缓解相对贫困上面来。

- 1. "精准扶贫"的成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点是巩固"精准扶贫"取得的成果。近年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取得了巨大成效。第一,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发生率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9000万人。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只剩下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为0.6%,2020年底实现整体脱贫。第二,贫困县摘帽。经过5年时间,通过分期分批的考核与评估,832个贫困县于2020年底全部摘帽,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第三,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减贫任务完成之后,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将不存在,反贫困的区域重点将转到"三区三州"。③
- 2. 当前面临的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要是应对贫困人口收入的不稳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的挑战。第一,脱贫人口返贫的挑战。虽然我国目前在总体上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总体上的收入水平仍然比较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依靠国家的政策支持。这种脱贫人口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增加收入的能力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一旦出现减产减收的情况,十分容易返贫。第二,老年人口贫困的挑战。老年人口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健康和精神层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能,更加依赖政策帮扶。减少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和防止返贫高度相关,2020年后进一步完善基础养老金改革对缓解农村老年人口贫困至关重要。第三,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偏低的挑战。越是低收入的劳动力,其受教育的年限与全国平均差距越大。教育水平偏低影响了农村人口对就业的适应能力、对生产中新工艺和新方法的接受程度。第四,因病返贫的挑战。防止因病致贫和返贫是"十四五"期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艰巨的任务。据估计,2020年后在贫困人口中仍有60%以上的大病患者需要长期维持治疗或康复治疗,如果政策支持减弱,其中的低收入家庭很有可能出现因病致贫和返贫的现象。此外,农村中流行的慢性病、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都会导致返贫,医疗卫生扶贫政策需要延续。

① "两不愁、三保障"指不愁吃不愁穿, 住房、医疗和教育有保障。

② 2020年11月25日,伴随贵州省最后一批贫困县摘帽,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③ "三区"指南疆四地州、西藏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的藏区;"三州"指云南怒江州、四川凉山州和甘肃临夏州。

- 3. "两线合一"的困难。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和"低保"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因此,有人主张 2020 年之后用低保来代替扶贫完成后的反贫困任务,主张"两线合一",即低保线和贫困线合一。从 2019 年的情况看,全国 2800 个县的低保加权平均标准是 5335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6021 元,低保标准刚好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3.3%,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困标准是 3218 元,占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1%。也就是说,当前的低保标准要大于绝对贫困的标准。低保标准最大的特点是以省份为基本单位来确定,与绝对贫困线的全国标准在基本功能、制定方法、衡量与检测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联系到当前低保和扶贫的部门管理模式,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尚不具备"两线合一"的基础,即用低保来代替扶贫目前不具有可行性。
 - (三)"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任务
- 在"精准扶贫"任务完成之后,我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过渡期。在这期间,需要完成一系列任务。
- 1. 探索和建立与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反贫困战略。第一,要延续保证脱贫人口收入持续提高的政策。2020年后的过渡阶段,我国刚刚实现绝对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减贫工作进入循序渐进的巩固提升阶段。"十四五"期间贫困治理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是农村低收入户中处于贫困边缘的主要目标人群的收入要有明显增加;二是农村脱贫人口中的相对困难人群要尽快摆脱困难现状;三是老年人群和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通过低保和社会救助等途径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更长期的政策设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把社会公平和地区公平建立在对低收入人口的帮扶基础上,是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第二,要建立涵盖"边缘人口"的普惠性的政策。帮扶政策还应覆盖贫困的"边缘人口",即收入略高于贫困标准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前期没有享受国家的政策支持,收入提升较慢,有些人的收入可能已经低于前期脱贫人口。政策的普惠性十分重要。第三,要建立区域瞄准的新标靶。相对贫困是一种长期性的贫困现象,需要长期的反贫困战略。"十四五"期间,我国向缓解相对贫困战略转型,在过渡期仍然有一个区域瞄准问题。建立区域瞄准的新标靶,需要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出发,区域的工作重点仍然以县级行政区为主要空间尺度,"脱贫不脱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县域行政区。用"低收入地区"来描述未来的相对贫困所分布的地区,可以彰显我们的"精准扶贫"的成果,也可以对长期的反贫困战略形成一个区域范围的约束。
- 2. 巩固产业扶贫措施,拓展产业扶贫效果。我国脱贫攻坚的成果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靠产业扶贫取得的,已脱贫的贫困户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各种产业帮扶。在产业扶贫中,"扶贫车间"起到了重要作用。"扶贫车间"是指以扶贫为目的,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为宗旨,开设在贫困地区的加工车间。扶贫车间设立的目的是吸纳农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业,就地增加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通过在扶贫车间的工作,贫困人口能够提高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外出务工或者自己创业打下基础。在中西部地区,这类扶贫车间极为普遍,数量众多。然而,"扶贫车间"属于通过发展低层次产业来实现就地扶贫的措施,也存在各种问题。一是部分扶贫车间的经营者缺乏经营管理能力;二是产业结构单一,产品生产与销售脱节;三是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四是经营规模小和技术水平低。接下来,"扶贫车间"需要进一步提升。一是按照现代产业发展的规律,把"扶贫车间"融入当地产业链条中,并以当地的产业发展要求来重组扶贫车间;二是挖掘地区优势,立足当地资源,把"扶贫车间"与当地的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文化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进行深度融合;三是注重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技术水准和生产产品的技术能力。
- 3. 保持政策的延续稳定,防止贫困空间转移。第一,继续做好易地搬迁扶贫工作。目前,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基本完成,已进入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的区域调整、搬迁工作继续落实的后续扶持阶段。后续扶持措施重点是贫困人口在前一阶段搬出来的基础上住得下、稳得住和能发展,目标是实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活富裕。需要建立健全搬入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搬迁移民的生活条件,促进移民快速

融入当地社会。对于进入县城和小城镇的搬迁移民,要做好落户和就业安置工作,落实市民待遇。第二,保持扶贫政策的延续和稳定。"扶上马、送一程",是中央对贫困人口脱贫之后的重要政策导向。"十四五"期间保持脱贫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做到脱贫不脱政策,是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保障措施。中央特别强调,对于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要落实"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防止返贫和发生新的贫困。要进一步发挥"精准扶贫"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农村贫困监测体系的作用,对返贫人口、新发生贫困人口以及临近贫困线的低收人人口,分别制定有差别的扶持政策。第三,防止贫困的空间转移。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60%,仍处于城镇化向前推进的阶段。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的贫困农民的工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也会产生新的贫困。需要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防农村贫困人口伴随城乡人口迁移陷入新的城市贫困。

二、相对贫困线的测算与相对贫困人口规模预测

要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应当根据向相对贫困过渡的要求,延续当前的脱贫标准,并制定"十四五"期间的贫困标准。过渡阶段的贫困标准,应当区别于之前的"精准扶贫"的标准,并与2025年后的相对贫困标准靠近。结合理论与实践,2020年后我国应采用以收入标准为主、其他标准为辅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目前,国际上主要有四类关于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是全体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美国以绝对收入作为衡量的基础,并根据不同家庭进行调整;日本以家庭收入十等分组中的中等家庭收入的60%作为衡量基础,并按照家庭成员年龄、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家庭所在地的物价指数等进行调整;墨西哥、巴西等部分拉美国家综合考量收入、就业、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维度来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借鉴国际标准,我国应当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过渡期贫困标准,并以一定年限作为调整周期。下面,我们将通过数据测算对比分析比例为40%、45%和50%时的情况,以及统一设立全国线和分别设立城乡相对贫困线的情况。

(一) 人均收入的测算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21 年《经济蓝皮书》预测,2020 年和 2021 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分别为 2.2% 和 7.8% 左右。^① 假设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2020 年和 2021 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也分别为 2.2% 和 7.8%,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90%。接此测算,2020 年全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预测值分别为 28628 元、38962 元、14736 元。假设相对贫困线标准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45% 和 50%,则全国统一的相对贫困线分别为 11307 元、12721 元和 14134 元。若城乡分别设立,对于城镇而言,相对贫困线则分别为 15585 元、17533 元和 19481 元,高于全国统一线;对于农村而言,比例为 40%、45% 和 50% 时,相对贫困线则分别为 5894 元、6631 元和 7368 元,低于全国统一线。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仍将继续维持。若笼统地以全国为整体,设立统一的相对贫困线,则无法准确识别出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因此,"十四五"期间应当将城镇和农村分开,分别设立相对贫困线,统一城乡贫困标准只是未来方向。与此同时,"十四五"时期是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的时期,相对贫困问题刚刚起步,在设立标准时应注重从绝对标准向相对标准过渡的衔接,因此选取 40% 的比例来设立相对贫困线比较合理,避免了过大差距。

(二) 贫困人口的测算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分为五个等级:低收入组、中间偏下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组和高收入组。假设 2020 年和 2021 年五个等级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改变,且两年的增长率仍分别为 2.2% 和 7.8%;再假设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3.1%和 2.8%,城镇化率分别为 61.9%

① 谢伏瞻、蔡昉、李雪松:《经济蓝皮书: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和 62.8%。基于 2019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对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全国、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数据进行预测,并使用五等分收入数据对洛伦茨曲线进行拟合,再结合人口数据对相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规模进行测算,最终得出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和相对贫困率如表 1 所示。

标准	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的 40%		2020 年人均可 数的		2020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的 50%		
	贫困率	贫困人口规 模(亿人)	贫困率	贫困人口规 模(亿人)	贫困率	贫困人口规 模(亿人)	
全国线	21.40%	3.01	25.60%	3.61	29.40%	4.14	
其中: 城镇	9.91%	0.88	13.63%	1.21	17.08%	1.51	
农村	40.80%	2.14	45.80%	2.40	50.20%	2.63	
城镇相对贫困线	7.20%	0.64	12.70%	1.12	17.60%	1.56	
农村相对贫困线	13.50%	0.71	18.50%	0.97	22.90%	1.20	

表 1 不同方案下的 2021 年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率预测

从表 1 可见,按 40%、45% 和 50% 三个比例,全国线衡量出的 2021 年全国相对贫困率依次为 21.4%、25.6% 和 29.4%,对应的全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依次为 3.01 亿、3.61 亿和 4.14 亿;全国线衡量出的城镇相对贫困人口规模依次为 0.88 亿、1.21 亿和 1.51 亿;全国线衡量出的农村相对贫困率分别高达 40.8%、45.8% 和 50.2%,相对贫困人口规模依次为 2.14 亿、2.4 亿和 2.63 亿。通过对比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可知,在城乡使用统一的相对贫困线会出现识别的不平衡,农村的相对贫困率过高,识别出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将远远超过城镇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十四五"期间我国仍不具备设立统一城乡相对贫困标准的条件,应当对城乡分别设立相对贫困线。当使用城镇相对贫困线来识别城镇相对贫困人口时,不同比例的相对贫困率依次为 7.2%、12.7% 和 17.6%,对应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依次为 0.64 亿、1.12 亿和 1.56 亿。这与使用全国线时识别出的结果相差不大。对于农村而言,使用不同比例的农村相对贫困线识别的相对贫困率依次为 13.5%、18.5% 和 22.9%,对应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依次为 0.71 亿、0.97 亿和 1.2 亿。这与使用全国线时识别出的结果相差较大,农村相对贫困线识别出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人口规模更低,与城镇的结果更加匹配。

(三) 财政压力测算

利用上文拟合的洛伦兹曲线来估算我国在面对相对贫困问题时的财政压力,具体方法是估算贫困缺口。^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388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按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0)》的预测数据,假设 2020 年和 2021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 7.98% 和 7.87%,^②则 2021 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值为 262757 亿元。^③ 在城镇层面,40%、45% 和 50% 三个比例对应的相对贫困线所估算出的贫困缺口依次大约为 5353 亿元、20794 亿元和 45214 亿元,分别占 2021 年总体财政预测支出的 2.04%、7.91%和 17.21%。在农村层面,40%、45%和 50%三个比例对应的相对贫困线估算的贫困缺口依次大约为5261 亿元、11065 亿元和 18687 亿元,分别占 2021 年总体财政预测支出的 2.00%、4.21%和 7.11%。从全国来说,40%、45%和 50%三个比例对应的贫困缺口占总体财政支出的比例则约为 4.04%、12.13%和 24.32%。由于 2019 年全国扶贫财政支出为 5561 亿元,占总体财政支出的 2.3%,因此相对贫困线设定时选取 40%的比例是较为合适的。

① 贫困缺口指的是为消除贫困问题,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转移,使其可支配收入刚好达到贫困线时所需的财政支出。

② 刘尚希:《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5-116页。

③ 2019 年居民消费价格为 102.9 (上年 =100), 假设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居民消费价格不变, 根据增长预测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计算得到 2021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值。

根据上述测算,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合理的农村相对贫困线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且由于城市贫困问题尚不急迫,加上财政压力较大,农村的贫困人口问题仍是我国扶贫政策的重点。

三、"十四五"时期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途径

(一) 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低收入人口在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公平获得途径,以特惠制的公共服务供给加上普惠性的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来保障每个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从学前教育开始抓义务教育的普及,促使义务教育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基本普及职业和高中教育,消除因贫困而失学的现象。争取 2025 年低收入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救助水平,及时有效救治大病患者,有效遏制和根本消除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基础养老金给付水平,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不低于扶贫标准。在制度上,要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扶贫制度,特别是要明确保障流动人口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公平有效获得。给予低收入地区专项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公共服务可得可及。以数字技术为平台,借助"新基建",加强低收入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与发达地区的信息互联互通,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服务在低收入地区的普遍获得与应用。通过远程教育、在线实时学习、远程诊断、远程医疗、数字健康管理以及人工智能在教育、健康、养老中的广泛应用,缩小低收入地区与全国的公共服务差距。

(二)产业与就业

产业扶贫是通过发展生产、激发内生动力来帮扶贫困户增加收入的一项基础性扶贫工程。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我国形成了传统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金融扶贫等门类齐全的多种产业扶贫方式。从产业组织形式来看,既有直接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的扶贫方式,也有鼓励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扶贫方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带动贫困户、贫困村脱贫的一支重要依托力量。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扶贫提供了新途径、新业态。就业扶贫是鼓励贫困户通过自力更生摆脱贫困的另一项基础性扶贫工程。就业扶贫包括"以工代赈"、提供生态公益岗位、劳动力转移就业扶持、返乡创业、"扶贫车间"、就地就近就业等多种形式的帮扶,近年来还有针对"两后生"提供的职业教育扶贫。"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进一步构建完善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的就业扶贫体系。在脱贫攻坚期间,我国针对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问题,以扶贫资金支持建设了一批厂房、设备,发展了一批乡村集体经济产业,形成了一些集体资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集体经济主要是通过扶贫资金形成集体资产,生产运营又依靠各类产业扶贫资金维持,自身还难以实现独立运营、自负盈亏。若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安排,没有明确的市场化运营手段,没有后续政策的跟进,这部分村集体经济将无法持续运营,可能出现资产的闲置与荒废。因此,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运营,需要乡村振兴战略与其相衔接。

(三) 绿色发展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绿色扶贫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生态补偿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并更加 向西部地区倾斜;"以工代赈"、生态公益岗位更加向贫困人口倾斜;绿色农业、旅游扶贫、光伏扶贫、 生态种养业、休闲农业等绿色扶贫产业不断丰富。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移民成为绿色扶贫的"标志 性工程",既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也有效缓解了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压力。贫困 地区的光能、风能、水电等资源开发,在资源和资产收益分配上更加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然 而,挑战和困难也同时存在。一方面,生态脆弱地区面临绿色扶贫挑战,以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为代表 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和西南部分严重石漠化地区都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农牧业发展限制因素多、生态 保护任务重、绿色减贫手段少等问题;另一方面,绿色资源富集地区面临扶贫任务重的挑战,以西南大 部分地区为代表的生态环境较好、绿色资源富集地区目前仍未探索出一些较好的绿色减贫手段。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仍需完善绿色扶贫的政策体系。一是建立绿色扶贫总体政策框架。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实施国家绿色扶贫工程,明确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的总基调,不断探索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利贫模式。二是分类实施绿色扶贫工程。不同区域的扶持战略需要各有侧重,深度相对贫困地区以保障民生、夯实脱贫基础为主,生态脆弱地区以移民搬迁、生态改善、提供公益性岗位为主,绿色资源富集地区以绿色资源开发为主。三是不断完善绿色扶贫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使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金融市场与社会资本形成合力,加强对绿色扶贫产业的支持力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开辟绿色扶贫产业新模式,解决生态型相对贫困问题。

(四) 国家扶持与社会参与

从 2016 年起,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 20% 以上,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 30% 以上,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有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各种金融政策不断出台,2016 年以来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 1700 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 4437 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 1600 多亿元,形成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社会融资等门类齐全的金融扶贫政策体系。"十四五"期间,仍需加大财政、金融对脱贫攻坚的投入。积极完善财政扶贫开发政策,继续在低收入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建立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可持续保险扶贫政策。完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扶贫工作的平台。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在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优势,通过对口帮扶等创新方式,帮扶西部低收入地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产业优势,支持低收入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完善相关税收支持政策,鼓励支持社会扶贫创新。培育在低收入地区开展乡村振兴和扶贫开发的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特别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发展、健康养老、绿色减贫等扶贫工作,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弥补低收入地区在这些公共服务方面的人力资源不足。

"十四五"期间,当前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措施可能会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常规性帮扶措施,扶贫战略也将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统筹安排。我们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致富进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逐步向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责任编辑:张超

"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策略*

李文静

[摘 要] "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群呈现人口占全国比重持续增长、创新产出高速增长、人流和物流 联系持续增加、污染排放大幅减少的"三增一减"趋势,基本上实现了"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的城市 群发展目标。但中国城市群还面临着国际形势严峻、城市群资源错配、中西部城市群培育成本巨大、城市群 空间半径过大、中心城市辐射力量不足等问题。"十四五"期间,应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分类、分层发展中 国城市群,优先发展城市圈,继续走紧凑、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主要策略包括增强城市群的空间紧凑度、 提升成熟型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以城市圈或城市群为载体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鼓励流动人 口向城市群流动和落户并允许其以宅基地指标换取相应的城市福利、使建设用地指标等生产资料与人口流动 方向相匹配、确定官方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界定标准并做好城市群统计等。

[关键词]城市群 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90-07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区域,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分工的主要载体。城市群的高质量有序发展和功能互补,可以形成更强的集聚经济效应和正外部性。^①城市群概念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央政府工作文件中,"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提出将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2020年"十四五"规划建议又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当前,国际形势呈现逆全球化态势,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我国经济要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必须依托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来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本文将对"十三五"时期中国城市群发展成效及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再进一步探讨"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及相关发展策略。

一、中国城市群发展现状及"十三五"城市群发展评价

城市群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域,按"十三五"规划批准的 19 个城市群的人口、经济、土地面积测算,^②中国城市群以 26% 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 83% 的人口, 创造了 87% 的 GDP, 是人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城市群协同度测算及协同发展障碍的实证研究" (16YJC630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文静,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上海,200237)。

① 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政府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

② 有规划的城市群(或经济区)范围参考各城市群和经济区规划; 无规划的城市群范围参考方创琳、鲍超、马海涛:《2016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企业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十三五"期间,经济活动向城市群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匹配效应与 学习效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一) 规划先行

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了14个城市群或经济区发展规划。在"十三五"规划中涉及的19个城市群当中,国务院批复的城市群(湾区)建设规划10个,国务院批复的经济区建设规划3个,国务院批复的跨省域发展规划1个,只有辽中南、山西中部、滇中、宁夏沿黄、天山北坡5个城市群还未有国家级规划。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受到中央政府空前重视,成为中国经济空间发展的主要形态。

年份	数量	文件名称
2011	2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2012	1	《黔中经济区发展规划》
2015	2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	3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地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7	2	《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8	3	《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兰西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9	1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表 1 各年中央批准的城市群或经济发展规划

(二) 城市群经济总量持续增加

"十三五"期间,城市群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相比"十二五"时期,成熟型、发展型和形成型城市群的 GDP 均有大幅增长。^① 从比例来看,8 个发展型城市群与 3 个成熟型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基本相当,而处于形成期的城市群经济总量依然偏小。从投资来看,发展型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最大,几乎占到全国一半。

城市群类型	时期	GDP (10 亿元)	GDP 占 比 (%)	人均 GDP (元)	人均 GDP/ 全国	固定资产 投资(10 亿元)	固定资产 投资占比 (%)	财政收 入占比 (%)
成熟型	"十二五"	23424	39.7	67786	1.56	11945	28.8	44.7
从 热型	"十三五"	32270	38.8	88076	1.49	17318	28.3	47.8
发展型	"十二五"	26439	44.8	47858	1.1	20139	48.6	37.1
及校生	"十三五"	34503	41.4	57320	0.97	29125	47.5	35.5
形成型	"十二五"	4805	8.1	55674	1.28	3579	8.6	7.2
少成空	"十三五"	6292	7.6	66849	1.13	5101	8.3	6.8

表 2 中国各类型城市群年平均经济指标

注:本文数据来源均为 CEIC。表格中各指标均为年均值,由于目前只能收集到 2016—2018 年数据,所以"十三五"期间数据为这三年数据平均,下同。

(三) 城市群人口持续集聚,人口分布更紧凑集约

三种类型的城市群人口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不同城市群人口增速不同。成熟型城市群仍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人口占比增长 1%,发展型城市群人口占比增长 0.7%,而形成型城市群人口占比只增长 0.1%。从行政区人口密度来看,成熟型城市群是发展型城市群的 2.3 倍,是形成型城市群的 4.2 倍。^②

①本文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成熟型(3个):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第二层:发展型(8个):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第三层:形成型(8个):北部湾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参见张学良、刘乃全:《201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中国城市群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② 黄征学:《城市群界定的标准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8期。

总体来看,城市群土地利用集约度提高,人口分布呈现集中态势。

表 3 中国各类型城市群年平均人口与人口密度指标

城市群类型	时期	人口 (万人)	人口占比(%)	行政区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商品房销售面积占 比(%)
成熟型	"十二五"	36031	26.5	849	28.5
风烈至	"十三五"	38155	27.5	899	27.8
发展型	"十二五"	63571	46.7	374	48.8
及版至	"十三五"	65836	47.4	385	49.9
形成型	"十二五"	10152	7.5	204	8.8
沙风型	"十三五"	10555	7.6	213	8.8

(四)创新产出快速增长

区域经济技术创新主要集聚在以城市化经济为主的大型城市,成熟型城市群在这方面占比有绝对优势。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指标来看,三大成熟型城市群占到全国的半数以上,投入产出效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新产出 创新投入 城市群 R&D 人员 R&D 经费 R&D 项目数 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 有效发明专利数 全时当量 京津冀年均占比 6.8 7.5 7.1 6.2 7.9 长三角年均占比 34.6 30.9 25.4 31.9 28.4 26.2 珠三角年均占比 17.8 15.7 15.6 23.3 26.2 30.6 年均占比合计 56.5 51.6 57.3 60.4 58.9 63.9

表 4 "十三五"期间三大成熟型城市群工业企业研发占全国比重(%)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测算。京津冀数据为三省市之和,长三角数据为沪苏浙三省市之和,珠三角为广东省数据。因此,长三角数据有所低估,珠三角数据有所高估。

(五) 城市群内和城市群间的人流、物流联系愈发紧密

"十三五"期间,中国高速铁路进入快速建设期,高铁通车总里程占世界比重超过 2/3, ^①已形成"四纵四横"的主骨架,并向"八纵八横"主骨架方向迈进。城市群公路面积累计增长 27%,路网密度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群内的人流和物流联系。"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未来城市圈和城市群内的时间距离将进一步缩短。

城市群类型	时期	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 率 (%)	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 (千吨)	工业废水 排放(百万 吨)	人均二氧 化硫排放 (千克/人)	人均工业 废水排放 (吨/人)	单位 GDP 二 氧化硫排放 (千克/万元)	单位 GDP 工业废水 排放 (吨/ 万元)
成熟型	"十二五"	86.8	1116.4	2251.4	8.8	18.5	1.5	2.7
风热空	"十三五"	86.2	365.8	1585.8	2.7	12.3	0.4	1.4
发展型	"十二五"	83.3	957.2	2073.0	11.8	21.1	1.8	3.0
及灰尘	"十三五"	82.3	317.5	1494.6	3.7	14.0	0.6	1.8
形成型	"十二五"	83.4	605.0	984.5	13.6	21.1	2.0	2.9
乃成至	"十三五"	80.6	214.5	719.8	4.8	15.3	0.7	1.8

表 5 中国各类型城市群工业三废排放平均指标

(六) 城市群污染排放大幅度降低

① 盛来运:《稳中上台阶 进中增福祉——〈2019年统计公报〉评读》,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2/t20200228 1728918.html, 2020年2月28日。

"十三五"时期,城市群工业三废排放量大幅降低。成熟型、发展型和形成型城市群工业废气排放比"十二五"时期分别降低 67%、67% 和 65%,高于全国 63%的平均水平;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降低 30%、28% 和 2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基本保持不变。城市群越成熟,工业三废排放量下降越快。同时,由于规模经济和同群效应,产业和人口集聚使人均和单位 GDP 排污量降低,越是成熟的城市群,人均污染物和单位 GDP 污染物排放量越低。

二、中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成熟型城市群与世界级城市群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人口挤出导致竞争力后备力量不足

国际城市群之间的较量首先是国际城市之间的较量。中国城市虽然在过去若干年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与世界一线城市仍有一定差距。在 AT Kearney 公司 2020 年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中,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分列前 4 名,北京和上海分列第 5 名和第 12 名,广州和深圳分列第 63 和 75 名。中国城市普遍在商业活动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上得分较高,但在信息交流和政治事务上得分较低。^① 从高科技人才来看,在 GTCI 2020 年公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榜单中,香港、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深圳、广州分别位列第 6、32、35、67、75、78 和 97 名,主要是在吸引人才和职业及技术技能两个指标排名落后。^②同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近两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可能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产生的人口挤出效应。此外,人口老龄化逐渐严重对中国整体创新能力和消费水平将产生负面影响。

(二)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城市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

"十三五"期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速仍快于人口增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增加迅速。从结构上看,人口增长最多的成熟型城市群获得的新增建设用地数量最少,人口增长最少的发展型城市群建设用地则增长最多。人口增长与建设用地增长不匹配导致成熟型城市群人地矛盾更为突出,房价居高不下,企业用地成本不断攀升,城市群竞争力下降。

城市群类型	时期	人口(万人)	人口增加(%)	建设用地面积(平 方公里)	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
成熟型	"十二五"	36031	-	13810	-
风热型	"十三五"	38155	5.9	14885	7.78
发展型	"十二五"	63571	-	15704	-
及版型	"十三五"	65836	3.6	18982	20.87
गर रे गर्भ	"十二五"	10152	-	3824	-
形成型	"十三五"	10555	4.0	4593	20.11

表 6 中国各类型城市群平均人口增长及建设用地增长

(三) 部分中西部城市群面临巨大培育成本

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需要在资金和土地指标的投放上对中西部地区倾斜。前文已述,建设用地指标的投放明显偏向发展型城市群和形成型城市群,并且发展型城市群和形成型城市群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上增速快于成熟型城市群。但在地均产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上,发展型城市群和形成型城市群却远低于成熟型城市群。

(四) 城市群不断扩容,空间半径过大,城市群内部的协调难度增大,首位城市辐射力量不足

自从中央提出将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形态以来,中国城市群空间范围不断扩张。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由原来的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合并而来,面积最大,达31.7万平方公里,人口占全国9.45%,GDP仅占全国9.22%,人均GDP尚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原城市群也有类似情况。

① Kearney:《2020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报告》,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65493. html, 2020年12月6日。

② 德科:《德科集团发布 2020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美通社网站: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72376-1. shtml, 2020 年 2 月 12 日。

城市群类型	时期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固定资产投资带来 的经济效益(GDP/ 固定资产投资)	地均产出(万元/ 平方公里)	固定资产投资带来 的经济效益(GDP/ 固定资产投资)
成熟型	"十二五"	7198	2.26	6097	2.26
	"十三五"	9930	2.10	8416	2.10
发展型	"十二五"	3854	1.32	1762	1.32
及校生	"十三五"	4664	1.49	2206	1.49
सर दे सर्व	"十二五"	5400	1.33	930	1.33
形成型	"十三五"	6513	1.30	1252	1.30

表 7 中国各类型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成效

张学良(2019)认为城市群包含的城市越多,特别是跨省城市越多,城市群协调的困难也越大,城市间的合作会因发展意愿不统一、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流于形式。^① 在国务院批准的 10 个城市群规划中,多数都跨越了 3 个省份,跨越省份最多的中原城市群横跨了 5 个省。城市群半径过大带来的另一个显著问题就是部分城市群首位城市经济辐射力量不足。日本城市圈要求首位城市经济占比超过 1/3,^② 方创琳等(2016)也认为城市群首位城市经济占比应为 45%以上,^③ 但我国多数城市群达不到这一门槛。例如,中原城市群首位城市郑州人口只占整个城市群人口的 6%,长江中游城市群首位城市人口只占整个城市群人口的 9%,辐射力度非常有限。

三、"十四五"期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思路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从城市群层面来看,城市群应分类、分层发展,并继续走绿色、紧凑的发展道路。

(一) 顺应客观经济规律, 城市群分类发展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高密度和人流、物流的密集交换是其主要特征。我 国地域范围辽阔,不同城市群发展状态差异较大,应分类制定其发展目标。

1.继续助推成熟型城市群发展壮大,成为更高层次的世界级城市群。"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我国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三大成熟型城市群均具备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条件,未来五年应继续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这三大成熟型城市群应继续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竞争上占领更多高地。事实上,"十三五"规划中就曾提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它们在"十三五"期间也确实成为人口流入最多、创新产出最高、工业污染排放密度最低的城市群。但同时,这三大城市群也是建设用地指标投放最少,落户标准最为严格的区域。世界级城市群的特点之一是多个都市区连绵成片,这需要建设用地统筹规划,在省内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上进行一定的放松,鼓励都市区连绵成片,增加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溢出效应。未来应通过优化经济布局、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优质人才吸引机制,强化高科技产业的溢出效应来进一步提升成熟型城市群的科研创造能力,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降低人才流动障碍。

2. 优化发展型城市群城市体系。发展型城市群内部本身也有一定差异。首先要优化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这三个城市群规划面积均超过了三大成熟型城市群,但空间城市密度较小,首位城市的经济引领作用太弱,城市群内部的差序格局没有建立起来,城市间人流和物流的交往规模还较小,需要培育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增加城市间的交往与合作。辽中南城市群

① 张学良、林永然:《都市圈建设: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改革》2019年第2期。

② 黄征学:《城市群界定的标准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8期。

③ 方创琳、鲍超、马海涛:《2016 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和哈长城市群面临一定的衰退危机,特别是辽中南城市群人口流出严重,应利用其比较优势,重振经济活力,打造特色型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基础,整体发展状况良好,城市群内部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未来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群整体实力,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关中平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位于西部地区,在西部地理条件优良,未来要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3. 处于发育阶段的城市群,应先发展优化主要城市。处于发育阶段的城市群,距离城市群要求的人口密度、经济总量、内部规模体系还有较大差距。这些城市群都处于中西部地区,要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利用极化效应壮大现有主要城市增长极,发展地区经济。先淡化这些地区的城市群概念,待这些城市能真正形成城市群的基本结构时再考虑发展壮大。

(二) 城市群内部分层发展, 优先发展都市圈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一般而言,都市圈包含的范围是时间距离在1小时以内、通勤率在15%以上的区域。^①都市圈内的区域由于在地理、文化、经济、信息等方面比较相似,更容易实现一体化和同城化。每个城市群根据不同情况,可以形成一个或多个都市圈。由于空间范围相对较小,人流、物流的时间成本和城市间的协调成本都很低,城市间的正外部性更容易发挥。要先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圈内的自由流动,再扩大到城市群。涉及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联防联控等更大空间范围问题,再在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协调合作。

(三) 城市群继续走绿色、紧凑的发展道路

规模经济、学习效应以及污染的联防联控有利于城市群降低人均排污规模,人民日益增加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要求城市降低污染排放,未来城市群应继续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城市群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密度,密度越高,人均使用土地面积越少,新增城市人口所需要的新增建设用地也越少。"十四五"期间,城市群发展应摒弃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快于城市人口增长的发展模式,通过高密度发展走紧凑发展的道路,更好发挥城市的正外部性及节约效应。

四、"十四五"期间支撑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策略

(一) 增强城市群的空间紧凑度

要"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首先应提高城市圈附近的空间紧凑度。受建设用地指标省内占补平衡及基本农田划定的影响,城市郊区普遍存在大范围的农业用地。这导致城市群内的城市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间隔,而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又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迅速衰减。我国虽然这些年通过大力推进高铁建设、增加路网密度将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大幅缩短,但与此同时也占用了大量农田,并且时间距离的缩短并不能完全替代城市间空间距离的减小。对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特别是城市群中心城市),应调整原有的城市空间布局及建设用地指标制度,扩大原有建设用地指标省际占补平衡的范围,重新调整基本农田范围。通过调整城市郊区用地结构,先实现小范围内的空间紧凑发展,再将小范围内的空间紧凑发展扩展为大空间范围内的紧凑发展,这更有利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交换,以中心城市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二) 提升成熟型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成熟型城市群是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未来我国以高科技产业占领世界舞台的大本营。从内部来看,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创新投入产出相对较低,而珠三角创新投入产出最高。珠三角是三个城市群里落户限制最少、人员流动最自由的区域。相比而言,长三角和京津冀中,特别是上海和北京的落户门槛仍然较高,这对吸引创新人才非常不利。由于行业间薪资差异较大,移动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成为资金和人才争相进入的领域。未来应引导更多资金和人才进入战略新兴产业,在高校专业设置、项目

① 黄征学:《城市群界定的标准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8期。

批准、落户限制等方面给予更多扶持和倾斜。通过吸引人才和增强人才专业技能缩小与一线国际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差距,通过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话语权。

(三) 以城市圈或城市群为载体,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一直以来,中国生产要素领域的非市场化被广为诟病,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抑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人口层面,附着在户籍上的子女人学、养老、医疗、购房等福利使人一旦落户某一城市就很难迁移。未来应将户籍制度改革为一种登记制度,即只登记而不限制人口迁移,实现学籍、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城市圈内的一体化,尽量减少人口流动障碍。可以先在城市圈进行试点,再逐步在城市群内推广,最终扩大到全国层次,彻底消除人口流动障碍。在土地层面,将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放大到城市群范围,更大范围内的土地指标自由流动有利于发达地区提高城市密度,实现规模经济,而相对落后地区则可以获得新增建设用地的补偿资金,更好保护生态环境。

(四) 鼓励人口向城市群流动并落户, 允许其以宅基地指标换取相应的城市福利

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可以推动消费升级(陈斌开等,2010), ^① 更容易实现"双循环",家庭整体落户也增强了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建设用地面积约395865平方公里,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只有56075.9平方公里,^② 占建设用地面积的14%,还有86%的建设用地以村镇建设用地形式存在,其中大部分是宅基地。随着我国城市化率日益提高,宅基地及其上面的房屋闲置情况非常普遍。如果流动人口进城落户能将其宅基地指标也带入城市换取相应福利,将大大节约建设用地面积。在此过程中,城市可以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获得大量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流动人口可以获得住房或养老保险等各种福利,这推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双赢。

(五) 使建设用地指标等生产资料与人口流动方向相匹配

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是使生产资料之间相互匹配。前文提到,虽然成熟型城市群是人口流入最多的 区域,但建设用地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却更多投入发展型城市群和形成型城市群。生产资料错配带来的 直接效果就是生产效率降低。实际上,规模越大的城市,集聚效应越明显,人均需要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越小,建设用地指标向大城市集中更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节约。同时,不必囿于传统的经济空间平衡的观点,经济在空间上从来都不可能平均发展,将地均平衡观点转化到人均平衡上来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 确定官方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界定标准, 做好城市群统计

我国早在 2006 年"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但现在尚无官方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界定标准,更无相关统计,与美、日、加、英、澳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制定城市圈或城市群的相关标准并定期统计,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从目前发布的各城市群规划来看,城市群除包括地级市外,还包含县级市或自治州,地方政府和学者很难通过现有的统计数据准确了解城市圈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城市群内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交换状况。官方出台相关标准并进行统计,将有利于更精准地制定城市群相关政策,促进城市群健康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机,应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中国城市群向紧凑、集约、高效的方向发展。成熟型城市群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将引领中国科技腾飞,鼓励生产要素集中与人口流动方向相匹配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城市群统计将服务于区域经济决策,进一步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张超

① 陈斌开、陆铭、钟宁桦:《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0年第 S1 期。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0》。

推进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管理动力系统理论的视角*

郝全洪

[摘 要]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经典科学机械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更加重视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尊重其复杂动态系统特性,不断强化现代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产业体系既体现一定程度的管理系统属性,也体现一定程度的动力系统属性,可被抽象为一个近似的管理动力系统。基于管理动力系统一般理论模型,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应突出系统功能导向,聚焦产业体系的总体战略目标;夯实系统要素基础,加强产业体系的科技创新等高端要素建设;坚持破立结合、重在建构,激活结构关系的组合与协同效应;强化创新引领,推进产业体系渐变性特别是突变性演进;完善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改进产业体系建设的组织管理。

[**关键词**]现代产业体系 系统科学 管理动力系统 协同发展 创新引领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097-07

党的十九大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实现了重大创新,其丰富内涵不仅在于突破传统的三次产业构成,从生产要素投入角度提出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而且也在于突破传统的简单还原论、一般均衡分析的产业经济理论和思维方式,更加重视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实现从数量比例、静态平衡、线性渐变的确定性思维到层次结构、要素协同、整体涌现、复杂动态等系统思维逻辑的重要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强调坚持系统观念原则,坚持以系统思维和方法加速推进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产业体系是根据生产的客观要求,把分布在不同时间、空间上的可能产业要素,按一定的数量比例、质量要求、时间顺序、空间位置组合联结而成的有实际效能的产业系统,^①是由不同属性和层次的大量产业构成的、状态和功能不断发展演变的、开放的复杂动态系统。从发展演变的目标方向和组织机制考察,产业体系是受外部人为控制的管理系统,即国家为实现一定产业发展目标、履行产业管理职能、保持产业体系平稳有序运行和发挥产业体系应有功能,根据有关信息反馈,对产业经济主体及其活动适时进行有目的的、自觉主动的直接或间接调控,实施目标管理的管理系统。产业体系演化的这种组织力和组织手段均来自系统外部的管理主体,也被称为他组织。与此同时,产业体系会在内部组分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竞争中产生自组织的动力,在对各种信息进行过滤、选择、压缩中形成适当的正负反馈机制,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基础研究领域一体化发展政策研究"(L1924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郝全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二部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91)。

① 苏东水:《产业经济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第61页。

自身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自发地沿着一定轨道向稳定的定态演化,^①确立自身规定性,实现有序结构。^②产业体系演化的这种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向着目的态的演化是系统自身自发的行为,故被称为自组织。产业体系的自组织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系统内各层次产业、各种生产要素等组分之间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复杂动力学关系中的互动互应的动态过程。^③因此,产业体系无疑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着的动态系统,^④而动态系统理论上总可以通过对时间变量的适当变换转化为动力系统。^⑤系统学的一个重要原理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远胜于单一的自组织或单一的他组织,^⑥产业体系建设应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让市场自组织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他组织机制的作用。

可见,产业体系既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管理系统,也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动力系统,可以将产业体系的建设发展过程抽象为一个近似管理动力系统的演变过程,即动力系统与管理系统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来研究。根据管理动力系统的一般理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兼具管理系统和动力系统特性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形式上包含如下 5 个基本式子的模型: (1) y=F(x, A); (2) y_n=F(x, A_{n-1}); (3) A_{n-1}=M(y_{n-1}); (4) \dot{x} = ψ (x, A_{n-1}); (5) n=1, 2, 3, ..., N。 ^②其中,式 (1) 表示产业体系的一般系统形式。从管理角度理解,y代表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x代表产业体系的所有子系统、要素等组分,如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F(·)表征产业体系的子系统、要素围绕产业体系总体战略目标而形成的结构组织关系;A表征为实现产业体系总体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所有管理行为的综合效应。式 (2) 表示第 n 个管理控制阶段产业体系管理目标的实现情况。y_n代表为实现产业体系总体战略目标而设置的第 n 个管理控制阶段的管理标的实现情况。y_n代表为实现产业体系总体战略目标而设置的第 n 个管理控制阶段的阶段性目标。式 (3) 表示产业体系管理主体在对第 n-1 个管理控制阶段所实施的管理行为的具体效应,它是第 n-1 个管理控制阶段产业体系阶段性目标 y_{n-1} 的函数;M(·)表征产业体系的管理策略。式 (4) 表示第 n 个管理控制阶段产业体系阶段性目标 y_{n-1} 的函数;M(·)表征产业体系的管理策略。式 (4) 表示第 n 个管理控制阶段内产业体系的迭代演化规律。 \dot{x} 是 x 的一个阶微分,表示 x 的下一个时刻值; ψ (·)表征 x 与 \dot{x} 的演化迭代关系。式 (5) 表示产业体系目标管理中的具体控制阶段数 n。N 代表实现产业体系总体战略目标所需要实施阶段管理控制的总阶段数。

基于上述模型,本文将分别从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关键要素、结构关系、演变路 径、管理调控等方面进行系统理论思考,提出对策建议。

一、关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战略目标的系统思考与建议

上述模型中的 y 是式子 y=F(x, A) 中的因变量,代表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也可被视为产业体系建设的任务、目的、核心。它体现了管理主体在产业体系自身自组织机制驱动下的目标管理,是产业体系自觉地发展演变的最终动因。 y_n 代表第 n 个管理控制阶段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总体趋于 y 的目标指向性,即当 n 趋于 N 时, y_n 趋于 y_n

系统的一切运作都是在功能与目标约束下的行为。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以来,我们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目标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我国产业发展及国内外环境变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目标从早期侧重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到中期侧重产业产出,[®] 再到后来侧重三次产业构成,但显然这些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时代特点、解决重大失衡问题和满足建设现

① 系统的稳定定态,即吸引子、目的态,表征系统的结构和特性。

②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89、146-149页。

③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 149-150 页。

④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79页。

⑤ 高隆昌:《系统学原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2页。

⑥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172页。

⑦ 高隆昌:《系统学原理》, 第 209、216、218、244-245 页。

⑧ 盛朝迅:《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瓶颈制约与破除策略》,《改革》2018年第3期。

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需要。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既是适应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针对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失衡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基 于系统科学理论的视角,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着眼于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 供需失衡这个突出矛盾,实现供需关系新的动态平衡。当然,产业体系建设目标本身也是一个多目标 系统,既有短期目标也有长期战略目标,既有局部利益也有整体利益,既有主要目标也有次要目标,它 们之间一般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有时存在冲突,需要有效协调各目标之间的关系,做到兼顾长期和短 期目标、主要和次要目标、整体和局部利益,特别要紧紧抓住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矛盾,坚持短期目标、 次要目标、局部利益服从和服务于重要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整体利益。

着眼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整体长远战略目标,首先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各类要素资源特别是科技、现代金融、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汇聚发力。通过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效引导市场自组织机制配置资源的正确方向,纠正过去要素资源过多流入虚拟经济领域的偏差,逐步消除对实体经济产生的不利冲击,防止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①比如,引导增量资本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抑制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建设的制度机制,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改善实体经济供给结构,提高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和提高经济效益。着眼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未来大趋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优化制造业区域创新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制造业前沿领域创新布局,加强战略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升竞争力,持续打造和升级主导部门综合体,②尽快实现若干重要战略产业领域的引领型发展。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产能过剩与杠杆过高等问题仍然突出。^③ 着眼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整体长远战略目标,必须适应需求结构新升级,破除无效供给,创造有效供给,打通供需渠道,专注和聚焦于实现供需关系新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要素资源合理化配置自然淘汰低端技术、无效低效供给,以更好满足中高端供给的要素资源需求;以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改造传统低端产业,提升产品与服务品质;关停并转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及其加工组装环节;加快新兴产业和新技术、新模式发展,增加智能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供给;借助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解决供求信息阻滞、脱节、延迟等问题,形成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一体化互动的系统反馈机制。^④

二、关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要素资源条件的系统思考与建议

上述模型中的 x 是 y=F(x, A) 和 $y_n=F(x, A_{n-1})$ 中的自变量,代表产业体系中的所有子系统、部门、要素等组分,也是产业体系运动演进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迭代方程 $\dot{x}=\psi(x, A_{n-1})$ 中,x 表征产业体系的演化状态,由产业体系的组成要素、要素间关系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

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大创新是实现了从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到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转变。 三次产业划分是产业体系呈现出来的基本现象,而决定产业体系各种现象的背后本质因素,是生产要素 投入的数量、质量、结构、绩效等。从基本的层次逻辑看,产业体系处于顶端,中层为企业组织规模和 资本有机构成,微观基础是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⑤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是全方位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品类、结构、水平、绩效。

① 刘志彪:《建设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苏东水:《产业经济学》, 第 218 页。

③ 何立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年, 第49-50页。

④ 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⑤ 何立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49页。

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端要素培育是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石。要素建设的重点首先是拓展要素广度深度、提升要素质量、激发要素活力、优化要素结构、高效配置要素。前瞻性地引入信息、数字、知识、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高端生产要素,汇集国内外顶级创新资源,激活潜在的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要科技创新平台和区域创新高地建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的关键作用。组织实施以企业为主体、军民央地科技力量充分融合的重大创新项目,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① 优化金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在保障金融风险可控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配置效率。通过校企合作、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加强技能培训,培养多层次、技能型产业人才,特别是瞄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培养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放眼全球发现、培养、激励高精尖科技创新团队和未来战略科学家,大力培育具有世界水准的中国现代企业家队伍。加强对产业体系的科技、劳动、资本、管理等要素的统筹规划,提升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比重。

产业体系转型演进的关键环节,是临界区域序参量和主序参量在竞争与协同中取得支配地位,引领产业体系通过突变形成更高层次、更加有序的新耗散结构组织。②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形成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引领型产业体系发展格局,是系统科学视角的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引领产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持续的产业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彻底振兴实体经济。创新引领型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是产业核心技术,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突破只能依靠自主创新。③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投入,创新资源在要素组合中的比重偏低。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通过市场化和产权激励、税收金融优惠等政策措施,推动科研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率。④

三、关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结构关系的系统思考与建议

上述模型中的 $F(\cdot)$ 表征产业体系的所有要素 x 围绕实现目标任务 y 和 y_n 而发生的作用关系,即产业体系内部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多层次有机结构和关联方式,这也是影响产业体系运行、演化、功能的决定性因素。在系统管理意义下, $F(\cdot)$ 由管理策略决定。系统整体在本质上是个结构体系, $F(\cdot)$ 体现了对产业体系的战略构建,合理的结构能够增加产业体系内部有序程度,有利于产业体系整体功效的发挥。

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构涉及若干重要方面,如产业体系子系统、要素等组分间重要的层次序列结构,关系到产业体系层次跃迁中丰富的涌现性和创新性;产业体系布局中的空间结构,关系到产业体系生产力的合理分布和组合;产业体系发展演变中的时间结构、时空结构,体现为产业体系演进的速度、节奏和路径规律;产业体系充分开放的物质、能量、信息耗散结构,赋予其内外部互动、联合、协调、合作、竞争的生机活力。

产业体系结构关系,决定于系统全部稳定和不稳定的定态集合。一些因素在某些临界点上的改变,将引起产业体系性质的根本改变,如定态点的个数、类型、相空间分布和稳定性,从而产生系统分岔。^⑤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结构优化,主要通过创新引领结构高度化和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合理化。协同发展

①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② 张浩:《管理科学研究模型与方法》,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 200 页。

③ 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④ 何立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50页。

⑤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 第92页。

的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构建产业体系要素、部门、子系统等组分的合理结构和相互关联方式 并在动态中不断优化。从理论上说,这里包含了一切有利于优化产业体系内部要素结构、企业结构、产 业结构等层际层内关系,以及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时空结构关系,静态结构、动态结构关系的对策 措施。

系统结构理论的首要观点是破立结合、重在建构,既要破除缺乏创造性活力的僵化结构,更要以战略目标为引领、功能优化为导向,构建构架稳固、动力与流分布合理、渠道密集通畅、充分开放、充满活力、优质高效、合理有序的产业体系有机结构关系。加强有利于调整理顺三次产业结构、细分产业结构、产业上下游结构的政策措施;加强有利于调整理顺不同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不同形态业态企业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的政策措施;加强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数字化加快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加强有利于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政策措施;加强有利于调整理顺产业区域结构、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先进制造业和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构建有利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密切关联、互动反馈的渠道和机制,建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坚实结构基础。

充分激活系统结构关系中蕴藏的丰富组合效应和协同效应,是系统结构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要着力完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优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强化现代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推进产业发展和劳动力素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协同和良性互动,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完善要素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要更多发挥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落实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和优化产业体系各要素之间质的适应性、量的均衡性、时间的有序性和空间的聚合性,促进产业体系的组织状态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水平上维持动态平衡。^①

四、关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演化路径的系统思考与建议

上述模型中的式子 $\dot{x} = \psi(x, A_{n-1})$ 是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演变的迭代方程,表征产业体系的演化路径和演化规律。其中, $\psi(\cdot)$ 表示 $x = \dot{x}$ 的演化迭代关系。产业体系从一种稳态向另一种不同质的更高层次稳态的发展演进,可以通过连续性的渐变或非线性的突变实现,具体方式主要依赖于 $\psi(\cdot)$ 的结构关系和相关控制参量等具体条件。原则上,可以通过控制条件的变化来控制产业体系演变的方式。系统科学理论的产业体系演进模式,表现为渐变与突变的相互转化,即较长时期的持续渐变性演进与偶尔触发突变性演进的交替过程。

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一种模式和思路,是通过促进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量和质的持续积累,在外界控制参量没有到达临界点之前,产业体系局部不断优化,最终在整体上实现从一种稳态平稳过渡和演进到另一种功能更优的新稳态。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另一种模式和思路,是在产业体系各种要素资源积累过程中,技术创新、管理变革等因素也在持续积累和变化,一旦到达某临界点,在产业体系内部复杂的非线性作用、临界点处涨落的巨变和内部序参量的协同作用下,产业体系原来的稳定状态失稳、分岔和突变,演化为一个时空结构更有序、水平层次更高、质量功能更优的新稳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的进化和飞跃。因此,需要持续推进产业要素资源量和质的长期积累,积极引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优秀人才等高端要素,大力激发和培育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要素,促使其成长为产业体系演变特别是突变中的序参量乃至主序参量。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产业体系演变常常处于混沌边缘或出现复杂的混沌现象而可能面临各种危机,可以借助混沌控制技术,尝试以微小的外部信号调控某些参数,把混沌轨道从危机状态驱动到安全的目标态,或者从不稳定状态尽快驱动至稳定状态。②

① 苏东水:《产业经济学》, 第61页。

② 张浩:《管理科学研究模型与方法》, 第 204 页。

为促进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即以渐变方式从一种稳态向功能更优的新稳态演进持续创造有利条件,也为产业体系突变演进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应从科技积累、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高起点战略筹划,促进未来关键要素积累和发展能力持久性提升。加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性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实验室、重量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实施科技创新重大项目,进行创新成果数量规模的持续积累,通过科技创新全面带动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加强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实体经济融资便利化和降低成本。畅通信息渠道,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优化就业服务,切实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突变性演进是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结构升级、整个功能提升和迎来突破性创新的重要机遇。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演变的空间几乎处处结构稳定,产业体系演变在结构稳定性区域主要表现为渐变。一旦产业体系运动变化到结构稳定性区域的边界即达到结构不稳定性的临界点,产业体系便可能从一种定态向另一种定态突变。^①因此,应通过必要的管理调控,特别是激发科技创新、自主创新等创新因素成为产业体系突变中的序参量和主序参量,适时推动产业体系从一个稳态向更高水平和更多功能的新稳态转型演进。加快重要领域前沿理论、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发挥创新平台对引领产业转型的关键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谋求重要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充分激发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的活力和创造力,突破临界区域转型演化的势垒障碍,发挥其在触发产业体系失稳、分岔、突变并走向新稳态中的关键作用,引领产业体系突变演进的有利方向。

五、关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管理调控的系统思考与建议

上述模型中的 A_{n-1} 代表产业体系管理主体在第 n-1 个管理控制阶段的管理参变量,表示在第 n-1 个管理控制阶段中除 x 外的一切对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相关作用、相关信息的整体效应,比如生产管理、管理决策、策略调整、科技进步、技术改革、市场变化、生产环境等产生的相关影响。A 表示与实现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总体战略目标相对应的管理参变量,体现了管理和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等产生的综合效能。在理论上,当 n 趋于 N 时, A_{n-1} 趋于 A。 $M(\cdot)$ 表征管理者对系统完成的第 i 个管理控制阶段目标 y_i 做出评判后,制定并付诸实施的第 i+1 个管理控制阶段的管理政策规制和管理活动,表现为新的系统参量 A_i , $A_i=M(y_i)$ 构成一个管理系统,i 可在 1 至 N-1 中任意取值。

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与管理,本质上就是利用产业体系的自组织功能来实现管理目标的他组织过程,即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进行产业规制、实施产业管理控制等实施目标管理,实现产业体系的全面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有序演进和高效发展。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首先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要素资源和市场,统筹产业体系加快发展和产业体系安全发展,实现产业体系发展的速度、规模与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对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与管理,在实践中总是表现为分段控制过程,即通过若干个管理控制阶段,实施若干次管理策略,达成若干个阶段性管理目标任务,最终实现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在这个阶段性管理和分段控制过程中,前一阶段的管理措施在下一阶段将内在地融入产业体系的自组织。^② 所以,对产业体系的预期管理目标必须与产业体系演变的客观规律一致或相容,否则管理过程将会受阻。^③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管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就是对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合理程度和实现情况进行评判,并根据需要及时调整具体管理策略,这涵盖了所有着眼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战略总目标、调整与实现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管理因素。

根据系统动力学逻辑,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激活系统动力机制,即充分运用要素资源效率等方面差别形成的市场势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动力、活力、压力,再加上由这些力的作用引起

①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97页。

② 高隆昌:《系统学原理》, 第 181 页。

③ 高隆昌:《系统学原理》, 第 178、181 页。

的科技、金融、人才、土地、能源等要素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要破除因人为不合理限制、管制、垄断等外在干预造成的要素资源流动性壁垒和内生活力不足问题,强化效率导向和激励创新导向,用好市场优胜劣汰、高效有序的选择机制,同时维护好公平竞争、平等开放的市场秩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形成有利于渠道通畅、良性互动、协同合作的产业体系演进的制度机制。这种制度机制包括由政府、社会、行业协会等管理主体实施的所有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高端要素培育和配置、产业体系结构建设、发展环境优化、促进产业体系渐变积累和突变演进的各种综合性管理政策措施,如关于产业体系建设发展的各类直接间接的规制,关于产业结构、布局、技术等各种功能的管理政策,关于信息、金融、环保、企业等各种对象的管理政策,关于战略产业扶持、新兴技术产业化、衰退产业调整的管理政策等。

基于上述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管理理念、需要推进一系列政策实践。破除科技管理制度藩篱、 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市场化的科技资金投入管理体制,加强对前沿引领技术、关键 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激励、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体制机制、创新链 与产业链对接机制,营造科技创新直接高效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产业体系建设的良好环境;完善创业 投资、天使投资等新型金融机构激励制度,加强绿色技术银行等新载体建设,探索国际国内、公有民营 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平等开放规则和企业融资上的公平竞争制度,完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制度机制;推 进教育、住房、社保、户籍管理、人事档案、职称评定等制度改革,破除人力资源在体制、城乡、区域 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培养一批代表科技发展方向、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关系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战略行 动能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型企业、鼓励有战略优势的非国有资本参与垄断行业和国企改 革,支持企业家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营造鼓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依法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清理妨碍市场统一和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 争的各种不合理规制,保护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实施内资的市场准人负面清单制度和 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不断探索和推行高水平的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鼓励开展全球创新与产业合作,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进一步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改革完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方面制度改革,瞄准产 业体系结构调整战略方向,着眼于科技、产业、财政、金融、区域、就业等各类政策的正向耦合、组合 协同、集成效应和良性互动、创新完善协同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产业发展与要素质量提 升良性互动、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演进、城市群都市圈大区域等产业密集带一体化、跨时期跨区域 国内外产业政策协调联动的制度机制,实现产业体系跨期、全域、动态均衡的高质量发展。①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决经济结构性重大失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系统工程,面临许多全新的困难和挑战。自觉强化系统科学思维和理念,充分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成果,破解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是一项紧迫的理论课题。

责任编辑:张超

① 何立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 64-69 页。

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权力需求结构的扎根研究*

李朋波 黄艳艳 罗文豪

[摘 要]通过向一线员工授权来提高他们在工作中的自主性、积极性和服务绩效,是传统服务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而满足员工在工作中的权力需求是实现和提高授权有效性的策略。本研究以酒店企业一线员工为例,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得出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包括掌握工作信息权、对客服务灵活权、工作安排自主权、工作沟通协调权、问题发现反映权、决策参与建言权等6项权力,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产生作用的机理。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权力需求"这一构念和授权行为有效性及其边界条件的认识,对传统服务企业的授权管理实践也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服务企业 领导授权行为 权力需求 结构维度 扎根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36; F2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104-07

一、引言

如何准确把握、快速满足顾客需求,是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议题 之一。在互联网时代,该议题的破解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顾客对服务的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另一 方面,具有较强自主需求并渴望实现自我成长的新生代员工在员工群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在此环境中, 企业及其管理者必须通过适当方式激发员工群体的主动性,以此来应对和满足快速变化的顾客需求。

通过授予下属权力来提高其工作自主性的领导授权行为,被广泛证实能够在各个层次带来积极效能。以海底捞、星巴克咖啡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企业通过对一线员工授权,激发了员工群体活力并由此带来了卓越的服务绩效,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开始重视对员工群体的授权。^①然而,并非所有的授权都能带来积极作用。^②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授权的有效性及其边界条件。^③"如何让授权更有效"在实践和研究层面都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按照"个体—组织匹配"理论中组织供给与个体需求匹配的原则,^④企业及管理者授予员工的权力在匹配或满足其实际需要时才能更加有效,即满足员工在工作中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是实现和提高授权有效性的重要路径。"权力需求"作为组织管理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2005)、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项目(SM201810031001)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1122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朋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教授;黄艳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24);罗文豪,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144)。

① 李朋波:《传统服务企业领导效能的提升策略及其作用机制——基于星巴克咖啡的案例研究》,《旅游学刊》2017年第3期。

② Forrester R., "Empowerment: Rejuvenating a Potent Idea",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14, no.3, 2000, pp.67-80.

③ 张鹏程、蒋美琴、李菊、陈菲:《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管理科学》2018年第3期。

⁴ Resick C. J., Baltes B. B., Shantz C. W.,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Work-Related Attitudes and Decisions: Examining Interactive Effects with Job Fit and Conscientious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2, no.5, 2007, pp.1446-1455.

中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被视为行为主体的一个基本需求类型,是员工在组织中产生积极行为重要的内在动力。回顾以往文献,权力需求大都被界定为一个单维的构念,而个体的权力需求往往存在着内容、形式和效能等方面的差异,这表明需要细分不同的主体类型来探明权力需求的内容。

对于具有强烈服务情境特征的传统服务企业而言,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探明员工在对客服务工作中需要被授予多少权力。传统服务企业的一线员工更能体现服务的情境特征和直接影响服务绩效,由此成为该情境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群体。^①本研究聚焦于开展直接对客服务的酒店一线员工,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及其作用机理,以期对推动授权研究和授权管理实践起到积极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 权力与权力需要

在组织行为领域,"权力"指的是主体对资源的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②按照传统定义,权力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变量,即权力基于主体客观拥有的能力和资源而存在。权力需要(Need for Power)是一个与权力有着直接联系的概念,是指个体影响和控制他人且不受他人控制的需要,也有学者将这一概念称作权力动机。^③在 McClelland(1975)^④提出的需要理论中,权力、归属和成就共同构成了个体的三种基本需要。随着研究更加广泛,权力不仅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结构变量,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被激活的认知和体验。^⑤个体对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的认知,也被称为权力感,心理授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则是个体对授权体验的综合认知,包括胜任、影响力、工作意义、自我决定4个方面。^⑥在现有组织中权力的研究中,围绕心理授权的文献是绝对的主体,而尽管"权力需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构念,但其所受到的关注和探讨却非常有限。

(二) 领导授权行为的内涵及效能

与"权力需求"相对且受到更多关注的概念是权力授予(即"授权"),特别是"领导授权"。自 20世纪 90 年代 Manz 和 Sims (1991)、 Pearce 等(2003) 提出"领导授权"概念以来,该主题一直是组织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现有研究侧重于关注管理者的授权行为,包括让属下表达意见、与员工分享知识、让员工承担工作责任等。 领导授权行为是为了提高员工绩效而采取一系列向下属授予权力的行为,目的是使下属具有对某项工作的管理决策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者们还将领导授权行为视为领

①徐虹、梁佳、李惠璠、刘宇青:《顾客不当对待对旅游业一线员工公平感的差异化影响:权力的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5期。

②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Anderson C.,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10, no.2, 2003, pp.265-284.

③ Fodor E. M., Wick D. P., Conroy N. E., "Power Motivation as an Influence on Reaction to an Imagined Feminist Dating Partn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36, no.3, 2012, pp.301-310.

⁴ McClelland D. C.,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 1975.

⑤ Galinsky A. D., Gruenfeld D. H., Magee J. C., "From Power to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5, no.3, 2003, pp.453-466.

⁶ Spreitzer G. M.,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38, no.5, 1995, pp.1442-1465.

⁷ Manz C. C., Sims Jr., Henry P., "Super Leadership: Beyond the Myth of Heroic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19, no.4, 1991, pp.18-35.

[®] Pearce C. L., Sims H. P., Cox J. F., Ball G., Schell E., Smith K. A., Trevino L., "Transactors, Transformers and Beyond: A Multi-Method Development of a Theoretical Typology of Leade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22, no.4, 2003, pp.273-307.

① Arnold J. A., Arad S., Rhoades J. A., Drasgow F., "The Empowering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Scale for Measuring Leader Behavio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21, no.3, 2000, pp.249-269.

导分享权力的行为过程。例如,Ahearne 等(2005)^① 指出,领导授权行为强调通过促进决策参与、提供自主权来减少科层制的约束;Zhang 和 Zhou(2014)^② 把领导授权行为定义为管理者通过阐明工作意义、提高员工自主性等方式实现权力共享的行为。现有研究表明,领导授权行为在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均能够产生积极效能。在员工层面,领导授权行为能够提高员工的心理授权感知,使得员工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敬业度和组织承诺,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外行为等,^③ 激发员工的知识共享、创新和建言等积极行为。^④ 此外,领导授权行为能够增强员工的心理授权和情感承诺,降低其离职意向和工作怠倦水平。^⑤ 在学界普遍关注和验证了其积极效应外,近几年来对领导授权行为的有效性及其边界条件的探讨逐渐受到了重视。庞书一等(2013)^⑥ 的研究表明,授权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作用是"倒 U 型"的,当促进作用超过一定程度后,其反而会降低工作绩效;张鹏程等(2018)^⑥ 的研究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其一,"权力需求"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构念和行为主体的基本需求类型,现有研究对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缺乏研究;其二,围绕"领导授权行为"的研究逐渐开始关注领导授权行为的有效性及其边界条件,且对"在何种条件下领导授权行为有效或更加有效"的关注逐渐加强。以上情况说明,选择某一类型的行为主体并探究其对权力需求的内容,既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权力需求"这一构念,也能够从权力实际使用主体的视角来探讨领导授权行为的有效性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选择

作为一种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真实生活或工作体验中获取资料,由下而上地对资料进行浓缩和归纳,最终形成对某一事物更为深入的认识。[®]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有以下原因:一是主题聚焦于"权力需求结构",需要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层归纳,扎根理论的编码方式较为适用;二是目前鲜有研究探究权力需求的内容,扎根理论尤其适用于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

(二) 数据收集

研究团队选择对服务品质重视程度较高的高星级酒店和精品主题酒店的一线员工开展访谈。共有36位一线员工接受了访谈,他们的特征是:有13人来自餐饮,12人来自前厅,11人来自客房部门;均为90后,男性15位,女性21位;受教育程度以大学专科为主(20人),其次是本科及以上(10人),最后是专科以下(6人)。

研究团队设计了专门的访谈提纲,包括以下3个部分:一是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 二是被访谈对象所在酒店基本情况及目前所在岗位的主要职责;三是取得更好工作绩效所需要的权力及 需要的原因。每位受访对象的访谈时间约为20分钟,采用录音形式进行记录,录音转录为文本后最终

① Ahearne M., Mathieu J., Rapp A., "To Empower or Not to Empower Your Sales For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Empowerment Behavior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0, no.5, 2005, pp.945-955.

② Zhang X., Zhou J., "Empowering Leadership, Uncertainty Avoidance, Trus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a Mediating Mechanism",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124, no.2, 2014, pp.150-164.

③ Raub S., Robert C.,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on In-Role and Extra-Role Employee Behaviors: Exploring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Power Values", *Human Relations*, vol.63, no.11, 2010, pp.1743-1770.

④ 张鹏程、蒋美琴、李菊、陈菲:《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管理科学》2018年第3期。

⑤ Chen G., Sharma P. N., Edinger S. K., Shapiro D. L., Farh J. L., "Motivating and Demotivating Forces in Teams: Cross-Level Influences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6, no.3, 2011, pp.541-557.

⑥ 庞书一、郑兴山、唐宁玉:《授权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绩效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⑦ 张鹏程、蒋美琴、李菊、陈菲:《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管理科学》2018年第3期。

⑧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教育实验研究》1999年第4期。

获得了10万余字的文本资料。

(三) 信度与效度保证策略

本文采用以下策略来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在质性数据编码阶段,采用了"背对背"方式进行,由 3 个独立小组(每组 2—3 名成员)分别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之后进行集中讨论;由专家评价小组(1 名教授、3 名副教授和1 名博士生)对编码结果进行讨论和修正,经过多轮讨论,最终评价者对 90%以上的编码结果达成一致,并对剩余的编码结果进行再次讨论并达成一致。

四、研究过程

(一) 开放式编码

在对访谈获取的文本资料进行整理时,我们采用了"逐字逐句"阅读文本资料的方式,最终挑选出所有与员工权力需求相关的文本,并以短句的形式呈现,共计得到原始语句 206 条。之后,采用 3 个小组"背靠背"的方式对得到的原始语句进行"标签化"。比如,在资料中的原始语句"在对客服务过程中遇到某些突发事件,可以自主选择使用某些资源来解决问题然后再上报上级领导"(A145)上,贴上"自主使用资源解决突发事件"(B11)的标签。在完成对所有原始语句"贴标签"后,3 个小组汇总和比对原始语句标签化的结果,依据 Mile 和 Huberman(1994)^① 的观点,结果达到了内部代码一致性超过 80%的标准,较为理想。最后,3 个小组集中对这些标签进行归纳,对相同及相近含义的标签进行合并处理,共得到"知晓顾客偏好""即时回应客人诉求""自主控制工作节奏"等 47 个标签化概念(见表 1)。

标签化概念	原始语句示例	
能够参与管理及决策(B1)	作为一线员工更清楚顾客需要什么以及目前服务、产品的问题在哪里,希望所在部门的管理和事项决策能够让我们有权参与其中(A1)	
清楚工作职责及标准(B2)	作为一线员工,希望有权被非常清楚地告知自己所在岗位的职责,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清楚做到什么程度是符合要求的(A12)	
能够主动开展工作(B3)	自己要主动做一些事情,不能等领班或者经理说了以后才开始做(A21)	
能够参与产品创新(B4)	在组织或产品创新方面有参与权或建议权,这样我可以更好参与组织建设(A32)	
遇到问题发表观点(B5)	在遇到问题时,员工可以参与并向领导发表自己观点,提高自身处事能力,更好地完成工作(A101)	
能够给予客人优惠 (B6)	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允许自己的员工"先斩后奏",给客人送纪念品、果盘等(A85)	
自主为顾客赠送礼物(B7)	在没有主管的指示下,能够按照活动安排把所需要的物品配备好(A121)	
自主控制工作节奏 (B47)	我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快速地保质保量完成工作(A199)	

表 1 标签化概念结果示例

接下来,我们对以上得出的 47 个概念进行聚合和归纳,依据各个概念之间在含义和逻辑关系上的关联将初始概念进一步抽象成独立的范畴,建立起初始概念与各范畴之间的从属关系。最终,我们得到"掌握顾客相关信息"(C1)、"适时给予顾客优惠"(C2)、"使用资源解决问题"(C3)、"自主选择工作方式"(C4)、"能开展跨部门协作"(C5)、"发表观点提出意见"(C6)等 21 个范畴(表 2)。

(二) 主轴式编码

在主轴编码环节,我们通过对以上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21 个范畴进行进一步聚类,最终得出"掌握工作信息权""工作沟通协调权""对客服务灵活权""工作安排自主权""问题发现反映权""决策参与建言权"等 6 个主范畴(见表 3)。

(三) 选择性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对主轴式编码所得出的独立范畴进行进一步归纳与总

⁽¹⁾ Miles M. B., Huberman A. M.,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New York: Sage Pub, 1994.

结,以确立核心范畴的中心位置。根据前面的编码过程及分析,6个主范畴共同指向"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在理论饱和度方面,我们通过第二阶段收集到6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构成因子。

五、研究结果分析与理论建构

表 2 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

范畴	初始标签
掌握顾客相关信息(C1)	获得顾客信息(B42);知晓顾客偏好(B32)
适时给予顾客优惠 (C2)	替顾客退换菜(B45);有权给顾客打折(B20);给顾客赠送菜品(B44);能够给予客人优惠(B06);给顾客打折或免单(B12);直接给顾客优惠(B36)
使用资源解决问题(C3)	自主使用资源解决突发事件(B11);自主为顾客赠送礼物(B07);给顾客赠送小礼物(B30);给顾客更换或升级房间(B34)
自主选择工作方式 (C4)	自主决定工作方式(B18);自主安排工作方式(B21);自主控制工作节奏(B47)
能开展跨部门协作(C5)	能够进行平等沟通(B24);要求其他部门配合(B31)
发表观点提出意见(C6)	遇到问题发表观点(B05);发现和反馈问题(B13)
制约上级及其行为(C7)	指出上级主管错误(B29);对上级提出意见(B19);能够制约上级行为(B46)
参与产品创新开展(C21)	能够参与产品创新 (B04)

表 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掌握工作信息权 - (D1)	清楚岗位工作职责(C9)	能够非常清楚把握所在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职责和标准
	知晓工作活动安排(C10)	能够清楚知晓即将到来的工作或活动的具体安排
	掌握顾客相关信息(C1)	了解或掌握客户喜好、客户细分、客户需求等信息
	清楚考核相关情况(C11)	掌握工作考核的方式、指标、规则、结果,以及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价、 反馈等
工作沟通协调权 (D2)	建立部门相互联系(C16)	不同部门间能够建立联系以实现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能跨部门平等沟通(C17)	在工作推进过程和合作中,能够在不同部门间进行平等、通畅的 沟通
	能开展跨部门协作(C5)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能够与其他部门的员工进行相互协调和配合
	越级汇报沟通工作(C18)	在一些紧急情况下, 能够跨层级直接向更高层级的管理者进行报告和沟通
对客服务灵活权 — (D3)	灵活应对顾客诉求(C12)	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态度和方式满足客人的需求
	适时给予顾客优惠(C2)	为了获得更高的顾客满意度或应对一些顾客投诉等情况, 能够适 时给予顾客一定程度的优惠
	自主提供个性服务(C13)	为了提高顾客体验水平和满意度,能够根据顾客特征提供个性化 的服务或产品
	使用资源解决问题(C3)	在对客服务尤其是处理一些应急情况时,能够获取和使用相应资 源来解决问题
工作安排自主权 (D4)	灵活安排工作内容(C14)	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灵活地安排具体的工作内容
	自主选择工作方式 (C4)	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按照自己擅长或者偏好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
	能够自主配置资源(C15)	根据完成工作的需要,能够自主地配置所需要的资源
问题发现反映权 (D5)	能够监督反映问题(C19)	能够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向主管领导或相关部门 反映问题
	发表观点提出意见(C6)	能够围绕工作开展中的现实议题发表个人意见或建议
	制约上级及其行为(C7)	不仅仅是被动的被监督对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上级主管 并约束其不当行为
决策参与建言权 (D6)	能够进行建言献策 (C20)	围绕企业发展及日常运行中的相关议题或决策,能够参与其中并建言献策
	参与产品创新开展(C21)	能够参与产品或服务创新活动
	能够参与管理决策 (C8)	能够参与企业或所在团队的管理决策,并发挥积极作用

(一) 权力需求的相互关系

1. 从权力产生的作用及其对象来看,6 项权力需求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员工为实现自身在工作中的自主性所需要的权力,包括"掌握工作信息权""对客服务灵活权"和"工作安排自主权",它们均指向一线员工希望在工作中不受控制和能够实现自主性的权力需要。按照几位访谈对象的阐述就是"我们希望在工作中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己说了算"(A77),本文将这一大类称为"自我控制"类权力需求。第二,权力的本质之一在于对外产生影响,"工作沟通协调权""问题发现反映权"和"决策参与建言权"是员工为了实现在工作中能够影响他人和组织所需要的权力,其本质是通过沟通协调、问题反映、决策建言等方式对外产生影响,本文将这一大类称为"互动影响"类权力需求。这样的划分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现有文献通常将权力划分为"个人权力"和"社会权力",前者指主体不受他人控制,可以自我掌控结果的能力,后者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能力。^{①②}

2. 在"自我控制"类型包含的 3 项权力需求中,"掌握工作信息权"是其他两项权力的基础,即只有在清楚、准确把握岗位职责及具体工作信息的基础上,员工才能够实现工作的自主安排和灵活的对客服务;"工作安排自主权"和"对客服务灵活权"均体现了一线员工希望充分实现工作中的自主性,前者代表了在工作安排、工作方式等方面一般的自主性要求,后者代表了在对客服务工作方面的自主性要求。"互动影响"类型包含的 3 类权力需求(包括工作中沟通互动、问题反馈和参与决策),展示了一线员工参与互动并产生影响的诉求。

综上可发现,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可以划分为"自我控制"和"互动影响"两大类型, 它们分别代表了一线员工在工作中的个人权力和社会权力,且这两类权力需求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 6 项权力需求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成"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

(二) 一线员工权力需求结构的作用机理分析

1. 权力需求结构的本质是一线员工在工作重塑和角色转变两方面的诉求,满足这样的权力需求能够促进一线员工实现工作重塑和角色转变。现有围绕领导授权行为的研究文献充分表明,向员工授予权力的核心目的在于减少科层制度的约束、^③增强员工在工作中的自主性、^④鼓励员工表达意见和想法、^⑤促进员工参与管理决策等,其本质是改变员工在被管理和控制下的工作状态和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授权能够让员工在工作中有更多自主性,促使员工产生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外行为等。^⑥因此,满足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能够促进他们实现工作重塑和角色转变。

2. 满足员工"自我控制"类权力需求,将使得一线员工从被动执行向自主工作转变,从被管控对象向自我管理者转变。现有研究表明,积极授予员工工作自主权,能够实现其在工作中的自我管理,并带

① Galinsky A. D., Gruenfeld D. H., Magee J. C., "From Power to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5, no.3, 2003, pp.453-466.

② Galinsky A. D., Magee J. C., Gruenfeld D. H., Whitson J. A., Liljenquist K. A., "Power Reduces the Press of the Situation: Implications for Creativity, Conformity, and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5, no.6, 2008, pp.1450-1466.

③ Ahearne M., Mathieu J., Rapp A., "To Empower or Not to Empower Your Sales For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Empowerment Behavior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0, no.5, 2005, pp.945-955.

⁴ Lorinkova N. M., Pearsall M. J., Sims H. P., "Examining the Differential Longitudinal Performance of Directive Versus Empowering Leadership in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6, no.2, 2013, pp.573-596.

⑤ Chen G., Sharma P. N., Edinger S. K., Shapiro D. L., Farh J. L., "Motivating and Demotivating Forces in Teams: Cross-Level Influences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6, no.3, 2011, pp.541-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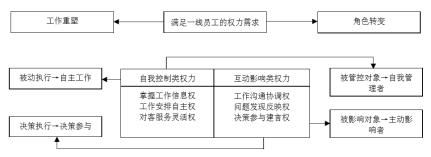


图 1 一线员工权力需求结构产生作用的机理模型

来积极效能。^①满足员工"互动影响"类权力需求,将使得一线员工从决策执行向决策参与转变,从被影响对象向主动影响者转变。一线员工对沟通协调、问题反馈和参与决策的权力需求,一方面是对工作内容的扩展,另一方面也是角色外行为的表现。以上这些均是工作重塑、职务重塑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趋势。

总体来看,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产生作用的机理在于,满足这些权力需求能够促进一线员工的工作重塑(被动执行→自主工作、决策执行→决策参与)和角色重塑(被管控对象→自我管理者、被影响对象→主动影响者)。因此,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的本质在于他们对以上工作重塑和角色重塑的诉求。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情境中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包括掌握工作信息权、对客服务灵活权、工作安排自主权、工作沟通协调权、问题发现反映权、决策参与建言权等6项权力。这些权力的前3项可被划分为"自我控制"类,后3项可被划分为"互动影响"类。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产生作用的机理在于,满足这些权力需求能够促进一线员工的工作重塑和角色重塑,权力需求结构的本质在于一线员工对工作重塑和角色重塑的诉求。

本研究结论对于实践的启示在于:第一,传统服务企业需要重新认识一线员工在创造顾客价值中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分满足他们在工作中对权力的诉求。服务企业的一线员工是对客服务和创造顾客价值的主体,管理者需要意识到服务绩效提升的关键在于激发一线员工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和积极性,并需要从员工的权力需求入手"自下而上"地打造能够适应所处内外部环境的新型管理模式。第二,认识一线员工的权力需求结构,能够让传统服务企业及其管理者深入把握一线员工希望被授予的权力,有利于企业从"授权内容"和"权力供给"的角度打造有效的授权管理体系。第三,授予员工所需的权力不仅是提高工作绩效的途径,更是激发员工工作动力的重要方式,满足员工权力需求能让传统服务企业打造更好的员工激励体系。

责任编辑:张超

①章凯、李朋波、罗文豪、张庆红、曹仰锋:《组织—员工目标融合的策略——基于海尔自主经营体管理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4期。

历史学

抗战到底的"底"与最后胜利

桑兵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国人齐声高呼的抗战到底,其"底"因人而异,至少有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收复东北失地、收复台湾以及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实现东亚永久和平等四种不同意涵。可见异口同声地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各自心中的实际底线却大相径庭。战略目标不同,手段自然有别。底一是战前国民党妥协路线的延续,其余则是由中国取胜日本的战略力量的有限性所决定,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才能彻底解决中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

[关键词]抗战到底 最后胜利 蒋介石 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111-23

全面抗战爆发,举国上下耳闻目睹最多的口号,就是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是全体抗日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共同意愿。在抗战的进程中,这样的口号内涵的笼统性时时引起各方的疑问,因而不断被拿出来讨论。在有识之士看来,抗战到底的"底",包含时间与空间,其时间性与持久战要多久大体吻合,至于空间,则各方的认定并不一致,有时分歧还相当明显。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各自心目中抗战到底的"底"的不同,反映了各方必胜的信心与和战的倾向,影响着抗战的进程。前人对此已经有所注意,蒋永敬、杨天石相继撰文,以蒋介石的抗战到底之"底"为中心,探讨相关问题,认为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蒋介石的抗战到底经历了以和为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到以战为主(完全胜利)的转变。①

蒋介石虽然是全面抗战的最高统帅,在抗战舆论和行事的实际运作层面,却不见得掌握了主动和主导,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势力的夹攻之下,摇摆不定,显得颇为被动。蒋介石和国民党之外,以中共为代表的各党派团体以及社会各界的抗战呼吁及其各种形式的行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决策行事,起到影响和制约作用。尤其是中共的对日态度及其对策,始终明确而坚定,具有标杆意义。放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整体脉络之中,可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战到底的"底",包括最后胜利的意涵究竟何所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一、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赶出中国

蒋永敬的《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一文,专列一节谈"抗战到底"的由来,指 1937 年 7 月 13 日蒋介石再度复电宋哲元,是其提出"抗战到底"之始。而 7 月 17 日蒋出席庐山第

作者简介 桑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浙江 杭州,310058)。

① 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1986年;杨天石:《"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抗战与战后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蒋永敬:《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次谈话会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即为"最后关头"的到来,可见"抗战到底"实源于"最后关头"的提出。1935年南京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所作对外关系报告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①据此,最后关头应为由退让妥协到决心抗战的关键,却未必决定了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战却并非先知先觉,全面抗战爆发前,他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广受诟病。在国人看来,面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早就绝望于和平,到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步步进逼,抗战到底的口号,即已正式见诸媒体。1933 年《国家与社会》第11 期发表署名"明"的时事短评,标题就是《抗战到底》,评论称:"抗战到底,是我们目前的奋斗口号。对国联,我们没有依赖侥幸的心理;对内,我们要有团结御侮的精神。热边战争是民族的生死战,我们不但要使热河不失寸土,而且要由此收复那沦陷的东省。"②这一短评不仅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奋斗口号,而且指出了不依赖外力、内部团结御侮的重要原则,并以收复东北作为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后来媒体报道平津学生团和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也使用了"抗战到底"的标题。③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以后,中共一度认为,只要国民党不正式对日宣战,所谓抗日就是假抗战之名,欺骗民众,因而采用反日的口号,希望掌握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实行中共领导的反日运动。^⑥ 为此,1932 年 4 月 15 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军民在苏维埃的红旗下直接对日作战。^⑥ 直到 1933 年华北危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才发表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⑥ 主张建立和扩大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鉴于东北和华北有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不再将反日(对日)和抗日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而是同时并用。^⑥1935 年,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以抗日取代反日。为此要求组成国防政府,行政方针第一点就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⑥1937 年 4 月,张闻天在《解放周刊》创刊号发表文章《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声明:"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华北事件之后,早已把日本帝国主义当做了中国民族的最大敌人,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当做了我们最中心的任务。" ^⑥上述变化转折,为中共自行提出抗战到底的口号奠定了政治基础。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共迅速做出反应,《解放周刊》第11期发表署名矢针写于7月13日的文章《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针对国民党历来的对日政策,认为日本各方面的言行,"充分地

① 蒋永敬:《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2页。

②明:《抗战到底》,《国家与社会》第11期,时事短评,1933年2月20日,第2-3页。

③ 安法孝:《平津学生团抗战到底》,《读书生活》第3卷第7期,1936年2月10日, 救亡信箱,第43页;《东北义军势力雄厚,准备抗战到底》,《华侨半月刊》第94期,1936年10月1日,第30页。

④《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4-120页;《请看!!!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1932年2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42-145页。

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6-638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2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41-645页。

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57-458页。

⑦《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1-222页。

⑧《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19、523页。

⑨ 张闻天:《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937年4月11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1937年4月24日,第4页。

证明着'和平'老实到了绝望时期。除了坚决下牺牲的决心,誓死与敌人周旋到底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不能重蹈九一八的覆辙,以为华北丢失后日本可以保证华中、华南的偏安,幻想以妥协来缓和日寇的凶焰,结果势必导致九一八的类似事件接连再现。"不管日寇发动的侵略行动行将立即爆发成为大规模灭亡中国吞噬华北的战争,或是利用猛烈的军事行动,以作为外交上压迫中国使实际上放弃华北的手段,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但一件事实已经证明得千真万确,即是华北已经危急,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大陆政策'已证明其没有止境。这样,倘若我们不抵抗,华北就沦亡,倘若抵抗,华北将可以永保,再没有第三条道路。而再一次证明只有抗战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问题,这才是中国应定的唯一国策!"①

然而,不仅投降派和汉奸说华北危急是夸大之词,包括国民党中某些负责人员、国民党官办或半官 办的报纸刊物以至《大公报》与《国闻周报》之流,都不敢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趋势的问 题,"他们公然希望日本强盗会'反省',他们甚至认定近卫内阁的上台是'可以因其中庸性格(!)而 对东亚大局起明朗化之作用',他们甚至公开提出'抗日是消极,建国才是主要口号',殊不知坚决抗战 的方针不确立巩固,任何国家都'建'不起来。"这一切根本谬误的认识,完全基于顾虑与企图用妥 协办法"保存"沿海工商业中心的私人权益,殊不知即使万分退让,在"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大 陆政策下,即使将这些"中心"完全让给日本而谋一安生之道,民族工业也唯有遭受尽情破坏而完全破 产。这同样证实了"只有经济建设才是国家急务"的误算,这一理论的提倡者完全忽略了日本强盗的侵 略凶焰,不会让中国有从容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必需的军事工业。不管提倡这些理论的人物主观上如何为 国家打算,客观上这些理论已经迷误了过去的国策而生了不少的恶果。"倘在现在的紧急关头还不清算 这些错误的见解而站到坚决抗战的立场上来,就只能使国家民族的前途蒙上不堪形容的损害,实际上也 只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遂行更加顺利而已。"以为承认日本提出的条件就可使其停止军事行 动,只能是完全断送民族国家的前途。"在客观方面说,中国已到达非抗战则灭亡的命运,在主观方面, 全国军民大众都一致认识非抗战无以求民族生存"。国民政府应誓死保卫领土主权,领导全国抗战,实 现团结救国的政纲, 开放党禁, 联合各党派, 给国民爱国的民主自由, 扑灭汉奸卖国贼, 放弃单纯防御, 首先在华北采用大规模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正面阵地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华北驻屯军。南京政 府似已下抗战的决心, 但是局部的或坚持到底, 有待证明。国民党当局应该信守诺言, 现在已经到达民 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了,应该坚持抗战到底。②

7月15日,朱德撰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提出抗战正从华北局部走向全国,必须上下一致,"抗战到底"。"尽管敌人怎样残暴,怎样强悍,在抗战到底的进程里,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③7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第二次宣言,正式提出:"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④7月26日凯丰的《唯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中国的出路》则指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的通电和宣言中,都是主张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而且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基本条件。"应本着蒋介石先生的谈话中所说的"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事实,只有决然"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必须立即实行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办法,"这是保障坚持抗战到底,保障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最好的办法"。^⑤

① 矢针:《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1937年7月13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9日,第5页。

② 矢针:《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1937年7月13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9日,第6-7页。

③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1937年7月15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第14页。

④《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7页。

⑤ 丰:《唯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中国的出路》(1937年7月29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第4页。

应否实行抗战的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才算是取得抗战胜利,也就是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的问题自然提上桌面。1937 年 8 月 25 日召开洛川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之一,即在实行全国性抗战的新阶段,"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① 抗战到底和最后胜利的基本原则是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具体而言,同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表示要"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② 为抗战到底的底划出了清晰的底线。

中共关于抗战到底之底的主张,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明确。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回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的提问,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斯诺进一步询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明确答道:"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③

1937年3月,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就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以及中日两国之间是否应该进行谈判等问题清楚地表示:如果日本愿意和平,我们不拒绝谈判。和平的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尊重中国的独立,两国地位完全平等;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自由飞航;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特务机关;禁止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横暴无理;禁止走私。"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④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明确宣称:"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战略反攻要"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⑤

至于蒋介石的抗战到底,虽然自全面抗战爆发之始就宣诸于口,实际上在战与和之间长期摇摆不定,尤其是在能否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对日议和的条件,还是真的决心战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东亚彻底和平的最后胜利的两权之间,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举棋不定。说蒋介石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经历了以和为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到以战为主(完全胜利)的转变,大体而言固然不错,具体而论,蒋介石始终在不欲战却不得不战、希望和却不能求和的两难中不断挣扎,其间既有以战促和的寄望,也有被迫死战的无奈。

蒋介石自视极高,以天赐中华民族的领袖自居,他本人的自期是:"我四百兆民众千年以来找得今日之领袖,以期拯救我民族,小子应如何奋勉,勿负其所期也。"^⑥说他一味想要投降,未免言过其实。可是正因为自认为身系国家民族命运,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又极不愿意过早对日决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即由此发生。同理,如果外力侵入威胁到他的合法地位,即超越其能够忍让的底线,为了自保,只能被迫应战。全面抗战前蒋介石的一再对日退让,与卢沟桥事变不得不被迫应战,以及此后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都是出自同一逻辑。

七七事变的当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慨叹:"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华北)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

①《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4-325页。

②《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7页。

③《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3-404页。

④《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4-485页。

⑤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周刊》第43、44 合期,第16页。

⑥ 《蒋中正日记》1939年,第11页。

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①战事初起,他认为日军仅仅意在华北,欲以战之态度致和。到淞沪战败,又转而听天由命。

与公开言论坚决抗战到底的义无反顾迥异,蒋介石在日记中坦露了自己内心的彷徨与迟疑。一方面,他知道已经到了不得不战的最后关头,否则自身难保。1937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抗倭必须到底,不背初衷,则虽败亦成。"^②10月31日的本月反省录进而全面总结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奏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决非想像所能及也。……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③

另一方面,在蒋看来,安内的大计尚未完成,战局如果陷入不利,势必加剧内部矛盾,同样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明知中日之战必然是持久战,却不愿意陷入长期战争的原因,可从 1937 年 12 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窥知:"考虑长期抗战最恶劣场合: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梏,社会纷乱。" ^④ 也就是说,蒋介石不相信中华民族可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又担心列强趁机侵夺,牺牲中国,所以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权位,便宁可对日妥协,而不肯全力御侮。

蒋介石不仅自大,而且量小,没有宁可我负天下人的豪强霸气,却充满天下人皆负我的怨妇式诅咒。他在日记里对相识者几乎无人不骂,中共之外,国民党内从宋庆龄、蔡元培、宋子文到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军政要员,社会各界从胡适、沈钧儒等知识界代表到黄炎培、张君劢等民主人士,全都痛骂不已,而且用词相当恶毒,似乎只有他才是救苦救难的尊神,其他人都是捣乱破坏的妖魔。他自认为只要全国上下都服从他一人,统一军令、政令,就能够抗战建国,无往而不胜,但实际上不要说客观上无力控制,即便得偿所愿,三军用命,举国一心,按照他的办法,要想战胜日本也几乎毫无胜算。作为党政军最高领袖,唯有全力抗战,放弃独裁,改革政治,才有可能赢得军心、民心。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大权独揽才能抗战,且总是将抗战不力委过于人,绝无可能得到全国的拥护。对于党内的求和妥协势力,蒋介石也常常表示愤懑,对投降派更加痛恨。1937年11月30日的本月反省录他写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是之易者,果何所据也。""毋惮初难,毋忘初衷,抗倭原定计划本以平汉与粤汉两路以西地区为根据,今日犹在其以东地区抗战,而一般文武人员意志其所以,诚不可与图始也。" ⑤ 不能说蒋介石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只是其民族利益的优先值,首要的还是自己的权位声望。

以个人的权位为考量基准,蒋介石的抗战不可避免地有些三心二意。在战与不战以及如何战等问题上,其决策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才能战胜日本,而是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中心权衡各种利弊得失。1937年12月11日的本周反省录蒋列举了必须一战的要因:"一、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党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二、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

①《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89页。

② 《蒋中正日记》1937年, 第124页。

③《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126-127页。

④ 《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139页。

⑤ 《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138页。

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也。三、不可失去本党革命性,更不可忘却本党革命责任,只要三民主义不灭,则国家虽亡犹存,只要革命精神不死,则战事虽败亦胜。四、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①战尚有一线生机,降则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会名存实亡,蒋介石的个人诉求与民族利益相当吻合。

日本全面侵华,同样与蒋介石的一己私利根本对立,只要日本不放弃侵华野心,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这使得本来不愿过早陷入对日战争的蒋介石退无可退,只能应战。而且只要日军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意图占领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不保,就必须硬着头皮抗战下去。沪宁相继失守,12月18日蒋介石的本周反省录总结道:"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 ②言和无异于自取灭亡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私见作为权宜之计,不失为国家民族之幸。

秉承上述认识,蒋介石面对各种言和与调停,均予以严词拒绝。1937年12月28日,他决定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次日,他约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谈抗战方略,主张抗战方针不可变更,"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③1938年1月2日,他严词拒绝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平代转的日方条件,认定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④后来蒋在2月28日的本月反省录中追记:"当余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篇,诸同志皆惴惴然以为激起敌国愤怒,从此更难应付。而敌国见此,亦发表一篇,认我国民政府为抗日主干,余乃知倭寇至此方悟抗日为余主动,其昔日种种恫吓,盖以为余必不敢主战也,至此其必悔料敌之错误乎?总之在本日外交、军事、政治、党务皆在动荡之中,人人以为恶劣可忧,吾则以为转危为安之机,或在此也。" ⑤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及其军队始终是心腹大患,即使全面抗战初期同意接受中共一起抗日,也没有正式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并在各方面想方设法加以限制甚至削弱。在他看来,日本和中共都是其统治的威胁,而且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必对东亚乃至世界造成大祸。但在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威逼之下,他宁可选择容纳中共。1938年1月12日,他研究对倭之心理及态度,推想四项:"甲、中国真正放弃容共抗日政策,表示为东亚和平计,与日本进行确实提携之态度。乙、保卫日本在东亚实在地位。丙、履行日本所任世界之反共义务。丁、克尽中国善后事宜,故必须取消蒋政权。"^⑤一个月前,他即做出判断:"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狯【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⑦也就是说,在中共与日本之间,蒋介石的取舍完全在于哪一方对自己的威胁更大。

二、恢复七七以前状态的以战致和与最后胜利

蒋介石的抗战,毕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华北与沪宁失利后,面对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其在战和之间再度犹豫不决。自 1938 年初起,与日本和谈的问题就不时出现在蒋介石的考量之中,而和谈的条件,并非如他公开表态,必须保持一切领土和行政的主权独立,而是只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就可以作为和谈的基础。开始这些还限于他本人的私下盘算以及暗中操作,1938 年 3 月 22 日,蒋在日记中记道:"言和条件如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一和。昔之不能解决东北问题,以其政

① 《蒋中正日记》1937年, 第143页。

②《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146页。

③《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148页。

④《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2页。

⑤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599-600页。

⑥《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5页。

⑦《蒋中正日记》1937年,第143页。

府不能掌握军队,若果当时解决,则仍不能免于一战,于我国地位更坏也。"他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讲演的第一讲的要旨是:"甲、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乙、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丙、只要于国有利,则一切和战责任我愿不顾一切,负责断行,但此非其时也。"在他看来,"此时将到可和可战之时期,不难转入主动地位,戒之慎之,勿失时机。" 其内心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彷徨完全浮现纸面。

其实,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应战,一方面是认为一味退让很难让日本停止侵略的步伐,另一方面则是意欲以战致和,希望引起国际干预,其欲达到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对于中共和全国民众而言,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正是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结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毛泽东即多次对此表示坚决拒绝。迫于国内各方的压力,虽然国民党内高层的求和呼声不断,但蒋介石更加在意的却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他认为,如果"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失败也"。^②"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而英国现下态度"对倭不接,对我不离,不无可虑。尤须防其于彼有利时,则与倭妥协,而劝我屈服"。^③据他判断,"俄自张鼓峰停战协定以后,于三年内,再无加入远东战争之望;而英美虽竞争造舰,但在三年内,亦决无干涉中倭战事之望。此时大势更明,我应速定五年抗战计画",实行各项改造政策,以期自力更生,独立抗战。^④鉴于英法无力保证捷克安全,应对日本和谈,自然依靠不上第三国的保证,须"要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⑤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的完整居然可以并行不悖,这样的看法他人显然很难接受。

此时欧洲的战争已经日益迫近,这对坚持认为中日之战与国际形势紧密关联的蒋介石的和战权衡颇具影响。9月26日,蒋觉得"若欧战不起,则可和当和"。次日,国联决议对日经济制裁,蒋表示:"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只是和议存在弊害:"甲、停战后,倭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乙、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丙、英美不悦。此三害皆应注意。"所以同时认为:"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武汉问题犹在其次也。"⑥其时武汉战事不利,国民政府负责对日和谈联系的萧振瀛在香港与日本特务和知鹰二会谈。蒋指示不可抱有成就之望,拒绝无商量余地之事,具体条件不可书面示彼。⑦同时考虑对日停战撤兵方法,包括分区交代、交接时期地方治安维持方法、交接时防止误会与冲突之手段,预防察绥与冀东问题及伪组织之处置等。停战撤兵后,先订不侵犯条约,后商互助协定,划定国境。⑧求和的方案日渐清晰,但是对于和议的效果及其影响,则颇为担忧。

形势的复杂多变,令蒋介石的和战态度更加纠结。10月3日,蒋介石意识到媾和危险在于,敌军不会轻易放弃已设立的支院与特务总监及不撤走驻扎在华北、上海、察绥的军队。停战后须对内宣言,外交以公开、平等、信义、独立为原则,并抚慰死伤军民。^⑤武汉失守后,11月2日,蒋自我激励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撼。" ^⑥次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军已攻占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已成一地方政权,如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其溃灭前断不收兵。两天后,蒋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指示参政会宣言对日本政府的声明不予理会,亦不提和战正题。他认定的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即坚忍不拔之志,取得最后胜利。

①《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25-26页。

②《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47页。

③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册,第621-622页。

④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册,第629页。

⑤ 《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84-85页。

⑥ 《蒋中正日记》1938年, 第86页。

⑦ 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2年,第342-344页。

⑧ 《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88页。

⑨ 《蒋中正日记》1938年, 第88页。

⑩《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99页。

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克服中国之野心丧失是也。" ^①12月9日,蒋与党政同仁谈话,声言半年内不可稍涉犹豫,与日人谈妥协。"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 ^②而当汪兆铭问中国将以何为媾和条件时,答称对外表示,当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情形为条件,唯措词仍当慎重。 ^③可见蒋介石的不妥协、不言和,只是应对日军的不停战,其心目中的媾和条件,还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

1938年12月15日,日本正式设立兴亚院。此举令蒋介石感到和议无望,"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欲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 ^④12月26日,他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对近卫声明提出的东亚协同体、日满支不可分等,予以严辞驳斥。^⑤

蒋介石坚持抗战,一定程度上是对日本政府无视其自以为至高无上之权力地位的抗争,在心底,他并未放弃议和的诉求。1939月1月9日,他拟订的和平原则为:"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根据或余地,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⑥其中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只是恢复和平的先决条件,而保持领土、行政、主权完整,则是基本原则。在1939年1月下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阐述了上述原则。

问题是,如果由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实现和平,是否就意味着抗战结束?如果这样的停战不能收回包括东北在内的全部领土主权,抗战到底的底是否别有所指?此事很快引起广泛争议。2月17日午后,国民参政会集会,参政员褚辅成、林祖涵等主张宣言解释"抗战到底"一语之意义,并主张认定九一八以前状态之恢复为抗战终止之期。这与蒋在五中全会秘密表示主张以七七事变以前状态之恢复为抗战终止之时明显有别。次日午后,参政会继续开会,蒋介石以政府代表资格发言,申述抗战到底一词之意义不可明白宣言之理由。与会者一致通过宣示应继续抗战,但对于抗战到底之意义不加以解释。②

国民党关于"抗战到底"之意义的模糊处理,首先是为对日妥协留下必要的回旋空间,以便届时对内对外有所托辞,可以交待。中共中央从各方面获悉了相关消息,于 1939 年 2 月 25 日发出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蒋在五中全会前后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与防共,最后要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同时,五中全会的公开文件,虽未明白表示这类意见,但其实质上亦包含有抗战最高目的为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状况,及不依靠民众而依靠外援……这些缺点错误的根源,基本上是由于蒋和资产阶级对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历来就与我们有不同的路线,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为此,中共采取的对策是,拥护彻底抗战路线,克服不彻底抗战路线,但批评时一般不正面提出,作为一般解释的方式提出。⁸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严正声明:"必须打

① 《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102页。

②《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112页。

③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印行,第164页。

④ 《蒋中正日记》1938年,第114页。

⑤《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行,演讲,第569-588页。

⑥《蒋中正日记》1939年,第9页。

⑦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 182-183 页。

⑧《中央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9-30页。

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① 5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的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发表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话,再次声明: 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打到鸭绿江边,争取最后胜利。 ^② 这可以说是对国民党妥协言和主张的正面回应。

5月30日,《解放周刊》第72期发表时评《抗战到底的正确认识》,详细阐明了中共关于"抗战到底"的态度:

抗战到底虽已成为我国的既定国策,但什么是"抗战到底"?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今天尚有严重的基本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抗战到底,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思想,它一方面把东四省放在我国领土之外,结果,必然在事实上默认在日寇操纵下的伪"满洲国",而自愿的破坏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另一方面,表示对敌人存在着最有害的幻想,以为敌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或者是"知难而退"。同时,他把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寄托在国际间对日本的压迫,再演一次"三国还辽"的历史,而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样必然会放松我们长期抗战的准备,不认真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准备将来之反攻,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去。……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指中国彻底战胜日本强盗,不仅在华中华南华北予敌人以打击,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寇出中国国土以外,否则我们抗日的使命就没有终结,抗战也不能罢手。这一次战争,不仅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是决定东方历史前进的途径。③

围绕"抗战到底"之"底"的分歧争议,不仅是对日态度的差异,而且反映了相关方面对于内外矛盾轻重取舍的政略动向。中共的判断是,对日妥协即投降,而投降与反共互为表里。6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反对投降危险,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及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要向一切爱国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说明反共即准备投降。

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上下万众齐声高呼的"抗战到底"口号,与"最后胜利"联为一体。连中政会主席汪精卫都曾亲笔题字: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⑤还有人将"持久战"改为"永久战",提出"坚持永久的继续的抗战到底,牵动世界规模的全面战,绝对战,疲敝战,坚持永久战,以获得最后胜利也"。⑥起初最后胜利的意涵比较笼统,董仲竾撰文指出所谓"最后胜利"不是理论,而是事实,针对日本的速战速决,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至于如何争取,则主要是养成必胜信念,坚定必死决心,条件则有国际同情,正义精神,举国一致以及倭寇危机四伏。⑥

在简约的口号形式下蕴含丰富的内涵,易于不同的人群各取所需地加以解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1937 年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时宣称:这次对日抗战,就是第二期革命。第一期革命是打倒军阀,经过许多年的奋斗,才能达到目的。这一期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日民族求生存,自然比前期的革命更难,不是侥幸可以达到目的,必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能成功。[®] 张健甫撰文指出,中日大战是中国民族生与死的斗争,在民族存与亡的关头,战争将使中国民族得到神圣的解放的胜利,登上独立的自由的高峰!必是甲午以后 40 多年中日关系的总结算!是民族解放自卫神圣的战争,是推翻日本帝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1939年4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36-137页。

③ 《抗战到底的正确认识》,《解放周刊》第72期,1939年5月30日,时评,第1-2页。

④《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80-81页。

⑤ 《题词》,《时事类编》第5期特刊,1937年11月25日。

⑥ 纪五:《神圣抗战与最后胜利》,《抗敌呼声》第1期,1937年11月1日,第9-10页。

⑦ 董仲竾:《长期抗战必获最后胜利之因素》,《抗敌旬刊》第2期,1937年12月20日,第5-8页。

图 邵令江:《持久战的精神条件》、《新粤周刊》第1卷第18期,1937年12月1日,第5-9页。

国主义压迫的战争,是中国人民以死求生、拼命求存的战争。^① 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把抗战与建国联系到一起,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

抗日战争被赋予如此众多且重大的意涵,要取得最后胜利,绝非易事。与此相连,抗战到底的底已经不限于地理概念,而是扩大为政治概念。社会舆论关于抗战到底才能最后胜利的意见,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中日战争是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必须战至最后,分出胜负,才能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前,有人已经明确指出,中日纠纷,非在不投降即抗战两条路中选择其一不可。而抗战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必须采取大军游击战的形式,克服武器落后的缺点。敌人不能作持久战,是最后胜利的大保障。中国不能用主力阵地决战的方式打倒敌人,也不能只是完全依靠正规军作游击战,必须广泛发动民众。②顾森千指出,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称日本大陆政策与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两大使命相互对立,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坚决抗战,拼全民族的生命,战至一兵一卒。这样伟大的抗战,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③顾希平与之意见相同,指出"抗战一经发动,我们中国面前很显明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复兴之路,一条是黑暗的灭亡之路,不走灭亡之路,就要跨上复兴之路,不能跨上复兴之路,势必走到灭亡之路,二者必居其一,决不容许我们在歧路上徘徊"。④因此,即使战况不利,也非抗战不可。要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⑤如孙福熙所说:"抗战是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死关头,在你一生,在我们民族的一生里,抗战只有这一次,战胜了,从此无需再战,不战而败,从此不能再有抗战这一类光荣的事实了!"⑥

施复亮从"最后胜利"的角度论述了抗战到底,他认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或是中国从半独立国降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完全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完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奴隶,或是扫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恢复一切失去的领土和权利,建立自由独立的新中国,达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前者是日本得到'最后胜利',后者是我们得到'最后胜利','最后胜利'只有一个,不是我们得到,便是日本得到。现在全中国人,除了少数汉奸和恐日病者,几乎一致地说'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所谓'最后胜利',自然不是指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乃是指根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达到中华民族解放的决定的胜利。的确,只要我们能够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才不会因一时的局部的失败而灰心。"最后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大家努力去争取,在许多必要条件中根本的有两个,一是发动民众运动,一是恢复"联俄政策"。②

林运铭的分析最为详尽,他说:"我们不能不抗战到底,委曲求全就是等于自杀,中途讲和就是等于投降。中国人太爱和平,才有今日的危弱,危弱之后仍是爱和平,那就是该灭亡的民族。我们固然和英美一样爱和平,但我们却不愿为英美爱和平的代价。"英美为求和平,无妨迁就事实,我们必要打破事实,寻求生存。"如果得不到生存和独立,我们宁愿抗战到底。日本人惯以事实造出理由,英美人喜就事实寻求办法。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事实来保障我们的生存。抗战是最具体的事实,亦即最有效的自卫行动。我们宁愿以抗战保卫世界的和平,不愿为世界的和平牺牲我们的抗战。"中国人过去中了太爱和平的毒,微微受一点苦,便渴想和平,甚至好些平时高谈抗战的青年也想过"苟活偷生"。日本人可以牺牲来侵略,我们倒不能忍痛牺牲去抵抗,这种民族还配存在!老是希望别国抗日,不见得对中国有益。中国不能不抗战到底的理由:第一,一旦开战,中日双方都不能言和,只有战至最后决定胜负。第二,中日都是生死存亡的战争,问题不解决,绝对不能妥协。第三,是世界大战的一环,世界战争

① 张健甫:《抗战到底, 牺牲到底》,《少年周报》第1卷第18期, 1937年7月29日, 第4-7页。

② 九天:《对日抗战胜利前途的估计》,《力文半月刊》第4期,1936年9月15日,第12-14页。

③ 顾森千:《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读书青年》第2卷第12期,1937年7月25日,半月评论,第5-6页。

④ 顾希平:《"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抗敌先锋》第3期,1938年1月15日,第6-8页。

⑤《非抗战到底无生路可言》赖(琏)特派委员十一月十五日在本部总理纪念周报告,《中山周报》第155期,1937年11月23日,第1页。

⑥ 孙福熙:《第二期抗战胜利无疑从此无需再战》,《前线旬刊》第2卷第9期,1939年5月1日,第5-7页。

⑦ 施复亮:《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文化战线》第1期,1937年9月1日,第8页。

无法避免,中日战争也绝对不能停止。第四,抗战是中央决定的国策,抗战到底才有出路。日本放出讲和消息,目的在于松懈我们抗战的决心,应积极抵抗,严厉驳斥,绝对不容许以中国为各国和平的代价。 万众一心抵抗到底,为唯一的救国办法。^①

其二,敌强我弱,战争是长期的,无论遭受多少挫折失败,必须坚持到底,才能最后取胜。淞沪会战将近尾声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在中央社发声,表示长期抗战的计划和布置,由蒋委员长领导许多有力量的同志制定实施,只要严格照办,最后的胜利,早早晚晚终能够实现。"经过了无数的进退,销耗了好些好些的日子,才决定一个真正的胜败,这方才叫做长期。能够长期,是利于我们,不利于敌人,故敌人利于速战速决,我们利于长期抵抗,长期抵抗了,最后的胜利,自然必属于我。要长期抵抗,就必定是有进有退,长期抗战中的进退,是应有的过程。那末我今天有点小小的贡献,就希望大家不要把这过程中的进退,误看做胜败。"②一时的得失,并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

全面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失利频频,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的把握问题日益凸显。于苇撰文认为六个月的抗战军事上遭到相当的挫折,后方失败主义滋长,主要出于一般人对"最后胜利"认识不清。弱小民族的抗战,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失败不可避免,因此,我们所争的,乃是"最后胜利"。最后胜利是由许多失败经验的累积与弱点的克服而造成的,须经过一个长期的抗战才能达到,问题在于中国能不能长期艰苦地抗站下去。只要能长期抗战下去,不断克服种种缺点,扩大增强战斗力,则最后胜利终有一天会到来。^③

李圣三讨论了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的关系,指出:"'抗战到底'就得到'最后胜利',……所以'抗战到底'乃是最后胜利之关键。吾们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全看吾们能否'抗战到底'。抗到底,就胜利,抗不到底,就失败。抗到底,就得到独立平等自由,抗不到底,就沦为万劫不复的亡国奴隶。……所以吾们要求'最后胜利',就必须'抗战到底'。因'抗战到底',所以有'持久战'。'持久战'的内涵,有力量与实践两种质素。'抗战到底'必须有其力量与其时间,有时间便能久,有力量便能持久。因时间以运展其力量,有力量能充实其时间。"有决心与实力便能抗战到底,抗战到底便是最后胜利。^④

其三,必须增强信念,振奋精神,勇于牺牲,积极斗争,不能坐等胜利的来临。强毅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一句话凡属中国人或全世界同情于我们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军阀的日本,都是绝对相信的"。可是华北几省即将沦陷,上海战线又要后撤,敌人的飞机大炮日夜不息地到处狂轰滥炸,"我们又怎么能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呢?"抗战要把握最后的胜利,先决条件是长期抵抗,争取国际援助,使日本内部发生革命,或经济恐慌。"但是我们最紧要的条件,第一是政府必须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第二是人民必须全体动员参加抗战。"假如自堕信念,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会发生动摇。既已发动民族抗战,就只有愈挫愈奋。现代战争是整体的、全面的,因此抗战必须全民总动员,前线冲锋陷阵,后方接济资源,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万众一心,共同担负抗战责任。沦陷区人民应拒绝供给敌军,设法破坏敌人阴谋,自动组织游击队,进行扰乱和攻击,消灭敌人。人民在积极方面应该牺牲生命财产,尽量供给政府,增强抗战力量,消极方面不与敌人合作,不资敌粮食等。^⑤抗战是拼命,不是战胜日本,就是被日本灭亡。只有抗战才有出路。战事失利,是因为军队和人民没有很好地联在一起,政府和人民没有很好地站在一起,只有军事动员,没有民众动员。只要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结成一条线,大家一条心,决心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⑥

① 林运铭:《抗战到底是中央既定的国策》,《新粤周刊》第1卷第16期,1937年11月8日,第16-17页。

② 吴稚晖:《长期抵抗必然胜利》(中央社 1937年11月8日),《半月文摘》第1卷第3期,1937年11月20日,第69页。

③ 于苇:《释"最后胜利"》,《抗战三日刊》第36号,1938年1月13日,第6-7页。

④ 李圣三:《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二十八年元旦于观音峡),《经世战时特刊》第31、32合期,1939年2月1日,第1-9页。

⑤ 强毅:《把握住最后的胜利》,《生力周刊》第1卷第9期,1937年11月13日,第139-140页。

⑥ 承可:《抗战到底,终必获胜》,《抗敌周刊》第9期,1938年1月9日,第2-3页。

随着战局的进展,人们的心理不断发生变化。战事不利时,不少人主张从速讲和,收拾残局。待到形势逐渐好转,尤其在鲁南大胜以后,一般人又抱着最后胜利已经来到的等待心理。^①战局陷入胶着时,"往往有人好像隔岸观火似地问:'这末打下去,什么时候才是最后胜利呢?'对于这种人,我们首先得问他:'你对抗战尽了些什么职责?'一个中国人,关心着祖国抗战的胜利,诚然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不过要想'收获',还得先去努力'耕耘'。……我想,简直可以这末说:'当每一个中华儿女认识和参加了抗战的一天,也就是抗战胜利开始的一天!'"^②

为了能够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社会各界纷纷出谋献策。有人提出,必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召集国民大会,立刻组织和武装民众,给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等政治自由,建立民主集中的政治机构,以加强抗战领导。^③ 有人提议召开国防代表大会,才能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确保抗战的最后胜利。^④ 还有人详细列举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实行民主集权、利用外援、国民军事化、努力生产、准备金融、扩充军备、肃清汉奸、精诚团结等。^⑤

方振武分析了全面抗战初期"最后胜利"的信念从坚定到动摇的演变,指出,从抗战开始到苏嘉线未失为止,"可以说'最后胜利'的信念坚不可破地建立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的心灵。可是及至苏州沦陷,江阴要塞被毁,首都为战略而弃守的时候,国人脆弱的理智,于是就开始动摇,对于各自的最后胜利的把握,便发生怀疑。这种现象,就一般不明此次抗战所由发生的人们,或者是不明白我们抗战应取战略的人们,原无可怪,然而把这种脆弱的心理就整个抗战的前途来看,却又是一种极可怕极要不得的心理。""我们要知道,最后胜利虽然有属于我们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凭了什么或用什么去获得最后胜利。"抗战半年的教训,每个国民应加以检查反省。"只要勇于接受失败的教训,正视血的教训,不断寻找我们'抗战的据点',最后胜利仍旧必属于中华民族。"而胜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善用游击战争。"今后我们参加在伟大的民力中,做一个战斗员,是我们顶高的目的,可是,领导他们在方法上、战术上去表现整个大中华民族伟大的力量,以歼灭敌寇,却又为我们获得最后胜利的焦点!"⑥

文化界也纷纷贡献自己的意见,哲学家陈唯实提出争取最后胜利的两大原则:第一,实行全面的全民抗战。第二,实行彻底的持久抗战。反对悲观消极、唯武器主义、弱国失败论、抗日必亡论,反对汉奸亲日派卖国贼的妥协屈膝。为此,应赶紧实行十大救亡办法,作为争取最后胜利的保障:一是全国军队革命化,实行军事总动员,由国防会议统一意志与作战。二是实行全国总动员,组织武装全国民众。三是联俄。四是全国进行反汉奸运动,肃清汉奸。五是改良政治机构,实行开明的民主政治,给人民自由。六是实施国防经济。七是改善人民生活。八是开展抗战教育运动。九是拥护国际上英美法的和平阵线,争取援助,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十是联合日本国内的被压迫民众和弱小民族。教育家白桃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军队加紧政治训练,提高士兵的政治标准,认识抗战意义;立即实施抗战教育,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教育民众。诗人穆木天认为:最主要是动员全国民众,加强内外政治宣传,联合民主国家。小说家艾芜同样认为最主要是组织训练民众,知识分子应回到本乡本土宣传。社会科学家胡绳批评许多人把最后胜利的口号看得太机械,变成宿命。如果不积极加强主观力量,争取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现阶段主要应集中于两点,第一,给予汉奸的和平妥协企图以彻底打击,使肃清汉奸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第二,组织广大群众自发开展抗日运动,逐步提高成为武装的自卫抗战。只有广大群众自身的力量才是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可靠的力量。广大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在游击战形式下对侵略者全面反攻的时候,中华民族才真正地面对着光辉的胜利了。^②

① 石戈:《团结到底, 抗战到底》,《动员周刊》第1卷第14期, 1938年5月1日, 短评, 第9页。

② 蒲军:《抗战胜利的时候》,《少年时事读本》第1卷第22册,1939年2月20日,第2-3页。

③ 陈冠南:《怎样才能维持抗战到底》、《文化战线》第5期,1937年10月10日,第11-13页。

④金丁:《怎样确保抗战的最后胜利》,《民族呼声》第6期,1937年11月5日,第11页。

⑤ 贺幼宾:《全面抗战怎样才能争得最后胜利》,《湘中学生》第10期,1937年12月,第17-18页。

⑥ 方振武:《从最后胜利说到游击战》,《文艺月刊》第1卷第7期,1938年2月21日,第138页。

⑦《文化人对于争取最后胜利的意见》、《文化新闻》第2卷第1期,1937年12月10日,第4-7页。

最后胜利必须努力争取,创造条件,而不能坐等,成为普遍共识。有人撰文指出:"自从抗战以来,无论上自军政领袖,下至贩夫走卒,都莫不异口同声地嚷着'最后胜利','最后胜利'。……然而,口号还不过是口号罢了,这'最后胜利'的到来,决不是我们喊了几句口号便可以获得的;必须要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儿女们,在某一些必要的条件之下,来继续努力的不断奋斗才能达到。如果不从积极方面去努力一些实际的工作,而只站在旁边不负责任的高喊什么'最后胜利','最后胜利',这不只是最后胜利的罪人,简直是民族解放的罪人!"争取最后胜利的最低限度条件,包括展开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和武装民众,肃清汉奸和亲日派,增进军队的政治教育,切实遵守持久战、消耗战原则,避免决战,广泛发动游击战,与主力配合歼敌。^①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并不是说会从天上掉下来,究竟应该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有人认为,第一,要不怕困难艰苦,绝不中途妥协。第二,记得血的教训,不分上下、阶层、宗教、信仰、派别,精诚团结,一致抗战。第三,实行宪政,无论何党、何派,只要站在抗战的旗帜下,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利。要得到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必须团结到底,要团结到底,"就非实行宪法,使政治民主不可。只有实行民主的政治,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②

如何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精神的作用得到彰显。此次全面的抗战,大家都说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也有不少人怀疑最后胜利的把握究竟有多少?在什么地方?有人阐述说:"关于这种怀疑,可以不必犹豫的解答说:'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有十分之七,这种把握的基础就在一致的民气或一致团结的民族精神。'这个解答粗看去似乎很空洞,民气或民族精神究竟是什么?怎么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它敌得过飞机大炮么?它抵得住坦克车么?是的,我敢大胆的说,它不仅敌得过飞机大炮,抵得住坦克车,还能战胜仇敌,恢复国土,使我们这五千年的古国万古长存。民气是什么呢?说得浅显点,就是前线将士的勇气、杀气和战胜仇敌的决心,也就是后方民众的敌气、怒气和誓不两立的决心。"民气也叫民族精神,比什么飞机、大炮、坦克车都厉害,是全面抗战的利器。一战时德国名将鲁敦道夫说:"一致团结的民族精神是全体战争的基础……真正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败的是民族精神力。"既然"我们现在有的只是这一种民族精神力,我们就拿这去堵塞敌人的大炮,去击落敌人的飞机,去毁灭敌人的坦克车,而得到最后的胜利"!^③

总之,抗战到此阶段,我方需要以最大牺牲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机,敌人也会全力挣扎苦斗,"我们愈坚强,敌人愈焦急,手段也愈毒辣。所以此时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畏怯,应集中全国的力量,以坚毅之意志,钢铁之信心,持久之抵抗,英勇之突击,把握此最后胜利的关键。"^④民众争取最终胜利的决心是对国民党以战致和的极大抑制。

三、追究甲午失地

蒋介石准备接受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为与日本议和的条件,这与国人抗战到底的要求大相径庭,只能暗中进行。相比之下,中共打到鸭绿江边、将日寇赶出中国的主张更符合社会各界的期待。65岁高龄的沈钧儒代表文化界到前线对将士们说,"人们常问我'底'字究竟作何解释,它的限度如何?我答道:'日从何处来,驱从何处去。就是说,把日本人赶出东北,便是抗到底。'"⑤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利用英法调停,汪精卫发表"调停之门未闭"的谈话,全国哗然,南洋侨领陈嘉庚及上海各公团纷纷质问。参政会二次大会上,抗战到底的情绪弥漫全场。蒋介石致电大会,称预计最后胜利之信念,必待敌人侵及平汉、粤汉两路以西,而后以我整个民族无上奋斗之实力,全国呼应,与之作一殊死之决战,

① 思燕:《最后胜利的条件》,《克敌周刊》第5期,1938年4月9日,第4-6页。

② 友群:《谈最后胜利》,《新道理》第13期(革新号),1940年11月1日,第18页。

③ 科美:《最后胜利的把握》, 短评二,《八一三半周刊》第3号, 1937年9月8日, 第3页。

④ 何永德:《把握最后胜利的关键》,《青年半月刊》(中国青年励志会) 第25期(抗敌特刊),1938年10月15日,第1页。

⑤ 《抗战到底》,《少年时事读本》第1集第9册,1938年11月7日,第17页。

乃克有彻底之实现,也引发各地舆论的指斥。^①人们不满足于蒋介石主权完整、行政独立的含糊说法,明确表示:"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子,不仅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并且要收复东北四省,打到鸭绿江边,把敌人赶出了中华国土,到那时候,我们才算是取得了最后胜利,也就是抗战到底的底子。"丢掉东北四省,就是因为"没有抗战的决心,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想求得屈辱的和平"。^②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以领导全国抗日的名义,大力主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 个政府、要求加强集权统一、进一步打压中共。可是在其主导下的片面抗战却节节失利。抗战到底、 最后胜利的舆论宣传,逐渐形成拥护领袖、加强统一集权与主张民主改革的分野。有人主张,要争取抗 战胜利的前途,必须有统一的政治基础,必须绝对服从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 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一方面攻击中共无稽地指责政府,以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仰,一方面夸大地宣 传自己,以扩大自己对人民的影响。根本不提加强政治基础的前提是改革政治。③有人宣称,国民党临 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要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许可言论、出 版自由,但不是漫无标准限度,既要自由,又要统一,要加以约束。对政府和领袖,不能怀恨、嫉视, 别存怀抱,隔岸观火。若在政府领袖指示抗战的途径之外,别开蹊径,使政府领袖的精神再分注于内部 集中意志力量。并重申蒋介石 1934 年 7 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所说,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是御 侮图强方法中最要紧的一个原则。认为要先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以为一心,才能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 体以为一体,必先有共同思想,才能发生共同信仰,才能发生共同力量。必须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 之三民主义,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 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务企图。以此作为纠正思想之准绳。凡是违反不听纠正 者,即为国民公敌。^⑤有人断言,只有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来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怀疑三民主 义是抗日的最高原则者,不配站在抗日前线。不相信国民党能够担负起领导全民抗战的任务,就是抹 杀革命历史的事实。^⑥

还有人声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当局即"深知岛寇处心积虑,图我益亟,非决一死战,国家无以自拔,民族无以自存,于是任劳任怨,深筹熟计,困心衡虑,以求一决耳。故于国家实力准备未臻充分以前,绝不附和立即抗战之主张;而于和平绝望,最后关头已届之时,即以大智大勇大无畏之精神,毅然应战而不辞,并告诫国人应忍受艰辛,不屈不挠,非达最后胜利之目的,决不中止,毋存丝毫悲观畏缩之念,全国上下,必须奋斗牺牲,发挥民族伟力,以促敌人之崩溃,谋我民族之复兴。"抗战爆发伊始,政府就昭示全国国民"民族至上""国家至上""长期抗战""最后胜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高领袖则训勉全国国民"闻胜勿骄""闻败勿馁","和平未至绝望时期,不轻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中途妥协,自取灭亡"。"国家之欲得独立,民族之欲自由,自身之欲求生存,领土主权之欲求完整,对外之'解放战争',乃为不可避免之事耳。"强国均由对外战争而成,"吾国抗战国策,既以'长期'闻矣,故非至'最后胜利''必胜''必成',决无已时。而救国建国,责任艰巨,非一朝一夕三五人力所能致果,必赖乎全国国民为完成此千古伟业之主力。惟此主力,须于贤明领袖领导之下,以不骄馁不畏艰辛不惜牺牲之大无畏精神,一心一德,共赴大难,斯则最后胜利之来临,民族国家之强盛,为期匪遥矣。"全国国民,益当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心,继先烈建国之精神以

① 定中:《全国一致抗战到底》,《译报周刊》第1卷第4期,"每周瞭望",1938年11月2日,第92-94页。

② 冷生:《抗战到底的底子:要收复东北四省,要打到鸭绿江边》,《伤兵之友》(江西)第44期,1939年9月20日,第2页。

③伯仁:《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苦斗》第1卷第8期,1938年4月11日,第5页。

④ 牛若望:《抗战到底和最后胜利的把握》(1938年6月16日),《益华报》第2卷第25期,1938年,第394-396页。

⑤ 张强:《集中民族整个的力量, 迎取最后胜利的曙光》,《胜利》第38号, 1939年7月29日, 第2-4页。

⑥ 詹德汉:《只有站着三民主义的立场来抗战才可以获得最后胜利》,《民众动员半月刊》第2期,1938年1月31日,第5页。

完成三民主义之新中国。①

然而,蒋介石不断集权统一的结果,除加剧内部磨擦之外,并没有带来对日战事胜利的喜讯,装备大幅度改良而且得到充分整训的国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依然不堪一击,而国军早就宣称的反攻却很少奏效。有鉴于此,1939 年国民参政会开幕时,参政员张君劢、左舜生、江恒源、张申府、孔庚、王造时、陈绍禹等不约而同提交的七个提案,其中包括在朝在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者,结语都归束到请政府实施宪政。虽然社会上还有不同论调,或调子较高,或担心跑得太快,或顾虑于抗战有无障碍,或认为宪法草案等还有研究余地,但黄炎培以为施政论政,"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即思想的演进应不取限制,但行动必须准诸事实"。^②后来他还主张以宪政运动争取抗战胜利。

邹韬奋在中国人权运动倡导者周鲸文创办的《时代批评》上发表文章《实现民主与抗战胜利》,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要大声呼喊实现民主,因为我们不但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实践而不是空喊建国与抗战并行,而且为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迅速到来,我们也非赶紧实现民主政治不可。"该刊实际上反映了东北三四千万同胞对于国事的意见。"收复东北是抗战国策的一部分,要争取抗战胜利,不得不想到实现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不管这个呼号的提出,某些人听到要感觉头痛,要感觉悲哀!某些人将实现民主加上破坏抗战的罪名,以抗战为名达到反民主的目的。在拥护抗战国策之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对于加强抗战力量有着重要的效用。如言论自由可以集思广益,监督促进国家政府;保障民权,培植民力,以加强国力,已成三位一体的要务。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抗战需要各党派团结,一党专制下不可能实现,只有实行民主政治,使各党派得到公开的合法保障地位,才能精诚团结,真正统一。我们竭诚拥护国家的统一,但是我们却深信必须统一于民主,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否则等于消灭或压迫其他各抗日党派而统一于一党专政,徒然引起国家分裂,与真正的统一背道而驰。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实现达到真正的统一,才于抗战有利,才能增加抗战力量,才是全国爱国同胞所愿有的结果。"③

与一味寄望于国民政府有别,也有人回应"抗战到底"固是天经地义,但是持续"抗"下去,事实上有无困难的疑问,表示:"所谓困难,大抵不外指经济、兵源、军需品补给等等而言。这些困难,只有在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最高目标之下,用加强团结,革新政治和运用正确的外交路线三个条件来克服它。这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一有了办法,别的枝叶问题均不难迎刃而解。这几句话近于所谓'抗战八股',可是在当前,却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④

"抗战到底"语多歧义,连汉奸也开始加入讨论的行列,以图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混淆视听。周佛海说抗战到底就是抗战到亡。署名"缶公"的文章《蒋介石为什么要抗战到底》声称,八一三上海战事,日方未料及会扩大到这步田地。汉口失陷,蒋依然高喊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将所有失地说成有计划退却,其实心里清楚军队的装备和各地的离心。有人说蒋的行为是因为西安事变时与中共有密约,现在要履行。但蒋何以讲信用,不用权术。虽然他从前得过共产党的好处,但也曾清党。重庆政府里私下都悲观,想和平,派到上海、天津,都很羡慕,不愿回去。但被共产党监视,不敢说真心话。华侨只会说风凉话,想发国难财。蒋不肯和平,可能是西安事变时被收音机、留声机、照相机留了原声原形,于是只好牺牲老百姓的财产性命,保全自己的人格面子。希望他及早回头,共建和平乐土。⑤

署名"问津"的《抗战到底呢和平协商呢》一文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尤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共, 诬蔑"共产党徒之不顾国家的存亡而坚持抗战到底的,是因为他们根本无国家观念,他们是主张'工人无祖国'的;国家亡了,在他们是无动于心,反而可使中国变成苏维埃,他们正可如愿以偿"。汪精卫

① 啸东:《"最后胜利"与"国民"》,《扫荡》创刊号,1939年10月10日,第12-15页。

② 黄炎培:《怎样欢迎我二十九年抗战最后胜利》,《国讯》第223期,公言,1939年1月15日,第1、16页。

③ 韬奋:《实现民主与抗战胜利》,《时代批评》第 4 卷第 79 期 (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收复失地专号), 1941 年 9 月 16 日, 第 14-16 页。

④ 傅彬然:《我们要抗战到底》,《国民公论》第4卷第8号,1940年11月15日,第270页。

⑤ 缶公:《蒋介石为什么要抗战到底》,《市声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15日,第13-18页。

称共产党捣乱成性,九一八全国抗战情绪高涨,共产党不动声色,红军乘机在后方揭乱,致使国民政府应付艰难。一二八上海抗战,红军又在两湖、江西、安徽拼命骚扰,牵制调赴前线抗战的毛炳文部,以致十九陆军孤军作战而失败。这次共产党以精诚团结抗战到底蒙蔽国人,骗取同情,以拥护国民党抗日为名,利用国民党的躯壳遮掩自己的狰狞面目,藉日本的精锐之师消灭中央军,发明游而不击的游击队,保存实力,伺机实现夺取政权使中国变成苏维埃的阴谋。汪精卫不忍看着锦绣河山断送在共产党手中,毅然决然提出和平运动,努力挽救垂亡的祖国,主张如果不是亡国的条件,则可以和,如果危及国家的独立生存,则不可和而必须再战。现在是可以和的时候,用平等的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纠纷,使国家仅有的民力国力得以保存,不致断送在共产党手中,祖国不致变成他人附属的苏维埃。应拥护和平运动,努力促其早日实现。并且妄言:"'和平'才是为国家民族挽救劫运实现独立解放惟一的办法;抗战到底,既无补于国,反于国有害。" 如此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恰好说明中共才是汉奸的心腹之患。

战事不容乐观、内部主张各异加上敌伪千方百计搅浑水,使得"抗战到底"的"底"成为众说纷纭的一大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形成议论的焦点。昆明的学生专门组织了抗战名词讨论会,席上对于抗战到底的口号,反复研究辩论,结论是:"'底'字在字典上解释颇多,用在这个口号上很难有明显确切的意义,像代数中的 X、Y 一样。"如代表时间,便引起哲学上时间有尽无尽的质难;且两国交战,总有休战之日,为表示时间的久长,不如仿百年战争定名为"百年抗战"。如代表空间,平绥路为首,广州是底,广州失陷,底就打翻,未免太狭窄。从全面战争战略看,国土中每一空间均应表现抗战行动,应叫"抗战无底",才能表示即无国土凭借,做侨民也还要抗战的决心。但这样反使人迷离恍惚。"抗战口号应该与'战的'相表里,作用在助人了解,不是使人怀疑。我们的'战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希望有一个意义明了确切,能够表现'战的'的口号来普遍宣传。"②

有人觉得抗战到底的问题比较简单,虽然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但"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字,是这次中日战争我们得到最后胜利,全民族得到解放之日为止之谓,简单说就是鬼子在那里来,教他在那里去,鬼子在那里进攻,把他消灭在那里。到最后,把全中国的鬼子,完全赶出中国去。……说到为什么要抗战到底?首先要明白,鬼子的攻打我们,是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我们要想生存,只有和鬼子拼,拼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否则就要灭亡。"要想抗战到底,就要争取外援,各党派合作团结,统一指挥,厉行节约,开发西北、西南,作为民族复兴地。^③

东北人士的态度更加坚定,于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严正申明:东北人民"忍辛含痛,牺牲生命,一切无可补偿的惨绝人寰的遭遇,都是为了收复故乡,争取民族解放的至高原则。所以所有的东北人士,可以肯定的说,一切苦难皆所不惧,一切牺牲皆所不惜,此中代价,只在收复失地,复兴民族。故此东北人士誓死反对中途妥协。最高领袖已曾一再昭示,全国艰难抗战,是为了收复东北,东北不收复,我敌无和平之可言。伟大明睿,东北人士无不胜感激涕零,争思效死。同时,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宣言,首即揭橥'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又曰:'中国全体国民誓以一切牺牲,达此目的。'意义明确正大,无可曲解。我上有贤明领袖之昭示,更有全国人士之一致主张,抗战到底毫无可疑的,当然以收复东北打到鸭绿江边为终极目的"。托庇于敌人势力之下或隐身于抗战阵容之内的汉奸汪精卫之流,或公然主张放弃东北,或暗中制造妥协空气,妄想牺牲东北,以求苟安,"似此类民族蟊贼,实于抗战前途发生无限弊害,吾人除誓认主权不可侵犯之至理,土地不可尺寸丧失之原则,抱忠奸不两立之决心,以事实粉碎敌人之愚妄,以行动扑灭汉奸之鬼蜮外,更望全国人士共同警戒敌人日暮途穷妄想妥协之阴谋,汉奸割地苟安之谬论。"此外,"一般妄想妥协分子,对于抗战策略,或妄加曲解,或盗窃内容,无形阻碍削弱抗战力量,如汪逆之焦土抗战论,所以吾人对于我国抗战之最高原则'长期抗战',必须明确的以实际行动充实其内容。现在某种别存肺肝的人,竟有

① 问津:《抗战到底呢和平协商呢》,《抗议旬刊》第8期,1939年6月11日,第19-20页。

② 黄素秋:《抗战到底论》,《民意周刊》(汉口) 第50期, 1938年11月23日, 第16页。

③ 临人:《抗战到底的三种解释》,《伤兵之友》(江西) 第9期,1939年3月11日,第3页。

意无意的认长期抗战为时间延拖,一切力量皆不能发动或强化,完全流于等待主义。本来敌人利于速战速决,我则利于争取时间,此种敌我战略歧异之点,即在敌人拥有优势军力,我则处于劣势,所以长期抗战旨在全体性的发挥我国优厚的人力和物力,使敌人的优势对比渐消。此种优劣势函数的变化,才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具体内容,而此种具体内容的充实,只有发动全国力量,韧性的机动的,随时随地设法打击敌人,破坏敌人,消耗敌人,必须这样长期持久下去,才能建立成长起反攻力量,促使日寇由强而弱,终归于败亡。东北地大物博,现在广大民众部队,虽沦为敌寇人力物力及一切资源取给的根据地,但人心未死,此实为我长期抗战战略发挥最有效之点,其所获战果必事半功倍。因此长期抗战到今天,必须注视到以全力充实加强东北的抗战力量,以削弱敌势。倘忽视东北抗战力量,一任自生自长,则根本丧失长期抗战【战】略的内容。抗战已入第四年度,为争取最后胜利,对东北抗战力量之加强,已为再不容缓之事了。" ①

1944 年九一八纪念,莫德惠、刘哲、李杜、邵冲霄、王卓然、陈纪滢、金长佑、赵雨时等东北人士以笔谈形式指出,东北同胞向来不少有力的抗日组织,并就今后应如何加强这些抗日力量以提早迎取最后胜利进行了讨论。主张成立东北战区,派军事大员指挥,东北政府组织随军事进展,移至接近东北之地区工作;并预测战局的演变有无利用东北作为反攻主要基地之可能,东北应该成为最后击溃日本的最大基地,但不是进攻日本本岛的基地。^②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始终坚持打到鸭绿江边,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共,在东北地下党之外开始考虑接管东北的问题。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二)三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⑤ 同时要求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也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 ⑥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变前夕,已经确定抗战胜利的内容之一是收复东北失地。1941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蒋介石发表告国民书,明确宣称:东北四省为我整个领土之一部分,必须彻底收复,此目的一日不达,则我抗战一日绝不停止。^⑤11月26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第十次会议一致通过,拥护蒋的上述宣言。12月6日,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顾问拉铁摩尔谈话,请后者转告罗斯福,中国绝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如果中国外围被日、俄、英兼并,内陆将无法保守生存。如果中国不能独立,必引起日俄英利害冲突,远东和世界战争势必循环不已,尤为遗留世界人类无穷之祸根。⑥

1942年8月3日,蒋介石两度会见来华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居里,谈到战后问题,居里称:华盛顿部分人印象,已不将东北认作是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蒋介石表示:"一、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即为收复东北。二、中国民众所以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以支持抗战者,皆以收复东北四省为目标。日本曾屡次提出和平方案,除允其保留东北外,愿接受中国所提其他一切条件,并进而声明,即中日共管东北亦可考量,吾人断然拒绝之。盖东北与中国不可分离,绝无变更之余地。三、此种错误观念,或受日本、苏联与共党宣传之影响,盖彼等希望日苏之间能有缓冲国家之存在也。倘此企图成为事实,太平洋上将无宁日

① 李杜:《"九一八"九周年——坚定抗战到底信念,充实长期抗战内容》,《中国青年》(重庆)第3卷第4期,1940年10月1日,第8-9页。

②《九一八笔谈会》,《国讯》第376期,1944年9月15日,第3-5页。

③《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9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1页。

④《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4年9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2页。

⑤《"九一八"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31,书告,第 267-274页。

⑥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47 册,台北:"国史馆",2010 年,第 591-596 页。

矣。" ① 坚定捍卫主权固然不错,嫁祸于中共,则与后者始终坚持民族立场的行事不合。

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政府,国民政府布置东北事宜要早于中共。1943 年 9 月 30 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对于收复东北之政治准备,即研拟具体办法与组织人事呈报。1944 年 1 月 12 日,张厉生呈报"建设东北准备工作要点",酌设东北建设设计委员会,着手规划,并拟备选委员会名单。蒋批示委员会缓议,从训练储备党政干部入手。^②

不过,这时抗战到底的"底",已经不仅限于收复东北失地。早在1938年1月,陈独秀就撰文讨论《抗战到底》的问题,他说:"抗战到底'这句话,在许多人当中,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呼声,但什么是'底',却从来不曾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我以为真正彻底之'底',应该是我在《抗日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所说的'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即是说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都要收回,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还不算是'底'。"而要抗战到这样的底,"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这便是我对于'抗战到底'这句话的了解。"③

此时的陈独秀出狱仅仅几个月,仍被中共视为托派,而托派形同汉奸,其抗战到底的彻底性与二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共双方的政策均有所出入,显得有些另类。文艺界进步人士葛乔则从国民政府和 民族国家的立场,详尽论述了抗战到底的问题:

抗战二十二月,人人知道"抗战到底"。然而,所谓"抗战到底",究竟"底"在何处?如何"到"法?这是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有许多人关心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人在误解这一问题。有人说,抗战是没有"底"的,他们认为这次的中日战争"中国既不能亡日本,日本亦不能亡中国",换言之,中国既把日本无可奈何,而日本也把中国无可奈何,打来打去,打不出一个彻底的结果,形势所趋,当然只有半途而废,或是中途妥协。所以,他们否定抗战有底,根本说"抗战到底"这句话是不通的口号。

也有人说, 抗战到底, 是有"底"的, 不过, 他们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有限, 敌人力量相当强韧, 国际间对于中国的压力又很大, 各帝国主义国家, 只能容许中国对日本有相当的打击, 不会许中国完全的自由独立。因之, 中国的抗战, 只能做到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状态, 顶多再能将东四省问题与日本作合理的解决。因之, 他们认为抗战有"底", 而这个"底", 即是七七事变前, 或其他的状态。例如, 不久以前, 民族失败主义者的败类, 就曾经说过: "经过一场创巨痛深的战争, 沦陷了偌大的土地, 中国居然能够接受七七事变前夕的条件, 于无损主权及行政独立原则之下, 而取得和平(?), 于和平中收复战争中所失土地, 按照临全大会的宣言精神, 认为抗战之目的已达。"换言之, 他们抗战到底的"底", 就是在七七前夕的条件之下而对日妥协。

这两种主张,就表面看,一个主张无"底",一个主张有"底",好像是矛盾的,而其实是一贯的,这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的理论,不过,前者是由左边来攻击抗战到底,后者则是由右边来攻击抗战到底,而其错误则是一样的。他们的这两种意见,都是由民族失败主义的观点出发,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缺乏自力更生的信念,把国际的依赖看得太重,对于中日战争,看不出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他们总以为中国的抗战不能有"底",即使有"底",也不过是恢复七七前的状态。

其实, 我们这一次的战争, 是全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战争, 我们所争取的不是对敌人的屈辱妥

① 《蒋中正与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 典藏号: 002-020300-00034-014, 002-020300-00034-015, 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 第178页。

② 高素兰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4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609-610页。

③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1月印行。引自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8-439页。

协,也不是要求七七事变前的条件,我们抗战所要求的,是民族的自由与独立,是中国由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之下的解放。战争的目的在这里,而抗战到底的"底",也就在这里。换言之,抗战是有"底" 的,他的"底"也就是中国的自由独立与平等。这个目的一天未达到,抗战也就一天没有到"底"! 在作者看来,抗战将近两年,已经胜算在握,只要继续努力,一定可以达到抗战到底的最终目的。 只是"底"虽然明了,如何"到"法却须讲究。有人基于前述的错误认识,把"底"弄错了,到"底" 的方法,不是争取抗战彻底胜利,而是中途妥协,所以一看见近卫宣言,便以为底已经可以到来,不 惜高呼和平。其实在敌人的刺刀之下,中途妥协就是对敌投降,所得的结果,是使中国变为日本的 附庸,"就是他们所理想的'底',都不能达到,只有使中国走向亡国灭种的地狱之'底'的!"还有 少数人,希图由新的太平洋会议再演一幕三国还辽的故事,由列强"建议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同时促请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而结束中日战争。在日寇侵占中国大部分土地的情形下,这 种主张也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东方造成新的慕尼黑协议,牺牲中国,绝不能使中国得到真正的自由、 独立、平等。所以,凡是在军事上未取得绝对的胜利,不足以真正达到抗战之最后目的以前,不管对 日直接谈判也好,利用国际会议也好,都是投降式的中途妥协,与"抗战到底"绝对对立。所谓"抗 战到底"的"底","是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平等,要到这个'底',只有经过坚忍不拔的绝不中途妥协 的斗争, 抗战就是革命, 正如蒋委员长所说:'革命战争无时限, 战争目的达到之日, 始为战争之 终结。'我们一天不能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一天不能打败日寇的侵略,我们都要一天不停的坚决 抗战下去,战!战!一直战到国家民族获得真正的自由独立与平等。" [◎]

抗战坚持的时间不断延长,增强了坚定抗战派最后胜利的信心,尤其是后来欧战爆发仅仅数月,各国便纷纷屈服投降,大都版图变色。而中国的抗战却愈战愈强,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变守势为攻势。于是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至少要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算清五十年来陈陈相因的血债,也许这就是最后胜利的内容,也许超出这内容以外。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不是高谈阔论可立而待,要把握最后胜利的条件,即'最先的胜利'。"所谓最先的胜利,包括国家意识的提高,人民愿意为保卫大我而牺牲家庭和个人,法币信用的强固,征兵制度的推行,以及由军事上的统一造成政治统一的局面。"我们要求最后胜利迅速的到来,惟有巩固这条件,切实把握这条件,强化这条件的实践性。……我们不能只眼巴巴的望着最后胜利,却忽视最后胜利的条件。"②

清算 50 年来的血债,首先就要收复甲午战败被割占的台湾。中共方面,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表达过这样的意向。193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③

1942 年 10 月 7 日,蒋介石接见美国罗斯福总统代表威尔基,表示战后东北四省、包括沿海要塞旅顺、大连、台湾在内,均须归还中国。欢迎美国参加各要塞海军基地建设,所建海军基地由中美共同维持使用。^④1943 年 1 月 2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⑤ 9 月 25 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参政会报告内政外交,声明我国外交政策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所谓领土完整,是包括甲午战争以来所丧失于日本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及东北四省,必须收回。^⑥

① 葛乔:《论抗战到底》,《抗建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9年4月16日,第2页。

② 天佑:《把握最后胜利的条件》,《春秋月刊》第1卷第3、4期,1940年5月31日,第1-2页。

③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93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1页。

④ 《蒋中正与威尔基谈话记录》,《蒋中正总统文物》, 典藏号: 002-020300-00046-010、002-020300-00046-011。 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7 册, 第 223 页。

⑤ 《蒋中正日记》1943年,第19页。

⑥《蒋主席对于内政外交之报告》,《蒋中正总统文物》, 典藏号: 002-080101-00015-101。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第442页。

1944年1月17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指示其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研拟收复台湾之政治准备及组织人事。3月15日,张呈报办法:组织军政府,先设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负责接收。6月2日,蒋复电中央统计局,4月17日设置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可以充实,暂不另设机关。①在此之前,3月9日,蒋与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谈设置东北、台湾复员工作委员会事宜,指定由农林部长沈鸿烈、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陈仪分别主持。27日,熊与沈、陈三人商组东北及台湾调查委员会之事。7月7日,东北调查委员会成立。9月20日,拟定东北复原计划。台湾调查委员会则先于7月已经提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②

蒋介石如果真的尽到国家元首、民族领袖的历史责任,不仅可以领导全国军民打败日本,而且能够赢得各党各派和全体国民的真诚拥戴。可惜他未能符合民族的期望,所作所为无不令人心生疑窦。得到收复东北和台湾失地的保证,本来是政治加分之事,却被质疑是外强为利用他而给予的施舍。1943 年底,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③

四、不打到东京与战胜日本

如果最后胜利的内容是要清算 50 年来的血债,那么所要恢复的绝不仅仅是九一八事变沦陷的东北。"什么是我们最后胜利呢?有人说要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原状;有些人说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原状;有些人说要恢复甲午以前的原状;更有些人说要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使他不能从事侵略。就第一点说,我们便要接受日倭在华北驻兵的特权,没有铲除伪满傀儡组织,直接给侵略者休养生息的机会,实施以华制华'毒化'的恶计,不能算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就第二者看,不平等条约还未取消,敌人一方面可以吮吸我们的经济骨髓,一方面更可凭借租界施其毒化捣乱中国的阴谋,这也不是最后胜利;但是要把中日的局势回复到甲午以前那样的景况,就要帮助朝鲜、琉球、台湾等民族恢复自由独立,这一半要靠它们自己的努力。倘若敌人切实觉悟了,自动退出中国领土,尊重我们的主权,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不用到再去解除它的武装。我们抗战不是对付日本民众,而是对付日本这种侵略的政策,只有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民族自由解放,才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迫切需要的最后胜利。" ^④ 所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言称:"抗战到底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敌军完全撤退于我们国境以外,尤在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只有日本民众彻底觉悟,推翻军阀专制,放弃侵略,中日两大民族才能真正的共存共荣。 ⑤

按照上述说法,抗战到底最后胜利的战略目标即使在主张抗战者的心中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整体上形成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有人就详细列出了日本从中国攫取的领土面积,包括琉球群岛、台湾(含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关东州租借地、朝鲜、东三省、热河省。^⑥《群言》《向道》《西北向导》《河南政治》《集成》《民智月报》《读书生活》《前导》等多家刊物将这份资料不断予以转载,意在唤醒国人报仇雪耻。

1937年11月25日,厦门集美学校召开了一次抗敌座谈会,针对一般民众闻小胜即兴高采烈、闻小败就灰心叹气的情形,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为主题,分三点进行讨论:"一、怎样才算是最后的胜利?二、为什么可以断定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三、在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

①《行政院秘书处上蒋委员长有关收复台湾政治准备工作及组织人事等具体办法呈文》,张瑞成编:《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印行,第41-42页。

②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第595-596页。

③《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8页。

④ 王兴超:《论最后胜利的时间、空间与力量》,《建军半月刊》第11期,1940年1月31日,第12-14页。

⑤ 社论:《抗战到底》,《反侵略》第2卷第6期,1939年12月1日,第1页。

⑥《日本从中国攫取的领土面积》、《战线》第9期、1936年1月3日、文艺、第50页。

利?"有人主张,使侵华日军失却作战能力,全部退出国境,我军收回苏淞、山西、绥察等地以及东北四省,就是最后胜利。有人则认为,把敌人赶出中国只是军事行动的成败,"我们所谓最后胜利一定是要更进一步的把我们从次殖民地的火坑救出来"。单是把敌人赶出去,长时间休养之后,还可以再来玩火。中国门户开放,又太接近狂犬的老巢,容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最大目的,一定要采取斩草除根的手段,把敌人粉碎不足够,非再把它的巢穴也一齐撕毁,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的。这样一来,我们大中华民族就永无后患之忧,而我们为公理、正义而奋斗的责任也方告完了,世界和平也就永无受威胁的可能,中国从此也可以安心地努力建设现代国家了。" ①

讨论的结果是抗战要同时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最后胜利,把敌人赶出国境,收复失地,包括苏淞、华北、东北和台鲜,并得到民族的自由平等。只要发动全面抗战,实行长期抗战,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越高,实现的难度就越大。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正比关系,认定"夫民族抗战,本系艰巨之工作,盖敌方数十年来,调度经营,劳心苦思,自以为非达并吞我国独占远东,征服世界之目的,不欲终止;而我则为国家独立,民族自由,领土主权之完整,非驱除敌寇,廓清外患,决难罢休;此乃国策根本上之斗争,非至敌我两国人力物力总和对比获有结论之后,未可定胜负也。亦即非至国力比赛之最后阶段,未能论成败也。"^②

如果以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为度,抗战到底的底无疑会大幅度延伸,最后胜利未可轻言。蒋益明讨论了抗战到底与和平的关系,他说:"'抗战到底'总有个底可到,战争之不能无底止,……我们所谓'抗战到底',要到底于我有利才行。即是我们要把握到最后胜利的形势,才能和敌人开始讲和。可是,'最后胜利'的获到者,只有一个,不是敌人,便是我们,其中绝对不能存在第三者。中国抗日的结果,不是中国失败,便是日本失败,或者是两败俱伤。"如日本获胜,中国便亡国,日本"侵华到底"。如中国获胜,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就可以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两败俱伤中国也是相当的胜利,使日本不能征服中华,独霸东亚,中国可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造成现代国家,再与日本决胜负。当前日本以承认满洲国、建立华北特殊政权、加入防共协定、根绝抗日运动为议和条件,接受任何一条,都有亡国危险。因此,言和即汉奸,只能抗战到底。没有战事上的最后胜利,绝对谈不到敌我的和平解决。最低限度,也必待战事确有转机,和议条件绝不损及我主权时,才有讨论的余地。^③

有人从时间空间与力量的相关关系讨论抗战最后胜利的赢取。所谓胜利的时间,是抗战胜利的过程,由胜利开始至胜利完成所需要的时日,都是胜利的时间。这个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个时间间隔的一点,并不一定有胜利事件发生。不过这是抗战时间的局部,如果战争准备持续十年或百年,胜利时间就迫近十年或百年最后的阶段。如敌方发生内乱革命,或被国际联合打倒,则未到预定时间即可获得胜利。主动争取最后胜利,就要全国总动员,抗战到底,全面反攻。

至于胜利空间的位置,凡是能够用来争取胜利的点、线、面、体,都是胜利的空间,依照数学极坐标的办法,以贯通南北的粤汉京汉线为 X 轴,以上海到重庆以西为 Y 轴,上至天空无穷远为 Z 轴,这样把中国版图分成三度空间,其周围的点线面体,均为不愿做汉奸奴隶的同胞与敌拼命的疆场。这些点线面体于我有利或不利,要利用有利,避开不利。按照蒋总裁所说:最后决胜的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争取胜利在平汉线以西的一带。这是天经地义的胜利空间,联合起来,叫作全胜利空间,个别的叫作局部空间。这个空间的实现,要双方经过战争,若无战争,胜利空间便不存在。若敌人提前崩溃,其他未打仗之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提供了支撑,仍是胜利空间。所以国土的任何角落,都是胜利空间,都要积极争取胜利。包括民众、行政层级单位、各方面负责人,

①《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集美抗敌座谈会记录》,《集美周刊》第22卷第10期,1937年11月29日,第1-2页。

②啸东:《"最后胜利"与"国民"》,《扫荡》创刊号,1939年10月10日,第12-15页。

③ 蒋益明:《抗战到底与和平声浪》(3月21日,广州),《新粤》第2卷第6期,1938年4月1日,第16-18页。

都要联成一体。

支配时间的是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军火、方法即组织战略。胜利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于人力、物力、智力、组织力、战略、政略之综合力,力量强,胜利的空间就扩大,把敌寇赶出国土的时间就加快,最后胜利的时间就缩短。抗战力量与胜利空间成正比,与胜利时间则成反比。因此胜利的时空力量会发生演变,或以空间换空间,或以时间固定空间,或以时间夺回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最后胜利的条件,以本身实力为本,以国际压力和敌人内部革命消长为助,胜利时间是胜利事实的过程,胜利空间争取胜利的总力量发挥点,综合它们的演变,造成三个不同的局面:第一,国际压力和敌国变动于我有利时,胜利时间的过程的三者大小而递减,但胜利空间的获得为三者大小之总和;第二,国际压力和敌国变动于我不利时,胜利空间为存在为我实力与二者之较,胜利进程减少,胜利时间延长;第三,国际压力和敌国变动不变,我们力量增至极限,则实力和胜利空间成正比,和胜利时间成反比。^①

"抗战到底"的四种"底",前两种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即有实现的可能,至于后两种,就并非单凭中国自身力所能及。要想彻底打败日本,实现东亚永久和平,不打到东京是难以成功的。可是早在卢沟桥事变一年前的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②武汉保卫战前,又在公开演讲中宣称:"现在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和南几省,将来非反攻不足取胜。反攻才可收回南京、太原、山海关,一直打到东三省为止。我们当然不必攻到东京,日本国内自会解决这件事,我们帮助他们就行了。"③

不必进攻东京的意思,其他主张抗战到底的人士同样表达过:

我人所谓"抗战到底",并不是说抗战永不有中止的话,而是以抗战的力量,使日本能够彻底的觉悟到中国是决不可以武力征服的,由于日本能够有这样的觉悟,彻底的改变其政策,中止对华侵略,这时才是中国中止抗战的时候,这就是我人所谓"抗战到底"的真意义,这是决不允许一般动摇分子、投机分子所误解的。我人所谓"最后胜利",并不是说,中国以军事反攻的力量,打到东京,消灭日本民族,灭亡日本的国家,而是以抗战的力量,来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也决不允许一般动摇分子、投机分子、过激分子所误解的。中国的抗战,是为了正义,为了和平,所以正义能够维护,和平能够实现,那就是可停止抗战,这也是完成了我们最后胜利的使命。所以中国战争的能否停止,责任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日本能够及早觉悟,那末中日两民族间屠杀,可以早日结束,早日停止,如果日本一日不觉悟,这种屠杀,便是一日无法停止。因为中国这种见解,是合乎正义的,是积极性的,所以中日两民族间所造成的一切纠纷,都应当归结在日本身上。日本的有识之士,你们如果认为这样的屠杀是残酷的,是不合人道的,那末应当立即唤起全日本的民族,自动的停止这种侵略,使中日两民族永久归于和好。④

署名"广平"者撰写的短评称:

抗战到底这一口号,应当如何解释,才算正确呢?有些人说:我们一直要踏平三岛才罢手;也有人说:要打到黑龙江一直到收复高丽。这固然是有意义的,只可惜都太过于感情和急性,而忘却此次抗战发动之历史的事实罢了。我以为此次抗战,虽发动于七七,而肇端实在于九一八之事变,假使我们的抗战,无论是直接的以武力击退敌人,或是间接的运用国际压力,使敌人知难而退,只

① 王兴超:《论最后胜利的时间、空间与力量》,《建军半月刊》第11期,1940年1月30日,第12-14页。

②《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3-404页。

③ 杨朔:《毛泽东特写》,《自由中国》(汉口)第2号,1938年5月10日,第184-186页。

④《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清明》第1卷第6期,1939年10月1日,短评,第1页。

要能做到排除侵略势力,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之状态,才算达到抗战之目标。所以"抗战到底"之解释,应该视我们能否达到这一目标为转移,如果能做到,无论打三年五年都行,否则就是打到十年廿年也不能罢休。这一问题,只有空间之标准,而无时间之限度。至于收复东北,固然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在步骤上,似乎应使这初步目标完成以后。希望大家喊着热烈口号的时候,不要忘却这种历史的事实而自乱步伐。^①

也有人并不完全否定打到东京的可能性。南昌陷落后,有人问郑流芳"我们究竟抗战到什么时候"?他回答便是"抗战到底"。至于什么地方是底?郑则指出,退出南昌,还有长河,退出湖南,还有川滇,退出川滇,还有新疆。抗战是抵抗侵略,人家一天不停止打我们,就一天不停止还手。所以抗战到什么地方,要问敌人想打到什么地方。要抗战到底,必须有最后胜利的信念。"什么是最后的胜利?是不是一直打到东京,收复高、台,方算得到最后的胜利?纵然没有这么回事,可是也不能不作这么想。"退一步说,起码应该完全恢复九一八以前的情形,"办得到,便是民族英雄,要我们牺牲什么都可以。办不到,便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应该引刃自杀,以谢全国人民。我们做老百姓的,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只问条件,不问和战,只要求最后胜利,不问你们一时的进退。"^②

不打到东京,意味着中日之战中国不会进攻日本本土。中国方面如此设想,是出于对自己武装力量状况的实际考量。国民政府麾下的三军之中,陆军较强,空军其次,海军最弱。至于中共,更是只有陆军,没有海空军。相对而言,提升陆军的战力较为容易,空军其次,海军最难。不要说制造军舰,就算有充足的财力购置舰船,没有相当长时期的训练磨合,也无法形成有效战力。况且二战时期的海军已经拥有航空兵和陆战队,自成多兵种的集合体,成军及作战的难度更大。而当时日本的海军在世界诸强中也是名列前茅。如果说中国的陆军可以通过持久战实现与日本陆军的强弱转换,空军(日军没有独立空军,航空兵分属陆海军)可以在盟国的帮助下取得局部的优势,海军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具备战胜日本舰队并实施登陆日本列岛作战的实力。即使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对于海军的发展仍然是不够的。

由此可见,直到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中国军队尚不具备攻占日据殖民地岛屿尤其是日本本土的军事实力。如此一来,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使中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将日寇全部驱逐出中国领土,日本仍然可能凭借本土列岛以及日据殖民地的支撑,拒不投降。从后来太平洋战场的实际进程看,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相当高。那么,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如何战胜日本,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取得最后胜利?当时国人所设想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如果战事进行到日本侵略者被全部驱逐出中国境内的阶段,日本将会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治革命,民众起而推翻军阀政府,成立人民政府,从而结束战争;二是将中日战争拖入世界大战,在盟军的帮助下彻底打败日本或是迫使其投降。前一种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支持日据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及帮助日本民众反抗法西斯统治发挥一定的影响,不过归根结底还是要日本民众和殖民地人民自己觉悟。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在高压统治和皇民思想的控制之下,无论是日本本土还是殖民地,很难形成像一战时期德、俄两国那样足以推翻强权统治的民众反抗运动,尤其是在日本本土。余下的只有另一种选项,即借助盟军的力量,攻占日本或是摧毁其抵抗。因此,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很早意识到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国际的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方面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坚决抗战到底,另一方面要极力争取外援,使中日之间的战争演变为世界性的战争,以利于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广平:《释抗战到底》(1939年2月28日),《中山半月刊》第1卷第9期,1939年3月10日,短评,第27页。

② 郑流芳:《抗战到底》,《更生》第1卷第2期,1939年4月22日,第20页。

刘家和先生学术研究的实践、特点及品格

刘林海

[摘 要] 刘家和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通古今,贯中西,思想穿透力强。他的学术研究生涯经历了从希腊史到印度史再到中国史的转变,在各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解决了传统经学研究的难题,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路。他融中国传统的小学、目录学和考证等根柢之学与西方的哲学逻辑学于一体,以自觉的理论统领,中西互用互鉴,在比较中而成融会贯通之学。宽阔的心胸、崇高的理想、坚韧的毅力、科学的方法和高超的效率使他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典范。

[关键词]刘家和 学术研究 实践 特点 品格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134-10

2019年5月14日,在刘家和先生的《史苑学步: 史学与理论探研》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陈祖武、陈启能、郑师渠等提出,刘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史学领域做出重大成就,除了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勤奋外,其治学方法和路径等也非常重要,应该加以研究总结,以嘉惠学林。刘先生思想深邃,学术研究体大精深。他通古今,贯中西,思想穿透力强,是公认的大家,确实值得研究。

笔者有幸聆听刘先生的教诲多年,亦常听他谈论为学之道,多少了解一些情况。虽竭力学习揣摩,但终因水平有限,所得甚少。即便幸有所获,也是一鳞半爪,实在无法窥其全貌。以下所述,结合了笔者这些年积累的受教杂记,仅仅是个人的一些体会,未必准确。好在学界已经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如《古代文明》杂志曾辟专栏,集中讨论其学术研究及思想等,刘先生本人也在一些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①可资匡正。不确或不当之处,笔者自负全责,概与先生无关。

一、发乎中而绎乎西,明于西而贯于中

刘先生的学术实践与大多数学者不同,有过几次研究方向的大转变。他的学术研究从古代希腊史开始,后来转到了古代印度,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史。

刘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中国史,最初打算做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学里也是按这个目标学习和打

作者简介 刘林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①《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载文7篇: 蒋重跃:《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 王大庆:《谈刘家和先生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思考——读〈史苑学步: 史学与理论探研〉札记》; 王成军:《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 许兆昌:《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探析》; 赵轶峰:《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 郭小凌:《史学园林中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 邵东方:《论学相见恨晚——记杨联陞与刘家和师的一段学术交往》。第3期载文1篇:于殿利:《通则透透则明明则智智则用——刘家和先生治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探微》。刘先生本人的相关论述参见《论学术工作的基础》(载《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 武汉: 武汉出版社,1995年)、《在挑战与回应中前进——刘家和先生谈学术工作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40年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进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追忆白先生、感念白先生》(《史学研究》2019年第3期)等。

基础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刘先生也毕业留校任教。不过,他教中国史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外语好,他被分到了世界史,从事世界上古中古史教学,从助教做起。在此后的三年,他一边教学,一边接受俄语突击学习训练,一边熟悉苏联和西方的基础教材,参与教材写作,还曾经到在和平门的附中去代世界史的课。虽然教学工作比较繁忙,但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世界通史的基础,积累了研究问题。在这期间,他一边教授世界史,一边继续研究中国史。他还自己学习陈垣先生的研究方法,研读《日知录》,在1954年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的文章。这篇文章受到白寿彝先生的表扬,还印出来供大家讨论过。这篇文章也引起了陈垣先生的关注,他给刘乃和先生写信,表扬了刘先生,同时指出了他在材料引用方面的一个错误。^①由于当时世界史及中国史界限划分严格,刘先生的这个举动被视为专业思想不牢固。此后,他就不再写中国史的文章,而是专门研究世界史了。

1955 年,东北师范大学举办青年教师培训班,由著名史学家林志纯先生主持,邀请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上课,从全国高校选拔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青年教师参加培训。刘先生考入培训班,到长春学习两年。入学一个月后,林先生要求大家报论文的研究题目。刘先生提出研究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林先生问刘先生看了哪些书,知道什么,还想看什么书。林先生看过书单后,觉得可以,征询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同意了这个选题。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完成了近8万字的论文《论黑劳士制度》。这篇文章结合斯巴达的历史,对黑劳士制度做了深入分析,既有宏观思考,又有微观考辨,也表达了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文章被全文翻译成俄文,还进行了公开答辩。格拉德舍夫斯基的评价是"基本解决了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学者能写出这么高质量的外国古代史研究论文,实属罕见。郭小凌先生评价"这篇文章始终是华语世界有关古代斯巴达黑劳士制度研究的经典之作。就史料的彻底性与论点的合理性而言,国内史学界至今仍无后来者"。②这是非常公允的。

《论黑劳士制度》一文虽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发表,^③但这篇文章一完成就引起了轰动,也奠定了先生在中国世界古代研究领域的地位。按照一般的思路,他应该乘胜追击,在希腊史领域深挖,出更多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转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古代印度史。从东北师大进修返回后,他开始钻研印度史,一边学习语言,一边研读大藏经,结合西文的材料,分别在 1962 和 1963 年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两篇文章。《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向蠡测》一文初稿完成于"文革"前,直到 1983 年才发表。刘先生研究印度的文章一发表,就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尤其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高度赞扬。季先生说他用佛经研究印度史是一绝,开辟了新的路子,在可能的范围内,把该用的材料都用上了,是一位成熟的学者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从宏观思考入手,通过微观考辨,对印度历史上的奴隶制、种姓制度及首陀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几篇文章奠定了他在印度史领域的地位。

刘先生虽然在印度古史研究上下了大工夫,也出手不凡,但他并未驻足于此,而是再次转换研究领域,重新回归中国史。1979 年底,他从历史系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刘先生从中国史到世界史,再从世界史转回中国史,都是出于工作需要,是被动选择。不过,他并非一味被动,而是因势利导,细致规划了学术研究计划,为中国史研究做准备。^④ 他虽然教授研究世界史,但从未放松中国史的学习和思考。在他那里,世界史和中国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几十年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不但没有成为其中国史研究的累赘,反而为其中国史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实,早在20 世纪 50 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发现了他对中国史的浓厚兴趣,并一直予以鼓励和关怀。何兹全先生

① 刘家和:《忆陈垣》,《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

② 郭小凌:《史学园林中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③《论黑劳士制度》一文完成后,曾有老师将它推荐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觉得文章里面有质疑苏联专家的一些论断,不宜出版。

④ 刘家和:《论学术工作的基础》,《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 600-609 页。本文所引该书,除非标明,均据此版。

也很欣赏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70年代末,白先生酝酿编纂中国通史,为此专门在史学研究所设立中国通史研究室,为刘先生提供更大的空间。白先生希望他在世界史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史,充分发挥其中外比较的研究专长。在这个意义上,刘先生的回归是有备而来的主动回归,不是被抓壮丁。

重新回到中国史后,刘先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先秦。研究先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是他整个比较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他已经考察了古代希腊和印度,再加上中国,就可以对古代亚欧大陆世界的代表性文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了。虽然刚进入中国史领域,但由于他有长期的积累及对问题的思考,所以很快就有文章发表。1981 年,《〈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一文发表。1982 年,他又发表了《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一文。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接连推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关于苏掩庀赋》《宗法辨疑》《楚邦的发生与发展》《三朝制新探》等。与此同时,他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开始思考中国史学和中国文明的特点等问题,前者如《史学与经学》《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史记〉与汉代经学》等,后者如《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等。从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中国史研究异军突起,引发了史学界的强烈关注。

与在希腊史、印度史领域一样,他的中国史研究一出手,就是高质量的。《〈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本是一篇会议论文,中国史的学者看了很惊讶,林甘泉先生当即将稿子要走,决定在《中国史研究》上刊出。系里有老师读到此文后,对他能发表中国史的文章很是惊讶,甚至还专门向他询问证实。林志纯先生也很惊讶刘先生能写出中国史的文章,对他大为赞赏,还请于省吾先生看了文章,于先生让林澐先生代为回信,评价是"用功甚勤,可备一说"。这篇文章与一般研究不同,它是用小学和经学的考证方法解决历史问题。《尚书·梓材》篇的"奸充杀人历人宥"的解释一直是一个难题,历代经学家理解分歧较大。刘先生在分析各家解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历和人宥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从而很有说服力地化解了各种解释上的矛盾。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分量很重,一举奠定了刘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1986年春,刘先生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的高级学者访问美国,期间他曾到哈佛大学拜访张光直、杨联陞两位先生,并就他关于梓材篇和公刘篇的文章与他们交流。杨联陞先生曾两次与刘先生长谈。刘先生还从训诂学的角度对杨先生的《"龙宿郊民"解》提供了解释支持。杨先生对刘先生的评价是"文史皆精,训诂佳"。后来周一良先生见到刘先生,还说杨先生很推崇他,说他是个语言天才。①

刘先生解决了经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②也开辟了由小学经经学考证古史问题的新路。但是,他并没有陷在传统的考证之学中,而是有更大的宏观理论视野,把中国、印度和希腊放在一起考量,就古代世界的人类文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所阐述的内容。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分析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希腊、印度、中国在思想领域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雅斯贝斯认为,在这个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在希腊、印度和中国出现,而且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不约而同地出现的。此次精神觉醒中提出的问题和标准决定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他将这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称这些文明为轴心文明。刘先生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特点,并进行了思考。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他并不知道雅斯贝斯及其著作,直到80年代初到美国看到这本书,才发现双方所想甚同。雅斯贝斯只是粗线条地描述了觉醒的现象,虽提及了三个文明后来发展的不同,但没有就觉醒的原因提出系统看法,"轴心时代"也只是其世界历史观念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刘先生不但分析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和出现的条件,而且比较了觉醒在三个文明中的不同表现特点。他提出,"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主要包括人对自然或天、对

① 邵东方:《论学相见恨晚——记杨联陞先生与刘家和师的一段学术交往》,《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② 关于刘先生经学研究的成就,可参阅许兆昌:《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探析》,《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人与人关系的反省及自觉,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而形成的关于自身的自觉。人类精神的觉醒之所以能够不约而同地出现,是生产力发展、血缘组织解体以及国家产生与发展的结果。在天人关系上,"印度形成了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了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在对人自身的认识上,三者"则分别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政治的(城邦的)动物或伦理的动物"。^①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等也是刘先生在这个时期深入思考的问题。1986年,他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一文发表。这篇长文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古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思考为何其他古老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能够连续发展。刘先生提出,中国的政治史发展具有连续性,这对文明的连续生存至关重要。中国的文化也保持着连续性发展,突出体现在语言和学术方面,这是其他古老文明无法比拟的。政治史的连续性为文化史的连续性提供了保证,文化的连续性又是政治史连续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能够连续发展,"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中国文明在政治上具有统一的趋势,民族上则呈现出不断融合和联合的趋势,是多样性的统一。从精神上看,四海一家、天人合一是最主要的特点。②这些特点是古代世界其他各文明所没有或者不明显的。

刘先生虽然以先秦为研究重点,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仍在不断拓宽思考范围,扩大研究领域。20世纪 90 年代末前后,他的研究重点也从先秦向下延伸到秦汉乃至魏晋,关注的层面也由经济社会到思想文化,由历史到史学,由史学到理论,由理论到哲学。相关研究成果也先后分两次结集出版,分别是《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2005)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2019)。其实,单从文集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研究旨趣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他一直在不断攀登学术的高峰。2019年,他发表了《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与笔者合作),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中思考的问题。最近,他又发表了《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该文则是他从哲学层面对中西文明比较认识的总结。③

二、本于中而用于西,中西互用而会通

刘先生的学术研究独具特色,值得总结的很多,也已经有一些精彩的专论,无需再续貂。这里只结 合笔者自己的理解做点补充,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体西用。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中国为本。刘先生的世界史研究成就斐然,也曾做过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会长,所以往往被视为世界史圈里的学者。不过,他的世界史研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最终的目的。他研究世界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中国历史,并希望从世界史研究中有所借鉴,以补益于中国。在他那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是本,他做的是中国的学问。这也是他念兹在兹,始终坚持的。其二,中学西用。具体说来,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钻研外国学问。在这方面,主要是小学和目录考证之学。刘先生学习过英、俄、德、法等现代语言,也曾自学过希腊文、梵文等古代语言。他的外语学习效率很高,诀窍就在于他借用了研习中国古文的方法,也就是清代学术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明故训,审词气"治学理念,从中国语言学迁移到外国语言学,找寻异同。他记单词都是从词源学和构词法入手,抓词根,找本义,看流变,在此基础上把握前后缀、词性变化等规律。这样记住的单词就不是一个,而是一串,也不容易忘。他还通过对照阅读英俄德本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不但要明故训,分析词性和词义,而且

① 刘家和:《论古代的人类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中国文化》1993年第1期。

② 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 1986 年第1辑, 第31-66页。刘家和:《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特点的分析》,《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86页。

③ 分别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2020年第3期。

要审文气,一句句扣文法,做图解,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示出句子成分,明晰主副句及不同成分的关系, 养成了杰出的阅读能力。^① 刘先生的语言学习也得益于良师的指导。他在东北师大进修时,俄语老师 是张正元教授,他也是培训班翻译给苏联专家稿子的审定者。他教刘先生等读《共产党宣言》,也 是逐字逐句研读, 使得刘先生不但俄文有提高, 英文能力也有提高。从东北师大回来后, 他插班到 张天麟教授在图书馆办的德语班学习德语。刘先生除了跟班学习外,还在四年的时间里每周到他家单 独学习。张先生也是让刘先生研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通过问答方式教学,分析字词和语法等,答 疑解惑。 德语学习也让刘先生的俄语和英语有所提高。 可以说, 他这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方式, 就是小学经学一起搞的中国传统路子。刘先生研究外国史效率高,还得益于他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修养, 知道看什么书,看到什么程度。他的希腊史研究如此,印度史研究亦如此。他之所以能在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完成《论黑劳士制度》,除了问题早已在思考外,也与他知道看什么书有关系。他看格罗特 (Geroge Grote, 1794—1871)和伯里(J. B. Bury, 1861—1927)等研究希腊史,发现他们也做目录 和考证,就跟着"照虎画猫"。他用汉文《大藏经》研究印度历史,"按照自己治中国古代文献的经验, 在掌握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线索后,就直接从目录学入手"。"经过对大藏目录做了一番大 体上的了解以后,我又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把它们分成三个部分,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对大乘部分只求 了解源流和分部的大体情况,基本上不深入经文;对目录和史传部分则选择其中重要者置于身边,作为 不时反复翻检、查核之工具;对小乘,尤其其中经、律,则深入原文,注意比较别本、异译,必要时还 与南传经英译本有关部分对读。" ② 阅读他的几篇印度史文章,可以看到其考辨之细微,所用文献数量和 种类之丰富。他讨论四种姓的起源,所引汉语文献就有十几种,有些还是不同译本,还参考了英文和巴 利文文本; 讨论婆罗门的地位, 除辨析英译本与俄译本异同外, 还对照了四种汉文佛经说法; 研究印度 土地关系,就用了8种法经(论),《摩奴法典》则有两个英译本,一个俄译本。③如果没有良好的目录 学训练,不谙搜集材料之法,即便在数字化高度发达的当下,一般学者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二,西学中用。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史西说,即用西方的理论认识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比如,他借鉴城邦理论研究先秦史,在经学和史学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应该说,用西方的理论认识中国历史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根本特点。自从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体系逐渐式微,西方的各种理论逐渐流行,成为解释和重构中国历史的主角。刘先生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接受教育,又对理论有浓厚兴趣,所以并不意外。不过,刘先生又有不同。一方面,他接受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抛弃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工具传统。没有这个工具,要创新很难,因为理论突破的材料支撑恰恰是通过这个工具完成的。另一方面,他对新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照搬、机械应用,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无论从中国看外国,还是用外国释中国,都不是简单地以哪一个为标准,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把双方视为普遍性中的特殊性,通过异同的分析,以实现认识的升华。二是西器中用,即把西方的逻辑学(哲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大工具。刘先生非常喜欢哲学,对逻辑学更是挚爱。他在大学期间曾经从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学习哲学、逻辑学,后来又多年研读黑格尔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因而善于从逻辑的角度思考问题,并自觉用于学术研究。逻辑是刘先生学术研究的两把刀之一。蒋重跃对此已有详细论证,即他所谓的两个"菲罗"之一。^④他不但自觉运用这个工具,而且从中发现了中西历史及文化在理性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第三,比较方法。这一点学术界了解的最多,研究的也最多,无须重复。笔者想补充的是,刘先生 思考及写作,都从比较的角度展开,其中有直接比较,也有间接比较。他不但做比较研究的实践,而且

① 郭小凌:《史学园林中"一只极为珍惜的鸟"》,《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② 详见刘家和:《论学术工作的基础》,《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 第 605 页。

③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5页注释、第9页注释、第35页注释。

④ 蒋重跃:《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思考比较的理论,提出比较可以"辨异同""明一多",也提出比较是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的统一。^① 可以说,比较是他的一种思维习惯,是他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件大事。^② 这种习惯与他的逻辑工具密不可分,因为一旦涉及概念及判断,就会遇到种、属等问题,这些又是取舍的结果,取舍的前提则是比较。所以,他又提出,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

第四,融会贯通。"通"是刘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治学追求。他常引用王充的一句话说明通的重要性:"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刘先生的"通"也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通。表现为古今通、中外通、经史通、文史通、史哲通等。何兹全先生的评价是"古今中外文史哲"。这方面也有不少讨论了,此处不再重复。

其次,学术视野的通。这方面有实例。笔者留校工作的前几年曾经聆听过先生的一个讲座,对他 的一个观点印象深刻。刘先生提出,无论做中国古代史还是做世界古代史,如果不了解 18、19 世 纪的学术,很难真正做好。就中国而言,清代的"乾嘉之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成就的最高峰,汇 集了历代的研究成果,不但在文献的整理上成就卓著,而且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考据方法。清人的这些 成就至今仍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不可代替。就史学领域而言,清初顾炎武开创朴学新风,有《日 知录》等硕果。这个考据的学术传统在乾嘉时期大放异彩,出现了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 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名作("都是赖博以成精的道路")。刘先生虽然不专门 研究清代学术史,但对这个领域的情况非常熟悉,对清代典章制度及学术流派烂熟于心,学林掌故等 更是信手拈来。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从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看陈援庵学术的传承", 这是他在 2018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柴德赓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柴德赓全集》学术委员会会 议"上的主题报告。这篇发言虽然是谈柴德赓先生的,但是从清代的制度及学术入手,娓娓道来,既 揭示了传统考据之学寓论于史的特点,又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不但做到了"尚友古人",而且"尚友 今人"。读过柴德赓先生这篇文章的人不计其数,但能从中挖掘出如此丰富内涵的学者,除了刘先生 恐怕找不到其他人。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是不可能从一篇大家熟知的考据文章中发现其不寻常之 处的。③清代学术史是先生"一直不能忘情"的,也是他学术的"童子功"之一,是他通古今的前提。 例如他研究《左传》,不但通观历代注疏成果,而且特别注重清儒对杜注的臧否。不仅如此,他还非 常重视外国学者的研究,专门就李雅各和安井衡等成果作论。 ④ 就西方而言,18、19 世纪也是现代学 术研究确立的重要时期,19世纪更是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不但历史学职业化、研究科学化,而且 出现了各种理论和范式,古代文献的整理也达到了顶峰,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就古典学领域而言,以 德国学者 F. A. 沃尔夫的《荷马导论》(1795)为标志,学术研究开始走出神话文学时代,转向科学 的研究,涌现出格罗特、B. G. 尼布尔(1776—1831)、T. 蒙森(1817—1903)等大家。这些学者 不但整理了古典的文献,而且提出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对于现当代学者而言,不 了解这些古典的学术史、自然很难充分理解历史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他在研究黑劳士问题时也是 从格罗特的著作和当代学者的研究入手,一方面了解之前的学术史和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

① 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刘家和、陈新:《历史比较初论: 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刘家和:《试说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自序》,《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 刘家和:《比较研究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件大事》,《文汇报》2019年3月15日;《40年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进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 整理稿全文见: http://www.chaidegeng.cn/index.php?_m=mod_article&_a=article_content&article_id=658. 亦可参阅: 《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关于陆贾〈新语〉的几个基本问题》(《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 第 399-411 页) 一文则是文献目录学角度通的范例。

④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详见与《左传》相关诸篇。

则从中梳理出基本的史料信息,并逐一阅读。这种方法既可以一举站到学术研究最前沿,又能"竭泽而渔",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最后,研究工具的通。笔者认为,这是他前两个通的必要条件,最为重要。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面有一段高论:"由小学人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人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人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学问的门类及其关系(主要是经世致用),既阐明了读书做学问的正确路数,又暗含了实现这个路数的必备工具。刘先生在谈论为学之道时,经常引用这段话,当然,他的引用仅止于"史学可信",其他则略而不论。他的学术研究就是遵循了从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的路数。

刘先生之所以能打通中国传统学问的这几个层面,是因为他有精良高效的小学、文献目录学等工具修养,又精于考据。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启蒙,小学、中学大多数时间在私塾度过,习四声,学《四书》(朱熹注本),读先秦儒家经典及诸子,打下了小学和经学的童子功。他虽不专门搞小学,但于清代小学各家及成就烂熟于心,提出小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也曾就同一个字具有正反两个意思的现象做过系统的专题笔记(受黑格尔的启发)。他的小学自成一家,受到著名古文字学家王宁先生的高度赞誉。大学期间,受钱穆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开始接触清代学术史,也懂得了做先秦史和诸子学必须考证的道理,而考证则绕不开清代。②工作后,他继续研习目录学,揣摩陈垣先生的学术特点。他发现,陈先生之所以之精于考据并能竭泽而渔,是因为知道研究需要的书在哪里、如何用。陈先生的学术研究从研习《书目答问》开始,花了几年的功夫啃这本书,同时对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熟悉相关书籍的内容及作者等。陈先生还非常重视《廿二史札记》,把它作为治史的人手。经过这个训练,做了到既精且博,还能由博返约,做起考证来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③

第五,理论统领。刘先生重视理论,也是公认的。^⑤ 刘先生的理论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这里只就哲学层面而言。在这方面,有两个对他的思考和研究产生持续影响的流派。一是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这一点是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研习的,一直没有间断。这是他思考分析问题的自觉工具,注重矛盾分析,注重认识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研读。这是从研读黑格尔的著作延伸出来的,也始于大学时代,而且一直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步入新的阶段,其中"五朵金花"等理论讨论盛极一时。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虽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史学上则可以归结为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连续与变化关系等问题。刘先生本来就对理论感兴趣,也一直在读《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就把黑劳士作为具体切入点,也计划与印度和中国做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个点,一是它是在中国历史分期讨论中出现的,与中国的历史问题有一定关联。一是恩格斯在一封信里专门谈到了黑劳士和首陀罗,郭沫若先生也曾经建议汪敬虞先生加以研究。白寿彝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理论的贯通,又在关键时刻提醒刘先生超越狭隘的考据,重视宏观的理论思考。白先生知道刘先生的兴趣在先秦哲学,熟悉先秦诸子,又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就建议他先从经济基础做起,逐步深入。^⑤可以说,刘先生的理论自觉很早就形成了,高效地统领着他的研究。这是其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点睛之所在,也是融会贯通的最高境界。

三、虚怀若谷善反省, 主一无适自砥砺

刘先生治学特色鲜明,成就斐然,不但在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史领域建树卓著,而且在中国传统

① 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

② 刘家和、江湄、罗新慧:《"学者亦必志于榖"——刘家和先生访谈》,《历史教学问题》2002 年第 4 期。

③ 刘家和:《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④ 详见蒋重跃:《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赵轶峰:《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⑤ 刘家和:《追忆白先生、感念白先生》,《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的小学、经学、史学、子学领域成就非凡。不仅如此,他还喜欢欣赏古典音乐,精于古体诗(有未刊诗集一部),工于书法,^①是真正的多才多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学术之树长青的奥秘又在哪里呢?2012年9月20日晚上,我奉命去先生家取他给的东西(先生经常赠东西给学生)。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比较集中地谈了做学问的问题,并嘱咐我记下来。他总结了五点,在笔者看来,这五点是他对自己学术实践经验的思考和总结,正可以作为上述提问的答案。以下各点主题引文为刘先生原话,其他则结合笔者体会而成。

第一点是心胸。"要有心胸。心胸像茶杯,大了盛的多,小了盛的少。心胸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没有心胸,做不大,做不高。"刘先生早年读《孟子》,就悟出了做学问先做人的道理。"孟子在为学之前首先注重自己的为人、个人道德人格的修为(养成浩然之气);据此而发为文章、与人辩论时,必先反思自己的主张是否真正有理(必须'自反而缩【直也】'),这样发出的文章自然理直气壮,沛然莫之能御。"^②先生的人品和学品在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对学术充满了敬意,视之为天下公器,总是对请教者敞开大门,毫无保留。他深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并躬行之。他写东西会经过深思,不操觚率尔。他总不满足于已有成绩,总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还需要不断努力,需要不断进步,需要不断否定自己。他常借用一双关语对联自嘲:"行年七十尚称童,堪称寿(受)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③他还有一首自嘲的诗:"敢承过誉受虚声,不学岂堪更不诚。执笔人惊呼'泰斗',临文自觉认书生。书生故应呈原色,'泰斗'焉能冒盛名?洗尽铅华真我见,庶乎无愧且心平。"^④他对新的前沿理论总是持积极的开放态度,并能为我所用,融入自己的研究。何兹全先生曾经有一个为人及治学的心得,也常用它来勉励教导刘先生:既要"择善而固执之",(《中庸》)又要"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荀子·解蔽》)没有博大的胸怀和自我否定的精神,是很难达到这个境界的。

第二点是理想。"要有理想,崇高的理想,That Noble Dream (笔者按:系美国史学家彼得·诺维克于 1988 年出版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一书书名的主标题)。"刘先生的理想当然是做学术研究,但内涵丰富,可从以下层面来理解:首先是真挚的爱国情怀。刘先生矢志学术的理想是源于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日本人的残暴深有体会,也因《最后的一课》而触景生情。他至今不学日语,也不去日本。他立志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选择学术救国,也是因为担心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灭亡。抗日战争后,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又加入了反抗之列,以革命救国为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专心学问,以学术兴国、学术强国为已任。学术于他始终是一种生命,不是糊口的职业。这是他学术研究热情不减的原动力,至今没有改变。到现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张口即来。他非常关心时政,每天看参考消息和新闻联播,关注国际局势。新冠肺炎爆发后,他立刻从现实回溯到历史,推荐大家读挪威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通的《美帝国的崩溃》一书,督促我们思考研究相关问题。但是,这种感情又不是盲目的。不读中国书不行,要亡国;只读中国书也不行,不能救国、强国。他很早清楚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并试图从学术上追根求源,寻找解决的方案。这也是他中外比较的缘起之所在。中国是有缺点的,需要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呢?当然是西方所长而中国所短或无的,比如数学和逻辑思维、逻辑理性。这是西方之所长,也是其科学发

① 刘先生早年师法苏米,书法受到柴德康先生的表扬。他上大学时听过著名金石学家陆和九先生的金石学(考古学)课。陆先生精于魏碑,曾经专门点评过他的字,说他的字看起来不错,架子可以,但其实是花拳绣腿,基本功不扎实,笔法功力不行,要重练,从魏碑开始。此后,刘先生就练了几年魏碑,读了很多名家书帖,所以他的字中也有魏碑的特点。唐至中先生也曾经告诫刘先生写字要注意每笔都送到。他自评写字行笔太快,起笔落笔也太草率,后来就没有专门练习了。1971年,故宫曾经计划办一个展览,选拔书法或绘画好的学者撰写展品说明,刘先生是入选的十位人员之一。

②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③ 按照明清代科举制度,读书人在考取秀才之前,都称为童生。考取秀才后,才能考举人。刘先生大学毕业,虽然到东北师大进修过,但没有发学位,所以以童生自谦。"书生"则取书读的不熟之意。

④ 刘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手就抖,进入新世纪后抖得比较厉害。师大图书馆的董乃强老师与刘先生很熟,也经常开玩笑,说大家都称刘先生为泰斗。有一次,他们在专家餐厅吃饭时碰面,刘先生端了一碗米汤,因为手抖的厉害,撒了大半。董老师看到后说,刘先生您可真是泰斗(太抖)!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题名为《惊闻"泰斗"感赋》。

达之关键。他曾经在有众多院士参加的国家教材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数学教育中的问题和缺陷,并引起共鸣。2019年暑假,他还与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有过一次会谈,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感。这个高贵的梦还体现在他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期望上。刘先生一直在呼吁要继承陈垣老校长的根柢之学和白寿彝先生的贯通之学,将传统的目录考证与宏观理论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这是师大历史学科的传统和特色。特色是立足的根本,也是培养具有穿透力的中西兼通人才的前提。他常说,没有突破就没有穿透力,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①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在耄耋之年还亲自参与设计"励耘学堂"的课程计划,亲自上课并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最后是宏大的研究目标和格局。刘先生治学博通精专结合,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寻求理论突破。他经常告诫大家,学术研究要有高远的眼光,不能只满足于做专家,更要做大家,要勇于回应西方学者的挑战,回应时代的挑战。②学者要时刻警惕各种学术陷阱,如片警或段警陷阱,一辈子只做一个问题或一本书的专家陷阱,教授中等收入陷阱,低重复陷阱,碎片化陷阱,等等。当然,目标远大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实践。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座右铭——"眼高手低"。那就是:思考问题的眼光和境界要高,但解决问题要从小处、具体处入手。不要老是盯着小问题,要反过来,盯着大问题,从具体做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东西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高度不同,看到的也不同。在平面上是看不清路的,站在高处路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第三点是毅力。"毅力,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这方面,用"主一无适"来形容刘先生是最恰当的。他曾经说过,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漆侠先生给他们上过课,曾经告诫他要"主一无适",他也经常以此告诫我们。刘先生的"主一无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只干一件事,就是做学术,这是他始终不变的理想。他自己说,他也只能干这一件事,其他干不了。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心无旁骛,坚持不懈做学问,不争名,不夺利,主动靠边站,甚至主动放弃了各种升官发财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主一无适"。可能有学者会质疑,刘先生在希腊、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回转换,既搞经学,又搞史学甚至子学,还痴迷小学;既搞历史,又搞史学甚至理论,还写哲学的文章。这种闪转腾挪的架势很难说是主一无适,甚至相反。表面看来,似乎确实如此,事实并非如此。刘先生的"主一无适"并非在一个小领域或方面走到黑,也不是一辈子就搞一个题目。他的目的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是大家、通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学术生涯一开始就做了详细规划,通过研究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来认识人类历史及文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转换区域也是主动为之,是要做个案研究。他写希腊的文章,心中有中国,想的是印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吃一望二眼观三"。这是他的"一",多年坚守,初心不变。无论历史问题还是史学问题,无论历史探讨还是哲学思考,也都围绕这个宏大主题展开。各项研究或者层层递进,或者从不同角度展开,都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是一个有机整体,绝非一盘散沙,更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第四点是反省。"反省,也就是方法。要反省自己的方法对不对,一边砍柴一边磨刀。在反省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反省,不断革新。要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实现方法上的革新。"刘先生不但善渔,而且长于渔鱼之道,特别重视总结学术研究的方法,善于自我反省,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他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体会到了打基础与搞研究的关系,认识到了基础的层次性,也注意到了基础的结构等问题。此外,他还多次谈到博与通、精与专的关系,对"竭泽而渔"等也有精彩论述。③这些认识既是他研究经验的

① 刘家和:《也谈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问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上);《没有突破就没有穿透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例如,回应黑格尔关于中国历史特点及以史为鉴的论断,托马斯·库恩"不可通约性"问题等。刘家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刘家和、蒋重跃:《在挑战与回应中前进——刘家和先生谈学术工作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可参见:《论学术工作的基础》《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在挑战与回应中前进——刘家和先生谈学术工作的基础》《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廣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引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

总结,又反过来指导改进其研究。他经常说,方法就是磨刀,不要怕耽误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刀快了,才能砍得快,砍得多。在这方面,刘先生有两把刀(他戏称"二把刀"),一把是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一把是逻辑。这是他的独门法器,一中一西,土洋结合,至今还在磨着。

第五点是效率。"方法革新的如何,要看效率。别人看一天的,你一个小时就解决了。这就是效率,关键在效率。这是自觉反省的结果。" 刘先生不但方法高明,而且效率高超。他特别会利用时间。上厕所时看说文解字,逛书店看书则有意扩充自己的目录学知识,训练自己的眼力。他经常讲,要学会看书,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读书是要有选择的。他将阅读对象分为工具书、教材、研究论著、资料汇编、未经整理的原始材料等,类型不同,阅读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或检索,或泛览,或精读,则要视具体题目等而定。他读书先看作者、目录、前言、后记等,了解大概情况,然后决定是否继续读、如何读。对于要读的书,则据自己的知识加以判断: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哪些是介于知与未知之间的,也就是知道一点但又不深的。一般说来,已知的可以不管,未知的也可以暂时不管,因为缺乏背景,离得太远,不容易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阅读思考的重点应该放在知与未知的部分,因为这部分似懂非懂,也最容易发现问题,最容易取得突破。由于效率非常高,他的转变进程非常快。周一良、吴于廑先生编纂世界通史,编写提纲时他还是希腊史的专家,在欧洲组,但到正式写作时,他却要求到古代东方组,写印度的部分。1983年开国家社会规划会议时,他还是世界史专家,到 1987年分科开会时,他就变成中国史专家了。

刘先生的效率高,当然得益于他的强记博闻和独特方法,也与他的问题意识密不可分。他总是带着问题思考和阅读,从书中寻找启发和灵感,寻求答案。笔者觉得,这些固然重要,但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他的阅读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是自觉行为。大多数人读书之所以效率不高,是因为还停留在自发状态,没有形成自觉。在这种状态下,读书漫无目的,无主次之分,最多可以成为"活字典"。即便自觉了,如果理论高度有限,也难提出高水平的问题。实际上,有问题的人很多,提出问题的人也很多,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提出好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更是凤毛麟角。刘先生的问题都是在理论的指导下从逻辑的角度提出的,经过了一般抽象与个别具体之间的多次往复。这使他居高临下,不但容易看出并提出高水平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梓材篇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问题是老的,研究的人更是多得数不清。但是由于他有了理论的自觉,从古代世界城邦的普遍性与多样性角度进行思考,所以能够有突破,从而判定人历、人宥是社会阶层的范畴。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三朝制新探》。公刘篇则同时考虑到了历史的基本时空逻辑,解决了经学上的难题。

四、结语

时至今日,这位"九零后"仍辛勤耕耘在学术前沿,初心未改;仍然目光敏锐,才思敏捷,与人论学两三个小时,不疲倦,不重复,不跑题;仍然记忆超群,文献诗文,张口能背;仍然风趣幽默,妙语迭出;仍然干劲满满,还时时"煽风点火"(这是他给弟子们打气鼓劲的常用语,他自称"疯癫老头",是学生的"充电器""打气筒")。孔夫子曾经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又曾自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些话用在刘先生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颜渊曾经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对此,了解并熟悉先生的学生想必会"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他鼓励大家学颜回,不要学冉求,理由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责任编辑:杨向艳

文 学 语言学

由"中"而来:中国形式美的起源、定型和内容

张 法

[摘 要]中国形式美理论在远古的立杆测影活动中产生,特别是以数的九五之比和 60°视角而凸显出来。以"中"为核心的观天活动,经过十字、万字、八角星形、亞形、式盘等多种方式演进,最后在易学中定型为九宫图和太极图,并融合先秦至汉的气论、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了以九宫图和太极图为基础的中国形式美体系。中国形式美理论具有虚实—关联结构,九宫图主要与朝廷美学相关,太极图主要与宇宙美学相关,从而形成了中国形式美个体形式、朝廷形式、宇宙形式三者的整体结构关系。中国形式美的个体形式,需要与后两种形式关联起来,才能得到最后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形式美 观天之中 九宫图 太极图 个体—朝廷—宇宙关联结构 [中图分类号] B83-02; J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144-13

中国的形式美理论,在由远古到先秦的观天仪式演进中产生。远古中国,东西南北各族群的观天活动多种多样,与文化和美学的形成最为相关的由立杆测影而来的"中"最后成为主流。在漫长的演进中,以"中"为核心的立杆测影天文观测,被总结在从伏羲到文王再到孔子的易学体系里。立中,即通过村、邑、国的地之"中"而确立以北极一极星一北斗为一体的天之"中"。此天之中名曰北辰,又名太极,贾公彦《周礼疏》曰:"极,中也。以居天之中,故谓之北极也。"^①在天极中,北极不易,极星千年一易,北斗随时而易但指向极星不易,形成不易与变易的统一;在天象中,北辰不变,而带动天地运行,也是不易与变易的统一。由此形成"易"的理论。"易有太极"是易理的核心,郑玄说:易有三义,不易、变易、简易。^②由"易有太极"而来的三易思想,在形式美上,形成了以九宫图和太极图为基础的形式美体系。具体到审美对象上,形成了形式美理论的虚实一关联结构,体现为:第一,具体对象本身的具有虚实结构的形式法则;第二,具体对象的虚实结构与天地的内在关联,天即天象(特别体现在京城结构之中),地即地理(特别体现在村落结构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形式美的个体形式、朝廷形式、宇宙形式三者的整体结构关系。

一、中国形式美的起源:观天之中

中国形式美的起源,可以从《周礼·考工记》中的一段话讲起:"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③这虽然是先秦以后的总结,但其起源在远古。此段话讲的是以立杆测影的"中"为核心的天文观测:在平地上立

作者简介 张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兼职研究员(四川 成都,610064)。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9页。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曰:"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③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第 1147-1149 页。

一執(中杆),观察太阳东升西落在杆下的投影,由早晨和黄昏的日影求出东西方向,由正午的日影,再参之以极星,求出南北方向,以杆为"中"的东西南北中的空间观念由之得出。由太阳一年在南北回归线的往返,得出以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为中心、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要点、二十四节气为节点的日月季年的时间体系。太阳的晨午昏的日运动和南北回归的年运动,体现为以中杆为圆心的画圆和以中杆为中心的画方,立杆测影活动形成了以中杆为中心的方圆结构,由"中"形成了时空合一不可分割的关联体系(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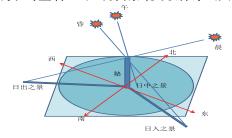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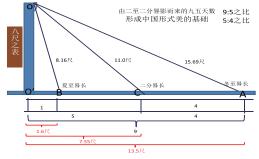




图 1 中杆观天与方圆结构

图 2 三龙为主体的中国地理(来源: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

这一时空合一的天圆地方观念不仅来自直观,而且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思想和技术的总结,具有 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虽然太阳观察是主,但同时也是对包括日月星在内的整个天相的总结,是以北 极一极星一北斗为中心、以二十八宿为环绕、日月众星在其中运行的具有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合一的 "天"的整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为其基本结构。第二,在由远古东西南北各族群的互动 而形成的"共识中国"中,人们认识到了中国地理的西北高东南低的基本形态。《禹贡》把中国山脉 分为四列九山。山体绵延为龙脉,由昆仑山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行,渡 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总之,形成了由西 至东以三龙为主体的中国地理(图 2)。第三,太阳在天空运行,不见其轨道之线,但从中杆投影上可 呈现运行之迹,因而其运行是虚而实有。整个天体以北极一极星一北斗为中心的日月星的运行,以气 贯注其中,形成天地互动。《春秋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一也。"① 《太平御览》卷二二引徐整《长历》曰:"北斗当昆仑,气注天下。"②以中杆为核心的观天察地把天地 组织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的整体。就数的规律来讲,立八尺之中杆,二分二至的晷影形成了9:5 比率和 5:4 比率,再由之关联到其他因素,形成了中国形式美(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的黄金比在内)的美的比率 体系(图3)。就角的规律来讲,冬夏二至日出与正南的夹角接近60°。在古代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冬 至太阳从南偏东 60°的辰位升起,从南偏西 60°的申位落下。夏至太阳从北偏东 60°的寅位升起,从 北偏西 60°的戌位落下。 二至与雨水、处暑, 太阳所在宿度相差 60°, 雨水、处暑前后, 斗柄所指方 位与正北方成 60°。以 60°为基础,形成了 30°、45°的角度体系(图 4)。虽然中国的数理没有西方几 何那样的角的理论, 但也把角纳入到了自身数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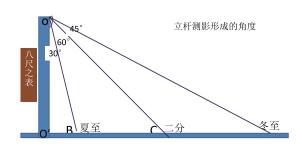


图 4 由中杆观天而来的基本角度

①[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2页。

②[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6页。

数量关系和角度关系都包含在天地整体的图形(即天圆地方)之中,中国的形式美理论由此从这一以"中"为核心的观天活动中产生。

二、中国形式美形成期的多形演进

这一天地整体的运行,在远古东西南北各族群的具体演进中,其形式和演进路径多样而繁复。从逻辑上由后往前梳理,可以梳理出一个大致的演进环节,即十字、万形、八角星形的形式抽象一方面进入从亞型到明堂的建筑空间,另一方面进入式图的工具模型。这既形成了形式美的演进路径,又成为了形式美的基础因素。















图 5.A 马家窑彩陶纹中的十字纹

图 5.B 半山彩陶纹中的十字纹

图 5.C 马厂彩陶纹中的十字纹

图 5 西北各文化的十字纹

在立杆测影中,十字是在动态中的十字。只有从整个天地互动以及由整体天地运行反映在中杆下日月星的投影上去理解十字的内涵,其意义才是完整的。因此,不强调静态而彰显动态,十字就转化为万(卍和卐)形,前面所举三个甲骨文的巫字,第二字"十"就是具有动态的万字。万字在远古文化东西南北各地不断出现(图 6),体现的正是天地的运行。













图 6.A 半山型

图 6.B 马家窑马厂型

图 6.C 阴山岩画 图 6.D 河北武安赵窑 图 6.E 山西太谷白燕 图 6.F 内蒙小河沿

图 6 中国远古各地文化的万字形

以体现天地运行的"万"字为内容的远古仪式之舞,称为"万舞"。甲骨卜辞及《夏小正》《诗经》《左传》《国语》《墨子》等文献都提到了万舞。据萧兵研究,先秦各方的四大族群,西北的夏和周,东方的商,南方的楚,都有万舞。^③ 孙诒让说,黄帝尧舜夏商周的"六代大舞,所谓万舞也"。^④ 在万字中内蕴的,是由十字而来的天地整体运行的规律。把十字与卐字结合起来就可以理解天地的整体运行。再进一步细化,就是体现八方的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同样在中国远古东西南北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8-89页。

② 以上字例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 4 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760-762页。

③ 萧兵:《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辽宁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

④ [清]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26页。

各族群的图案中不断地出现(图7)。















图 7.A 大溪文化 图 7.B 马家浜文化 图 7.C 良渚文化 图 7.D 小河沿文化 图 7.E 大汶口文化 图 7.F 凌家滩文化 图 7.G 河姆渡文化

图 7 远古各文化的八角星纹

这些图案显示,八来自于四。最后一图是河姆渡文化的四鸟图,以旋转样态透出了八方的指向。《淮南子·天文训》讲到从二(绳)到四(钩)再到八(维)的演进,而且是在时空合一的框架里讲的:"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蹏通之维。"①由此形成了理论性的八方图(图 8)。还原到立杆测影技术,可以呈现由立杆测影(图 8.A 的两图)到对之抽象化(图 8.B 的两图)最后到《淮南子》的理论化过程(图 8.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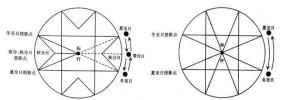


图 8.A 由中杆观天而来的虚实八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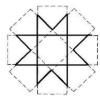


图 8.B 由观天抽象出来的八方动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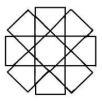




图 8.C《淮南子》八方图

图 8 中杆观天到八方图的内在演化

八角星形与西方的五角星形不同,八角星形不是用几何学去体现以黄金分割为核心的西方天道,而是以时空合一、静动合一来体现中国天道。更全面和更清晰地把天地整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亞形。亞形是中杆的仪式空间,通过空地、坛台建筑之静,反映天地合一的动态整体。亞形经过古文字和文献上的一系列演进,如心、中、岭、〇、〇、〇、〇、〇、日,最后落实到明堂上。据文献记载,从神农到黄帝再到周公都有明堂。《三辅黄图》说:"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②《尚书帝命验》说:"唐虞谓之五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③名称不同但功能一以贯之,蔡邕《明堂论》说:"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④总之,是把基本的数的规律包括在其中。

明堂为法天则地的巫王所居住的符号性建筑,与之相应的还有一种占卜工具,战国时代普遍称为"式"。李零说依《周礼·春官·太史》再早名曰"天时",应当还有更久远的器形和名称演进史,其内容可以上溯到《尚书·虞典》的"同律度量衡"、甲骨文和《山海经》的四方风、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北斗龙虎图、凌家滩文化的四位八方玉片。这一工具也由远古巫王进行法天则地的思考而来,因此,式与明堂型建筑一样,体现了天地一体的数理规律。图 9 是两汉六朝的四种式盘。式由圆形上盘和方形下盘构成,圆象天,以北极一极星一北斗居中,环以多层圆圈,依次可标:(1)十二月神,(2)干支,(3)二十八宿。地盘由多层方形构成,一般有:(1)天干,(2)地支,(3)二十八宿。两盘相扣,天

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7页。

②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第 294页。

③[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368页。

④ [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第799、8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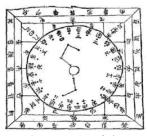


图 9.A 西汉六壬式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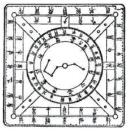


图 9.B 东汉六壬式盘



图 9.C 朝鲜出土的东汉六壬式盘



图 9.D 六朝晚期六壬铜式盘

图 9 两汉至六朝式盘

地互动,构成了天地整体的运转。^①从两汉之式可推回到远古此类图形的产生和在历史中的演进,其基本结构不变,具体义项有变。对本文而言,式与明堂一样,蕴含了中国古代形式美的基本数理。

三、中国形式美的理论定型:九宫图与太极图

中国自远古至先秦,由立中观天而产生的"十"、"卍"、八角星纹、亞形、式盘等图形演进,就形式美而言,其最基本的图形是什么呢?是《周易》里的数理体系。如前所述,郑玄注《易》,谓"易"之一字包含三个内容:(本质性的)不易,(现象性的)变易,(精要性的)简易。第三条简易("易简"),强调的就是易中的数理内容。《周易》的数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二,由三爻成卦而来的一分为三的模数理论。八卦卦象就是由 -- (阴) - (阳) 之 "一"重叠到量(乾) 註(坤) 两卦之 "三",再由 "三"相互重叠而成六十四卦。这是一个以 -- 一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宇宙模数,也就是《说卦》所说为什么三爻成卦的基本经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爻象征的是宇宙的天地人整体,天因日月星运行而来的昼夜、晦朔、冬夏之流动构成阴阳之爻象,日月星的运行引起地上万物生长,成刚柔之爻象。刚柔既指物的性质(山刚水柔、石刚土柔、树刚草柔等等),又指物的生灭(初生柔、成长刚、老时柔)。人在天地之中,依天地的生的法则而有仁,依天地的灭的规律而有义,从而构成人的生灭爻象。《系辞下》说,爻就是动,《系辞上》说,爻就是变。三爻构成两个基本的量(乾)註(坤)卦,构成卦的模数,展开为六十四卦以象天地万物。三爻成卦,用《老子》(第四十二章)的话来说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的爻卦系统构成了中国形式美模数的理论基础。中国乐论,由三分损益法而得五音,进而得出十二律,产生宇宙各种音乐,是依三分法而来的模数。中国山水画,郭熙《林泉高致》说"三远"可以演出一切山水画的境界,石涛《画语录》说"分疆三叠两段"可构成一切山水画的构图,^③都源于由三分法而来的模数理论。建筑上李诚《营造法式》构材比例划分,房屋整体及局部比例划分,都遵循和运用三分法的模数系统。喻皓《木经》说:"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④乃将三分模数运用于人居建筑结构。

以上两点以数的原理为主,下面两点则以形的原理为主。由包括前两点在内的易理思想的演进,

① 参见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秋季卷)。

② [魏]王弼注, [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 第289、258-259页。

③ 参见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④ [宋]沈括:《梦溪笔谈》("喻皓《木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产生了由河图、洛书而来的九宫图和由八卦图而来的太极图,形成中国形式美的基本图形。

第三,由河图、洛书而来的以方为主的九宫图。郑玄注《周易·系辞上》和《礼记·月令》,认为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一、三、五、七、九是天数,二、四、六、八、十是地数。①以生数成数动态相交,把运行中的斜条按顺时针运行到十字直条上,并叠加在直条的数字之上,形成凸显"十"字的河图②(图 10.A-D);以天数地数动态相交,形成彰显九宫格的洛书(图 10.E-G)。河图形成十字图形,强调方形里中轴线的重要性;洛书形成九宫格,彰显相互贯通的整体的重要性。这里,生成数和天地数的圆转流动是重要的。作为平面图形的河图洛书,强调的是中心、中轴、九宫。这构成了中国建筑从村落到城镇再到京城的基本结构,也是一般民居中地标性建筑的基本构图。同样,在九宫十字图中一定要体悟其中所蕴含的如图 10.A 和图 10.E 体现出来的生成的运行和天地的互动。九宫图实际上是四图一体,一是图 10.F 的九宫,二是图 10.C 的十字,三是图 10.E 的天地互动,四是图 10.A 的生成运行。其实只要从式图的观点去看河图洛书,一个四图合一的中国空间基形就凸显出来了。也可以说,由河图洛书构成的九宫十字图是中国空间构成的基本图式,它包括图 10.F 和图 10.C 的正形(礼制建筑),也蕴含着图 10.E 和图 10.A 的变形(园林建筑),但礼制建筑都有园林因素在其中,园林建筑也都有礼制因素在其中,二者互通。理解了这些,就可以理解九宫十字图为何是中国形式美的基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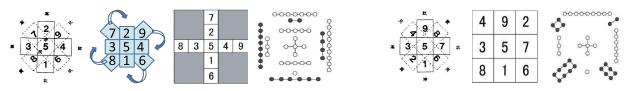


图 10.A-D 河图及其数理

10.E-G 洛书及其数理

图 10 河图洛书及数理图

第四,由八卦图而来的以圆为主的太极图。从宋代刘牧、元代张理到清代江永,都讲到河图洛书与八卦图的关系。先天八卦图与后天八卦图的互补互通,为现代学人所热论。本文主要从数理角度阐释太极图的产生。《说卦》曰:"天(乾量)地(坤☵)定位,山(艮☶)泽(兑量)通气,雷(震量)风(巽☴)相薄,水(坎☵)火(离量)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③这段话蕴含着天地互动与四方四时运行的中和原则以及相关的重要思想,这里仅从数理角度看太极图的产生:—(阳爻)为 0, -- (阴爻)为 1,其顺序就成了 000 (乾)、001 (兑)、010 (离)、011 (震)、100 (巽)、101 (坎)、110 (艮)、111 (坤),体现的是二进位的奇偶规律(图 11.A)。其在时间中"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运行方向,由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再转到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运行之线构成了太极曲线(图 11.B),它是被立杆测景一直观察到的和由北斗斗柄四季旋转、太阳年回归、月亮的朔望晦循环总结而来的理论抽象。太极图阴阳互含的原理,在大汶口文化的梳子上(图 11.D)、



图 11.A 先天八卦图 图 11.B S 曲线

图 11.C 太极图 图 11.D 大汶口文化 S 型梳

图 11.E-G 屈家岭文化中的纺轮

图 11.A-C 从先天八卦图到太极图

图 11.D-G 太极图的远古刍型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1-452页。

② 河图和洛书的名图认定,本节按现代学术主流,依南宋蔡元定说(北宋刘牧的定义正好相反)。

③ [魏]王弼注, [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 第 326-327 页。

屈家岭文化的纺轮上(图 11.E-G),以及在冬季阴中含阳和夏季阳中含阴的转换里,已有所体现。因此,从八卦图到太极图只是一种思维形式的变换,但这一变换对中国的形式美却具有重要意义。

太极图突出了中国形式美的三大要点:第一,结构的对称、均衡。黑为阴,白为阳,阴阳互动;白为虚,黑为实,虚实相生;黑为有,白为无,有无相成。阴阳、虚实、有无的互动,具有融对称均衡为一体的结构。这种在动态中的对称均衡的合一,可谓之为"中"。第二,互动的进退、转化、互含、圆转。太极图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阴阳互含。其黑白两鱼,一边的鱼尾渐缩渐小,化进另一边中,在圆的规范下互为进退、相互换位,具有阴阳、虚实、有无互动圆转的特点。这一特点,可谓之为"圆"。第三,太极图的结构及其互动,都是在圆的规范下以太极曲线的方式进行的,透露出宇宙万物在日、月、季、年中运行的特点,同时也是万物、个人、家庭、族群、王朝的运行特点。太极曲线以圆而形成,又以圆为旨归。这一特点,可谓之为"曲"。中、圆、曲乃太极图作为形式美的特征,这一特征贯穿中国美学的方方面面。

当先秦的各种思想,特别是气的思想、五行思想、阴阳八卦思想,既区别又关联着演进,最后在秦汉时期相互融合,以及九宫图和太极图又与气论和五行思想结合在一起时,^①气论就从内容上进入两图中,五行则从形式上进入两图中(图 12.A、B、C)。当由十字和卍字而来的处在河图洛书中央从而也处在九宫图中央的"五",在先秦展开为一个普遍相关联的五行图式时,在形式美上,就形成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说"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②色声味以五为基本,展开为千味千色千声。《礼记·礼运》说:"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③也是讲以五行与五声、五味、五色为基本,而产生一年十二月中的万声万味万色现象。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声、色、味在数上的共通性。这一共通性,还包括与宇宙万物的同构与会通(表 1)。

	色	味	音	季节	方位	位置	情	内脏	道德	神	帝
木	青	酸	角	春	东	左	怒	肝	仁	句芒	太皋
火	赤	苦	征	夏	南	上	喜	ご	礼	祝融	炎黄
土	黄	甘	宫	长夏	中	中	思	脾	信	后土	黄帝
金	白	辛	商	秋	西	下	忧	肺	义	蓐收	少皋
水	黑	咸	羽	冬	北	右	恐	肾	智	玄冥	颛顼

表 1 五行相联相诵表

当五行八卦结合在一起时,太极图就包含了五行的内容。展开来讲,河图也蕴含着五行的内容, [®] 因而也可以说九宫图也蕴含了五行的内容。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形式美理论甚为重要。九宫



图 12.A 以八卦为主的五行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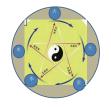


图 12.B 以五行为主的太极图



图 12.C 五行八卦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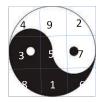


图 12.D 九宫—太极图

图 12 太极五行八卦图的三类形式和九宫—太极图

① 关于五行与八卦在具体要项上的同构与互通,参见王俊龙:《〈尚书〉五行、〈周易〉八卦和人体形态逻辑再探》,《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②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4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 第 1222页。

③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第691页。

④ 参见王兴业:《河图洛书探微》,《周易研究》1993年第3期。

图和太极图既是两种基本图形,就其分来讲,各有变化,就其合来讲,二者合一,构成中国基本图形的整体(图 12.D)。综上所述,从形式美的角度讲,中国远古以立杆测影为中心而产生的数和形,从九五之数、60°—30°—45°角到十字、万字、八角星、亞形、式盘,最后形成了以九宫图和太极图为基础而又互通的基本图形,构成了中国形式美的基础。

四、中国形式美的基本内容

九宫图不仅是九宫图本身,而且还蕴含着整个远古美学演进中十字、万字、亞型、河图、洛书的形式美内容,太极图也不仅是阴阳鱼的互抱,而且还包孕着无极、太极、气、阴阳、五行、八卦和天地运行的形式美内容,由此就可以理解,中国的形式美实际上存在于虚实—关联的文化整体框架中。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体审美对象形式美的基本要素和结构,以及由自相似而来的数模原理。这与西方的形式美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相似可感到宇宙的同一性,不同能凸显中国的特殊性。具体的审美对象所呈现的数理,不仅是可见的自身形式,更有自身未显的关联内容。关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礼制的等级数理,二是自然的宇宙理性。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从整体看个体,而不是从个体看个体,个体虚实结构中的虚的关联从这里透露出来。个体虚的关联的两种类型——朝廷礼制和宇宙整体,构成了中国形式美如下第二和第三点基本内容。第二,个体审美对象因关联礼制整体而来的形式美法则,以九宫图为主,主要以朝廷形式呈现。第三,个体审美对象因关联宇宙整体而来的形式美法则,以太极图为主,主要以明廷形式呈现。以九宫图为主的朝廷形式和以太极图为主的宇宙形式虽有不同,但又相交相迭相通,因此,可以将之归为一大类。这样,就可以将中国形式美的内容归结为两大类,一是审美对象自身呈现出来的可见形式,二是这一可见形式所关联的在个体上不可见的整体内容,即礼制的数理内容和宇宙的数理内容。

(一) 个体形式

每一个审美对象都有其具体的结构方式,使之看起来是美的。古代的审美对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让人看起来是美的呢?以建筑为例,现代理论家发现了世界公认的以比例、模数、角度为基本内容的 形式美规律,这对于认识中国的形式美,可作为参照。

先讲比例。中国现代学人在研究中国古建筑时,发现了比例规律。比如,王其亨认为,殿阁楼台房屋以及每面举折深高控制,都有与西方黄金分割极为相似的 3:2 比例。①王贵祥认为,在中国礼制建筑中,广泛运用了 $\sqrt{2}$ 矩形。②王树声分析隋唐长安城,总结为"三个内含等边三角形的矩形"规律。③王南把王树声的归纳提炼为 $\sqrt{3}$ /2 矩形,并将之运用于从远古到清代的礼制建筑分析中,得出结论: $\sqrt{2}$ 和 $\sqrt{3}$ /2 比例在中国礼制建筑中普遍存在,为两种基本比例。这两种比例中还包含了模数关系, $\sqrt{2}$ 比例同时就是 5:7 或 7:10, $\sqrt{3}$ /2 比例同时就是 6:7 也是 7:8 (图 13)。④在古代文献中, $\sqrt{2}$ 的表述方式是"方五斜七""方七斜十"。 $\sqrt{3}$ /2 从中国形式美的起源上讲是由立杆测影而来的 4:5;从定型上讲是九宫图正方形按正变美学的通变原则而来的变体,用比例方式体现了"事在四方,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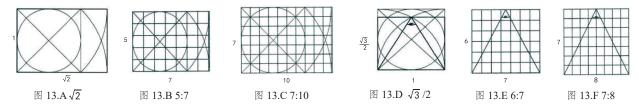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形式美的各种比例

① 王其亨:《〈营造法式〉材分制度的数理涵义及审美观照探析》,《建筑学报》1990年第3期。

② 王贵祥:《√2与唐宋建筑柱檐关系》,《建筑历史与理论》第3、4辑,1982年。

③ 王树声:《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城市规划》2009年第6期。

④ 王南:《象天法地,规矩方圆——中国古代都城、宫殿规划布局之构图比例探析》,《建筑史》2017年第2期。

在中央"^①的思想。这两种基本比例已经透出些许中国形式美与西方形式美的同与异。最后,还要加上傅熹年对明代故宫分析得出的 9:5 比例。这样,中国形式美的比例理论,以九宫图为基础,展开为三种基本比例: 9:5、5:4(即 $\sqrt{3}$ /2)、5:7(即 $\sqrt{2}$)。三者皆以九宫图中的 5 为核心。

再讲模数。梁思成、傅熹年、王其亨都认为,中国建筑在用材上,《营造法式》中八个等级材分 构成用材模数,而斗拱形成中国建筑美学和礼制的模数。傅熹年说:"木构建筑以所用标准木枋称 为'材',以它的高度为模数,称为'材高',是建筑的'基本模数'。又以材高的十五分之一为'分', 是'分模数',以计算小尺度的构件。当建筑用斗拱时,拱高与材高相等,建筑物的面宽、进深 和柱、梁、斗拱等构件都以'材''分'为单位。"②八等规定材分是一切建筑的模数基础,礼制建筑 所规定的斗拱级别又成为礼制建筑的模数基础。不从材分而从空间尺度看,无论是单体建筑还是建 筑群、同样依照一种模数。符英、段德罡所配图形、较好地展示了中国建筑从间到房屋到院落再 到里坊、城市的模数(图 14)。^③这里的间、房、院、坊、城,都是九宫正形,但在现实中,可变为 另一正形√2,再以二者为基础,变成千形万形。什么模数是中国美学的核心?傅憙年对故宫的分析最 为经典。④傅熹年区分模数和网格,这里突出网格中本有的模数,将其归为两类,一是以观念为主的 模数,一是以美学为主的模数。在中国美学中,以观念为主要落实到美学上,以美学为主也要内蕴着 观念。以观念为主的模数是以代表皇家的两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为模度,两宫东西向118米,南 北向 $218 \, \text{米,} \, = -$ 矩形宫院,其长宽比为 $11:6 \, (\approx 9:5)$ 。两宫扩大四倍面积,形成代表"国"的前三 殿(皇家即由家而国而天下的家国合一)。进而,不但东西六宫、乾东西五所等小宫院的总合,依后两 宫模数,而且从大明门到景山的皇城中轴线,也依后两宫模数。以美学为主的模数,则是指整个故宫 依等级礼制形成尺度不同的院落,其中有三种不同的网格尺度:三丈、五丈、九丈。⑤最大宫院如外 朝最重要的三前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太和门至午门之间,午门外至天安门金水桥之间, 用九丈网格。次级宫院如后两宫、东西六宫、皇极殿、乐寿堂等,用五丈网格。小的宫院如慈宁宫、 文华殿、英武殿,用三丈网格。这里三、五、九丈是为了突出视觉效果,但三、五、九又与文化的圣 数观念相关连。三是"三生万物"的生数, 五和九是"九五之尊"的皇权。对于中国的形式美来说, 要把建筑单体与按模数展开的整体关联起来,其内在结构方能透露出来。故宫整体,以后宫的九五比 率形成的基元和用三、五、九丈的网格模数形成的整一建筑群体,初步彰显了中国形式美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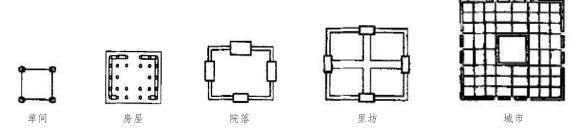


图 14 中国建筑美学的模数

中国美学的特点是本质与现象(象—数—理)的合一,因此在理论上与数理相关联,还需要把现象直观与内在之数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这就是中国建筑美学上十尺为室、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空间

①[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页。

②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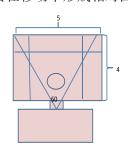
③ 符英、段德罡:《方位与中国传统建筑(续)》,《华中建筑》2001年第1期。

④ 傅熹年:《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5辑(上),2007年。

⑤ 傅熹年文中是三丈、五丈、十丈,这里根据曹鹏《明代都城坛庙建筑研究》(天津大学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 对其进行修正。九丈也更符合中国传统观念。

整体形式美理论。中国建筑的尺度标准取自人体,所谓"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①"人形一丈,正形也"。^②以人体为标准,形成中国建筑的十尺为室、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比例尺度,即在群体建筑中,单体建筑最小单位(室)是丈(=10尺),所谓"丈室容身"。最大单位是百尺(=10×10尺=10丈,即23~35米为率),所谓"百尺为形"。在群体建筑中的每单体之间的距离,最大单位是千尺(=10百尺),这是人的感知视觉的最大尺度。以故宫为例,单体建筑的高度,除了午门从地至脊吻高37.95米,太和殿高35.05米,所有单体建筑都在35米以下。以近观视距看,东西六宫的绝大多数庭院,通面阔,通进深,都在35米限内。"在远观视距构成上,紫禁城的整个平面布局除东北、西北城外角各至东华门、西华门距离过大,为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广场、街巷、或相邻单体建筑的间距,以及城台、城墙各段落之长最大也只在350米左右。"③这可以说遵循了"千尺为势"的法则。这一以视觉感受为中心引出的形式美原则,又与中国数理紧密相连,在故宫的具体例子中,与后两宫的基型和三、五、九丈的网格原则紧密相连。

最后讲角度。角度是一个静态空间概念,讲究时空合一、动静合一的中国建筑没有角度概念。[®] 但作为动中之静,角度又是存在的,只是中国古人不从角度的视点去看,却又把角度放在形式美理论之中。如前所述,在立杆测影的远古,角度就内蕴其中,形成了 30°至 60°的中国形式美原则。人立于定点双眼观看,视野范围为 120°,而 30°至 60°是视线清楚的范围。如张杰所说,[®]中国的礼制建筑,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到二里头一号宫殿再到西周岐山风雏遗址,都采用了 60°视角(图 15)。中国礼制建筑形成的 30°至 60°角度,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为礼制所要求的一系列尊卑等级的互看方式。而在园林之中,又有对 30°至 60°角度的另一种运用。韦克威以 60°为分析框架,彭凤以 180°为分析框架,对颐和园的三个视点进行了角度分析。[®]韦克威分析了颐和园两处视角要点:一是以万寿山上的佛香阁为视点,在由高而低的俯视中,由八个 60°视点引出的八个景观系列;二是在颐和园前湖中,由南湖岛、望蟾阁、藻鉴堂三岛的位置关系而来的三组平视和由低向高的 60°视角,引出由之而来的景观系列。彭凤分析了在万寿山下宫廷区外南面临水的知春亭中的视角展开。实际上,在园林中,视线的移动使得 60°和 180°可以互换;在佛香阁上,还有一个 360°游观整体。佛香阁、前湖三岛、万春亭,这三处视点,形成中国美学中非常精彩的移动性互看。而从 360°到 180°再到 60°,其中还包含着 45°和 30°之间的多种转换,但 360°的环观和 180°的游目,在"环"与"游"中都会在移动中形成相对固定的 60°、45°、30°的美学视线。这些不同角度的转换,又都是由园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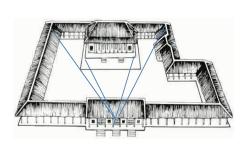


图 15.B 二里头文化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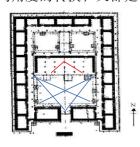


图 15.C 西周岐山凤雏遗址

图 15 中国远古建筑形式美中的角度

①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23页。

②[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③王其亨:《风水形势说和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

④ 张旻昊:《从角度概念欠缺看传统营造的若干现象》, 浙江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参见张杰:《中国古代建筑组合空间透视构图探析》,《建筑学报》1998年第4期。

⑥ 韦克威:《颐和园及北海景观规划中的视觉控制浅析》,《中国园林》1996年第2期;彭凤:《颐和园的造园艺术赏析》,《湖北农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景观本身引导出来的。一方面是景观的安排决定了审美的度数,另一方面又是设计者按一定的角度之数对景观进行安排。这里,中国园林形式美理论的体系性就呈现了出来。

(二) 朝廷形式

以上从比例、模数、角度三个方面分析了个体审美中呈现的形式美法则。这对于由实体—区分而来的西方形式美而言,已经基本上讲清楚了,但对于由虚实—关联而来的中国形式美原则,却还没有讲到一半。中国的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形式美,不完全由具体的审美对象所决定,而是要求比具体对象更大的整体,这个整体存在于具体对象的审美感官范围之外,要用感官之外的心性方可感受。只有心性感受到了之后,感官之"感"才得以真正完成。因此,这种形式美不是由具体对象之"实",而是由具体对象之"虚",不是由具体对象的实体独立性,而是由具体对象的虚体关联性来决定的。

与个体审美对象相关联的内容之一是礼制数理。在中国文化观念中,人生天地间,普遍体现为人 处于家国天下之中。家国天下是一个分层的等级结构。中国的审美对象由虚实两方面构成,虚的一面 关联着礼制结构的形式美整体和宇宙的形式美整体。还以建筑为例。中国的建筑以天子所居京城为最 高等级,以下的省府县城按一定的模数(一般是以二为公差的等级差数)递减。同样,从京城到县城, 各类建筑也依礼制按模数递减。即使在国家的最高等级京城中的最高等级的宫城中,各建筑单位同样 依礼制等级按模数递减。因此,对于某一个体建筑,一定要知道整体的礼制规定,这一具体建筑何以 呈现这样的形式方得到理解。比如,对于作为京城的北京城,其比例要符合九五之尊的数理。傅熹年 的研究证明确是如此。明北京城与紫禁城的比例,南北长为 5.5:1,东西宽为 9:1,面积为 50:1。这是 一个符合九五之尊的数理,面积的 50:1 还蕴含着《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的思想。前三殿和后两宫的工字形台基,长宽为9:5,前三殿和后两宫的总长宽为9:5,前三殿的总宽 与工字台阶的总宽亦为 9:5。明代太和殿的平面空间划分,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形成 9:5 比例(清 代面阔加为 11 间,成为最高数,但左右最边上的各一间稍窄,为附间,从理论上可略去而为九,但 九带有附间又凸显比其他的九高)。午门是宫城大门,墙下五门墙上九间,形成 9:5 比例。午门上的钉 横竖皆九,为最高数的九九八十一颗钉。城楼檐上的脊兽,为最高数的九(在太和殿面阔于清代改为 十一间的同时,殿檐上的脊兽也成为十一)。宫城为天子所居,突出九五数理。在宫城、皇城和整个京 城内部,还有等级结构。在皇城之内,以中轴线上九五型建筑为最高级,即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 太和门及前三殿、后三宫(含交泰殿),靠近中轴线的东西六宫,嫔妃们的宫室,或靠近中轴线的大门、 廊房、花园的景亭是第二级;宫内官员的房屋是第三级;以上三个等级的附属房屋为第四级。在皇 城之外,王府、衙署、寺庙,各里坊、胡同,同样呈现等级系列。整个京城所有建筑及其装饰,在尺 度和数量上,都呈现严格的礼制数理。因此,在京城,无论是对皇城中还是皇城外的建筑,只有知道 某一具体建筑在整个礼制中的数理规定,才能对之有正确的理解。以门为例,皇城中门和皇城外的 王府、衙署、寺庙、民居之门,各有自己在礼制上的尺度,在礼制的基础上,方有自身的审美自由 发挥。这就意味着,仅从个体与礼制的关系看,具体审美对象就有两套形式美法则:属于礼制所规定 的数理法则和属于个人趣味的审美数理法则。二者在具体对象上是合二为一的,但礼制法则是由政 治文化的整体决定的,要通过关联性想象和推理方能了解,而它又是决定具体对象美感的重要因素。

(三) 宇宙形式

与个体审美对象相关联的另一项内容是宇宙数理。中国形式美的宇宙数理内容,从建筑来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礼制型建筑和园林型建筑。就礼制型建筑而言,只有具备了宇宙数理内容,美感才是全面的。北京作为京城之美,不仅在礼制数理,更在其处于整个天下地理中的性质。历代的风水理论家,从唐代杨益、宋代朱熹,到元代巴图鲁、明代李时勉、清代吴长元等,都论述过北京的形胜。北京的地形,西和北高,东和南低,西部西山是太行山脉,北部军都山是燕山山脉,二者均属昆仑山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好风水的一个重要特征:"龙脉悠远"。太行、燕山两山脉在北

京的南口会合,形成向东南巽方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桑干河、洋河在此汇成永定河,形成好风水的另一重要的特征:"山环水抱"。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去,北京为重重案山围绕,乃藏风聚气之地: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为第三、四重,五岭为第五重。加之右有华山为白虎,左有泰山为青龙,黄河在其前,鸭绿在其后。这是符合中国文化关于京城选址理论的理想之地。而京城内部,又对具体的建筑空间进行了理想化的构筑。比如景山为紫禁城的"镇山",体现了建筑的理想形态。金水河自乾方(天门)人而从巽方(地户)出,并在英武殿、太和门前凸成"金城怀抱"(冠带形)之势。金水河西北人而东南出,又正好形成 S 形,同样呈现出京城建筑的理想形态。总之,京城整体内蕴着中国建筑选址的理想结构。

京城又与天上相应,天上的帝宫是紫微垣,地上的宫城是紫禁城。天上地下有一套象征和比附体系,如前三殿象征三垣;三大殿下设三层台阶,象征太微垣下的三台星;后三宫加上两旁的东六宫、西六宫,共十五宫,与天上紫微垣十五星同数,等等。不管这套象征和比附有多少说法或变异,总之都围绕一个基本点:地下与天上的相应和互动,地下是天上的象征。这一天地象征体系先凝结成哲学思想,再体现为空间结构。按阴阳学说,南阳北阴,景运门、乾清门、隆宗门形成的一条东西中轴线,将宫区分为南北两区。外朝在南,属阳,内寝在北,属阴。前者为国,后者为家。前三殿是外朝的最高峰,也是整个宫城的最高峰,呈现为阳之极,也就是帝王之最尊。后三宫属阴,但又是皇帝的居家内寝,是后宫之极。这样,前三殿与后三宫一阴一阳,又以家国合一的方式和谐地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形成,依据的是中国哲学独特而又极有深意的观念。

此处所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直观形式美感背后,还有礼制的数理形式和宇宙的数理形式,直观形式、礼制数理、宇宙数理这三套数理形式完美结合,中国形式美的特点方凸显出来;二是京城之美不仅在于京城本身,而且在于其在地理的天下之中和天地对应中的地下之中的位置。北京与中国地理大势紧密相连,与最高的昆仑龙脉遥相连接,而其中紫禁城与天上紫微垣上下对应。不但京城的形式美如此,中国最小单位乡村的形式美也是如此。对于村落、城镇、寺庙、京城来说,中国的形式美从来不是就这一村落本身讲其美,而是要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首先是关联到前后左右四周及较远的山水,然后关联到整个中国地理形势包括以最高的昆仑山为核心的各类因素,最后是地理位置与天上星图的对应,这就是从远古到先秦形成的分野理论。因此,中国的形式美理论,不是一个个独立审美个体的抽象形式与宇宙的以黄金分割为核心的抽象形式的关系,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形式内容与周围山水、天下整体,以及地下与天上的关系。图 16 直观地展示了中国风水理论从村落到京城的普遍性关联,从中可以较为充分地理解这一理论的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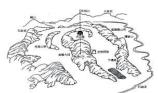


图 16.B 建筑关联远景



图 16.C 建筑关联全景



图 16.D 庙观实例



图 16.E 京城实例

图 16 中国风水理论中的建筑形式美

以上从京城实例分析了具体审美对象与礼制数理和宇宙数理的关联,重点突出了礼制,基本上是以礼制建筑为主,即以形式美的九宫图为主。而当中国的形式美以园林形式呈现时,礼制成分就基本消隐,个体形式与宇宙形式的关联便凸显出来,太极图成为形式美的主形。中国的私家园林自魏晋产生以来,不断影响皇家园林,从宋代艮岳到清代颐和园,基本上呈现为具体园林形式与宇宙形式的关系。这里且以颐和园为例。颐和园的形式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就其园内形式美与宇宙形式美的

关系而言,颐和园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主体,山为实,水为虚,构成了太极图的虚实关系。山后有狭长蜿蜒的后湖,山中谐趣园中有湖,这是实中有虚,犹如太极图的黑中有白。正湖的大水域中有南湖岛、藻鉴堂、治镜阁三小岛,这是虚中有实,犹如太极图中白中有黑。万寿山和昆明湖构成了太极图的阴阳相连和阴阳互含的宇宙形式之美。万寿山的前山,从云辉玉宇牌楼、排云门而上,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以前中轴线为中心,构成朝廷的庄严境界,而由佛香阁向后山,从智慧海到四大洲、多宝塔,构成了佛教的宗教境界。前后山是朝廷与宗教两大境界。昆明湖中,西堤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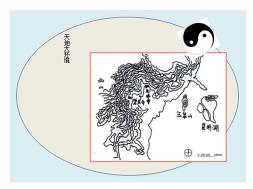


图 17 颐和园与天地关联 ①

的三岛,象征蓬莱仙山,呈道家仙境,与万寿山后的佛教境界相互呼应。万寿山下,东边从乐寿堂到东宫门是严整的宫殿区。东北半山上是谐趣园,仿自无锡的寄畅园,是典型的江南士大夫私家园林境界。正北后湖中是民间商业味的苏州街,南起团城湖北岸,东临玉带桥至界湖桥一线,是农家乐的耕织图景区。天下的各种美景都在颐和园中得到了体现。而在这各种境界之中,由各类太极曲线关联起来,从东宫门到乐寿堂再到长廊,经排云门上排云殿、佛香阁,是一条变幻多彩的太极曲线,佛香阁经湖山真意到石坊转后湖,是另一条由幽到明又曲径通幽的太极曲线。从庆善堂到谐趣园再到苏州街,是一条由庄境到雅趣再到俗乐的太极曲线,从知春亭到十七孔桥再到柳桥入西堤,又是一条湖光桥景不断变幻的太极曲线……另外,颐和园把玉泉山诸塔纳入园中,在山上的佛香阁和湖边的知春亭,都可以远望西山景色。在颐和园的大图中,它是与天下最高的昆仑山关联在一起的,当然同样具有天上地下的关联(图 17)。

总之,正如故宫以九宫图为主彰显中国形式美体系一样,颐和园以太极图为主彰显了中国形式美体系。只有理解了中国形式美的特色,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一切艺术的美感——比如中国山水诗的美感。且以杜甫《秋兴八首》其一为例,来看中国形式美的特色:

玉露凋伤枫树林,【视线由一点(露)到一片(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再扩展景色整体:天地之气中的山与峡】

江间波浪兼天涌,【由近(江)而远(天)的无限延伸,关联到宇宙形式美】

塞上风云接地阴。【由远(塞)而近(地)的回环往复,关联到宇宙形式美】

丛菊两开他日泪,【由眼前的空间之点(丛菊)而进入时间(他日)关联】

孤舟一系故园心。【由眼前的空间之点(孤舟)而进入空间(故园)关联】

寒衣处处催刀尺,【收,由各处空间回收到目前】

白帝城高急暮砧。【结,在上面的关联中再回到当下,心境苍茫】

理解了中国形式美的三层含义,就会理解杜甫的山水诗何以会这样写,进而理解整个中国古代山水诗与中国形式美的内在关联。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本图在岂凯《风水理论在明清北京古典园林中的应用研究》(北京林业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 绘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西方"如何作为方法

——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维度与方法论立场*

段吉方

[摘 要]当代西方文论诞生在 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首先应该基于历史文化语境的知识论维度的考察,即考察当代西方文论在知识话语层面上的特性,其次要深入到方法论层面上,辨析当代西方文论旅行的有效性及其弊端。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探究"西方"如何作为方法问题既是理论反思研究的目标,也是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核心问题。当我们建立起有效的反思研究的方法与路径的时候,理论话语的反思研究就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策略,这种策略的意义体现在有效把握中西文论研究的不同语境以及理论范式上的特征,从而起到跨越中西文论阐释间隔及其理论模式间的理解应用差异的作用。中国文论建构需要在"作为'方法'的西方"与"'西方'作为方法"所提供的路径上,在参照借鉴的过程中走向理论建构和体系建设,最终锤炼出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关键词]当代西方文论 知识论 方法 反思研究 中国文论

[中图分类号] IO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157-08

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文论以"语言学转向"和"俄苏形式主义"等文论的崛起为标志,开启了理论发展与转型的过程。在各种理论观念与方法的轮番登场中,文学批评理论异常繁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雷纳·韦勒克总结为是一个"批评的时代",①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则形容,"那一阵子,理论研究乘风破浪,让人觉得活得滋润"。②从宏观角度看,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确实成果斐然,批评理论流派不断涌现,各种新的理论观念不断抛出,甚至各种批评明星频繁出场。但是,经过了20世纪晚期以来近20年的发展,所谓"批评的时代"给当代文论发展留下的并非完全是取之不尽的话语资源和百试不爽的批评利器。首先,20世纪以来的批评理论尽管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但真正涉及批评实践的内容不多,迄今为止,在实质性的批评层面有所建树的理论观念,特别是对当下批评实践能够产生持续有效影响的方法、观念仍然很有限。其次,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文论话语系统中使所谓的"理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但也产生了"理论之争",并为当代西方文论中"大理论"的迅速退潮埋下了伏笔,所谓"光环散去,克里斯马式的魅力也归于习常,理论成为为数不少的人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 510006)。

①[美]雷纳·韦勒克:《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刘让言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日教授和学习的材料", ^① "理论"本身的这种遭遇与它当初产生的原生缺陷与不足有密切的关系。最后,所谓"理论"的繁荣仍然面临着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以及理论有效性的检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传播与接受等方面还没有出现令人可以期待的方向。

"理论的过去表明理论是有未来的",^②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上述问题开展的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不断升温,相关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建设很有启发,但也有进一步深化讨论之必要。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既要清理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历史与现状,更主要的还是要回到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让理论反思研究成为新的话语建构的生长点与理论建设的有效参照。本文从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知识论维度与方法论立场出发,提出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如何将"西方"作为方法的问题,以期为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的讨论提供一种参照的角度。

一、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三次理论高潮

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是中国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更成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中的核心议题。综合来看,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基本上是在文论研究的西/中理论思维模式及其话语张力中展开的,其主要的反思研究倾向和理论路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反思"西方",即强调大范围的西方文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当代文论知识生产与话语应用的困局,西方文论占据了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的核心话语层面,产生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严重依赖;另一个是指向本土,认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引用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有效表达,文学理论批评大量应用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理论观念,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设与发展。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倾向,却是互为因果地存在,在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可以说相互映衬,共同指向的是中国当代文论在把握当代批评经验方面的疲弱以及西方文论影响下的阐释偏差。

按时间顺序来看,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大致形成了三次理论高潮,分别是"文论失语症""理论过剩论"和"强制阐释论"。"文论失语症"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曹顺庆最早提出,他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继之而起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③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和修正,开始强调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进行发掘整理,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他的思路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并认为"这一操作与一般的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它不满足于在概念的表面做文章,不愿意再用一套未经反思的思维工具来重新切割传统概念,而是在整个研究工作中都贯穿着明确的'返回家园'的意识"。^④由此形成了从"文论失语症"到"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再到"话语重建"的策略。

当代文论研究中的"理论过剩论"的提出,在时间上稍晚于"文论失语症",大概在 2005 年左右,在理论观念上比"文论失语症"提出的问题更加具体。"理论过剩论"强调西方理论话语的大量涌入导致了文论话语的"拥堵"乃至"理论过剩"。"过剩"的理论概念、范畴充斥当代文论,导致理论分析过多,经验阐释不够,批评实践缺失,普遍存在"理论过剩而经验匮乏的倾向","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正在被批评家用理论术语自我演绎生成的意义所湮没。当诸如此类的批评越来越热闹的时候,批评的原始对象——作品本身却越来越远离了这种批评活动"。⑤ 有的研究者认为"理论过剩"体现了社

①[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②[美]文森特·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王顺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③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④ 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⑤ 高小康:《理论过剩与经验匮乏》,《文艺研究》2005年11期。

会思想生产中的一种批判和超越的态度,认为"理论过剩的实质乃是理论生产与运用上的过度",是一种"越界的可能"。^①"理论过剩论"后来还与"文艺学危机论"联系起来,其内在的逻辑是认为在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下,文艺学研究出现了边界的位移,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初衷与愿望,从而产生了学科危机。

"强制阐释论"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方文论话语反思研究的又一理论高潮。"强制阐释论"最早由张江提出,他认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特征与缺陷是"强制阐释",其主要表现在于"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②他呼吁"面对任何外来理论,必须捍卫自我的主体意识,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必要的辨析。既不能迷失自我、盲目追随,更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并且强调,"实现与西方平等对话的途径,一定是在积极吸纳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坚持以我为主,坚持中国特色,积极打造彰显民族精神、散发民族气息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③"强制阐释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论,而是努力寻求本土语境下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理论支点。"强制阐释论"积极倡导重返本土语境的文本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论域和批判实践过程提供了阐释分析框架,从而将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反思的问题从一种批判性观念上升为文本阐释的理论建构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就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来看,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开始的,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就开始出现了,此后不断走向深入。这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一种现实上的关联特性,即西方文论在中国是短时间大量引入的,但其中消化吸收的过程是比较短的,反思研究与理论接受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这种短时间融入同时短时间反思批判的特征自然影响了反思研究的效果与方式,所以才会出现反思"西方"与指向本土的反思研究意识相辅相成的过程。从理论的层面上看,无论是"文论失语症"还是"理论过剩论"以及"强制阐释论",实质上都是不断加剧的西方文论"中国旅行"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的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三次理论高潮在将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引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再次提出了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论的有效经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一种共识性的判断,即反思研究并不是否定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目的在于在西方文论话语与中国语境的相关性上建立有效的联系,进而实现理论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当我们建立起有效的反思研究的方法与路径的时候,理论话语的反思研究就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意义体现在有效把握中西文论研究的不同语境以及理论范式上的特征,从而起到跨越中西文论阐释间隔及其理论模式间的理解应用差异的作用,这既是反思研究的起点,同时更是反思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反思什么: 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起点与知识论路径

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言必称西方"。"言必称西方"的说法其实更多地是一种情绪判断,不应该成为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起点和问题,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不应该建立在这种情绪判断的基础上,理论反思研究的起点还是要回到知识论路径上来。知识论路径就是要排除情绪的、情感的"前判断",更多回到理论研究的共识性语境中。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提出,"理论是一种充满矛盾和盲点却靠着当下的现状支撑起来的社会历史建构",^④在他看来,理论是时代的一部分,当代西方文论体现了对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各种话语模式的命名方式,

① 余虹:《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文艺研究》2005年11期。

②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③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④ [美]文森特·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第210页。

这种命名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学批评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精神分析、政治学的分界线,以一种跨学科的形式集结于"文化研究这杆包容广泛的旗帜下"。^① 虽然里奇的观点最终指向的是文化研究,但也包含了对当代西方文论各种复杂的理论概念、范畴以及观念的知识论生产途径的思考。这种知识论的生产途径一方面与西方既有学术建制中的学科划分、专业设置以及课程体系有密切联系,如美国学者杰弗里·J. 威廉斯在《文学制度》中曾深入描述了这种学术建制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在他看来,当代西方文论各种流派的发展是由四种因素决定的,分别是:领军人物、重要文本、重大问题以及讨论整体领域的制度和方法,"形形色色由诸多先驱、文本、话题、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交错构成的微观史"^② 最终融汇成了一部理论史;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生产途径还与专业的或职业的理论家的批评实践分不开。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三种类型,他比较看重"职业的批评",认为"职业的批评"的价值在于照亮"将要遵循的艺术之路"。^③ 当代西方很多文论家可以说都是"职业批评家",他们的批评毫无疑问都是一种"职业的批评",当然,有些理论家还介于"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之间。作为一种"职业的批评",当代西方文论不仅带来了批评手段和方法的更新,更在各种批评方法的更新中蕴涵了不同批评传统与理论观念的深化,这种由批评手法和方法推动开来的批评观念的深化无疑才是它最重要的知识论生产路径。

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生产路径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经验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回到它的知识论 语境是反思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方面,杰弗里·J.威廉斯所说的影响理论研究发展的"领军 人物""重要文本""重大问题"在我们的理论反思中都有涉及,但"制度和方法"的问题所谈甚少, 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成为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所要补充的内容。在"制度和方法"的层面上,首 先需要一种与当代西方文论知识论语境对接的思路,在与"知识论"的对接上,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 究是反思当代西方文论中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观念适合我们, 哪些不适合我们, 这其中, 批评方法 论应该是反思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无论哲学思想,还是理论观念以及美学精神,都不能否认当代西 方文论有值得借鉴之处,这种可借鉴之处当然不仅仅因为"领军人物""重要文本""重大问题"更胜 一筹,更主要的是批评方法论的更新中所展现的批评理论思维的拓展和理论范式的更新,体现在文学 理论观念切入文学研究具体问题过程中的知识论的丰富和方法论的自觉。方法论的自觉体现了理论批 评观念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当代西方文论方法论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文学研究范围、对象、边 界的位移、上升以及外向拓展中所展现出的批评的"客体化"。所谓批评的"客体化"就是理论和批 评的概念、范畴等不仅发生在文本与批评话语的表层,而且发生在文学发展结构的内部,理论和批评 选择什么概念,使用什么范畴,概括什么问题,不是理论和批评本身说了算,而是理论和批评充分融 入对象、体验和经验之中,从而使批评的"客体化"起到批评方法选择、革新和规范的作用,最终影 响的是批评的哲学深度和美学高度。

批评的"客体化"可以产生各种新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可以激发许多原有的概念、范畴的新用法。在弗里·J. 威廉斯《文学制度》中,詹姆斯·J. 索思诺斯基曾经提出一种"理论垃圾场"的概念,他说:"批评家们一旦发现理论变得'过于老套',便立即将其替换掉。不过,这些旧理论跑哪儿去了呢?想必存在着理论的垃圾场——至少在我们的想象中应该如此。"^④他以詹姆逊的理论为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在"神秘叙事(Macical Narratives)"一章重新应用了格雷马斯、弗莱、普洛普等人的术语,从而使那些过时的老套的理论得以回收,重新利用,重写或重读,特别是普洛普

①[美]文森特·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第209页。

②[美]杰弗里·J. 威廉斯编著:《文学制度》,李佳畅、穆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③[法]阿贝尔・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 赵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6页。

④ [美]杰弗里·J. 威廉斯编著:《文学制度》,第27页。

的"情节(Plot)"这一早就被丢进理论垃圾场的"过时"概念在詹姆逊的理论中重获生机。詹姆逊用这样一个概念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表示了不同的意义,所以在他看来,"理论垃圾场"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术语,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这种处于"理论垃圾场"但很快又"变废为宝"的概念、范畴数不胜数,它既体现了当代西方文论在批评的"客体化"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也是批评方法论更新的理论效果。

批评的"客体化"的另一显著表现是让很多个别性的理论观念、概念、范畴引发整体理论观 念的策动,比如,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所谓"后理论"的概念。在关于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很多学 者都在讨论"理论之后""后理论"^①的问题,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认为,理论之后并不是理论 的消亡,而是一种理论的终结情绪,这种理论的终结情绪在当代阶段就有了,至少以以下几个重要 的理论事件为标志:"弗莱的概要式《批评的剖析》一书达到顶峰的时候";"当法国结构主义彻底 战胜了形式主义的时候"; "后结构主义被文化研究取代的时候"; "当文化研究以其经典的 20 世纪 70年代英国的形式,而不是后来的散乱无章的北美版本,在回顾中表现出一种比较有条理的政治性 和规划的时候"。②在他看来,"理论之后"是一种"悼念理论",这种"悼念理论"绝不是以哪一个 理论家出版了某个同名著作为标志和影响,或者哪一个理论家提出了理论走向所谓"后理论时代" 为标志,而是"理论之后"这个概念与当代西方文论中某些内在的方法观念变革和知识论状况的变 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内在的方法观念变革中,"理论之后"这个概念、范畴与理论研究具 体对象的"客体化"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批评的"客体化"与批评方法论的同频共振,并对文艺理 论观念的深化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支撑作用。这也说明,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中,知识论 的拓展和方法论的革新常常与批评的客体选择相互呼应,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批评"客体化"所导 致的文论研究范围和边界的变化、文学研究重心与格局的位移与拓展,类似于"理论之后"问题的 反思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概念和范畴层面上,其实就是在"反思什么"的问题上失去了重心。

三、作为方法的"西方": 理论的"做"与"用"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曾以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来反思日本"中国研究"的方法问题。他提出,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存在着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从而影响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及其文化表现特征的深入把握,导致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最终难以深入。所谓"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指的是日本在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将中国置于"异文化"来思考的文化混淆现象,"一方面使我们倍感亲切,另一方面又妨碍了我们对'异'的认识"。^③在沟口雄三看来,这种文化混淆现象形成了"没有中国的中国阅读"传统,"其结果要么变形为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知识为目的、或以埋头于中国本身为目的的另一种追随中国的中国学,要么就是自始至终停留在个人目的消费上的另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而这两者都不能算是真正自由的中国学"。^④他提出要"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作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⑤沟口雄三的思考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我们也要考虑如何以"西方"作为方法。

① 理论之后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得到集中研究,相关理论著作甚多,主要有 Martin MaQuilian et al.,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 Michale payne and John Schad, eds., *Life After Theory*, London: Continium, 2003;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2003; Jennifer Howard, "The Fragmen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6, Dec. 2005, A12-16. 见[美]文森特·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第 212 页。

②[美]文森特·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第212-213页。

③[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7页。

④[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 第130页。

⑤ [日]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第130、131页。

"西方"如何作为方法?在这里,正像沟口雄三说的那样,"西方"是作为榜样和超越的目标而存在的,是以世界为目的、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当代西方文论,因此,在这里"西方"不是"他者"的西方,不是"异文化"的西方;"方法"也不完全是作为目的而存在,方法本身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常识,方法不仅仅指具体的研究方法,它还应该是理论阐释分析的内在话语特征,在方法的层面上,"理论不应该被简化为一门技巧,一门教案"。①法国学者罗杰·法约尔在他的《批评:方法与历史》中曾专门从"方法历史"的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强调要用当代人文科学和批评方法所提供的理解手段来阐释文学的理论与观念,并提出"如果大学生们只是一味地使用一种词语,而没有学习理解新方法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进行的这些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会带来不好的作用"。②在"'西方'作为方法"的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方法是在理论剖析与定位的具体过程中起作用的,方法研究与反思体现的是方法和理论观念的同一性问题,这也是为了把反思研究真正作为研究对象和批评"客体化"的内容而考虑的。

作为方法的"西方"意味着什么?作为方法的"西方"要实现从"做"理论到"用"理论的转变, 这涉及理论的功用观问题。理论的功用性是复杂的,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更加如此。一直以来,文艺 学研究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说我们总是"用"很多"理论",忽视文本,是"从理论到理论"。但实 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文艺理论学科,各个学科都在"用"理论。按照法国学者埃德加·莫 兰的说法,理论是一个共同体(哲学共同体或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规则,"共同体对各种理论进行 维护、激励和批判",他还强调:"理论是开放的,因为它具有生态依赖性,它依赖于应用它的那个经 验世界。理论依靠与世界的交流而生存:它通过现实来进行新陈代谢,以便生存。"③当代西方文学理 论也如此,它也是文学共同体所总结和提出的观念,既有来自文学经验方面的思考,又存在观念层面 的主观创造, 所以, 并非"从理论到理论"就是错的。但"从理论到理论"的说法的确折射出关于理 论功用说的一种矛盾,即理论的"做"与"用"的差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有一本著作,题 目就叫作《怎样做理论》。他提出,有一些理论不是像某种工具那样是可以直接加以应用的,他举例说: "现象学探讨的是作品的存在模式;阐释学理论涉及的是观察者或读者与作品接触时的自我理解;格 式塔理论则聚焦在观察者的各种感知功能在作品的激发下如何发挥作用。这三种理论分别建立于不同 的前提之上:现象学以描述性前提为基础,阐释学理论基于历史性前提,而格式塔则建立在操作性前 提之上。三者都做出特定的假设、揭示了解读作品的独特模式、尽管这些假设并不表现某种阐释技法。 因此,这些理论要用做阐释技法,必须经过改变。" ④ 他提出理论是要"做"的,所谓"做"理论,就 是要把握理论的知识论内容和方法论价值,因为理论的目的是为某种知识框架打下基础,而为某种阐 释技法提供工具的理论就是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他还提出"硬理论"和"软理论"的差别,认为像物 理学的理论就是"硬理论", 其特性是为观察对象提供理论模式, 这种理论将各种数据归入系统从而 寻找一系列的结论;"软理论"则恰好相反,"软理论"是一种"试探性工作",它不接受法则的控制, 而是将被详细观察的对象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实现理论的闭合,"尤其是当它们聚焦艺术时,是通过隐 喻或者引入所称的'开放式概念'来寻求闭合的"。^⑤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一系列理论无疑是"软理论", 在知识论的层面上,这种理论是可以"做"的,但很显然,在反思研究的层面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 理论的"做", 而是要体现理论的"用", "用"理论才是"作为'方法'的西方"提供给当代西方文 论反思研究的启示性价值。

①[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第7页。

②[法]罗杰·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怀字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8页。

③[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秦海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④[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⑤[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第6页。

在作为方法的"西方"中,解决理论的"做"与"用"也是解决理论的批判与建设关系的一种方式,批判地反思就是理论的"用",否则只能是作为一种对象研究的"做"。这种理论的功用性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学者卡勒认为,所谓的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宏大叙述,文学理论其实是一种思维与写作的"躯体",文学理论是思维和写作同时进行的过程,它的作用在于"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作用,或者说让它们从中获益"。^①显然,卡勒的这种对待理论的方式是"用"理论,"用"理论不仅要把握理论的知识论内容和方法论价值,还要突出理论的思想性和超验性,这就不是普通层面上的研究了。可以说,一直以来我们是在"'做'理论"的层面来对待当代西方文论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从理论到理论"的指摘。破除所谓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困境就是要改变理论的功用观,实现理论的"用",特别是要实现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共生性",在理论和批评之间建立思想联系和精神影响。

四、"接受得怎样":理论旅行与中国文论建构

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也是所谓"理论的旅行"问题域中的内容。"理论的旅行"是美国文论家 赛义德提出的观念,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论的旅行"观念常常被视为是贬义的,认为"理论的旅行" 之后果其实就是理论的"贩卖"。但实际上,赛义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是世界范围内文论发展的 普遍经验,不仅仅包括理论的"中国旅行",而且包括理论的"世界旅行",是一种理论发展的恒常状 态。就含义来看,赛义德的"理论的旅行"内涵基本明确,指的是某种理论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传播与 接受过程出现的理论的增值、发展与变异的情况。在"理论的旅行"中导致理论变异的因素很多,如 语言翻译的错误、理论接受的语境、理论阐释的方式、理论应用的过程与目的等等。其中,如何在"理 论的旅行"中避免"误读"一直是理论接受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尽管如布鲁姆、保罗·德·曼等人那 般曾坚持理论的误读也是一种有益的修辞,但在"理论的旅行"中,"误读"常常使正常的理论的变 异过程发生重要偏差,从而导致理论接受上的错误。正是由于"理论的旅行"中有"误读"情况的 存在,也更加深刻地提出了理论反思研究不仅仅是探究接受的历史和现状,还要考虑"接受得怎样"。 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接受得怎样"是一种深层次的追问。有的研究者提出:"我们只有将文 学理论与这一时代的那些决定性力量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那些在文学理论的变迁框架中交错出现且 愈发全球化的现实。"②"接受得怎样"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决定和影响理论生产与变迁的社会思想力量 问题,因为在"接受得怎样"的思路下自然会引发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旅行"与本土经验的调适问题, 其目标就是要解决"理论的旅行"和本土化的矛盾。

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旅行"与本土经验的调适,其问题核心是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如何有效地构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及其理论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当代文论话语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其实一直在进行,可以说,自从中国文论有意识地确立自己的理论范畴及观念开始,我们一直致力于话语体系的建设。当代以来,从反映论到实践美学,再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实践存在论、文化诗学等,这种话语体系建设一直没有中断。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上重要日程,也使中国文论建构中的西方文论话语反思与批判借鉴的问题变得更加集中,"作为'方法'的西方"从根本上凸显了西方文论的"理论旅行"和中国文论本土化建构的联系,同时也蕴含着解决和推动这个问题的启发。

首先,"'西方'作为方法"所展现出来的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路径会更加有效 凸显西方文论发展与中国文论建构之间的理论相关性,也使所谓的"中国经验"问题有了参照互鉴的 理论依据与展开方式。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学者们很容易谈到"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本

①[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38页。

土性"等等这些概念,其实,这些概念都较为宽泛,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普遍经验的表达。文论上的"中国经验"是什么?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何在?"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如何比照?如果"中国经验"是比照西方文论经验而言的,那么,西方文论的反思研究有哪些与"中国经验"不相协调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一直缺乏知识论的拓展和方法论的提升。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论话语都各自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本土性特征,这种本土性根植在它的社会语境、哲学语境与现代性发展的历程中,体现了社会发展在文化、哲学和美学上的变革印记。也就是说,一种理论观念的生成以及一种理论形态的确立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的精神与内涵。从"'西方'作为方法"的角度,可以在知识论上的深度把握和方法论上的细致借鉴层面展现这种中西文论参照互鉴的效果,从而在"理论旅行"与中国文论建构之间建立深刻的话语关系。

其次,"'西方'作为方法"与"作为'方法'的西方"的反思研究路径会让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研究,突出中国文论建构的具体问题实在性和理论可行性。中国文论建构不应该是一句口号,或者是变为一种理论阐释上的需要。中国文论建构的问题本身需要加强学理研究。在所有关于文论话语的研究中,学理研究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在西方文论发展过程中,学理性是一个贯穿批评理论发展全过程的内容。这个学理性包含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哲学、美学与批评的学理,哲学的理论、美学的理论、批评的理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其实也是中国文论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更是"中国经验"研究在文学理论层面上需要突出的方面。文论话语的反思研究不能替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研究,尽管反思研究是一种研究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研究充其量只能提供方法与路径,在根本上,中国文论建构还需要在"作为'方法'的西方"与"'西方'作为方法"所提供的方法与路径上,在参照借鉴的过程中走向理论建构和体系建设,最终锤炼出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最后,"'西方'作为方法"对解决中国文论建构中的西方话语依赖问题有一定的启发。现代文学理 论范式的建立是从西方开始的,所以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话语建构的"西方视角"不可避免,但是这 种理论建构的西方视角不能走向西方话语的依赖,所谓"言必称西方"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当代西 方文论反思研究中,上升到"'西方'作为方法"的层面,所谓的"西方视角"就不是"言必称西方" 了,而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作为'方法'的西方"提供给中国文论的是一种思想资源,它与片 面依赖西方话语不同,依赖西方话语忽视了中国文论的地方性特征和本土性实践,"作为'方法'的 西方"则在一种非排他性的知识论参照和方法论立场中强调中国文论本土话语的特性与功能,它们的 差异体现在处理全球化语境与西方话语中心观的不同。全球化语境是一种客观现实,中国文论建构不 可避免地要融入文学理论的全球化进程,但一定要走出西方话语中心观。在走出西方话语中心观的过 程中,中国文论建构中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的树立也不是自我封闭的,中国经验体现的是中国文论 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这个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不能忽略西方文论话语经验而孤立存在, 这里面有一个"话语场"的建构问题。20世纪以来的西方各类文学理论家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 论话语场,在这个文论话语场中,当然更多地是突出西方文学经验及其批评实践,各种文学理论研究 中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基本上是基于西方话语场而构建的。在中国当代文论构建过程中,中国文论 不仅要加入这个话语场,而且中国文论自己的话语场优势也亟需凸显,中国文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从中国古代文论、到中国现代文论、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各种文论概念、范畴和理论观念实际 上已经包含一个非常复杂的话语场,如何进一步有效凸显这个话语场的作用及其价值,是中国文论话 语建构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从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反思研究逐步深入到中国文论话语建构 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同时也是艰难的,但并非是不可达成的。

责任编辑:王法敏

秦"书同文"告令颁布具体时间考*

王贵元 李洁琼

[摘 要] 里耶秦简 8-461 号木牍记录的是秦统一全国后"书同文"的部分内容,经对已正式公布的全部秦简牍的查证,木牍所载而出现在纪年简中的"书同文"字词有 4 对:"卿"与"鄭"、"鼠"与"予"、"大守"与"泰守"、"吏"与"事"。木牍原文为"卿如故,更鄉""鼠如故,更予人""大如故,更泰守""吏如故,更事"。另外,木牍还有官员名"秦"者须改名的记载。经考察,秦王政二十六年七月之前,除 1 例外,皆符合统一前用字规则,而秦王政二十六年八月之后又皆符合统一后用字规则。依据纪年简的年月日具体时间,可以确定秦"书同文"告令颁布的时间在秦王政二十六年七月至八月十三日之间。秦简牍用字有严格的规律,据此还可纠正现有释文中部分标注错误。

[关键词]书同文 秦简 字用

[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1)01-0165-08

秦统一全国后颁布的"书同文"告令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二十六年记录了这一事件,那么,秦"书同文"告令的颁布是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吗?如果是的话,具体是在二十六年的哪个阶段颁布的?这个问题涉及小篆的通行时间、秦出土文献的时代认定以及众多词语称谓调整改换的时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里耶秦简 8-461 号木牍记录的是秦统一全国后"书同文"的内容。木牍语言很可能是写者自用的简记,并非都是法定规则原文的照写,但是木牍使用了里耶秦简中少见的小篆字体,我们认为这是抄自用小篆书写的法定告令的表现。木牍所载内容只是"书同文"文告的摘录,并非全部,然而类型丰富,大致可分为正字形、正字用和正语用三类。正字形不包括字体的规定,只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隶书所做的整理,如"故皇今更如此皇""故。今更如此旦",前一个皇字上从"自",后一个皇字上从"白";前一个旦字"日"的最下一横与"一"相重,后一个旦字"日"与"一"分离。这种字形整理很可能是以小篆字形为标准做出的规定。皇字《说文》篆体上从"自",但出土的秦"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立号为黄帝"铜器和陶器铭文皇字基本从"白"。正字用如"吏如故,更事""卿如故,更鄉""者如故,更诸""鼠如故,更予人",包括异体字的职能分派、派生字的职能分配及假借字的使用等。正语用是对词语称谓的规定,如"毋敢曰豬曰彘""毋敢曰王父曰泰父""更詑曰谩"等。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史"(15ZDA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洁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已经有学者对里耶秦简 8-461 号木牍所列的部分内容进行过分析,我们也对木牍所列内容与 出土秦简牍进行过详细对比、研究表明、木牍所列内容是真实的、其规定在实际使用中得到了 比较严格的执行,如"更詑曰谩",《说文·言部》:"詑,沇州谓欺曰詑。从言,它声。"《原本玉 篇残卷·言部》:"《说文》:'谩, 欺也。'《方言》:'秦晋谓慧为谩。'郭璞曰:'言詑谩也。'""詑""谩" 皆是欺瞒之义,由此可见"更詑曰谩"即把"詑"替换成"谩",意即不用"詑"而用"谩"。睡 虎地秦简"詑"2见,字形隶作"訑",为异体。无"谩"字。岳麓秦简叁"詑"3见,无"谩"字。 岳麓秦简伍"谩"7见,无"詑"字。里耶秦简壹"谩"2见,无"詑"字。里耶秦简贰"谩"3见, 无"詑"字。大体而言,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叁为秦统一前文献,岳麓秦简伍、里耶秦简为秦 统一后文献,统一前用"詑",统一后用"谩"。

秦简中有些简牍内容含有明确的年月日时间,学界称其为纪年简。既然 8-461 号木牍所列规 定在实际使用中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在此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依据纪年简来进一步推断 秦"书同文"告令颁布的具体时间呢?

一、秦简纪年简"书同文"字词考察

经我们对已正式公布的全部秦简牍的穷尽性查证,木牍所载而出现在纪年简中的字词有4对, 即"卿"与"鄉"、"鼠"与"予"、"大守"与"泰守"、"吏"与"事",木牍原文为"卿如故,更 鄉""鼠如故, 更予人""大如故, 更泰守""吏如故, 更事"。另外, 木牍还有一句"诸官为秦尽 更",游逸飞已指出是指众官员有名为"秦"的要全部更改。^① 岳麓秦简伍 2026:"●令曰:黔首、 徒隸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貲二甲。"这也是改名的规定。秦昭王二十一年相邦冉戈、 三十七年上郡守庆戈、三十八年上郡守庆戈、四十年上郡守起戈铭文中皆有人名"秦",而统一后 的秦简牍文献不见人名"秦",可见人名避讳用"秦"是秦统一后的规定,也可一并考察。下面先 以二十六年纪年简为中心,考察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纪年简,然后再就相关字词扩展至全部秦简 牍进行考察。

本文考察所涉材料为秦统一全国前后的秦出土简牍材料,包括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里 耶秦简、放马滩秦简、周家台秦简、龙岗秦简。释文主要依据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 修订本》、②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一叁)・释文修订本》、③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 释 (第一卷)》、[®]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二卷)》,[®] 并据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朱汉 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②《岳麓书院藏秦简(贰)》、[®]《岳麓书院藏秦简(叁)》、[®]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⑩《岳麓书院藏秦简(伍)》、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⑫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贰)》、③张德芳、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④中国文物

① 游逸飞:《里耶 8-461 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第79页。

②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叁、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年。

③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

④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⑤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⑥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⑦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 (壹)》,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年。

⑧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⑨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⑩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①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⁴⁾ 张德芳主编,孙占宇著:《天水放马滩奏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

研究所等《龙岗秦简》^①核对图版。为印刷方便,与本文论题无关的释文一般用通行字。

(1) 廿五年八月甲子, 贰春卿(鄉)□□

宂佐百九十……☑(里耶秦简贰 9-127)

- 按,卿,《里耶秦简(贰)》及《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皆作"鄉",实为"卿"字,原字形作 题。里耶秦简(贰)9-15:"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鄉兹爰书:南里寡妇慭自言。"里耶秦简(贰)9-2283:"三月辛酉,迁陵丞欧敢告尉、告鄉、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鄉、司空、司空传仓,都鄉别启陵、貳春,皆勿留脱。"鄉字分别作 题、题。
- (2)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戊子,鄢将奔命尉沮敢告贰春<u>卿(鄉)</u>主:移计二牒,署公叚(假)于牒。食皆尽戊子,可受**廝**续食。病有瘳,遣从口。敢告主。十一月己丑,贰春<u>卿(鄉)</u>后敢言之:写上,谒令仓以从吏(事)。敢言之。丿尚手。

十一月壬辰,迁陵守丞戎告仓:以律令从吏(事)。 / 丞手。

即走筭行。(里耶秦简贰 9-1114)

按,文中两个"卿"字,《里耶秦简(贰)》及《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皆作"鄉",实为"卿"字,原字形作 (文)。文中两个"吏"字,《里耶秦简(贰)》及《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皆作"事",实为"吏",原字形作 (文)。里耶秦简贰9-1:"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里耶秦简贰9-1861:"五月乙酉,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官主:以律令从事。"两个"事"字形作 (本),可资比较。

(3) 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戊子, 贰春<u>卿(鄉)</u>后敢言之: 丞相言: "得巍(魏) 城邑民降归义者, 有故臣妾为拾虏,以<u>鼠(予)</u>之。"令书已到。敢言之。□辰,佐臧以来。丿韦半。赾手。(里耶秦简贰 9-1411)

按,卿,《里耶秦简(贰)》及《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皆作"鄉",实为"卿",原字形作

- (4) 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壬辰,迁陵邦候守建敢告迁陵主:令史下御史请书曰:自今以来,毋传叚(假)马以使若有<u>吏(事)</u>县中,及逆传车马而以载人、避见人若有所之,自一里以上,皆坐所车马为臧(赃),与盗同法。书到相报。今书已到,敢告主。毋公印,以私印。印章曰李志。(里耶秦简贰 9-1874)
- (5)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告之:大(太)守令曰:秦人□□□侯中秦吏自捕取,岁上物数会九月望大(太)守府,毋有亦言。问之尉,毋当令者。敢告之。(里耶秦简壹 8-67+8-652)
- (6)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丙子, 唐亭叚校长壮敢言之: 唐亭旁有盗可卅人, 壮卒少, 不足以追。亭不可空。谒遣卒索, 敢言之。丿二月辛巳, 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卿(鄉)主, 以律令从<u>吏(事)</u>。尉下亭鄣, 署士吏谨备。贰卿(鄉)上司马丞。丿亭手。丿即令走涂行。(里耶秦简贰 9-1112)

十二月,《里耶秦简(贰)》及《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皆作"二月"。按,癸丑朔是十二月朔日,细审图版,"二"前确有"十"字。

- (7) 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烦故为公田吏,徙属。<u>事</u>答不备,分 负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钱三百一十四。烦冗佐署迁陵。今上责校券二,谒告迁陵令官计者定,以 钱三百一十四受旬阳左公田钱计,问可(何)计付,署计年为报。敢言之。(里耶秦简壹 8-63)
- (8) 廿六年五月庚戌, **媽**(**馬**) 舍守欧、佐秦出案粟米四斗一升泰半升,以食**媽**(**馬**) 者居貸 士五朐忍宜新符积十三日,日少半斗,积四斗少半升。令史肄监。(里耶秦简贰 9-2292+9-2303)
 - (9) 廿六年七月庚戌, ´´´´´´´´´(斯) 舍守宣、佐秦出稻粟米一石一斗半斗,以贷居資(贷) 士五朐

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 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

忍阴里冉口积卅日。其廿一日,日少半斗;其九日,日少斗。令史庆监。(里耶秦简贰9-502+9-1526)

- (10) 廿六年七月庚戌, ´´´´´´´´´´(斯) 舍守宣、佐秦出稻粟米四斗少半斗,以贷居資(贷) 士五朐忍修仁齐,积十三日,日少半斗。令史庆监。(里耶秦简贰 9-1301+9-1935+9-1937)
- (11) 廿六年七月庚戌, ´´´´´´´´´´´´、(厮) 舍守宣、佐秦出稻粟米二斗以贷居資(贷) 士五巫霈留利, 积六日,日少半斗。令史庆监。(里耶秦简贰 9-1903+9-2068)
- (12)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壬戌, 厩守庆敢言之: 令曰司空佐贰今为厩佐言视<u>事</u>日。•今以戊申视事。敢言之。贰手。(里耶秦简壹 8-163)
- (13)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樛敢言:前日言兢陵汉阴狼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口,以求故荆积瓦。未归船。狼属司马昌官。谒告昌官,令狼归船。报曰:狼有逮在覆狱己卒史衰、义所。今写校券一牒上,谒言己卒史衰、义所,问狼船存所。其亡之,为责券移迁陵,弗口口属。谒报。敢言之。/【九】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却之:司空自以二月叚(假)狼船,何故弗蚤辟口,今而誧(甫)曰谒问覆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知)所居,其听书从事。(里耶秦简壹 8-135)
 - (14)廿六年后九月辛酉,启陵鄉守枯、佐□、禀人矰出麦四斗以贷贫毋穜(种)者贞阳不更佗。令史孙监。自受及券。(里耶秦简贰 9-533+9-886+9-1927)
 - (15) 廿六年后九月己酉朔癸酉,□□□□敢言□
 - □毋式□□谒令□□须以给□□

后九月癸酉,泰守府□□□□□□(里耶秦简贰 9-1891)

- 按,"泰"字《里耶秦简(贰)》及《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释文皆未释,此字字形虽较模糊, 但痕迹明显,是泰字无疑。
- (16) 廿七年十月庚子,迁陵守丞敬告司空主,以律令从<u>事</u>言。/ 應手。即走申行司空。(里耶秦简壹 8-63)
- (17) 廿七年十一月戊申朔癸亥,洞庭叚(假)守昌谓迁陵丞:迁陵上坐反适(谪)皋(罪)当均输郡中者六十六人,今皆输迁陵。其听书从事,它如律令。以新武陵印行事。
 - 十二月丁酉,迁陵守丞敦狐告司空主:以律令从事。 / 夫手。走畬即行。(里耶秦简贰 9-23)
- (18) 廿七年十一月戊申朔甲戌,库守衷敢言之:前言组用几(机),令司空为。司空言徒毋能为组几(机)者,今岁莫几(机)不成,谒令仓为,□□徒。腾尉。谒报。敢言之。
- 十一月乙亥,迁陵守丞敦狐告仓:以律令从<u>事</u>。报之。丿莫邪手。(里耶秦简贰 9-1408+9-2288)
- (19)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薄,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夬(决)泰守府。嘉、榖、尉在所县上书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丿壬辰,洞庭守礼重曰:新武陵别四道,以道次传,别□到,辄相报。不报,追之。皆以邮、门亭行。新武陵言书到。丿如手□
- 三月辛酉,迁陵丞欧敢告尉、告<u>鄉</u>、司空、仓主:听书从<u>事</u>。尉别书都<u>鄉</u>、司空,司空传仓,都<u>鄉</u>别启陵、貳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即报酉阳书到。丿□手。壬戌,隶臣尚行尉及旁。(里耶秦简贰 9-2283)
 - (20) 廿七年三月丙午朔己酉,库后敢言之:兵当输内史,在贰春口口口口五石一钧七斤,度

用船六丈以上者四艘。谒令司空遣吏、船徒取。敢言之。

- 三月辛亥,迁陵守丞敦狐告司空主,以律令从事。(里耶秦简壹 8-1510)
- (21) 廿七年八月甲戌朔壬辰,酉阳具狱狱史启敢□□启治所狱留须,敢言之。•封迁陵丞□八月癸巳,迁陵守丞陉告司空主,听书从事□(里耶秦简壹 8-133)
- (22) 廿七年八月丙戌,迁陵拔讯欧。辞曰:上造,居成固畜园,为迁陵丞。故为启☑视狱。 欧坐男子毋害诈伪自爵弗得。狱史角曹。•六月丙子论☑
 - 鞫: 欧失拜大男子赏横爵。有它论, 赀二甲。与此同事相遝。审。(里耶秦简贰 9-2318)

里耶秦简最早的简牍是二十五年简,{乡里}用"卿"。秦王政二十六年岁首为哪个月有争议,或曰十月,或曰十一月,当是十月。二十六年十一月简 {乡里}3见,皆用"卿",{事务}3见,皆用"吏",{给予}1见,用"鼠"。二十六年十二月简 {太守}2见,皆作"大守"。二十六年二月简 {乡里}2见,用"卿",{事务}1见,用"吏"。二十六年三月简 {事务}1见,用"事"。二十六年五月简人名"秦"1见。二十六年七月简人名"秦"3见。二十六年八月简 {事务}2见,皆用"事"。二十六年九月简 {事务}2见,皆用"事"。二十六年九月简 {事务}2见,皆用"事"。二十六年九月简 {事务}2见,皆用"事"。二十六年九月简 {本守}1见,作"泰守"。二十七年十月简开始,一直到八月简,{乡里}3见,用"鄉",{事务}10见,皆用"事",{太守}1见,作"泰守"。

综上,二十六年七月之前,除二十六年三月{事务}1见用"事"外,皆符合统一前用字规则,而二十六年八月之后又皆符合统一后用字规则。廿六年七月简3例人名"秦"皆为七月庚戌日简,廿六年七月朔日是庚辰,依此推算,庚戌日成了三十一日,很可能"庚戌"是误记,^①但七月应该没有问题。廿六年八月的2例"事"是壬戌日简,即八月十三日简,若此用字体现的是秦"书同文"告令的规定,则秦"书同文"告令颁布的时间在秦王政二十六年七月至八月十三日之间。

纪年简数量有限,它们能否准确反映"书同文"文告颁布前后的变化情况?存不存在偶然性和特殊性?要确定此问题,还必须全面考察相关字词在全部秦简牍中的使用状况。如果在全部秦简牍中相关字词的变换都符合统一前后这一界域,那么,纪年简中的相关字词自然就排除了偶然性和特殊性,依据它们来推断"书同文"文告颁布的时间就不存在问题。下面就"卿"与"鄉"、"鼠"与"予"、"大守"与"泰守"、"吏"与"事"进行全面考察。

二、相关"书同文"字词的全面考察

"卿如故,更鄉",意思是{职官}义仍用"卿",{乡里}义改用"鄉",其核心是{乡里}义用字的改变。睡虎地秦简在用于{乡里}、{职官}等词义时"卿""鄉"不分,皆写作"卿",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凡生子北首西鄉(向),必为上卿。"《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县啬夫若丞及仓、鄉相杂以印之。"三个"鄉""卿"字形分别作 《》 《 " " 集 " 集 " 。 唯用于 {方向} 词义时少量用"卿",大多用"鄉",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生东鄉(向)者贵,南鄉(向)者富,西鄉(向)寿,北鄉(向)者贱,西北鄉(向)者被刑。""鄉"原形作 《 ② 。这个形体显然是篆体的照写,前一个形体演变为后代的"卿",后一个形体则演变为后代的"鄉"。岳麓秦简壹用"鄉"表示 {乡里}4例,皆出现于《三十五年质日》,为统一后文献。岳麓秦简武和叁为统一前文献,岳麓秦简武 {乡里}6见,岳麓秦简叁 {乡里}3见,皆用"卿"表示。岳麓秦简肆和伍为统一后文献,岳麓秦简肆 {乡里}28见,岳麓秦简伍 {乡里}2见,皆用"鄉"表示。里耶秦简壹 {乡里}149见,皆用"鄉"表示。里耶秦简贰 {乡里}164见,其中 158 见用"鄉"表示,6 见用"卿"表示,其 6 例用"卿"者正是前列例(1)(2)(3)(6)秦王政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文书。因此,秦简牍中全部的"卿""鄉"用例都符合统—前后的区别,所以纪年简中的"卿""鄉"用例信实可据。

① 此点得到武汉大学陈伟教授提示, 谨致谢忱。

"鼠如故,更予人",意思是"给予"义不再用"鼠"表示,而用"予"表示。经查,睡虎地秦简 {予}18 见,皆用"鼠"字。岳麓秦简叁 {予}40 见,皆用"鼠"字。岳麓秦简肆 {予}12 见,皆用"予"字。岳麓秦简伍 {予}16 见,皆用"予"字。周家台秦简和龙岗秦简为统一后文献,周家台秦简 {予}1 见,龙岗秦简 {予}2 见,皆用"予"字。里耶秦简壹 {予}14 见,皆用"予"字。里耶秦简贰 {予}10 见,其中9 例用"予"字,1 例用"鼠",其1 例用"鼠"者也正是前列例(3)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一月文书。由此可见,秦简牍中全部的"鼠""予"用例也都符合统一前后的区别。下列秦王政二十六年后纪年简用"予"之例,可与前列秦王政二十六年用"鼠"文书对比。

- (23)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启陵鄉赵敢言之:令令启陵捕献鸟,得明渠雌一。以鸟及书属尉史文,令输。文不肯受,即发鸟送书,削去其名,以<u>予</u>小史适。适弗敢受。即詈适。已有(又)道船中出操栮〈楫〉以走赵,奊訽詈赵。谒上狱治,当论论。敢言之。令史上见其詈赵。(里耶秦简壹 8-1562)
- (24)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敢言之:廷曰:令居赀目取船,弗<u>予</u>,谩曰亡,亡不定言。 论及讂问,不亡,定谩者訾,遣诣廷。问之,船亡,审。沤枲,乃甲寅夜水多,沤流包船,船系绝,亡, 求未得,此以未定。史逐将作者泛中。具志已前上,遣佐壬操副诣廷。敢言之。(里耶秦简贰 9-982)
- (25)卅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鄉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

六月壬申,都鄉守武敢言:上。敢言之。/初手。

六月壬申日, 佐初以来。/ 欣发。初手。(里耶秦简壹 8-1443+8-1455)

"大如故,更泰守",即{太守}一词的用字由"大守"改为"泰守"。睡虎地秦简{太守}1见,作"大守"。岳麓秦简叁{太守}1见,作"大守"。岳麓秦简肆{太守}1见,作"泰守"。里耶秦简贰{太守}11见,皆作"泰守"。里耶秦简壹{太守}16见,14见作"泰守",2见作"大守",其2见作"大守"者也正是前列例(5)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二月文书。可见秦简牍中全部"大守"与"泰守"用例符合统一前后的区别。

"吏如故,更事",意思是"官吏"义仍用"吏",而改变"事务"义的用字。"吏""事"本是一字异体,"吏"与"事"的区别,主要是字形下部的"又"是独立存在还是插入下通的竖笔,前者是"吏",后者是"事",西周中期即有标准的"事"形体,但在睡虎地秦简中,"吏""事"仍不分,睡虎地秦简{事}凡150见,原释文皆隶定为"事",今核查图版,原形体作"吏"者148例,作"事"者仅2例。岳麓秦简壹{事}凡20见,《二十七年质日》2见,《三十四年质日》6见,《为吏治官及黔首》9见,《占梦书》3见。皆写作"事",《为吏治官及黔首》和《占梦书》一般认为是秦统一后文献。岳麓秦简叁{事}凡4见,3见用"吏",1见用"事"。岳麓秦简肆{事}凡25见,岳麓秦简伍{事}凡72见,皆用"事"。里耶秦简壹{事}凡117见,皆用"事"。里耶秦简贰{事}凡139见,用"事"133例。用"吏"6例,其6例用"吏"者有4例见前列例(2)(4)(6)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一月和二月文书。另如下2例无纪年。

- (26) □□亲毋过七月来报,不麦等以廿五年五月……□期未□臣请并将军亟执论,节命曰□臣□……□其□□戊戌,□□长贲告五□幕侯、两□马:听书从【吏】,□□论必□亟言莫侯以闻,已尽略齐地,鬼毋有□听书从吏,执捕必得之。唯留,各下书所臧式□真如此。(里耶秦简贰9-2301)
- (27)十一月甲寅,鲁阳守丞印下尉:以律令从<u>吏</u>。今亟日夜遣,毋出寅夕。唯毋失期。失期, 致啬夫、吏主者。它尽如遣新地吏令。痈手。(里耶秦简贰 9-1881)

其中1例文中有"二十五年五月"字样,此2例有可能也是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文书。可见秦简牍中"吏"与"事"的用例基本符合统一前后的区别。

前面我们说到, 里耶秦简壹{事}凡117见皆用"事", 里耶秦简贰{事}凡139见, 用"事"133

例,用"吏"6例。但依据《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释文,里耶秦简壹有4例"吏(事)"、里耶秦简贰除上述6例外,另有5例"吏(事)",这是认为里耶秦简还有9例"吏"表示{事},也即"吏"用为"事",且其中有秦始皇三十三年文书。里耶秦简除秦王政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前期文书外,都是秦统一后文献,若果真如此,则与秦统一后"吏""事"区分之结论不符。《里耶秦简牍校释》上述9例释文如下。

- (28) □□月己亥朔辛丑,仓守敬敢言之:令下覆狱遝迁陵隶臣邓□□□<u>名吏(事)</u>、它坐、遣言。•问之有<u>名吏(事)</u>,定,故旬阳隶臣,以约为□□□史,有遝耐皋以上, 毄(系)迁陵未夬(决),毋遣殹。谒报覆狱治所,敢言□□□刻刻下六,小史夷吾以来。/朝半。尚手。(里耶秦简壹8-136+8-144)
 - (29)说,说所为除赀者名吏(事)里、它坐、訾遣。(里耶秦简壹8-1090)
 - (30)及令丞令吏主遣者名吏(事)县、它坐。

今 告 清。

献泰。迁陵守丞陵口为为(里耶秦简壹8-1438)

- (31) ☑解定当坐者名吏(事) 里口。(里耶秦简贰 9-386)
- (32)八月乙巳朔甲寅,迁陵守丞都告廐主:亟定丞以下当坐者<u>名吏(事)里</u>、它坐、赀, 遣诣廷。以书言,署金布发。 J 欣手。(里耶秦简贰 9-756)
 - (33) ☑名吏(事) 里、它坐。(里耶秦简贰 9-1229)
- (35) 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壬辰,酉阳齮敢告迁陵主:或诣男子它。辞曰:士五(伍),居新武陵軴上。往岁八月毄(击)反寇迁陵,属邦候显、候丞不智(知)名,与反寇战,丞死。它狱迁陵,论耐它为侯,遣它归。复令令史畸追环(还)它更论。它毄(系)狱府,去亡。令史可以书到时定名吏(事)里、亡年日月、它坐论报赦皋(罪)云何,或覆问毋有。遣识者,当腾腾。为报,勿留。敢告主。丿五月戊戌,酉阳守丞宜敢告迁陵丞主:未报,追。令史可为报,勿留。敢告主。丿抗手。

六月癸丑,迁陵守丞敦狐以此报酉阳曰:已以五月壬寅、戊申报曰:它等未毄(系),去亡。 其等皆狱迁陵,盗戒(械)传谒迁陵。 / 遂手。 / 即令走起以送移旁。有前在其前狱。

里耶秦简壹和里耶秦简贰还各有一例相同语例,《里耶秦简牍校释》未标:

- (36) □□迁陵丞昌下乡官曰:各别军吏。•不当令乡官别书军吏,军吏及乡官弗当听。□其问官下此书军吏。弗下下,定当坐者名吏里、它坐、訾能入赀不能,遣诣廷。□□狱东。/义手。□【者】。/萃手。/旦,守府昌行廷。(里耶秦简壹 8-198+8-213+8-2013)
 - (37) □名吏里、□坐□(里耶秦简贰 9-789)

可以看出,上述各例具有共同特点,或言"名吏",或言"名吏里",或言"名吏县",属于格式用语,"名"即人名,"县""里"指居住地,那么,这里的"吏"到底是指什么?既然这是辩讼文书的规定要求,那么在里耶文书中必有具体体现,如上举第(34)例:"库武、佐当坐。武,上造,居旬阳□□。士五(伍),居灊工里。名吏(事)里皆定,毋它坐。"武,人名。上造,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制的第二级。其他例子如下。

(38) 廿七年八月丙戌,迁陵拔讯欧。辞曰:上造,居成固畜园,为迁陵丞。故为启□视狱。

欧坐男子毋害诈伪自爵弗得。狱史角曹。•六月丙子论☑•鞫:欧失拜大男子赏横爵。有它论,赀二甲。与此同事相遝。审。(里耶秦简贰 9-2318)

人名: 欧。爵位: 上造。居住地: 成固畜园。

(39)世年口月丙申,迁陵丞昌,<u>狱史堪【讯】昌。辞(辞)曰:上造,居平除</u>,侍廷,为迁陵丞。 口当诣贰春乡,乡【渠、史获误诣它乡,口失】道百六十七里。即与史义论赀渠、获各三甲,不智(知) 勃云赀三甲不应律令。故皆毋它坐。它如官书。(里耶秦简壹 8-754+8-1007)

人名: 昌。爵位: 上造。居住地: 平除。

- (40)世二年,<u>启陵乡守夫当坐。上造</u>,居梓潼武昌。今徙为临沅司空啬夫。时毋吏。(壹8-1445) 人名:夫。爵位:上造。居住地:梓潼武昌。
- (41) 世二年, <u>贰春乡守福当坐。士五(伍)</u>, 居<u>案(资)</u>中华里。•今为除道通食。(里耶秦简壹 8-2014)

人名:福。爵位:无爵位。居住地:築(资)中华里。

由此可见,"吏"所指是有爵无爵和爵位几何,秦律规定,爵位可以减罪、免罪和赎罪,所以论罪要标明爵位。在汉代简牍及传世文献中已直接用"爵"代替了"吏",由"名吏里"或"名吏县"改成了"名爵县里"或"名县爵里",如:居延新简 68.34:"• 状辞皆曰:<u>名爵县里</u>年姓官禄各如律,皆□。"居延汉简 7.31:"寿王敢言之。戍卒钜(巨)鹿郡广阿临利里潘甲,疾温,不幸死。谨与□□槥椟参絜坚约,刻书名县爵里槥敦参辨券,书其衣器所以收。"居延汉简 239.46:"鞫毄书到,定名县爵里年。"《汉书·宣帝纪》:"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颜师古注:"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

秦实行官爵合一制度,当官为吏,必须有爵,有爵者有意愿的话则可以为官吏。也就是说,爵位与官吏有关联性,因此,里耶秦简"名吏"之"吏"就是本用,并不是用为"事"。它所说明的是,在秦人语言文字里,这种词义就是用"吏"来表示,不应该用"事",也就是说,在"吏""事"分工之时,表示爵位这类身份的词义是归属于"吏"的,从汉语词义引申规律来看,用主要表示{官吏}的"吏"是合理的,而用主要表示{事务}的"事"则缺乏必然联系。因此以上9例的"吏"释文不应当标注"(事)"。

里耶秦简之释文"名吏"之"吏"标注为(事),可能是受了睡虎地秦简释文的影响,睡虎地秦简也有相同的语例,如《睡虎地秦简·仓律》:"后节(即)不备,后入者独负之;而书入禾增积者之<u>名事邑里</u>于廥籍。"《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有鞫》:"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五(伍),居某里。'可定<u>名事里</u>,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无)有,遣识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覆》:"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可定<u>名事里</u>,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无)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上述三例中"名事"之"事"原字形分别作

岳麓秦简肆和伍也有数例类似例句,如岳麓秦简伍第二组 168 正、169 正:"□□□□□。有不从律令者,都吏监者□举劾,问其人,其人不亟以实占吏其<u>名吏(事)官</u>□,吏三问之而不以请(情)实占吏者,行其所犯律令辠,有(又)驾(加)其辠一等。"原释文如此,其中的"名吏(事)官"之"吏"也是本用,不当标注"(事)"。

责任编辑:王法敏

《周礼》鸟兽尊彝形制再议

任家贤

[摘 要]关于《周礼·司尊彝》中所载鸟兽尊彝的形制,或以出土象形尊彝否定传统的刻画纹饰说和饰物说,或指出出土实物亦有带纹饰或饰物者,极力维护传统旧说。实际上尊彝的形制在先秦并不固定,结合礼书文献和目前所见两件带自名的动物形尊可以得出结论,先秦对酒器的命名是可据其形直接以动物名之的,《周礼》鸟兽尊彝称名中的动物名词不可释作纹饰或饰物。

[关键词]周礼 鸟兽尊彝 刻画 饰物

「中图分类号] K87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1) 01-0173-04

《周礼·司尊彝》中载有系列鸟兽尊彝,其文曰:"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裸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①关于这些鸟兽尊彝的形制,自古存在以郑玄为代表的刻画纹饰说和以王肃为代表的象形说,韦昭则尚有饰以动物之某部分之说,如象尊即尊饰以象骨,此或可名为"饰物说"。近代出土铜器增多,象形说较占上风。不久前,张雁勇撰文,全面分析诸说之争,指出象形说与刻画说、饰物说,实际上都有出土实物可比照,加之文献有支持刻画说、饰物说的例证,却缺乏直接推翻二说的反证,因此对旧说不可轻易否定。据出土实物否定刻画、饰物二说的学者,有"重考古而轻文献"的倾向。②检视近世据出土实物支持象形说的学者,或罗列各种动物形态之器与《周礼》中各种鸟兽尊彝名称比对,以证象形说;或径以象形说重新解释典籍,对刻画说、饰物说似乎都缺乏必要的检讨。从这一角度说,张雁勇认为诸家有"重考古而轻文献"的倾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徐中舒是为数不多的对三说都作了全面检讨分析的学者,然而对刻画说、饰物说也并没能提出足够有力的反证,只能持保留态度,故其文说:"吾人如遽以此说(笔者按,指象形说)为是而否认其余两说(笔者按,即刻画说与饰物说),则似又有未可。盖现存遗物中,不但有象鸟兽诸形之器,即刻画凤皇牛象诸形,及以象牙松绿石为饰者,亦不少见。如以地下遗物为依据,则此三说似皆有同样可信之理由。故此非别有其他左证,则吾人实无从断定其说之孰当孰否。按器物之以雕镂绘饰为名者,如琱戈、琱戟、画轉、画蟒、敦弓、镂簋,初不必缕举其雕镂绘饰之物。其以雕镂绘饰之物为名者,如旗帜有鸟、隼、龟、蛇、龙、象及狼头纛等,货币有龙币、马币、龙洋、鹰洋之类,皆必须资其雕镂绘饰以为识别之物。至普通用具如龙勺、虎符、鱼錀、龙舟、龟纽、

作者简介 任家贤,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006)。

①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14页。

② 张雁勇:《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

兽环,大致皆就其所象之形而言。故此尊彝中犧、象、鸡、鸟诸名,皆应释为象犧、象、鸡、鸟诸形之物。" ^① 既说"无从断定其说之孰当孰否",又说普通用具"大致皆就所象之形而言",故"皆应释为象犧、象、鸡、鸟诸形之物",可见徐先生态度之摇摆。

张雁勇进而力主刻画说、饰物说之不可废,他在讨论象尊时举例说:"装饰有象纹的,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代后期九象尊,腹部主纹为九条象纹,觚、簋、卣等青铜器也有饰以象纹的,存世较多。《诗·小雅·采薇》有'象珥',是弓以象牙为饰;《周礼·春官·巾车》载天子有'象路',是车上有象牙为饰,《弁师》载天子的皮弃有'象邸',是帽子上饰有象牙。这些器物都不是全体为象形而冠以'象'字的例子,尤其是通过《周礼》的例子可以类推出象尊可以象骨为饰。从前面几例的考察推及象尊,象骨说和图饰说较他说为长,而刻画象图说与鸡、鸟、虎、蜼、献等尊彝的类型更为一致。" 如果说要把出土实物与典籍记载——对应上、才能判断孰是孰非的话,那么,无论刻画说、饰物说还是象形说,目前都无法完全被证实。关键问题在于,出土实物大多都缺乏自名,更鲜有交代其功能,没有直接与典籍记载的鸟兽尊彝相联系的依据。张雁勇亦只能举出诸如在出土器物上同样有动物纹饰,以及文献中动物名词作修饰语可作纹饰或饰物解,来推论刻画说、饰物说不可轻易否定而已,这同样只具备或然性。然而,撇开文献与实物比对的方法,从尊、彝这类器物本身的形制演变考虑,《周礼》中的鸟兽尊彝当如何理解,应该是可以说清楚的。

徐中舒和张雁勇都认为"动物名+物名"的命名方式本身有多种理解的可能,理解成象某动物之器固可,理解成有某动物纹饰、或饰以动物某个部分之器亦可。故"动物名+尊/彝"似乎就有三种理解的可能。然而但凡命名一物,必首先定其形,若其形本即明确,方以纹饰相区别。上举的旗、币、弭、车,形制本身就是明确的,故以龙、鹰、象修饰之,就只会作纹饰或饰物解。然而如果事物本身没有固定形态,直接用纹饰或饰物为之定名,就会让人不明所以。至今所见先秦铜器铭文中,尊、彝就未见有作专名的;而先秦典籍中提及尊,则至少可指甒、壶、方壶、圜壶、瓦大等,^③彝则更可指宗庙常器,范围更广,这与铜器铭文中的情况基本一致。若给"尊/彝"命名时仅冠以纹饰或饰物,势必让人不知所指为何物。定名本为别物,若所指含混不清,这样的命名也就没有意义,先秦人当不会有这样命名的道理。因此,在尊、彝并无定制的先秦时代,冠于尊、彝前的动物名词只能理解成象形,而不能理解成纹饰或饰物。正因为尊、彝的形制不固定,才需要冠以犧、象等以限定之。至于张雁勇所举九象尊,其名乃后人所定,并不能代表先秦的称名情况。

然而,汉及以后的人何以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唯一的可能是汉人已对尊、彝的形制有一个固定的认识。验之出土实物,尊在汉代已是形制固定的酒器专名。1962 年山西右玉出土的两件汉代铜酒尊(图1、图2),一作盆形,自名为"酒樽";一作桶形,自名为"温酒樽"(温读为醖)。发掘整理者指出:"(这两种酒樽)都是我们以往在汉代器物中,最常见的器形,一般定名为奁和鉴,但现在铜器本身铭文,都作酒樽,是汉代特有的酒器形式。"^④再验之传世的《新定三礼图》,所绘的尊形,正有与桶形相似者,只是大小有别,^⑤或加圈足;彝的形制更是划一(图3、图4)。总之,尊与彝在礼图中的形制都比较统一。由此可知,汉人很可能对先秦酒器的形制已不甚了了,

①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46页。

②张雁勇:《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

③ 张雁勇引《庄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证明其时的尊非象形器。然而当时称尊本身就包括壶在内,但并不限于壶;《庄子》此语所说的"尊"正是壶,其不是象形器,并不妨碍"尊"可指象形器。《庄子》里亦同时有"百年之木,破为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犧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与用于浮乎江湖的尊就不是一回事。这都只能说明,当时的尊并非专名。

④ 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

⑤ 居延汉简中记载的樽即有两种不同的规格,又汉人认为卣是"中尊",都说明汉代的尊确实有大小之别。

而尊、彝在汉代已经是定名,故解释先秦文献时难免以今律古,在此基础上谓饰以文饰,自不致不知所云。事实上,汉人以当时的制度注释先秦文献的例子并非孤例,同样是《司尊彝》中的"舟",郑众就说"若今时承槃",就是以今律古的明证。^① 当然这本是很自然的做法,只是如果古今存在差异的话,这种解释的逻辑就行不通了。尊彝的情况即属古今有别,故汉人的解释就只能代表汉人的认识,与先秦实际恐怕并不是一回事。退一步说,即使不论器形之当否,将某些尊的修饰语解为纹饰,就很有增字解经的味道,例如犧尊之犧,郑玄读为"娑",谓"刻画凤皇之象于尊上,其形婆娑然",实嫌增字太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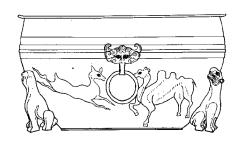


图 1 右玉出土汉代酒樽



图 3 《新定三礼图》所绘之尊



图 2 右玉出土汉温酒樽(剖面图)^②



图 4 《新定三礼图》所绘之彝 ③

综上所述,《周礼》中的鸟兽尊,确定其为象形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出土的众多动物形尊当中已出现了自名。材料虽然有限,但对我们理解鸟兽尊彝称名亦提供了一 些有益的参考,以下试对此再作一点讨论。

在动物形尊里,有自名的目前有二器。^④一是子之弄鸟尊(集成 5761),鸟形,铭云"子之弄鸟"。一是彇伯羊尊(集成 5913),羊形,铭云"彇白乍丼姬用盂羲"。鸟形器自名为鸟,不必深论。值得讨论的是彇伯羊尊。彇伯羊尊的羲字,容庚释为"镬";⑤张亚初释为"鏙";⑥陈汉平释为"鑴"。⑥程少轩所释与陈相同,并认为��即商器中的⑥。⑥在商器中作氏名,则羲亦是缀加了金旁的氏名。⑥从字形来看,羲当以陈、程释"鐫"为是。然而程少轩认为"鐫"不是器名,

①关于"舟",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不赘。

②图1、图2采自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附图。

③ 图 3、图 4 采自[宋] 聂崇义集注,[清]康熙十二年通志堂刊《新定三礼图》(原刊本)。

④ 另有猪形晋侯尊(铭图 21·11610),铭云"晋侯作旅》"。末一字目前有较大争议,不过作器名解有较大困难,郭永秉认为当释似,单独点断,表祭祀,似较长(参氏著《晋侯猪形尊铭文商榷》,《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故此暂不纳入讨论。

⑤ 容庚:《金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912页。

⑥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2页。

⑦ 陈汉平:《金文编订补》,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第171页。

⑧ 程少轩:《试说"篙"字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46页。

笔者以为,"鑴"字应是从金、巂声的形声字。循形、声求之,恐即典籍中之"犧"。巂、羲均属歌部,音颇近。"鑴"从金,当强调其材质。^② 犧从牛,则强调器形。^③ 以"鐫"(犧)自名,其例正与上述子之弄鸟尊自名为"鸟"同;《礼记·礼器》"君西酌犧象,夫人东酌罍尊",犧、象与罍、尊对举;《明堂位》更径谓"尊用犧象山罍"、"犧象,周尊也",犧、象也均是以动物名单称器物。故"鐫"可作器之称名,不是没有可能的。古代如王肃、刘杳等持犧尊为象形器的学者,都认为"犧"就是牛形。若"鐫"果即"犧"字,强伯羊尊自名为"鐫"而为羊形,则旧说谓犧必为牛形亦有未安。王念孙虽支持郑玄刻画之说,但指出犧字本六畜之总称,亦有一得之见。^④至于鐫前冠以"盂",盂可作水器或食器,这里可能是强调该器用作装水或酒,正如子之弄鸟尊称"弄",乃表示该器用于赏玩一样。

由此二器,结合上引礼书可见,先秦对酒器的命名是可据其形直接以动物名之的。当然这类名称若单称,在叙述中容易与普通的动物名发生混淆,在其后缀以共名,使其复音化,是比较好的分别办法,比如它们都是酒器,就可称鸟尊、犧尊。这好比汾、汝等河流本可单称,后世亦缀以共名,称汾水、汝河。那么,《周礼》中鸟兽尊的称名,很可能是从单称其形,再到缀以共名,才形成"动物名+器名"的称谓。这与如龙旗、鹰洋等名称,在形制明确的物名基础上加修饰语形成的专名,演变过程完全不同。从这一角度说,鸟兽尊中的动物名词就更不能理解成纹饰或饰物了。

以上就尊彝的形制,结合出土器物的自名,对鸟兽尊称名的理解作了讨论。当然,目前出土的动物形尊,动物的种类众多,《周礼》中冠于尊彝前的动物名词也不少,要逐一落实,就要等待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了。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查飞能:《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西南大学 2019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庄子·马蹄》"纯朴不残,孰为犧樽",《天地》则说"百年之木,破为犧樽",知犧尊亦可为木制。

③类似的例子如瓶与缾,从瓦,强调其材质;从缶,则强调其器类。异体字之间亦往往有形旁、声旁皆异者,如迹与蹟,和鏞、犧尤可比照。

④ 查飞能正确地指出鑴应是根据器之象形自名,然而拘于器形(查氏谓"马獏形"),辗转谓此器形即《山海经》中的"孟极",鑴借为"极"字,缺乏确据,且亦迂曲。

Main Abstract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Outlook

Li Fengliang and Yang Hui 1

Xi Jinping'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outlook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ultural security thought of Marxist and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ecurity theory of Marxist and has abundant Marxist philosophy Co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Xi Jinping'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outlook puts forward that "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quint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Moreover, it use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ensur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Furthermore, uphold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eople, which can provide strength for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has been taken account. In addition, it adheres to the Marxist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ory and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Finally,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trength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Therefore, in-depth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outlook equipped with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nhancing cultural awareness,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o build a great cultural socialist country.

Boundary and Interpretation: Re-examination of Ecological Ded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Lu Qiang 16

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or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results of introdu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ideas into this context are common and have become popular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 is a great histor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deas, whether they are the background or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results is largely a process of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Therefore, specific methodologies are required as principles in order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of interpretation.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bounda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carry out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xten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is,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ould be constructed legitimately. And we cannot arbitrarily mix and compare some seemingly similar concepts and theories, so as to produce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s that violate academic common sense.

Market or FDA Office?

—The Administrative Logic of Food and Drug Regulatory Regime Reform Choice in Township-level

Liu Peng and Zhong Guangyao 3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gency reorganization of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ownship-level since 2013 in China. By examining two cases studies of two counties in J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ministrative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s' agency reorganization choi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mbiguity. A series of important findings have been advanced: Firstly, the reorganization choi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have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obedience, peer induction, and self-rationality. Secondly, it's the local governments' own rationality that really matters to select their own agency structure, which comes from the rational judgment of their own work performance, risk status, and authorized size. Thirdly,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demonstrate the correctness of their own agency reorganization choices, by using "selective" administrative rhetoric and "tactic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 series of policy suggestions have been advanced for stud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future.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Scal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Zhang Keyun and He Dazhi 74

"Regional coordination" mainly includes two aspects: "determining the spatial scale" and "formulating the coordination means". As for the former, although China has formulated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round the Four Regions, it has not yet formed a suitable scale to achieve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 fact that "simply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Four Regions as the focal point of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ion" has not substantially changed. This kind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based on a single scale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situa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s still grim. For this reason,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combing the scale type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multi-scale framework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ith the main contents of "building blueprint guidance by coordination among the Four Regions, steering policy direction by coordination among problem regions, imposing targeted measures by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by urban agglomeration coordination".

Different Anticipation of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Sang Bing 111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every Chinese was advocating persisting with the fight to the end. However, the anticipation of the "end" vari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were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strategic goals of the war: restoring domestic condition to the one before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recapturing the lost territory in the north-east China, reestablish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disarming Japan completely. The first one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Kuomintang's compromise policy, while the others were based on different estimates of China's strategic forces. Accordingly, diverse approaches were required to resolve the continued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Practice, Characteristic and Character of Professor Liu Jiahe's Academic Researches to My Knowledge

Liu Linhai 134

As a deep and penetrating historian, Professor Liu Jiahe is eminent for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research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es, as well as the West and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ancient Greek, his academic research shifted to ancient India before going back to China. He has been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se fields, breaking a new trail to study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has solved some controversial problem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or jingxu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philosophical insight, and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with the logic tradition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h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learning of ronghui guantong (harmonizing differ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into an academic system or hierarchy)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interpret interactively the histories of the West and China in comparison. Open-mindedness, noble academic aspiration, perseverance, reflexivity for improvement and high-efficiency make him a perfect model for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profession.

"Zhong" (中) Produces the Beauty of Form in China and Its Origin, Forming and Contents

Zhang Fa 144

The beauty of form in China produced from the observation to astronomical phenomena on central pole which nine-five ratio and sixty angle came into being and the cross, fylfot, octagon, Ya-pattern and disk' type developed in many ways, and finally formed the Jiugong-diagram and Tianji-diagram in Yi-book that in the pre-Qin and Han times absorbed qi, Yin-yang and wu-xing ideas and became the main thoutht. The Jiugong-diagram relative with dynasty's aesthetics and Tianji diagram cosmic aesthetics. Therefore the beauty of form in China shaped its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he whole unity related the individual form with dynasty's form and cosmic form.

How to Use "the West" as a Method

——On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and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of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Duan Jifang 157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as born in the complex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western societ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Western Lterary Theory is the first, we should investigate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hat 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on the level of knowledge discourse, Secondly, we shou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ravel. In the study of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study of "How to use 'the west' as a method" is not only the goal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 but also the core issue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methods and paths provided by "the West as a method" and "the West as a method", in the process of rethinking, we will go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temper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